



05.3
8/6

斯 大 林
列 寧 主 義 問 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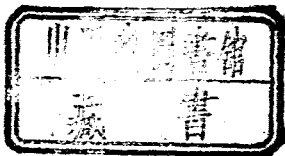
下 卷 新 版

J. STALIN

PROBLEMS OF LENINISM

VOLUME 2

扣



1940

227514

中國出版社 出版



目 錄

俄國共產黨第十四次臨時大會工作底總結	3 — 29
一 國際情形	3
二 資本主義國家內共產黨底當前任務	9
三 殖民地及附屬國內共產主義分子底當前任務	12
四 論蘇聯社會主義底命運	14
五 黨在鄉村中的政策	22
六 論五金工業	27
東方民族大學底政治任務	31 — 42
一 東大對於東方蘇維埃共和國底任務	32
二 東大對於東方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國家底任務	37
問題與答覆	43 — 74
共產主義青年團底任務	75 — 79
中央政治報告底結論	81—108
一 沙珂爾尼考夫同志與我國道威斯化	81
二 加米涅夫同志和我們對農民的護步	83
三 誰的失算	85
四 沙珂爾尼考夫同志怎樣擁護貧農	86
五 思想上的鬥爭還是認悶？	87
六 論新經濟政策問題	88
七 論國家資本主義	89

八	季諾維埃夫同志與農民	94
九	分歧底歷史	99
十	反對派底綱領	104
一	他們的“愛和平”	106
二	黨必須要達到一致	107
聯共中央在十五次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		109—172
一	世界資本主義恐慌底增長和蘇聯底國際地位	109
1.	世界資本主義底經濟狀況與國外市場鬥爭底加厲	
2.	資本主義底對外政策和帝國主義新戰爭底準備	
3.	世界革命運動底現狀和新革命高漲底預兆	
4.	資本主義世界和蘇聯	
5.	總結	
二	社會主義建設底成績與蘇聯底內部情形	121
1.	整個國民經濟	
2.	我們社會主義大工業發展底速度	
3.	我們農村經濟發展底速度	
4.	階級、國家機關、國家文化的發展	
三	黨和反對派	142
1.	黨內情形	
2.	討論底總結	
3.	黨與反對派之間重要的分歧	
4.	以後怎麼樣？	
四	總結	158
結論		161—172
一	關於拉考夫斯基同志的演說	161
二	關於加米涅夫同志的演說	163
三	總結	170
聯共中央擴大會議的總結		173—186
一	共產國際的問題	173
二	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問題	178
三	結論	185
論國家工業化及蘇聯共產黨內底右傾		187—214
一	工業化發展的速度問題	187
二	五穀問題	194
三	論反對傾向及調和派的鬥爭	201
論德國共產黨內底右傾危險		215—226
一	資本主義穩定問題	216
二	無產階級階級鬥爭問題	218
三	德國共產黨問題	220

四	德國共產黨內和聯共黨內底右派.....	223	
五	關於秘密信和公開信底草案.....	224	
	大轉變的一年.....	227—233	
	蘇聯的土地政策論.....	239—256	
一	“平衡，論.....	240	
二	社會主義建設的“自流，論.....	242	
三	小農經濟“穩固，論.....	244	
四	城市與鄉村.....	247	
五	論集體農場底性質.....	250	
六	階級的變動和黨策略上的轉變.....	253	
七	結論.....	255	
	論消滅富農階級底政策.....	257—260	
	勝利衝昏頭腦（論集體農場運動問題）.....	261—266	
	給集體農場工作的同志們的答覆.....	267—284	
	蘇聯共產黨第十六次大會上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	285—384	
一	日益增長的世界資本主義的恐慌與蘇聯的國際地位.....	285	
1.	世界經濟恐慌	2.	資本主義矛盾的銳利化
3.	蘇聯與各資本主義國家的關係		
二	社會主義建設不斷地發和蘇聯底內部情形.....	301	
1.	整個國民經濟底發展	2.	工業化的成績
3.	社會主義工業底指導地位和他發展的速度		
4.	鄉村經濟和五谷類問題	5.	農民轉向社會主義和蘇維埃農場集體農場發展的速度
6.	改善工農的物質條件和文化條件	7.	發展中的困難、階級鬥爭和社會主義在整個戰線上的進攻
8.	資本主義制度還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	9.	目前的任務
三	黨的問題.....	351	
1.	領導社會主義建設的問題	2.	領導黨內生活的問題
結論.....		374	
	論經濟工作人員的任務.....	385—393	

出版者聲明

本書俄文本第十一版，現在已經出版。和第十版不同之處在於，新版中添加了斯大林的下列著作：

在克列姆宮紅軍學院畢業典禮時的演說

在蘇聯第一次全國斯塔漢諾夫式的工作者會議上的演說

關於蘇聯憲法草案底報告

關於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

聯共（布）中央在第十八次黨代表大會上的工作總報告

這五篇著作中之前三篇，本社已編入“斯大林言論選集”出版，第四篇即“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底第四章第二節，第五篇國內已有幾種譯本出版。

（如：葉非木譯本，書名“今日之蘇聯”）

本書此次出版，並未將上述各著作補入，但亦並未在第十版內刪去任何文字。市上某書店出版之“列寧主義問題”上下冊，係由本書上下卷另外加入若干斯大林之著作編輯而成，但內容與俄文本之增補本並不相同。

俄國共產黨第十四次臨時 大會工作底總結

一九二五年五月九日在莫斯科黨部積極份子會議上的報告

同志們！我想在這裏把我們黨的第十四次臨時大會所通過的議決案加以詳細的討論是沒有意思的。這要花費許多時間，並且在這裏也沒有必要。我想只限於把這些議決案中最主要的路線指出來就夠了。這樣可以使我們特別指出議決案中的基本結論。而且將來研究這些議決案也容易些。

假使把議決案觀察一下，在那裏牽涉到的各種問題，可以分爲六種主要問題。第一種問題是關於國際狀況的問題。第二種問題是關於資本主義國家裏的共產黨目前任務的問題。第三種問題是關於殖民地及附屬國的共產主義份子的目前任務問題。第四種問題是關於在我們國家中社會主義的命運和目前國際環境相關的問題。第五種問題是關於我們黨在農村中的政策及黨的領導在新條件中的任務。末了，第六種問題是關於我們的各種工業的主要命脈，就是五金工業的問題。

一 國際情形

在國際情形中，決定目前時局主要性質的新鮮的與特殊的地方何在？

在最近時期內發現的，及影響國際情形的新鮮的東西，就是一方面在歐洲革命潮流開始低落，開始有些沉靜，所謂資本主義暫時的穩定。同時蘇聯的經濟與政治力量又是發展着。

什麼叫做革命潮流的低落與沉靜呢？這是不是已經開始結束世界革命，已經開始取消世界無產階級的革命呢？列寧曾經說過：在我們的國家中無產階級勝利以後，已經開始了新的時代，即世界革命的時代，極端衝突與戰爭，進攻與退守，勝利與失敗的時代，即在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中將使無產階級獲得勝利的時代。

假使在歐洲，革命潮流已經開始低落，這是不是說列寧關於新時代，關於世界革命時代的估計都失去了效力呢？這是不是說西歐無產階級的革命已經取消了呢？

不是，不是這個意思。

世界革命的時代，是革命的新階段，包括許多年，或者可以說包括幾十年的戰略時期。在這個時期的過程中，革命潮流能夠並且必有低落與高漲。我們的革命在他的發展過程中經過了兩個階段，兩個戰略時期，在十月之後進入第三個階段，第三個戰略時期。第一個階段（一九〇〇到一九一七年）繼續有十五年多。他有他的推翻沙皇制度，爭取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革命勝利的目的。在這個時期的過程中我們看到革命潮流有許多低落和高漲。在一九〇五年我們曾經有過高漲。革命暫時失敗，這個高漲告終了。以後我們曾經有過延長許多年的低落（一九〇七到一九一二年），以後我們在列那河事變中（一九一二年）又發現了一個新的高漲，以後在戰爭的時候又換了一個新的低落。一九一七年（二月）又發現了新的高漲，結果人民戰勝沙皇，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革命遂告勝利。在每個低落之後，取消派都要說革命已經完了。然而革命經過許多低落和高漲，在一九一七年二月，終究得着了勝利。

從一九一七年二月起開始了革命的第二個階段。他有從帝國主義戰爭中退出，推翻資產階級，和爭取無產階級專政勝利的目的。這個階段或者戰略的時

期只延長八個月之久。但是在這八個月內是加深了革命的危機，當時戰爭和破壞鞭策着革命，使牠依着極快的速度向前跑。唯其如此，革命危機的八個月份最少能够並且應該等於平常憲法發展的八個年頭。這個戰略時期和以前的戰略時期一樣，其特點就在於革命並不是按着筆直的上昇的路線不斷的高漲，如同一般庸人對於革命的觀察，而是有低落與高漲。在這個時期中，在七月的示威遊行的那天，革命運動有絕大的高漲。在多數派的七月的失敗之後，我們看到革命潮流又低落了。在考爾尼老夫事變之後，新的高漲，直接地替換了這個低落，這個高漲至十月革命取得勝利後，才告一段落。在七月的失敗之後，這時期的取消派滔滔不絕地說革命完全消滅了。然而革命經過了許多困難和低落，驟然的，無產階級專政奏了凱旋歌。

在十月勝利之後，我們進入了第三個戰略時期，第三個革命階段，牠有在世界範圍中推翻資產階級的目的。這個時期延長到什麼時候，這很難說。無疑的，無論如何牠是很長久的，同樣無疑的，牠有牠的高漲和低落。目前世界革命運動進入了革命低落的時期，同時這個低落由於許多原因（我在下面將要說到），——應當有一個高漲來代替，這種高漲或將以無產階級的勝利結束牠，或者不以無產階級的勝利來結束牠，而又換上一個新的低落，這個低落的本身應該又有一個新的高漲來代替牠。現在的取消派說：進入沉靜狀態就是世界革命的告終。但是他們錯誤了，和以前的錯誤一樣，即在第一第二革命階段的時期，那時他們以為每個革命運動的低落都是革命的破壞。

這便是每個革命階段的內部，每個戰略時期的內部搖移的情形。

這些搖移的情形告訴我們什麼東西呢？牠們是不是說列甯關於世界革命新階段的說法已經失掉，或者可以失掉牠的意義呢？不是。自然不是。牠們只是說：革命普通不是按筆直上昇的路線不斷地向上增長，而是經過曲線的道路，進攻和退守的道路，高漲和低落的道路，在發展的行程中鍛鍊革命的力量，並準備牠徹底的勝利。

這就是進入革命低落時期的歷史意義，我們所處的沉靜的的歷史意義。

但是低落只是事情的一方面而已，事情的另一方面就在於除却在歐洲革命的低落之外，我們看到蘇聯經濟的猛烈發展及其政治力量的增長。換言之，我們不僅有資本主義的穩定。同時我們還有蘇維埃制度的穩定。所以我們有兩個穩定：資本主義暫時的穩定及蘇維埃制度的穩定。在這兩個穩定間達到了某種暫時的平衡，這就是我們所處的國際情形的特點。

什麼叫做穩定？這是不是停滯，假使穩定就是停滯，可否把牠應用到蘇維埃制度上去？不，穩定不是停滯。穩定是目前狀況的鞏固及將來的發展。世界的資本主義不但鞏固了目前狀況的基礎。牠再走下去並向前發展擴大牠的勢力範圍，增殖牠的財富。說資本主義不能發展，說列甯在他的“帝國主義”，一書中提出關於資本主義腐敗的理論好像把資本主義的發展一筆勾消了，這是不對的。列甯在他的“帝國主義”的小冊子中，完全是證明資本主義的發展沒有取消，而是包涵和準備資本主義進步的腐敗的事實。

所以我們有兩個穩定。在一端穩定了資本主義，鞏固了牠已經達到的情況並向前發展。在另一端穩定了蘇維埃制度，鞏固了牠已經取得的地位向前走到勝利的道路上去。

誰戰勝誰。一切中心問題就在這裏。

爲什麼一個穩定和別的穩定並駕齊驅，這兩個極端從何而來的？因爲在世界上，統一的，沉澱各處的資本主義已經沒有了。因爲世界已經分裂爲兩個營壘，——資本主義的營壘，以英美的資本家爲首領；社會主義的營壘，以蘇聯爲首領。因此世界的情形更要取決於這兩個營壘間的相互力量的對比。

所以目前的特點不僅在於穩定了資本主義及蘇維埃制度，並且這兩個營壘達到某種暫時的平衡，對資本有些長處，對革命運動有些短處，因爲與革命的高漲比較一下，已進入的沉靜狀態，對於社會主義無疑的是暫時的短處。

這兩個穩定間有什麼分別？這兩個穩定各朝那一方面進行？

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的穩定，暫時加緊了資本的力量，同時必定加緊了資本主義的矛盾；甲、各國帝國主義集團間的矛盾；乙、各國工人和資本家間的矛

盾；丙、帝國主義和各區殖民地民族間的矛盾。

但在蘇維埃制度的條件下的穩定，加強了社會主義，同時必定軟化了矛盾並且改善了：甲、我們國家的無產階級和農民；乙、無產階級和被壓迫國家的殖民地民族；丙、無產階級專政和各國的工人階級的相互關係。

但是，不加緊地剝削工人階級，沒有大多數勞苦羣衆半餓的生活，不加緊壓迫殖民地及附屬國，各帝國主義間沒有衝突和矛盾，資本主義是不能夠發展的。同時，蘇維埃制度及無產階級專政，只有不斷地提高工人階級的物質及文化的狀況，不斷地改善蘇維埃國家的一切勞苦羣衆的情形，加緊接近和聯合各國的工人，聯絡殖民地及附屬國的被壓迫民族環繞於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周圍，在這些條件之下，才能發展起來。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是廣大的勞苦羣衆生活之貧困及半餓的道路，同時收買並豢養小部份這些勞苦羣衆的上層份子。

反之，無產階級專政發展的道路是不斷地提高大多數勞苦羣衆的幸福。

正因為如此，資本主義的發展不能不產生加緊資本主義矛盾的條件。正因為如此，資本主義沒有力量來解決這些矛盾。

自然，假使沒有資本主義不平衡發展的定律，沒有資本主義國家間因爭奪殖民地引起衝突和戰爭；假使資本主義不用輸出資本到落後的有廉價原料及勞動力的國家去而能夠發展；假使“宗主國，資本積累的剩餘不變為出口資本而拿來發展農業及改善農民的物質生活；末了，假使用這些剩餘來提高工人階級羣衆生活的水平線，——那末關於加緊剝削工人階級，關於在資本主義的條件下農民的赤貧化，關於加緊壓迫殖民地及附屬國，關於資本家間的衝突和戰爭等問題都談不到了。

但是那個時候就不成其為資本主義了。

資本主義不能不發展，不得不加緊這些矛盾，不得不積疊起那些歸根結底易於墮落資本主義的條件，一切事情就在這裏。

反之，無產階級專政不能不向前發展，不能不形成在各國掀起革命運動到最高點並準備無產階級徹底勝利的條件，一切事情就在這裏。

這便是兩個穩定間的分別。

所以資本主義的穩定是不能夠延長或鞏固的。

現在我們來具體地觀察資本主義穩定的問題。

資本主義的穩定在什麼地方具體地表現出來？

第一，在於美國、英國及法國關於掠奪德國的方法及範圍得到暫時的同意。換言之，他們得到一個協約，他們就叫做德國的道威斯化。可否稱這個為鞏固的協約？不，不可以的。第一，因為締訂這個協約沒有主人，就是沒有德國的國民來參加；第二，因為這個妥協以雙重的壓迫加在德國的國民身上，民族資產階級的壓迫和外國資產階級的壓迫。誰以為如德國那樣開化的民族，如德國那樣開化的無產階級，能沒有爆發革命的企圖，而甘受雙重的壓迫，這簡直是信神信怪。實際上甚至於那樣反動的事實如選舉興登堡，這無疑的是證明協約國反對德國的臨時協約，是不鞏固的，不幸固到可笑的地步。

第二，資本主義的穩定表現在英國、美國及日本的資本在中國關於劃分勢力範圍，關於在這個國際資本主義的廣大市場中，掠奪的方法得到了暫時的同意。能不能說這個協定是鞏固的呢？也是不可以的。第一，因為分贓的問題，在他們中間引起了並且將引起拚命的爭鬥；第二，因為這個協約是在中國民族的背後締結的。而這個民族是不願意並且不會遵守異族強盜的紀律的。難道中國革命運動的發展不是說外國帝國主義的狡計要破壞嗎？

第三，資本主義的穩定表現在先進國的帝國主義者的集團間關於不互相侵犯掠奪和壓迫“他自己的”，殖民地的事情得到暫時的同意。可否說這個協定或這個企圖是鞏固的呢？不，不可以的。第一，因為帝國主義者間每個集團企圖並且將企圖奪取一塊別人的殖民地以利於己；第二，因為帝國主義的集團在殖民地的侵略和壓迫的政策，只使這些殖民地革命化，加緊殖民地的革命的危機，帝國主義者企圖“平靜”，印度，鎮壓埃及，馴服摩洛哥，束縛印度支那及南洋羣島的手足，並且採用各樣各色的狡計和陰謀。或者他們在這方面能夠達到些許“結果”，但是用不着懷疑，這些狡計是不夠的，並且不能維持很久的。

第四，資本主義的穩定可以表現在：在先進國的帝國主義者的集團企圖聯合反蘇聯的戰線。假定這個協約能夠料理停當，假定他們利用五花八門的狡計以及與接西的暴發相關的無賴的狡詐組成了類似的統一戰線。有沒有根據來說，反對我們國家的協定或者在這個範圍內的穩定是鞏固的和成功的呢？我想沒有這種根據。爲什麼？第一，因爲統一戰線及資本家聯合進攻的威脅將造成一個最鞏固的環繞蘇維埃政權周圍的全體人民的大圈套，要把蘇維埃國家變成比“二十四國，進攻的時候還要鞏固的堡壘。你們記得不是無名的欠爾企利關於“二十四國，進攻的威脅。你們知道這個威脅說出，已足使全國人民團結於蘇維埃政權的周圍來反對帝國主義的強盜。第二，因爲反對蘇維埃國家的行動在敵人的後方，一定要解開許多革命的紐結，瓦解和破壞帝國主義的行伍。最近許多衝突積累起這些紐結，牠們對於帝國主義沒有一點好處，這邊用得着懷疑嗎。第三，因爲我們的國家已經不是孤零零的，因爲牠有西方的工人及東方的被壓迫民族做同盟者。不用懷疑，反對蘇維埃的戰爭將成爲反對本國的工人及其殖民地的戰爭。我用不着證明，假使他們對我們進攻，我們也不會袖手旁觀，我們要採用一切方法，掀起各國的革命運動。資本主義國家的領導者不能不知道我們對這些事情是有些經驗的。

這些事實和概念說明資本主義的穩定不能鞏固，這個穩定產生了使資本主義走到失敗道路的條件，反之，蘇維埃政權的穩定，不斷的積疊起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掀起世界的革命運動及社會主義勝利的條件。

這兩個穩定——資本主義的和蘇維埃的——原則上的對立，就是兩個經濟和管理制度間，資本主義制度和社會主義制度間對立的表现。

誰不明白這種對立的形勢，誰永遠不懂得目前國際情況的中心。

這就是目前國際情形的概況。

二、資本主義國家內共產黨底當前任務

現在來說第二種問題。

目前資本主義國家內共產黨情形的新鮮和特殊的地方，就在於革命的高漲時期被牠的低落時期和沉靜時期所代替了。要利用目前所處的沉靜時期，來鞏固共產黨，使他們布爾塞維克化，使他們變成羣衆的政黨，倚靠職工會來聯絡非無產階級的勞動份子，首先聯絡農民環繞於無產階級的周圍，末了，準備訓練無產階級以革命的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精神，主要的任務就在這裏。

我不把擺在西歐共產黨面前的各種任務都數出來。假使你們讀過相當的決議案，特別是共產國際擴大會議關於布爾塞維克化的決議案，你們就不難知道這些任務具體地究竟在什麼地方。我願意把西歐共產黨主要的任務加以說明，解釋了這些任務以後，其他任務就容易解決了。

是什麼任務呢？

這個任務就在於西方的共產黨和職工會相聯絡。這個任務就在於發展並徹底地進行統一職工運動的宣傳，一切共產黨員必須而且無條件地進入職工會，在那裏進行聯絡工人反資本家的統一戰線的有系統的工作，那末就造成共產黨有可能來倚靠職工會的條件。

若不實行這種任務，要想把共產黨變成真正羣衆的政黨和準備無產階級勝利的必要條件，都是不能的。

西方的職工會和政黨不同於我們的職工會和政黨。西方的職工會和政黨的相互關係，大不同於我們俄國的職工會和政黨的相互關係。我們的職工會的產生後於政黨並且環繞於工人階級政黨的周圍。當黨和牠的組織已經開始領導不僅是政治的而且領導工人階級的經濟鬥爭，甚至於領導極小的罷工的時候，我們還沒有職工會。這主要的可以這樣解釋，因為我們的黨在二月革命前在工人羣衆中比我們各處所有的職工會的雛形享有特別的權威。我們國家的真正的職工會僅在一九一七年二月後才產生出來。在十月前我們已有正式的職工會的組織，在工人中有極大的權威。列寧在那個時候已經說過，沒有那樣的如職工會一樣的支柱，無論奪取或支持無產階級專政，都是不可能的。我們的職工會在奪取政權之後，特別是在新經濟政策的條件之下，更形發展。無疑的現在我們

有力的職工會成爲無產階級專政主要支柱中的一個。我們職工會的歷史發展中最特別的地方，就是職工會是在黨以後產生、發展而且鞏固起來的。它們環繞於黨並且和黨處於友善的地位。

西歐的職工會，完全是在另一種環境中發展起來的。第一，它們在有工人階級的政黨以前，是早就產生和鞏固起來了。第二，在那裏沒有職工會是環繞於工人階級的政黨而發展起來的，反之，工人階級的政黨本身是從職工會產生出來的。第三，因爲最接近工人階級的經濟方面的鬥爭已被職工會奪取去了，所以政黨大都從事於國會的政治的鬥爭，並且不能不影響到它們工作的性質，及工人眼中對於它們的比重。就是因爲那裏的政黨是後於職工會而產生的，就是因爲職工會的產生早於政黨，並且它們在無產階級和資本家的爭鬥中能够築成一個無產階級重要的堡壘，因此政黨是一個獨立的力量，是不倚靠職工會的，他只站着次要的地位。

但是從這裏應該明白，如果共產黨願意成爲真正羣衆的政黨，能够推動革命前進，它們應該和職工會聯絡並依靠它們。

不估計到西歐這種特殊的環境，必然會戕害共產主義運動的事業。

在西歐現在還有種「共產黨人」不願意了解這個特點，並且繼續提出反無產階級的及反革命的口號：「從職工會中滾出去」。應該要說，無論誰危害西歐的共產主義運動也比不上這般「共產黨員」。這些人以爲職工會是敵人的營壘，從外面「進攻」職工會。他們不知道在這種政策之下，工人和他們就和敵人一樣。他們不知道無論職工會是好是壞，但是工人羣衆總以爲職工會是他們自己的堡壘，幫助他們保持工資、工作時間等。他們不知道這種政策不會使工作容易，反而破裂了共產黨人侵入幾百萬工人羣衆中的事業。

一般的工人可以對這般「共產黨人」這樣說：「你進攻我的堡壘，你破壞我幾十年惨淡經營的事業，來證明共產主義比工聯主義好。我不知道，或許你在共產主義的理論上是對的，但是對我，簡單的工人，從何處去了解你們的理論，我只知道一件東西，我有自己的職工會的堡壘，它們引導我們鬥爭，無論是

好是壞，它們總是保持我們抵制資本家方面及其他的攻擊，誰想破壞這些堡壘，這就是破壞我們工人自己的事業。你不要進攻我的堡壘，進入職工會吧，到那裏做上五年或者更多的工作，幫助改善職工會並鞏固它們，那末我看你究竟是什麼樣的朋友，假使你們表現出真正是合意的朋友，我自然不拒絕來幫助你們」等等。

在目前一般普通的工人大概都是這樣接待反職工會主義者，誰不了解西歐一般普通的工人心理中這種特點，那末對於目前我們共產黨的情形一點就不懂。

西歐社會民主黨的力量在什麼地方？

在於它倚靠職工會。

在西歐我們共產黨的弱點在什麼地方？

在於它們不聯絡職工會，而且這些共產黨中有些分子不願意和職工會聯合。

所以，西歐共產黨目前最主要的任務，就在於發展並澈底進行統一職工運動的宣傳，一切共產黨員都要進入職工會，在那裏進行聯合工人階級反對資本家的有系統的忍耐的工作，以便達到共產黨能夠依靠職工會。

共產國際擴大會議對於西方共產黨目前主要任務的議決案的意思就是此。

三 殖民地及附屬國內共產主義分子底當前任務

現在談到第三種問題。

在這一方面新的東西如下：

一，因為受資本主義穩定的刺激，從先進國運到落後國的資本輸出加緊了，資本主義在殖民地極快的發展並且將繼續發展，破壞舊式的社會政治的條件並且培植新的；

二，在這些國家裏的無產階級加快的發展，並且繼續發展；

三，在殖民地發展並且將繼續發展工人的革命運動及革命的危機；

了，與此相聯的繁殖並且將繼續繁殖一種更富有的更有力的民族資產階級，在它自己的國家內，它害怕革命比害怕帝國主義還要利害，它們選擇帝國主義者，締訂契約，而不顧及它自己國家脫離帝國主義的解放事業而出賣自己的（印度、埃及）；

成，要和妥協的民族資產階級作鬥爭，才能够把這些國家從帝國主義壓迫下解放出來；

已，因此在工業發展及正在發展的殖民地工農聯合的問題及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問題，應該成爲目前迫切的問題，好像一九〇五年俄國第一次革命的情形一樣。

以前的時候，常常說東方各國都是一樣的和整個的，現在大家都明白在東方不盡是一個樣的，現在有資本主義發展的及正在發展的殖民地，有落後的及還是落後的殖民地，在這種關係中，是不會一樣的。

以前的時候總把民族解放運動看爲殖民地及附屬國的整個民族力量的聯合戰線，從最反動的資產階級起至最革命的無產階級止。現在當民族資產階級分裂爲革命的與反革命的派別之後，民族運動的狀況就有些不同了。除民族運動中的革命分子以外，在資產階級內部又產生了妥協的反動分子，他們甘心與帝國主義者勾結，來叛賣本國的解放事業。

因此殖民地的共產主義分子的任務：聯絡資產階級的革命分子，首先是聯絡農民來反對帝國主義與「本國」資產階級的妥協分子所結合的聯盟，以便進行以無產階級爲首的真正的革命鬥爭而從帝國主義的壓迫之下解放出來。

結論只有一個：許多殖民地的國家現在愈走近到它自己的一九〇五了。

其任務在於團結殖民地的先進的工人分子，組織爲統一的共產黨，能够領導正在發展的革命。

列寧在一九二二年關於殖民地國家中正在發展的革命運動說過：

「在第一次帝國主義戰爭中的「勝利者」現在甚至於沒有力量來戰勝小而又小的愛爾蘭，沒有力量來戰勝在他們財政及金融問題中所生出來的

紛亂。現在印度及中國沸騰起來了。這些國家有七萬萬以上的人口，再加上鄰近的及類似它們的亞洲的國家，就佔全世界人口的大半。那裏正在不可停留地很快地走向一九〇五年，但是與一九〇五年有重大的差別。在一九〇五年俄國的革命可以單獨地走過（最少在開始的時候是這樣），就是說，不能馬上引起他國的革命。而目前在印度及中國正在發展的革命已經引入革命的鬥爭、革命的運動、國際的革命了。」（『列寧全集』第十八卷第二部第七四頁）

結論就是：殖民地的國家現在是站在它的一九〇五年的面前。

共產國際擴大會議所通過的關於殖民地問題的決議案的意思就是這樣。

四 論蘇聯社會主義底命運

現在我來說一說第四種的一些問題。

以前，我曾說過我們的大會對於直接涉及共產國際一些問題的各種決議案。現在我們且來談談那些對於共產國際和俄國共產黨都有直接關係的問題。因此這些問題，便成爲內外問題間的聯合的鏈環。

資本主義的暫時穩定應如何反映到我們的國家裏面社會主義之命運？這個穩定，是否是我們國家裏面社會主義建設的末途，或末途開始？

當其他各國於較長的時期尚保存資本主義的條件之下，在我們的技術和經濟落後的國家裏面，一般的說能否以自己的力量建設社會主義？

正在資本主義而且目前穩定的資本主義圍繞中，我們的國家裏面，能不能創造完全的保證，沒有其他各國武裝干涉的危險和舊制復辟的危險？

所有這些問題因爲國際關係的新環境，必然要擺在我們面前，非予以確實固定的答覆不可。

我們的國家，具有兩部分的矛盾：一部分是內部的矛盾，即存在於無產階級與農民間的矛盾；另一部分是外部的矛盾，即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與其他一切資本主義國家間的矛盾。

我們且把這兩部分的矛盾，分開來看一看。

無產階級與農民間，有些矛盾存在，這自然不能否認。要回憶那些事件，如關於農村經濟生產價格的政策，如關於價格的限度和減低工業品的價格等等之經過，就足以明瞭這些矛盾的實質。在我們的前面，有兩個主要的階級，這便是無產階級與私有者階級，即農民。因此在他們中間，便不能避免矛盾。整個的問題，就在我們能不能以自己的力量戰勝那些存在於無產階級與農民間的矛盾。當着人們說能不能以自己的力量建設社會主義呢？那末這般人就是想說我們國內無產階級與農民間的矛盾能夠戰勝嗎？抑或是不可以戰勝呢？

列甯主義對於這個問題，有圓滿的回答：是的，我們能建設社會主義，我們在工人階級的指導下，將與農民共同去建設社會主義。

這個回答的原理和旨趣在那裏？

這種回答的旨趣，就是在除了無產階級與農民間的矛盾以外，對於發展的根本問題，還有一般共同的利益，這些一般共同的利益，正隱蔽並且畢竟能夠隱蔽這些矛盾，而且這些一般共同的利益，不啻是工農聯合的根基。

這些一般共同的利益在什麼地方？

就是農業的發展，有兩條道路，即資本主義的道路，與社會主義的道路。資本主義的道路就是為着城市和鄉村資產階級的上層分子發財而使多數農民窮困的發展；社會主義的道路則與之相反，就是堅決的提高多數農民的幸福的發展。無產階級，尤其是農民，樂意按照第二條道路即社會主義的道路去發展，因為這條道路，是農民逃出窮困和半飢的生存唯一的救星。無產階級專政，手裏握有經濟的主要命脈，將採用所有的手段，使第二條道路即社會主義的道路勝利，這是用不着說的。另一方面，農民切膚的願望按着第二條道路發展，這更是不言而喻的。

由此無產階級和農民的共同利益，便能隱蔽無產階級與農民間的矛盾。

所以列甯主義說我們與農民在工農聯合的基礎上能夠而且應該建設完滿的社會主義的社會。

所以列甫主義說依靠無產階級與農民的一般利益，我們能够並且應該以自己的力量，征服那些存在於無產階級與農民間的矛盾。

列甫主義對於這件事體，就是這樣觀察的。

可是同志們顯見得並非都是贊同列甫主義的，比方託洛茨基同志關於無產階級與農民間一切矛盾的問題說道：

“在農民佔最大數的落後國家裏面，要解決工人政府地位的矛盾，只有★在國際的範圍內，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舞台上才能得着解決。，，（參看託洛茨基著的“一九〇五年，，的序）

換句話說，就是我們沒有力量也沒有可能用自己的力量去戰勝，並且消滅無產階級與農民間的矛盾，因為依他的意見只有世界革命的結果，並且只有在世界革命的基礎上，我們才能够消滅這些矛盾。並且最後才能建設社會主義。

這種情形，與列甫主義毫無相同之處，是用不着說的。

託洛茨基又繼續說道：

“沒有西歐無產階級直接國家的幫助，俄國工人階級是不能保持政權的，並且不能轉變其臨時的統治為長期社會主義的專政。在這方面，一秒鐘都不能復原的。，，（參看託洛茨基著的“我們的革命，，二七八頁）

換句話說，就是當西方的無產階級還未握着政權，並且未給我們幫助時，我們是不能幻想保持政權於較長的時期的。

往下託洛茨基又說道：

“……比方革命的俄國，或者能屹立於保守的歐洲之面前，想來也是無希望的。，，（參請，託洛茨基全集，第三卷，上册，八十九到九〇頁）

換句話說，依他的意見我們不僅不能建設社會主義，並且連短期的屹立於“保守的歐洲之前，，也不可能，雖然全世界都知道我們不僅保持了，並且還打倒了保守的歐洲之對於我國的一些瘋狂似的攻擊。

託洛茨基最後又說道：

☆注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

“社會主義的經濟在俄國之真正的興起，僅僅只有在歐洲各主要國家內的無產階級勝利之後，才有可能。”，（參看“託洛茨基全集，第三卷，上冊，九十二到九十三頁）

我想大家已經明白了吧。

同志們，我引了這些論證，爲的是要把這些引證與列甯全集的論證對看，使你們就够領會關於在無產階級專政被資本主義國家包圍的國家裏面能建設完滿的社會主義的問題之主要的實質。

現在且看看由“列甯全集，引來的論證。

列甯還在一九一五年帝國主義戰爭的時候寫道：

“經濟的與政治的發展之不平衡，是資本主義無條件的定律。由此社會主義起初可以在幾個國家裏面，或者甚至於在一個單獨的資本主義的國家裏面勝利。這個國家裏面已勝利之無產階級，剝奪了資本家並且自己組織社會主義的生產，起來反對其餘的資本主義的世界，吸引其他各國被壓迫的各階級到自己這方面來，在這些國家中舉行反對資本家的暴動，在必要的時候，甚至要用軍事的力量反對一些剝削的階級及其國家，，……“因爲要想把各民族自由地聯合在社會主義裏面不經過社會主義共和國與其他各國多多少少長期激烈的爭鬥，是不可能的。”，（參看“反潮流。”，一三〇頁；列甯一九一五年著。）

換句話說，被一切資本家包圍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不僅能够以自己的力量掃除無產階級與農民間內部的矛盾，而且能够並且應該建設社會主義，組織自己的社會主義經濟。同時準備武力，幫助周圍各國無產階級，作顛覆資本主義的爭鬥。

列甯主義關於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裏面勝利的主要立場就是如此。

列甯又同樣的說，不過只換一點說法的形式。他在一九二〇年蘇維埃第八次大會上，關於俄國電氣化的問題，說道：

“共產主義就是蘇維埃政權加上全國電氣化。不然，國家仍是小農國

家，這是我們應明顯地覺悟到的。我們不僅在世界範圍內，而且在本國內也比較資本主義弱些，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們覺悟了這點，並且我們督促事業的進行，使小農經濟的基礎，轉變到大工業的經濟基礎。只有到國家電氣化的時候，只有當工業、農村經濟與運輸事業，已有現代大工業的技術基礎的時候，只有那時，我們才能得到最後的勝利。，（參看“列甯全集，第十七卷四二八頁）

換句話說：就是列甯十分覺悟到我們國內社會主義的建設的技術上的各種困難，但是他決不因此作出那種荒謬的結論，如像說：“俄國社會主義經濟之真正的興旺，僅僅只有在歐洲各主要國家內的無產階級勝利之後，才有可能，，
• 列甯則認為我們能以自己的力量，戰勝這些困難而達到“最後的勝利，，即建設完滿的社會主義。

列甯從此經過一年之後，在一九二一年又說：

“和農民相處，如有一二十年正確的相互關係，便能保證在全世界範圍內的勝利（甚至於當無產階級革命延遲的時候，也要增長）。，（參看列甯：“論糧食稅，的提綱摘要，一九二一年。參看“布爾塞維克，第七期，一九二五年）。

換句話說，就是列甯十分覺悟到我們國內社會主義建設的政治上的困難，但是列甯決不由此便作出那種不正確的結論，如像說，“沒有歐洲無產階級直接國家的幫助，則俄國工人階級便不能保持政權，，而列甯則認為只要對於農民的關係有正確的政策，在建設完滿的社會主義的意義上，我們完全能夠“達到在全世界範圍內的勝利，，

可是對於農民正確的政策是什麼？對於農民正確的政策，不是別的東西，而是完完全全在乎我們，僅僅在乎我們，即指導吾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我們的黨。

同樣，列甯在一九二二年，在其論合作社的雜記中肯定的說道：

★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

“在實際上，國家握有一切大的生產工具，國家政權是在無產階級的手裏，而這無產階級與很多成千累萬小的和極小的農民聯合起來，又保證無產階級對於農民的領導等等，難道這還不够從合作社僅僅從合作社一方面來建設社會主義嗎（我們從前把合作社輕視為商賈，在現今新經濟政策下面，我們也還有相當的權輕視他們）？難道這還不是建設完滿的社會主義社會之必須的條件麼？這自然還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之完全建設，但已是此種建設的一切必須的充足的條件★，（第十八卷下冊一四〇頁）。

換句話說，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的下面，我們有一切必要的條件來建設完滿的社會主義社會和戰勝一切和各種內部的困難，因為我們能够並且應該以自己的力量，戰勝這些內部的困難。

我想大家已經明白了吧。

反對的意見，以為我們國家內的經濟上比較落後，沒有社會主義建設的可能，列甯取一種攻勢，駁斥這種意見，認為這種反對的意見，無一點與社會主義相容之處，說道：

“他們的理由，真算腐敗到萬分，在西歐社會民主黨發展的時候，他們就背誦熟習了，這種理由，說我們還未長成到社會主義，好像他們中間一些“博學的，老爺們說我們還沒有社會主義的一些客觀的先決條件，。（參看“列甯全集，第十八卷下冊一一八至一一九頁）

不然，在十月奪取政權和組織十月革命，便沒有什麼作用，因為完滿社會主義社會建設的可能和必須若是因某種的原因而失去，則十月革命便也失掉意義。誰否認在一個國家裏面社會主義建設的可能，誰便應該一定否認十月革命的正當。反之，誰不相信十月革命，誰不應承認社會主義在資本主義包圍的條件中，有勝利之可能。不相信十月與不承認社會主義在我們國內有建設之可能，這兩方面中間的連繫，是完滿和直接的。

列甯說：

★注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

「我知道有些明哲的人們，認爲自己很聰明，且自稱爲社會主義者，他們諄勸在所有各國還未爆發革命的時候，便不應奪取政權。他們並不知道這樣一說，他們便離開了革命，跑到資產階級那方面去了。等到一切勞動階級在國際範圍內完成革命的時候，還便是將大家停滯於期待中，這是毫無意思的。」（參看『列寧全集』第十五卷二八七頁）

關於這一種矛盾，關於內部性質的矛盾，關於在資本主義包圍條件中建設社會主義之可能的問題，大體如是。

現在且轉到第二種的矛盾，轉到外部的矛盾，即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與其餘一切資本主義國家間的矛盾。

這些矛盾在於什麼地方呢？

這些矛盾，就在因資本主義包圍環境，應該就有資本主義國家的武力干涉的危險，既有這種的危險，那末也就應有復辟的危險和舊制度復興的危險。這些矛盾，對於一國，能不能完全被克復呢？自然不能。因爲一國的努力，即使這國是專政的國家，也不能充分的完全保證它免去武力干涉的危險。因此要完全保證沒有武力的干涉，也就是說社會主義最後的勝利，只有在國際範圍內，只有許多國家的無產階級借同努力的結果，或者還好些，只有幾個國家無產階級勝利的結果，才有可能。

社會主義最後的勝利是什麼？

社會主義最後的勝利，就是防止武力干涉與復辟企圖的實足保障，因爲多少嚴重的復辟企圖，只有在外力嚴重的幫助下，只有在國際資本的幫助之下，才能發生，因此全世界工人對於我們革命的幫助，特別是幾個國家內工人的勝利，是第一個已勝利的國家完全保證無武力干涉與復辟的企圖之必要條件，社會主義最後勝利的必要條件。

列寧說：

「暫時我們的蘇維埃共和國還是全世界的資本主義孤立之邊疆，現在如想消滅這些和那些危險，完全是一種可笑的幻想和烏託邦，這些根本的

矛盾既然存在，自然沒有方法逃開這些危險，。（“列甯全集“第十七卷四〇八至四〇九頁）

列甯又說：

“我們不僅在一國內生活，而且在很多國家的系統裏面生活，蘇維埃共和國與一些帝國主義的國家共同存在，想長久是不可能的，結果不是這個就是那個國家勝利，。（“列甯全集，十六卷一〇二頁）

因此列甯說：

“只有在世界的範圍內和各國的工人們共同努力，才能最後勝利，（“列甯全集，第十五卷二八七頁）

第二種矛盾的問題就是這樣。

誰把一個國家的力量可以完全解決的第一種矛盾和必須用幾個國家的無產階級的力量始能解決的第二種矛盾混為一談——那麼，他就犯了反對列甯主義的最大錯誤了，這種人或者是一個不可救藥的機會主義者。

本年正月有一位同志給我一封信論及在一個國家內社會主義勝利的問題，該信可為此種頭腦不清的榜樣。他誤會的寫道：

“你說，列甯主義的理論……就是社會主義可以在一個國家內勝利。可惜，我在列甯的著作中，找不出關於一個國家內社會主義勝利的詞句，，”。

這位同志，我認為是我們青年學生中較優秀的同志之一，他在“列甯的著作中，找不出關於一個國家內社會主義勝利的詞句，，這當然不是什麼不幸。將來他再讀“列甯全集，的時候，他終究可以找出此等詞句。不幸的，就是他不先把內部的矛盾和外部的矛盾分清白，却至一誤再誤，而弄得一場糊塗。我答覆這位同志的話，你們也不妨認識一下。我的答覆如下：

“不是說完全的勝利，而是說大體上的勝利，即是說驅除地主和資本家，奪取政權，打破帝國主義的反攻和着手建設社會主義的經濟，這是一個國家的無產階級可以完全成功的，可是要完全保障不至復辟，只有在“

幾個國家的無產階級共同努力，以後，才有把握。倘若在其他國家的無產者十分同情之下，只是還沒有國家得着勝利。當這個時候，以為俄國勝利的無產階級“不能抵抗守舊的歐洲”，那麼俄國開始革命，也許是蠢笨的。這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極庸俗的機會主義。倘若這個理論是正確的，那麼列寧斷定“我們要把新經濟政策的俄羅斯，變為社會主義的俄羅斯，和建設完全的社會主義的社會條件，我們是應有盡有”，等話（見列寧“論合作社，）也許是不對了。……在我們政治的實行上，若以為勝利的無產階級國家只是消極的，以為在沒有其他各國勝利的無產階級援助以前，這一個國家不應當前進一步，這是最危險的。我們假定，在五年或十年以內，還沒有西歐的革命成功；我們又假定，在這個時期內我們的共和國依然存在，依然是在新經濟政策的條件之下代表一個建設社會主義經濟的共和國；那末你是不是在那想在這五年或十年以內，我們的國家將清閒無事，而不組織社會主義經濟呢？只要把這個問題提出來，便可以明瞭否認一個國家內社會主義勝利的理論，是十分危險的。然這是不是說，這個勝利，就是完全澈底的呢？不是的，因為目下還受資本主義包圍，時時都有武裝干涉的危險，。（一九二五年正月）

根據吾黨第十四次臨時大會的決議的觀點來說我們國家的社會主義的命運問題，就是這樣。

五 黨在鄉村中的政策

現在我來說第五種的問題。

在沒有說到第十四次臨時大會所通過的黨在鄉村中的政策的決議以先，我想稍為談談資產階級的言論機關因吾黨批評我們自己在鄉村中的缺點而起的喧嘩。資產階級的言論機關很得意地告訴衆人，以為我們公開的批評我們自己的缺點就是蘇維埃政權薄弱的表徵，就是蘇維埃政權破裂和崩潰的表徵。不用說，所有這些喧嘩只是欺詐和虛偽罷了。

自己批評，是吾黨強固的表徵，而不是薄弱的表徵。只有生機健全和走向勝利之途的強固的黨，才能毫不客氣，於一般人民雙目共視之下，在過去和將來始終批評自己的一切缺點。在人民面前掩蔽真理的黨，畏懼光明和畏懼批評的黨，不算是個政黨，而是死命已定的騙徒們的朋黨。資本家先生們以其自己的心腹來測量我們。他們畏懼光明並竭力對人民掩蔽真理，以盡善盡美炫耀耳目的招牌，去隱藏自己的缺點。所以他們以為，我們——共產主義者也應當在人民面前掩蔽真理。他們畏懼光明，因為他們認為允許某種嚴重的自己批評，某種自由批評自己的一切的缺點，則資產階級的制度將不留片石了。所以他們以為，倘若我們——共產主義者允許自己批評，那末這是我們受人包圍和壓迫之空中的表徵。這般體面的資本家和社會民主黨人，正是以自己的心腹來測量我們。只有明日黃花和死命已定的政黨才能畏懼光明和批評。我們不畏光明，亦不畏批評，因為我們……是發榮滋長和趨於勝利的黨。所以我們幾月以來所舉行的自己批評正是吾黨萬分強固的表徵，而不是薄弱的表徵；正是吾黨團結的手段，而不是分裂的手段。

現在來講黨對於鄉村政策的問題。

因國內和國際的新環境，在鄉村中，究竟有些什麼新的事實可以指出呢？

我以為有四點主要的事實：

- 一，國際環境的改變和革命速度的遲緩，必須選擇最安全的（雖然是長遠的）道路，使農民加入社會主義的建設，使農民共同去建設社會主義；
- 二，鄉村經濟的增長和農民的分化，必須消滅鄉村中軍事共產主義的殘餘；
- 三，農民對於政治的積極，必須改變舊日鄉村中的領導和行政的方法；
- 四，蘇維埃的改選中，發現了毫無疑義的事實，即我們國內有許多區域的中農已經跑到富農方面去反對貧農了。

根據這些新的事實，黨對於鄉村的基本任務，究竟何在呢？

有些同志根據鄉村分化的事實，得出一個結論以為黨對於鄉村的基本任務

——就是加緊鄉村的階級鬥爭。同志們！這是不對的，這簡直是笑話。現在我們主要的任務，不在這裏，這是復詠孟塞維克老百科全書中孟塞維克的舊歌。

現在主要的任務，完全不在加緊鄉村中的階級鬥爭。現在我們最主要的任務，要使中農團結於無產階級的周圍，重新取得中農。現在主要的任務是與主要的農民羣衆結合起來，提高農民羣衆的物質和文化的程度，並與這個主要的羣衆一致向社會主義的道路前進。主要的任務是在與農民一致去建設社會主義，並必須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去建設社會主義，因為工人階級的領導是我們的建設走到社會主義道路的基本保障。

現在黨的主要任務，就在這裏。

當施行新經濟政策時，列甯關於這個問題所說的話至今還有充分的力量，所以現在不妨回憶一下。

•‘現在一切重要關頭即在與廣大無比和力量無限的羣衆一致前進，這個羣衆，就是農民，，。（‘列甯全集，十八卷下冊七一頁）

列甯又說：

‘與農民羣衆聯絡，與一般勞動農民聯絡而向前進，一定比我們所描想的更要遲緩得萬分，可是只有這樣，一切羣衆纔真正和我們一致前進。將來這個運動的迅速是我們現在不可思議的，，。（‘列甯全集，十八卷下冊二九至三〇頁）

根據上述各點，我們目前在鄉村中的基本任務就有兩點。

（一）第一個任務要把農民的經濟歸入蘇維埃經濟發展的全部系統中。以前我們的經濟有兩個平行的過程：城市則走城市的道路，鄉村則走鄉村的道路。資本主義者盡力使農民經濟歸入資本主義發展的系統中，可是這個過程發生了農民羣衆的貧困和農民的上層分子的豪富。這個步驟引起了偉大的革命。自無產階級勝利以後，爲使農民經濟歸入蘇維埃經濟發展的全部系統中，遂極力促進國民經濟發展的新條件，在漸進的基礎上確然提高大多數農民的幸福，換句話說，現在所走的道路與革命前資本主義者引導和號召農民所走的道路，完

全相反。

但是如何能把農民的經濟歸入經濟建設的系統中呢？就是經過協作社。經過信用協作社，經過鄉村經濟協作社，經過消費協作社和經過職業協作社。

經過此等大的和小的道路自然是遲緩的，可是確然可以歸納農民經濟於社會主義建設的全部系統中。

(二) 第二個任務是一步一步的，但是一定要堅定地實行消滅鄉村中舊日行政和領導的方法的路線，實行振作蘇維埃的路線，實行把蘇維埃變為真正的選舉機關的路線，實行鄉村中蘇維埃德謨克拉西的路線。列寧說：無產階級專政是為大多數勞動者德謨克拉西的最高形式。列寧說：這個德謨克拉西的最高形式，只在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以後和我們能夠鞏固這個政權以後，才有實現的可能。所以，鞏固蘇維埃政權的時期，已經開始施行蘇維埃的德謨克拉西了。這條道路我們應謹慎前進，不要燥急，在工作的過程中應使非黨的農民積極分子都在黨的周圍。

倘若第一個任務——歸納農民經濟於經濟建設的全部系統中的任務——給我們有促進農民與無產階級並駕齊驅走入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之可能，那末第二個任務——施行蘇維埃的德謨克拉西和振作鄉村蘇維埃的任務——定能使我們再造我們的國家機關，使國家機關與國民羣衆聯絡起來，使國家機關成為健全的、忠實的、簡單的和節省的組織，以便造成許多條件使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易於過渡到無國家的共產主義的社會。

吾黨第十四次臨時大會所通過的黨在鄉村中的政策問題的決議之主要的路線就是這樣。

根據上述各點，也應當改變黨在鄉村中的領導方法。

我們黨內有人斷定道，新經濟政策如此神速，而資本主義暫時開始穩定着，那末我們的任務是在實行盡量壓迫的政策，在黨內是如此，在國家機關內也是如此，使四方八面均有傾軋之概。同志們！我應當說，這個政策是不正確的、和滅亡的政策。現在我們所必需的不在盡量壓迫，而在盡量靈活，在政策上是

這樣，在組織上也是這樣，所以在政策上應該靈活，在組織的領導上也應該靈活。在現在複雜的條件之下，沒有靈活的政策我們是不能操縱自如的。我們應當盡量靈活，使能保持黨的操縱自如，使能保持黨有充分的領導。

其次，必須使共產主義者在鄉村中洗除一切行政的畸形的形式。對於農民所發生的關係不能只限於一種管轄的方法。應能耐煩的對農民解釋他們所不了解的問題，使農民心悅誠服，做這種事的時候不要怕犧牲時間和精力。我們中間有些作領導工作的人：時常是發號施令以了事，這當然是很容易的，而且很簡單的。然而不是所有好的事情，都是簡單而容易的。不久以前有兩個區委書記答復省委代表所提出的該區缺乏報紙的問題，他說：“我們何必要報紙呢？沒有報紙，倒還安靜和妥當些，不然農夫們一經閱報，他們又要質問一切，終究是不堪其擾了，。這個書記也稱為共產主義者呵！實在不待證明，這不是共產主義者，而是一個不幸的東西吧了。同志們，事實上現在要實行領導，非有“麻煩，不可，若沒有報紙，那就更不行了。倘若我們想保持黨和蘇維埃政權在鄉村中的領導，必須了解和領會這個簡單的道理。

其次，現在要實行領導，必須善理財，必須知道和了解經濟。若只會高談“世界政策“，狂論張伯倫和麥克唐納爾，現在看來已經是離題太遠了。我們正逢經濟建設的期間。因此，只有了解經濟的意旨的人，只有善於忠告農夫有助於經濟發展的人，只有善於扶助農夫實行經濟建設的人，他纔能領導。研究經濟與經濟相接觸，無微不至的實行參加經濟建設，便是現在共產主義者在鄉村中的任務。沒有上述的能力，領導一事簡直不要夢想好了。

現在不能再循照舊的領導了，因為農民的政治積極性已經提高了，應使這種積極性鑄成蘇維埃的形式，使他經過蘇維埃，不要越出蘇維埃。誰能振作蘇維埃和使鄉村的農民積極份子團聚在黨的四周，他就可以做領導工作。

現在不能循照舊的領導了，因為鄉村經濟的積極性，已經提高了，應使這種積極性鑄成合作社的形式，使他經過合作社，不要越出合作社。誰能在鄉村中成立合作社為社會的組織，他就可以做領導工作。

一般講來，鄉村中黨的領導的具體的任務，就是這樣。

六 論五金工業

現在說一說吾黨第十四次臨時大會所討論的最後一部分的問題。

在我們的經濟的發展中所謂新的和特別的現象，究竟在什麼地方呢？

所謂新的和特別的現象，就在我們的經濟實際上的發展越過了我們的經濟計劃，我們的經濟計劃表現出不充分，且始終不能應付經濟的實際發展。

我們的國家預算案就是這個事實明顯表現之一。你們知道，經過半年的時間，我們便要變更我們的國家預算案，因為我們預算案收入的部分迅速的增加了，而我們支出的預算的原定數目，事先沒有計到。換言之，我們的支出預定的數目和我們的預算案的計劃趕不上我們的收入增長，惟其如此，所以國家的金庫中有餘利的數目。這就是說，我們國家的經濟生活的本身有莫可抑制的上昇力，把所有我們的財政專家的科學計劃完全打倒了。這就是說我們經濟的勞動的强有力的增長，不下於（即或不勝過）美洲南北戰爭以後美國經濟的增長。

我們經濟生活中這個新的現象明顯的表現即為我們的五金工業的發展。去年金屬的生產等於戰前的盧布一萬萬九千一百萬盧布。在去年十一月按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五年的全年的計劃，其數目等於戰前盧布二萬萬七千三百萬盧布。本年正月，這個計劃（因與五金工業實際上增長的速度不相適應）有所變更，其數目竟達到三萬萬一千七百萬。到本年四月這個擴充的計劃，又表現出不切實了，因此又把這個計劃定為三萬萬五千萬的數目。現在看來這個計劃又有缺點了，因此必須再行擴充，現在要定為三萬萬六千萬至三萬萬七千萬。

換言之，本年五金工業的生產，比之去年的生產，差不多增加二倍了。至於我們的輕工業偉大的發展，運輸的增進，燃料工業的上昇等等，我不再多說了。

所有這些是說什麼呢？即是說，在工業（為社會主義主要的基礎）的圓滿的意義上我們的發展已經走到廣大的道路上了。至於說為一切工業的主要的發

條的五金工業，則牠的困難時期已經過去了。我們的五金工業有完全向上發展的把握，有充分的興榮的基礎。德再爾仁斯基同志說得對，我們的國家可能和應當成爲五金工業的國家。

這個事實，對於我們國家內部的發展，以及對於國際的革命，均有莫大的意義，這是用不着證明的。

從內部發展的觀點來說，我們工業的發展，我們工業的增長，其意義非常偉大，這是無疑義的，因我們工業增長的意義即是表現我們一切經濟的增長，因爲我們五金工業是一切工業主要的基礎，因爲若無五金工業強有力的發展，無論輕工業，無論運輸，無論燃料，無論電氣化，無論農業，均不能有立足的餘地。五金工業發展，即是一切工業發展的基礎和一般國民經濟發展的基礎。

請閱列甯關於“重工業”，所說的話，所謂重工業，主要的指五金工業而言。

“我們知道，要拯救俄羅斯，不特在農民經濟中要有豐富的收穫——這還不夠的，——不特輕工業有好好的經營能供給農民消費品，——這還是不夠的，——我們還要有重工業。要使重工業有好好的經營必須經過數年的工作。，，

列甯又說：

“若沒有重工業的拯救和重工業的恢復，我們是不能建設任何工業。沒有重工業，我們終是要滅亡，不能成爲獨立的國家。，，（“列寧全集”，十八卷下冊九五頁）

說到我們五金工業的發展，在國際上的意義那末可以說是無量的。因爲，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五金工業發展，難道不是直接證明，無產階級不特能破壞舊的，且能建設新的嗎？難道不是直接證明，無產階級能用自己的力量建設新的工業和新的自由的沒有人剝削人制度的社會嗎？這是在事實上去證明的，而不是從書本上去證明的。

這就是說，真正的徹底的促進世界革命事業向前發展。

西歐的工人們來參觀我們的國家，這不是偶然的。這個參觀對於全世界革命運動的發展，實有莫大的煽動和實際的意義。凡到過我們國家的工人們，遍視我們工廠和作坊的一隅一角，不肯輕忽，這一個事實，證明他們不相信書本上的話，願受無產階級在建設新的工業，創造新的社會本領中所有的經驗來說服。當他們相信這一點（也許可以信仰）的時候，則世界革命事業的前進，將一躍千里了。

列甯說：

“現在我們促進世界革命主要的方法，就是我們自己的經濟政策，一切的人都注視蘇維埃俄羅斯共和國，世界各國一切勞動者（沒有一個例外的，亦並沒有絲毫的增加）無不注視這個過程，在這方面鬥爭已經轉移到全世界的範圍中了。我們解決這個任務，——便是在國際範圍內我們真正和完全勝利的時候。因此經濟建設的問題，對於我們有十分特殊的意義。在這個戰線上，我們應該慢慢地漸漸地保持我們的勝利，——不能急速，——但是一定要上升和前進。”，（“列甯全集，第十八卷上冊第二八二頁）我們一般的工業進步尤其是五金工業的進步在國際上的意義就是如此。

現在我們約有四百萬的產業無產階級。這當然是很少的。可是要建設社會主義和保持我們的國防不為無產階級的敵人所陷，這也算是可以了。然而我們不能並不應當以此中止。我們要有一千五百萬至二千萬的產業無產者，我們國內主要的區域應當電氣化，農業要協作化和要有極發展的五金工業。到那時，我們就不怕任何的危險了。到那時候，我們在國際範圍內就得着勝利了。

第十四次臨時大會的歷史意義，就在他能明顯的指出達到這個偉大目的底道路。

這條道路是正確的，因為這是列甯的道路，能使我們完全勝利的道路。吾黨第十四次臨時大會工作的總結，大概如此。

東方民族大學底政治任務

一九二五年五月十八日在東大學生會議上的演說

同志們！首先允許我致敬禮于你們東方勞動大學成立的四週年紀念。我希望你們大學在很艱難的道路上培養東方共產主義幹部人材之種種成功，自不待言了。

再允許我道歉，雖然應該常到你們大學來，我却很少來。沒有辦法，——事務多，沒有常來與你們見面的可能。

現在說到東方勞動大學政治任務的問題。

若是分析東方勞動大學的成分，不能不注意這成分有若干的兩重性；這個大學包含不下五十種民族的代表，算是東方人種的團體。大學的學生，他們都是東方的兒子。但是這個定義還不算怎樣明顯與完善。事實上在大學學生的中間，有兩個主要的部份，代表兩種完全不同的發展條件：

第一部份學生，是從蘇維埃的東方來到此地的人，從資產階級的政權完全滅絕了，帝國主義的壓迫推翻了，而政權屬於工人的地方來的；

第二部份學生，是從殖民地來到此地的人，從資本主義仍統治一切，帝國主義的壓迫尚保其全力，而還需取得獨立，驅逐帝國主義者的這些地方來的。

因此擺在我們的前面有兩個東方，處于相異的生活，且在不同的條件中發展。

這個學生成份的兩重性，在東方勞動大學的工作上，不能不有其印象。這正是說明這個大學一隻腳立在蘇維埃的上面，一隻腳立在殖民地的上面。

因此，在大學的工作中，就有兩條路線：一條路線是造就一羣有力的幹部人才，以應東方蘇維埃共和國的需要，而另一條路線是造就一羣有力的幹部人才，以應殖民地勞動羣衆革命的要求。

由此產生兩種任務擺在東方勞動大學之譜，茲分別來考究東方大學的兩種任務。

東大對於東方蘇維埃共和國底任務

這些共和國的存在與發展與殖民地和附屬國比較起來有什麼不同的特點呢？

第一 這些共和國是解除了帝國主義的壓迫。

第二 他們的發展和鞏固不是在資產階級政權保護下，而是在蘇維埃政權保護下的民族，這是在歷史上沒有比擬的事實，但這畢竟是事實。

第三 雖則他們在工業上是很不發達，他們却能在自己的發展上完全依靠蘇聯工業無產階級的幫助。

第四 這些共和國是從殖民地的壓迫解放出來的，處於無產階級專政保護之下，並且是蘇聯的分子，他們有可能且應該加入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

主要的任務，是要使這些共和國的工人和農民便于加入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按照這些共和國的各不相同的條件，創造並且發展各種有力的前提，推進加速這個聯合。

由此產生目前的任務，擺在東方蘇維埃積極工作份子的前面。

1 在東方蘇維埃共和國建立工業的熔爐，以作集合農民在工人階級周圍之基礎。你們知道這個事業已經開始，並且將依蘇聯經濟增長的程度而前進。在這三共和國有各種的原料，乃是這個事業與時俱進，直作到底的保證。

2 提高農村經濟，首先是灌溉，你們知道這個事業在“高加索，一帶和

「土耳其土坦」，已在極力的進行。

三，提倡且推進農民和手工業者廣大羣衆的合作事業，爲東方蘇維埃共和國加入蘇維埃經濟建設共同系統之最可靠的方法。

四，使蘇維埃接近羣衆，使蘇維埃成爲民族的組合，因此而樹立民族蘇維埃的國家性，對於勞動羣衆很接近而且瞭然。

五，發展民族的文化，廣設普通教育性質與實業技術性質的學校與講習班，用本地的語言教授，以便從本地人中養成蘇維埃的黨的及實業的經濟的幹部人才。

實行這些任務——這當然是利於東方蘇維埃共和國社會主義建設的事業。

說到東方蘇維埃模範共和國。那末什麼是模範共和國？模範共和國是切實真誠的實行所有這些任務的共和國，由它本身創造一個使鄰近殖民地工農趨向解放運動的引子。

我上面已經說了蘇維埃之接近民族的勞動羣衆——蘇維埃的民族化。然而，這是什麼意思，它實際上的表現是怎樣的？我想，不久在土耳其土坦告完結底民族計劃界可以爲這樣接近羣衆的模範。資產階級的報紙對這種劃界，認爲是「布爾塞維克的詭詐」。然而很明顯的，此地所表現的不是「詭詐」，而是土耳其墨尼士坦和烏惹伯其士坦民衆底極高度的願望，得有它各自的權力機關，很明瞭的接近它們。在革命以前的時代，這兩國的被分裂成爲諸「可汗」們（譯者按：即韃靼諸王）的小小國家，以供一般「富農有權力」剝削者的陰謀之漁利場。現在時候到了，顯然有了可能，將這些被分裂的小塊，再聯合成爲獨立的國家，爲的是使烏惹伯其士坦與土耳其墨尼士坦的勞動羣衆與權力機關接近，打成一片。土耳其土坦的劃界主要的意義是使這些國家分裂的部分，重新聯合爲一個獨立的國家。若是這些國家因此願意以平等法權的資格加入蘇聯爲其分子，這不過說布爾塞維克對於東方民衆的極高的傾向找得了鎖鑰，而蘇聯乃是在世界上各民族勞動羣衆唯一的自由意志的聯合。爲的要聯合波蘭，資產階級需用了許許多多戰爭。爲得要聯合「土耳其墨尼士坦」和烏

慈伯其士坦，，共產黨人只費了幾個月工夫的說明宣傳。

這便是蘇維埃行政機關如何與各民族的廣大勞動羣衆接近的方法。

這便是證明多黨制的民族政策，是唯一的正當的政策。

我以後更講到在東方蘇維埃共和國民族文化的提高。但是什麼是民族文化？如何將牠與無產階級的文化聯合起來呢？列寧不是在戰前就說了嗎？我們有兩種文化——資產階級的與社會主義的，而民族文化的口號是資產階級底反動的口號，極力用民族主義口號的毒劑來麻醉一般勞動者的覺悟？如何建設民族文化，以本地語言發展學校和講習班培養地方幹部人才會與社會主義的建設無產階級文化的建設相融合呢？此地有沒有不可渡過的矛盾？當然是沒有！我們建設無產階級的文化，這完全是真實的。但無產階級的文化，其內容是社會主義的。在各種加入社會主義建設的人民，因語言風俗等等的不同，而採取各種不同的形式和方法的表現，這也是真實的。牠的內容，是無產階級的；牠的形式，是民族的——這就是人類共同的文化，社會主義之所向。無產階級的文化是不廢棄民族的文化而給牠以內容。反之，民族的文化也不廢棄無產階級的文化而給牠以形式。當資產階級握得政權的時候，民族的鞏固是處於資產階級政權保護之下，民族文化的口號，乃是資產階級的口號。當然無產階級握得政權的時候，民族的鞏固，是處於蘇維埃政權保護之下，民族文化的口號乃是無產階級的口號。誰不明瞭這兩個不同的環境的主要區別，便永遠不會了解列寧主義及列寧主義觀點民族問題的眞象。

有人說（如考茨基）在社會主義時代要廢除其他一切語言，創造一個人類共同的語言。我不大相信這個統一的包括一切的語言底理論。無論何處的經驗，均不是擁護，而是反對這樣的理論。到現在事實是如此，社會主義革命並未減少而是增加了語言的數量。因爲牠激動最下層的人類，並推動他們上政治舞台，喚醒許多新的民族，從前不出名或不大出名的，走向新生活。誰會想到舊俄帝國代表不下五十種民族人種的團體？然而十月革命，打破了舊的鎖鍊，而推動許多忘却了的人民和民族走上舞台，給他們以新生活和新的發展。例如現

講印度好似是一個整個的。然而若是在印度革命激動起來的時候，毫無疑義的幾十種從前不出名的民族，各有各的語言文化的民族均將出現於舞台。若說到各種民族與無產階級的文化溶合，這是毫無疑義的，這個溶合將經過各種形式適應這些民族的言語和風俗而進行。

不久我曾接了一些布列特同志們的信，要求解釋人類共同文化與民族文化的相互關係的重要而且困難的問題。其信如下。

“懇求解釋下面各種對於我們非常重要而且困難的問題：共產黨最終的目的，是唯一的人類共同文化。怎樣想由民族的文化在我們各個自治共和國個別的地域內發展而轉到唯一人類共同文化呢？怎樣使各民族的文化特性（語言等等）同化起來呢？，

我想上面說的就可以答覆布列特的同志們所掛心的問題。

布列特的同志們提出關於在人類共同無產階級的文化建設的過程中各民族同化的問題。自然有些民族會被捲入且一定無疑的被捲入同化的過程。這種的事，在從前也是有的。但要緊的是一部份的民族同化過程，並不屏除，反而預計許多強大民族的鞏固和發展的反面過程，因為部份的同化過程，乃是各民族發展總過程的結果。正因為如此，一部份民族可能的同化，並不減弱，反而確定那個完全正確的原則：即無產階級的人類共同的文化，並不屏除，反而預計和培養民族的文化；猶之民族文化並不屏除，反而補充和豐富無產階級的人類共同文化。

這乃是共同的目前任務，擺在東方蘇維埃共和國積極工作份子的前面。

這些任務的內容和性質便是如此。

必需利用強固經濟建設的進取時期，和對於農民新的讓步，以推進實現這些任務，然後便於使東方蘇維埃共和國這些全是農民的國家加入蘇聯建設社會主義。

說黨對於農民的新政策，給了一些新的讓步（短期地租、允許雇用勞動）本身包含一些退守的成份。這話對不對呢？是對的，但是這種退守的成份，在

黨和蘇維埃政權方面，給我們以莫大力量的保障。金融的穩定，工業的發達，運輸的發展，信用制度的鞏固，藉此經過優待借貸可以破壞或提高人民中任何一個階層而不發生一點驚動，——所有這些均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手裏的後方力量，在他的基礎上面小部份戰線上一些退守的成份，祇是有益于全部戰線上進攻的預備。所以黨許給農民底一些新的讓步，必不會阻難，而在現在是有益于農民加入社會主義建設的事業的。

這種景況，對於東方蘇維埃共和國會有什麼意義？祇有這樣的意義，他給這些共和國的積極工作分子手裏以新的武器，便利了加速了這些國家與蘇維埃經濟發展共同系統的聯合事業。

這乃是黨在鄉村中的政策與東方蘇維埃積極工作份子目前任務的關係。

所以東方民族大學對於東方蘇維埃共和國的任務，乃是為這些共和國培養幹部人才，在乎保證實現上面所說的目前任務。

東方民族大學是不能脫離實際生活的，他不是且不能是一個超實際生活的一個學校，他應當以自身生存的根本來與實際生活緊接起來。因此他才不會拋開東方蘇維埃共和國的目前任務。所以為什麼東方民族大學的任務，是在注重這些共和國目前的任務，去為他們培養適當的幹部人才。

此處要注意到在這大學壁壘內，東方蘇維埃積極工作份子的實際工作中有兩種傾向必須與之奮鬥，以便為東方蘇維埃培養真正的幹部人才和真正的革命者。

第一種傾向便是把我上面說的這個責任簡單化了，希圖機械的移植經濟建設的模範，這些模範完全適應於蘇聯的中心，但是完全不合乎所謂邊境地方發展的條件。同志們，犯這種傾向的人，不明白兩件事：他們還不懂得東方各個蘇維埃共和國本身不是一種的，其中有一些例如格魯集和亞美尼亞是最高級的民族形成，其他如捷尺宜和加貝爾德是低級民族形成，另外，其中第三者如基爾及斯坦又處於這兩端的中間地位。這些同志們不明白，若是不適應各地方的情形，不嚴密計算每個地方的所有一切的特性，是不能建設一點什麼實在的東

西出來。這種傾向的結果，便是脫離羣衆而變成一般左派論調的人。

與這種簡單化作不調和的鬥爭，用這種精神來培養幹部，這就是東大學的任務。

第二種傾向是相反的，張揚各地方的特質，而忘記了其全部的主要的即東方蘇維埃共和國與蘇聯各工業區的關係，不問社會主義的任務，去適應狹隘的民族主義的任務。犯這種傾向的同志們，是少注意本國內部的建設，他們以為這個發展是自然的過程。對於他們重要的不是內部的建設，而是“對外”政策，擴張自己共和國的疆界與環繞的各共和國爭論，希圖奪得鄰國一小塊多餘的土地，因此以取悅於本國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者。這種傾向的結果，便是脫離社會主義而轉成一般通常的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者。東方民族大學的任務，乃是以不妥協的精神與這些隱匿未發的民族主義奮鬥來培養幹部人才。

這乃是東方民族大學對於東方蘇維埃共和國的任務。

二 東大對於東方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國家底任務

現在我們就講到第二個問題，即是東方勞動共產大學對於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國家的任務問題。

這些國家的生存和發展的特性與東方的蘇維埃共和國不同之點是些甚麼？

第一便是所有這些國家，都在帝國主義壓迫之下生存和發展。

第二便是受兩重的壓迫——內部的壓迫（本國的資產階級）與外部的壓迫（外國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促進了這些國家裏面的革命危機。

第三便是在這些國家中，有幾國如印度，其資本主義的發展速度非常之快，於是漸次發生了形成了多數的本地無產階級。

第四便是因為有了革命運動的高漲，而這些國家裏面的本國資產階級，遂分化成爲兩部份，即是革命的（小資產階級）與妥協的（大資產階級），從這兩種當中，前者仍繼續其革命的爭鬥，而後者則實行與帝國主義聯合。

第五便是在這些國家裏面與帝國主義的聯合遙遙相對的，又形成了另一種

聯合，即是工人與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的聯合，即是以從帝國主義中全部解放出來為目的的反帝國主義聯合。

第六便是在這些國家裏面關於無產階級的領導作用和從妥協的本國資產階級的影響之下把民衆解放出來的問題，均愈見帶發揚的性質。

第七便是這些情景，非常便利於這些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與西方先進國的無產階級運動的聯合。

由此至少可以得出下列三種結論：

1 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國家要達到從帝國主義解放出來，除了革命勝利是不可能的，即是說無代價的獨立，是得不着的。

2 要推進革命和取得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國家在資本主義的發展上全部的獨立，除了與本國的妥協資產階級隔離，除了把革命的小資產階級從妥協的資產階級的影響之下解放出來，除了無產階級出來作領導者，除了把工人階級中先進的份子組織在獨立的共產黨中，完全是不可可能的。

3 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國家中，要達到鞏固的勝利，如果他們的解放運動與西方先進國的無產階級運動二者之間沒有實際的聯合，亦是不可可能的。

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的共產黨人的根本責任，就是從這些結論中去找自己革命工作的出路。

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與這些情景相關連的革命運動的目前責任是些什麼呢？

現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中特質，就其本質上來說完全已非一致的和傳統的殖民地的東方了。在以前殖民地的東方彷彿差不多是表現一致的和同樣的，然而現在這樣現象，已經不適合於實際了。現在我們至少有三種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國家：第一如摩洛哥一類的國家，沒有或者差不多沒有自己的無產階級，在實際上完全沒有發展。第二是中國和埃及一類的國家，在實際上尚少發展，比較上已經有了少數的無產階級。第三是印度一類的國家，資本主義多少已經算是發展，而且多少有了多數的本國無產階級。

很明顯的，一點也不能夠把所有這些國家相提並論。

對於摩洛哥這類的國家，他本國資產階級還無所謂分化成革命的與妥協的政黨的根據，共產主義分子的任務便是採用一切手段，造成反對帝國主義的統一民族戰線。在這些國家裏面，共產主義分子要劃分成統一的政黨，只有在同帝國主義奮鬥的進程中，特別是在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戰爭勝利以後，才能夠產生出來。

對於埃及或中國一類的國家，那裏的本國資產階級已經分化成革命的和妥協的政黨，但是妥協的一部分資產階級還不能與帝國主義聯成一氣，而共產黨人又已經不能自己來組織反帝國主義的統一戰線，因此在這些國家裏面共產黨人應該從統一民族戰線的政策轉到工人與小資產階級的革命聯合的政策。這種聯合可以採用“國民黨，一類的如工農黨，統一黨的形式，然而在實際上須使這種特質的黨代表兩種力量的聯合，即共產黨與革命的小資產階級政黨的聯合。揭破本國資產階級的半途不前的和不澈底的性質，而與帝國主義堅決奮鬥，就是這種聯合的責任。這種兩重性的政黨，如果他不要牽掣共產黨的手足，不妨害共產黨鼓動和宣傳工作的自由，不阻撓無產階級團結在共產黨的周圍，而又使共產黨這方面便於作事實上領導革命運動的事，那末這種政黨是需要的，而且是便宜的。假如他不能保證所有這種條件，那末這種兩重性的政黨就用不着，而且也不合宜。因為他適足以引起共產主義分子同化於資產階級的行列，而使共產黨失去了無產階級的軍隊。

至於對於印度這一類的國家，事實的進行就稍有些不同。如印度這樣殖民地的生存條件，其根本的和新的條件，不僅僅是本國的資產階級已經分化，成了革命與妥協的政黨，而且首先這一部分妥協的資產階級與帝國主義的協定，根本已經成功了。他們怕革命比怕帝國主義還利害，他們關心自己的財富的利益，比關心自己祖國的利益更甚。這一部分的資產階級是最有錢的，而且是最有勢力的，雙足站在與革命不可調和的仇敵的營壘上，與帝國主義聯成一氣，反對自己本國的工農。不打破這種聯合，是絕不會得到革命的勝利的。然而要打

破這種聯合，就須集中射擊，反對妥協的本國資產階級，搗破他們的好細行爲，從他們影響之下，把勞動羣衆解放出來，而且有系統的爲無產階級準備作領導的必須條件。換句話說，就是在印度這樣的殖民地中，準備無產階級去當解放運動的首領的作用，一步跟一步的把資產階級及其通敵者從尊貴的地位推下來，造成革命的反帝國主義的聯合，而且在這種聯合當中，保證無產階級的領導作用，這就是他們的責任。然這種聯合不應該採取工農黨統一的形式，在形式上被統一的綱領所束縛。在這種國家裏面共產黨的獨立性，應該是共產主義先進分子的基本口號，因爲無產階級的領導作用。只有共產黨才能够準備和領導。然而共產黨爲得在反帝國主義的爭鬥中去分離妥協的本國資產階級，與引導城市和鄉村數十百萬的小資產階級羣衆隨着自己走，他儘可以而且應該加入公開的聯合，與資產階級的革命派合作。

由此我們便可以看出在資本主義發展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國家的革命運動的目前任務應該是：

- 1 取得工人階級最好的分子到共產主義這方面來，創立獨立的共產黨。
- 2 創造工人農人和革命的智識份子的民族革命的聯合，以反對妥協的本國資產階級與帝國主義的聯合。
- 3 在這種聯合當中要保證無產階級的領導作用。
- 4 從妥協的本國資產階級影響之下，作解放城市和鄉村的小資產階級的奮鬥。
- 5 保證解放運動與先進國無產階級運動的聯合。

這就是擺在東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的努力工作者的面前之三種目前責任。

假如我們就近時國際的情形來研究這些任務，牠們都是可以發現出特別嚴重的性質和特別重大的意義。在現時國際的情形，覺得是表現革命運動暫時沉寂的時期到了。然而究竟什麼是沉寂，在現時這種沉寂能够表示出什麼意義呢？可以說牠的表示只是加壓地壓迫西方的工人和東方的殖民地，而首先便是對

付各國革命運動的領導者——蘇聯。在帝國主義者的行列中，這種壓迫蘇聯的準備，已經開始了，這是毫無疑義的。關於愛沙尼亞暴動的毀謗運動，關於梭斐亞炸案對於蘇聯的詭計陷害，資產階級的報紙一致向蘇聯進攻。所有這些，都是向我們進攻的預備的階段。這是輿論的砲兵預備，計算藉此培養那些居民來猛烈攻擊蘇聯，且造成一些精神上的前題，以圖侵犯。這些欺騙奸計的運動，結果如何呢？帝國主義者或許冒險的企圖猛力進攻，但是一點也不足以約束那些殖民地，在這一點上我想很明顯的，沒有什麼可疑的根據。因比關於聯合革命勢力，準備反攻帝國主義方面大概要有的打擊，這個問題，就是現時必不可免的問題。

所以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堅固地履行這種革命運動的目前任務，對於現時有特別重大的意義。

根據這些情形，東方大學對於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所負的使命是什麼呢？這種使命，就是精確計算這些國家革命發展所有的特點，保證履行以上所解釋的各個不同的目前責任。從這方面去培養由此等國家來的幹部人才。

在東方大學裏面，大約聽講者有十種民族班，他們都是從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國家走到我們這裏來的。大家都知道這些同志都渴望着教育和智識，因此東方大學的責任，便是從他們中鍛鍊出真正的革命家。以列寧主義的理論來武裝他們，以列寧主義的實際經驗來供給他們，使他們能够心甘意悅的，毫無畏懼的完成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的解放運動的目前任務。

關於這點在此要注意到，在殖民的東方的積極工作者的實際工作中，有兩種傾向發現，因此為培養真正的革命幹部人才，對於這種傾向作奮鬥是非常必要的。

第一種傾向，就是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裏面沒有估量到解放運動的革新的可能性，與過分估量單一的總體的民族戰線的觀念，不問這些國家的組織和發展的程度。這種是右派的傾向，包含有減低革命運動和把共產主義分子同化於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者的一般聲調中去的危險。堅決的同這種傾向奮鬥，

就是東方大學直接的責任。

第二種傾向就是過分估量解放運動的革新的可能性，沒有估量到工人階級與革命的小資產階級聯合起來反對帝國主義這種事實。爪哇的共產黨人恰好就犯了這種傾向，不久以前他們對於本國曾經很錯誤的提出蘇維埃政權的口號。這是左派的傾向，有與羣衆隔離和把共產黨變成宗派主義者的危險。堅決與這種傾向奮鬥，就是為東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培養真正革命的幹部人才之必需條件。

一般的說，這就是東方大學關於蘇維埃與殖民地的東方人民的政治責任。

我們希望東方大學能够很忠實的執行這些責任。

問題與答覆

一九二五年六月九日在新羅得洛夫大學的演說稿

同志們，我要來回答你們用書面給我的許多問題。我就依照你們所寫的大序，逐一回答。這些問題，你們都知道，一共是十個。

現在我開始回答第一個問題。

問題一：在將來十年至十五年中，蘇聯如果不得西方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幫助，應當採用什麼方法和條件去鞏固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工人階級和農民的聯合？

我以為這個問題，已包括所有其餘你們用書面所寫的問題了。因此我的答覆祇帶有一般的性質，而不能盡量發揮，因為不是這樣，那在回答其餘的問題時，就沒有話可說了。

我以為，第十四次黨臨時大會的決議，可給這個問題以一個完滿無遺的答覆。這些決議曾說到，鞏固工農聯合的主要保證，是對農民的正確政策

但是什麼是對農民的正確政策呢？

這個政策，就是能保證鞏固工農聯合的一些經濟、行政及文化方面的設施。

先從經濟方面講起。

第一，必須在農村中剷除軍事共產主義的殘跡。其次，必須對工業品及農產品的價格有正確的政策，以保證工業與農業的迅速的發展，而消滅其剪刀現象。此外，必須減低農業稅的一般稅額，並且把這些稅額從國家預算案中，漸漸移到地方的預算案裏去。首先須就農業合作社及借貸合作社的路線，使千百萬的農民羣衆合作化——這是吸收農民經濟到整個社會主義建設的系統中來的工具。農村中必須使用拖拉機——這是農村經濟技術革命化的工具，亦是創造農村文化基礎的道路。最後，必須實行電氣化的計劃——這是使農村和城市接近，而且消滅它們中間的矛盾的方法。

黨如果要保證城市和鄉村在經濟方面的聯合，就應該照這些道路前進。

我想使你們注意把農業稅由國家預算中移到地方預算裏去的這個問題。這或許會使你們驚奇。但是，農業稅祇帶有地方稅的性質，這是事實。譬如，二年以前，大家都知道，農業稅佔我們國家預算收入項下主要的，或差不多是主要的部分。但是現在呢？現在它僅佔國家預算的一小部份。國家預算現在是二十五萬萬盧布，而農業稅在今年最大限度可供給二萬萬五千萬至二萬萬六千萬盧布，比以前要少一萬萬盧布。由此可見數目已經不是那麼多了。並且國家預算總額越是增多，這預算案中農業稅所佔的部分也越要減少。其次，這二萬萬六千萬農業稅中的一萬萬盧布將歸到地方預算案中去。這個數目要多於全部農業稅的三分之一。這怎樣解釋呢？這就是說，在現在所有的稅收中，農業稅要算是最接近地方情形，最能適應地方的需要了。地方預算案將來還要增加，這是毫無疑義的。但是地方預算案的增加，首先要依靠最適合於地方情形的農業稅，這也是毫無疑義的。國家收入的重心，已經轉到並且將來完全要轉到另外一種收入上去，轉到由國家企業與間接稅等等的徵收上去，這是更可能的了。

因此，把農業稅由國家預算中轉入地方預算，在目前是有可能的，而且在鞏固工農聯合的觀點上，又是完全適當的。

現在來說行政方面保證聯合的設施。

在城市和鄉村中實行蘇維埃的德謨克拉西，並把各種蘇維埃興奮起來使政府機關簡單，便宜而健全，把官僚主義及資產階級的腐敗分子從這些機關中驅逐出去，使國家機關和千百萬羣衆充分的接近——黨若要在政治管理的建設中去鞏固工農的聯合，就應當照這些道路前進。

無產階級專政，不是最後的目的。無產階級專政只是達到社會主義的工具與道路。什麼是社會主義呢？社會主義是由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轉到無國家組織的社會的過渡。但欲使這種轉變成功，必須依此方向來改造國家機關，藉以在事實上能保證專政的社會轉變到無國家組織的社會——共產主義的社會。興奮蘇維埃的口號，在城市及鄉村中實行蘇維埃的德謨克拉西的口號和由工人階級與農民中的優秀分子直接管理國家的口號，都是爲着這個目的而提出來的。真正地改善國家機關，把官僚腐敗分子逐出於政府機關之外，使政府與羣衆接近和親密——所有這些，如沒有羣衆自己對國家機關不斷的積極的幫助，都是不可能的。但是羣衆積極的不斷的幫助，如果沒有吸收工農中最優秀分子到行政機關中來，沒有政府機關和“下層”的勞動羣衆的直接連繫，也是不可能的。

蘇維埃國家機關和資產階級的國家機關有什麼分別呢？第一就是資產階級的國家機關是站在羣衆上面的，因此它和民衆被一條不可超越的鴻溝分隔着，實際上它對民衆是漠不相關的。但蘇維埃國家機關是和民衆結合在一塊的，因爲如要保持自己蘇維埃國家機關的面目，它就不能也不應當站在羣衆的上面，因爲如要真正取得千百萬的勞動羣衆，它就不能與這些羣衆漠不相關。這就是蘇維埃國家機關和資產階級國家機關原則上分別之一。

列甯曾在他的小冊子“布爾塞維克能否保持政權”，中說過，多數黨的二十四萬黨員一定能保護窮人利益，反對富豪而管理國家的，因爲他們決不會比以前擁護富豪利益，反對窮人而管理國家的十三萬地主還壞。有些共產黨員因此便想道，國家機關只須幾十萬的黨員，他們就夠地可以管理廣大的國家了。這樣他們把黨和政府看成一個東西。同志們，這是錯誤的，他們把列甯的意思

曲解了。列寧說到二十四萬的多數黨的黨員的時候，決不想說這些黨員佔滿了或者可以佔滿蘇維埃政府機關的位置。剛剛相反，在政府機關的成分中，除黨員外他還包括了十月前擁護多數黨的一百萬人，他並且說，我們有方法一下子就把國家機關增加十倍，就是說用吸收勞動羣衆到管理國家日常工作中來的方法，把國家機關增到極度，增加到一千萬人。列寧說：

“這二十四萬人現在已經有一百萬以上贊助自己的成年人了，因為這種黨員數目和贊成黨的非黨羣衆數目的關係，在歐洲及俄國的經驗中，甚至在彼得的國會八月選舉中，都表現的非常清楚。我們的國家機關已經有一百萬羣衆，這些人思想上都是忠于社會主義國家，而不是爲着每月二十號領大薪水的。此外，我們還有奇異的方法，一下子能把國家機關增加十倍——這種方法沒有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在什麼時候採用過，並且也不能採用。這件奇異的事情，就是把勞動羣衆和貧農吸收到管理國家的日常工作中來。，（見‘列寧全集，第十四卷，下冊，二三六頁）

但是這“吸收勞動羣衆及貧農到管理國家日常工作中來，”的事情，是怎樣進行的呢。

這種工作，是由羣衆組織，由在蘇維埃，經濟機關，工廠委員會，文化機關，黨組織，青年團組織及一切合作團體等等周圍所成立的各種委員會，理事會，及代表大會來進行的。我們的同志有時沒有注意到在我們下級黨的，蘇維埃的，文化組織的，職工會的，教育的，青年團的，軍隊的，婦女部的，及一切其他組織的周圍，有無量數擁有千百萬非黨工農羣衆的獨立組織，委員會和理事會。這些無量數的組織在他們自己日常的，看不見的，細小的，不矜張的工作中，造成了蘇維埃的基礎和生命，而爲蘇維埃國家力量的來源。沒有這些環繞於黨和蘇維埃機關周圍的千百萬組織，那麼蘇維埃政權的存在和發展，以及指揮並管理廣大的國家，是不可能的。蘇維埃國家機關不僅僅是由蘇維埃造成的。蘇維埃國家機關，就其深厚的意義說來，是由蘇維埃加上千百萬的一切黨的，非黨的團體與組織而組成的。這些組織把蘇維埃和“下層，”的羣衆連接

起來，把國家機關及千百萬羣衆溶成一片，並且一步一步的把國家機關和羣衆間的鴻溝，剷除淨盡。

因此，我們就應該這樣努力的來把國家機關“增加十倍”，使它對千百萬勞動羣衆親密與接近，剷除官僚主義，使政府機關和羣衆溶成一片，並且預備由無產階級專政社會過渡到無國家組織的社會，共產主義的社會。

這就是與蘇維埃和實行蘇維埃的德謨克拉西口號的意義，這就是鞏固聯合的主要設施，要黨在行政方面所必須做的工作。

至於講到在文化教育工作方面鞏固聯合的設施，此地不必多說，因為這些設施是很清楚，大家都知道的，無須詳細解釋。我僅想把最近期間在這方面工作的主要路線指明出來。這個主要路線是要造成在全國，全蘇聯實行一般急迫的初期教育所必須的條件。同志們，這是最偉大的改造。這種改造的實現，不僅是文化戰線上，而且也是政治的經濟的戰線上的最大的勝利。這種改造是國家大興盛的基礎。但是這需要千百萬的金錢。要實現這種改造，需要大批的人才，差不多要五十萬的男女教師。但是無論如何，如果我們真要把國家提到最高文化階段上，那末我們必須在最近期間保證這個改造之現實。這件工作，我們正在作着，同志們。這是不能有疑義的。

這就是對於你們第一個問題的答覆。

現在來回答第二個問題。

二

問題二：如果資本主義的穩定很久地維持下去，我們的黨將有那種說化的危險？

就一般的說，我們有沒有這種危險呢？

這種可能，或者甚至於是實在的危險，當然是存在的。但是這種危險，與資本主義穩定無關。資本主義穩定，僅使其加倍的明顯而已，我以為重要的危險有下列三種：

- 1 失去我國建設社會主義前途的危險，因此而發生取消派的觀點。
- 2 失去世界革命前途的危險，因此而產生國家主義的觀點。
- 3 黨的領導衰落的危險，因此而使黨成爲國家機關的附屬品。

先來研究第一種危險。

這一種危險的特點就在：不信任我們革命的內部力量；不信任工人階級在工農聯合中的領導作用；不信任由‘新經濟政策的俄國，轉變爲‘社會主義的俄國，的事業；不信任本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功。

這是一種取消派化的趨向，因爲它可以取消十月革命的基礎與目的，使無產階級的政府變爲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的政府。這種‘神經過敏，的來源及其產生的根據，是因爲黨在新經濟政策條件之下，在國民經濟內部的資本主義成分與社會主義成分爭鬥的條件之下，受了資產階級強大影響的結果。資本主義的成分，不僅在經濟方面爭鬥，他們並想轉入無產階級的思想方面爭鬥，企圖麻醉黨內最不穩固的份子，不信任社會主義的建設，懷疑於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的工作。因此，我們不能說他們的努力是絕對沒有效果的。

一個被麻醉的‘共產黨員，說：

“我們是經濟落後的國家，到那裏去建設社會主義呢？我們的生產力不應許我們去達到烏托邦的目的。上帝呀，快來幫助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罷！，，

另有人說：

“我們已經完成了自身革命的使命，暫把我們的十月革命維持下去。現在，一切都要靠着世界革命，因爲沒有先進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我們便沒有建設社會主義的可能；嚴格地說，俄國的革命者，已沒有多大的事可幹了。，，

這是誰都知道的，在一九二三年德國革命的前夜，我們一部分求學青年，預備往德國投筆從戎，他們說，“革命者在俄國已經沒有事可幹了，應該投筆從戎，幫助德國革命去，，。

你們都知道，這兩派的“共產黨員”，都是站在否認社會主義建設可能的立場上和取消派的立場上說話的。他們兩派的不同點就在：第一派人是以“生產力的學理，來掩蔽取消派的態度（難怪最近米流可夫在“新聞報”，上大大地吹噓他們，說他們是“鄭重的馬克思主義者，，）；第二派是用世界革命的左傾的十分革命的話來掩蔽的。

就實際來說，假如革命者在俄國已沒有事可幹了；假如在他國未得到社會主義勝利以前，本國建設社會主義是無意識的，不可能的；假如先進國家社會主義的勝利，還要延至十年二十年之久，那末，我們能不能這樣的想：我們經濟中的資本主義成份，在我國被資本主義包圍的條件之下活動着的資本主義成份，同意停止向我們經濟中的社會主義成份作決死的鬥爭，我們袖手旁觀，坐待世界革命的勝利？要認識這一種無稽的推測，是值得這樣的設問的。如若這種假設是不成立的，那末，我們底“鄭重的馬克思主義者，和“懷嚴的革命者，還有什麼可幹？這是很明顯的，他們只有一事可做，就是做無謂的事情，屈從自然的意志，並逐漸變為通常的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者。

這裏有兩條路，揀一條走吧：或者我們承認我們國家為世界革命的基礎，像列甯所說的一樣，有完成建設社會主義的條件，那末我們必須戰勝本國經濟內部的資本主義成分，而建設社會主義的社會；或者，我們不以為本國是世界革命的基礎，沒有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條件，如若他國社會主義的勝利就延，我們必定要承認我國國民經濟的資本成分須站在優越地位，蘇維埃應該崩壞，黨應該蛻變了。

或是這條，或是那條。

這就是為什麼不信任建設社會主義，就要趨於取消派和蛻變的原因。

因此與取消派危險的爭鬥，是本黨目前的唯一任務，尤其是在資本主義暫時穩定的情形之下。

再來研究第二種危險。

這一種危險的特點，在於不信任世界無產階級的革命；不相信世界無產階

級革命的勝利；懷疑於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不了解本國沒有他國革命運動的幫助，是不能抵抗國際帝國主義；不了解一國內建設社會主義是不能最後完成的，因為他國還沒有革命的勝利，不能得到防止他國武裝干涉的保證；不了解國際主義的根本要求，因為國際主義的力量，是不以一國社會主義的勝利為其最後的目的，它是幫助別國革命發展的工具。

這是國家主義與退變的趨向，是完全取消無產階級國際政策的趨向，因為染了這種病症的人，不以本國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是以本國革命為始末的，他們以為他國的利益，應為本國利益犧牲的。

幫助中國的解放運動麼？為什麼要幫助？不怕有危險麼？幫助別國不是徒然的麼？與列強瓜分中國的‘勢力範圍’，取其有利於本國的東西，不是更好麼？這種政策有利的還是無利的？幫助德國的解放運動麼？值不值得這樣的冒險？根據凡爾賽和約與協約國妥協，以補償的形式與之通商，不更好麼？要不要與波斯、土耳其、阿富汗互守邦交？值不值得與他們周旋？與列強分割他們的‘勢力範圍’，不更好麼？

這就是一種‘神經過敏’的國家主義者的新思想，企圖取消十月革命的對外政策，養成黨的蜕化的因子。第一種危險——取消派的危險——的根源，是黨在對內政策的路線上，在本國國民經濟內部的資本主義成分與社會主義成分爭鬥的路線上，受資產階級影響的結果，而第二種危險——國家主義的危險——的根源，則是黨在對外政策的路線上，在無產階級專政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爭鬥的路線上，受了資產階級影響的結果。我們的外交家在資本主義國家嚴重壓迫之下，站不住腳，因有被引誘而走入減少反抗和國家主義途上的危險，這是毫無疑義的。

另一方面看來，很明顯的，只有在國際主義的基礎上，在十月革命對外政策的基礎上，才能保障第一個勝利的無產階級國家在世界革命運動中的作用。減少反抗和國家主義的傾向，只是使第一個勝利的國家處在孤立的和崩壞的地位。

所以對於世界革命的前途失望，能引起國家主義與黨的規化的危險。所以在對外政策方面，與國家主義危險的爭鬥，是本黨目前重要任務之一。

最後，來研究第三種危險。

這一種危險的特點，在於不信任黨的內部力量；不信任黨的領導作用；企圖削弱黨在國家機關的領導地位；不了解無產階級專政，沒有黨的領導是不成功的。

此種危險，可由三方面來研究：

第一，因為需要領導的各階級發生了變化。現在的工人和農民，已不是軍事共產主義時代的工人和農民了。從前，工人階級是沒有組織的，散漫的，農民在國內戰爭失敗的時候，備受地主反動的痛苦，因此，本黨在那時候是一個唯一的，集中的力量，作軍事行動的領導者。現在我們的環境比較從前大不同了。戰爭消滅了。戰爭的危險沒有了，無產階級無論在精神方面或物質方面，都恢復而且提高了。農民也有同樣的發展和進步了。此兩階級的政治積極性，日在興奮了。目前去做軍事行動的領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我們在領導中，第一，需要臨機應變的領導，第二，需要敏捷的供應工農的要求，第三，需要選擇工農優秀分子吸引到黨裏來，這些工農優秀份子在這兩個階級政治積極性發展的結果所產生的。但是此種條件和質量，不是立刻能夠做到的事，這是你們都知道的。因此，對黨的要求與黨目前所有的可能性不相符合，因此有削弱黨的領導作用和失掉黨的領導地位的危險。

第二，在最近期中——在經濟發展期中，國家和社會的機關，非常發展和鞏固了。托拉斯、新提嘉、貿易與信用機關，行政和教育組織，及合作社等，都有長足的增長和擴大，並有整千整萬的人員參加各種機關的工作，大部分是非黨分子，但此種機關不僅成分增多了，而且他們的力量也增加了。它們的意義愈重要，對於黨的壓力愈高，削弱黨的領導力量愈大，對黨的反抗愈利害。因此在此種機關裏面，需要黨團的力量和領導的人材，他們能在新的環境中，保障黨的領導地位。但是你們都知道，此種目的不是一舉手一投足便能達得到

的，國家機關所以有脫離黨的領導的危險。

第三，是因工作複雜而又加多的緣故。我所講的是關於現時的建設工作。農村和城市方面，以及一切機關的工作，複雜而又增多了。因此領導的工作，愈趨實際。從前，我們只講“一般”的領導。現在，“一般”的領導，只是一句空話，因為它是沒什麼領導內容的。現在是需要有具體的實際的領導。前一個時期造就出一種萬知的工作人員，他們準備回答理論上和實際上的一切問題。現在，此種舊的工作人員，應該讓位於新的工作人員，每一個參加工作的人都要成為該項工作的事主。使得成為真正領導工作的應當瞭解此項工作，須自覺地，細心地，切實地考察工作的究竟。如果不曉得農村經濟，合作社，價格政策，不了解對於農村有關係的法律，決不能指導農村工作。不知道工業，不研究工人生活，不了解工人的要求，不知道協作社，職工會俱樂部的工作，決不能指導城市的工作。我們是否立刻能達到這種程度？不能。因為要提高黨的領導作用需要提高黨的工作者的熟練程度。現在工作者的質量問題，必須放在第一位。但要提高工作者的質量，不是一揮即成的事。所可惜的，在黨的機關中還有舊習慣存在，此種習慣只使黨的領導作用，有時成為笑柄而無補於實際，因此，有減弱和喪失黨的領導的危險。

失掉黨的領導作用，就產生黨的腐化和規化的危險。

因此，與這種危險作堅決的爭鬥，是黨目前的主要任務之一。

這就是我對於第二個問題的答覆，現在來回答第三個問題。

三

問題三：不該動階級鬥爭，怎樣與富農爭鬥？

我以為這一個問題不能“自圓其說”，而且提得不正確的。這裏所講的究竟指那一種的階級鬥爭呢？如若講的是一般農村中的階級鬥爭，那麼，無產階級所反對的不僅是富農了。這是整個無產階級與農民的衝突——雖則此種衝突具有十分特殊的形式，難道不就是階級鬥爭麼？目前，我們社會的兩個基本階

級是由無產者與農民組合而成的，在這兩大階級之間的矛盾是存在的，雖然這個矛盾終久是要消滅和戰勝的，總之這個矛盾是要引起這兩大階級的鬥爭的，難道這不對嗎？

假使我們注意到城市與農村關係，無產階級與農民的關係，我以為階級鬥爭在我們的國家裏面，只有三條主要的戰線：

A，第一條戰線是整個無產階級（取國家形式）與農民，在限制工業品與農產品價格與規定稅額事宜等路線上的鬥爭。

B，第二條戰線是整個無產階級（取國家形式）與富農的鬥爭。消滅農產品的投機價格，稅收的負擔的重心移到富農的肩上去。

C，第三條戰線是貧農，尤其是佃農與富農的鬥爭。你們知道這幾條鬥爭戰線決不是同樣的輕重，也決不是同樣的性質。所以，我們對於這幾種階級鬥爭的形式，應取不同的態度來分別研究。

我們來仔細觀察一下。

第一條戰線：無產階級（取國家形式）看到本國工業的衰弱，得不到借款來發展他，已經採納許多基本方法，來免除國外工業的競爭，促進本國工業的發展，使全國國民經濟（農民經濟在內）長足的進展。此種策略：對外貿易的壟斷，農村經濟的稅捐，國家對於農產品的儲蓄，整個國民經濟之有計劃的發展，這些都是建築在主要的工業部門，交通及銀行等收歸國有的基礎上面的。你們都知道，我們必須要實行此種策略，就是說，我們要迅速地減低工業品的價格，提高農產品的價格，另一方面，一般農民自然要購買工業品，並出售其農產品於市場，但他們盡可能的購得廉價的工業品，高價出售自己的農產品，同時，農民很希望沒有分毫的稅額，或者至少希望把稅捐減至最低限度。

這就是無產階級與農民鬥爭的基礎。

政府能否拒絕不採納上面所述的根本政策？不，不能。因拒絕此種策略，立刻會使我們現時的工業與無產階級崩壞，使我們的國家成為資本主義先進國的農業殖民地，使我們的革命完全消滅。

是否整個農民都願意取消我們國家的這種根本政策呢？不，不願意的。因為目前取消此種政策。就是走向資本主義途上發展的勝利。向資本主義途上的發展，即是使絕大多數的農民破產，絕少數的富農和資本家更富。誰敢肯定說農民是願意破產，願意使我們的國家變成殖民地，而不願意根本推動本國的國民經濟向社會主義途上發展呢？

這就是無產階級與農民聯合的基礎。

這是不是說，我們的工業機關，依靠着壟斷而抬高工業品的價格，來破壞農民之基本羣衆的利益，並且加害於工業本身呢？不，不是這樣說。此種政策首先危及工業本身，使它不能從雛形的發展中變爲强有力的工業，所以我們有減低工業品價格與提高勞動生產力的運動。你們知道，此種運動，現在已有很大的成效了。

這是不是說，我們的儲蓄機關，依靠着壟斷，來減低了農產品的價格，使農民破產且危害及我們整個的國民經濟呢？不，不是的。此種政策，首先破壞了工業，第一因為它使工人不能得到農產品的供給，第二破壞了我們工業的國內市場。因此，我們就有反對所謂‘剪刀’式的運動，你們知道，此種運動已有很好的結果了。

這是不是說，我們的地方和中央機關，依靠着農業稅的法律，利用增高稅額的權利，視此種法律爲天經地義的規例，實際上掠取無力支付的納稅人的倉廩，剝奪他們的屋頂，像在湯波夫省幾處地方所實行的一樣？不，不是的。此種政策只是破壞了農民對無產階級和政府的信仰。黨的最近政策之所以要減低農業稅，並使此種稅收，多少具有地方的性質，整頓一般的賦稅，取締徵稅的無謂行動，也是爲了這個緣故。你們知道，此種政策已經獲得良好的結果了。

因此，第一我們有了無產階級與農民對於種種根本問題之共同的利害關係，及其對於國民經濟向社會主義道路發展之共同的旨趣，這就是無產階級與農民聯合的基礎。其次，我們有了無產階級與農民對於目前問題之相互間的利害衝突，這就是工農內部鬥爭的基礎。但此種鬥爭，與其共同利益，一輕一重，

當爲所遮掩了。而此種鬥爭，在將來工農階級消滅，大家成爲社會勞動者的時候，就必然消滅了。第三，在保持和鞏固工農聯合的範圍內，維持雙方利益，是我們解決工農階級矛盾的道路和工具。我們不僅有這些方法和工具，而且我們應用這些方法和工具在實行新經濟政策的條件之下，得着了很大的成效。這是你們大家所知道的，那末我們應當激動在這一條戰線上的鬥爭麼？不，不應當。恰恰相反，我們應當使雙方和衷共濟，相互讓步，不至有狹路相逢的現象和衝突。我們就要這樣去做，因爲我們有做到這一點的可能，因爲這裏，雙方利益的共同性，比較雙方利害的衝突性，強而又深固些。這是很明顯的，在這條戰線上激動和激起階級鬥爭的口號，對於此種戰線的爭鬥條件，是有百害而無一利的。

第二戰線：這裏，無產階級（取國家形式）與富農是處在面面相對的地位，此種鬥爭的形式，自有它的特點，同第一條戰線的爭鬥條件，亦自有其特點一樣。

國家要把農業稅的重要部分歸富農負擔。但富農對此，必定要用“合法與非法”的手段，推翻此種重大的租負，並利用農村中所有力量及所有影響，使此種稅項放在中農與貧農的肩上。

國家要抑制生活費的昂貴，保障工資的穩固，設法採納經濟化的政策。規定農產品的公平價格，適於農民經濟的利益。但富農對此，必定要盡量購買中農與貧農的生產品儲藏於倉庫中，不向市場出售，藉以抬高物價，直到他們能獲得高度的投機的利潤時候，才肯出賣。你們都知道，這一年中，有幾處地方的富農，曾將一普特麵包增至八盧布的價格。因此，在這一條戰線上的階級鬥爭，自有他的特點，及其或明或暗的形式。這裏似乎說明，我們在此條戰線上的爭鬥條件，可以應用激起階級鬥爭的口號了。但這是很不正確的，因爲這裏無須激起鬥爭的。我們可無須用激起鬥爭的形式，以致引起情形的複雜。

我們而努力與塞蘇維埃機關，奪取蘇維埃內部的中農，組織貧農，使得真正的減輕了農民基本羣衆的稅額，實際的將稅額的重心移到富農的肩上。你們

都知道循此方向進行的計劃，已經實施且有良好的結果了。我們國家要多儲蓄糧食，準備在市場上抑制物價的高漲，使民眾享受平靜的生活，富農不得居奇貨而高漲其物價。你們都知道在這一年中，我們已經得到很好的結果，因為我們不僅在列寧格勒、莫斯科、頓巴司、依萬諾夫伏時尼森司克等城市中，達到保持麵包價格的便宜。並且使許多地方的富農投降，他們不得不把舊有儲藏的麵包，出售於市場。當然這裏不僅是我們一方面的事情，有時候，富農自己開始激起高度的階級爭鬥，取匪徒暴動的形式，反對政府。那時，激起階級鬥爭的口號，已不是我們的口號，而是富農的口號，是反革命的口號。此外，富農自己將會受到此種反蘇維埃政府口號的大不利的。

你們會看到激起階級鬥爭的口號，也不適合於第二條戰線的。

第三條戰線：這裏有兩種力量，一方面是貧農，尤其是佃農，另一方面是富農。在形式上國家是站在旁邊的。但是此種戰線沒有像前幾種那樣擴大。而其階級鬥爭又非常的明顯而開展，不像前幾種的那樣模糊，不清楚。這裏富農方面直接剝削雇傭者和半雇傭者，我們絕對不能採取和緩的消極的政策對付他們。我們的任務是要組織貧農，領導貧農，與富農爭鬥。這是不是說我們要煽動階級鬥爭呢？不是，組織與領導鬥爭並不是煽動鬥爭，煽動鬥爭是說同時故意聳恿與故意吹噓階級鬥爭，當無產階級專政的時候與黨的組織及職工會的組織完全自由行動的時候，有這個故意造作的必須沒有？當然用不着。

所以，煽動階級鬥爭的口號對於第三條戰線也是不利的。

第三個問題就是這麼一回事。

你們要知道，關於農村的階級鬥爭這個問題，並不是像粗看而不加以思索那般簡單的問題。

現在來回答第四個問題。

四

問題四：工農政府是一個實際的口號，還是一個宣傳的口號？

這個問題的措辭，我以為有幾處矛盾的地方，

工農政府是一個實際的口號還是一個宣傳的口號？這種措詞究竟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一個政黨也能够提出不切實際的口號來達到狡猾手段（這種狡猾手段不知道為什麼在此地稱為“宣傳，，）的目的。如果是這樣，政黨能够提出不符科學根據的口號，這是對的嗎？當然是不對的。這樣的政黨只能在短時間存在的，一轉瞬間就同泡影一般的消滅了。如果是這樣，那麼我們的黨，也不是一個實行科學政策的無產階級的政黨，它不過是政策中的一朵曇花而已。

我們的政府，就它的性質及其政綱和策略來說，是一個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的政府。這裏絕對不應該有曲解和懷疑的地方。我們的政府，同時決不會有兩個政綱：有了無產階級的政綱，還有什麼其他的政綱。它的政綱和實際工作，是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的政綱和實際工作，就這一點意義上來說，我們的政府是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的政府，這是毫無疑義的。

這是不是說，我們的政府並不是工農的政府呢？不。我們的政府，若是根據它的政綱及其工作，是一個無產階級的政府，但同時又是一個工農的政府。

爲什麼？

因爲基本農民羣衆的根本利益，完全與無產階級的利益相符合的。

因爲農民的利益只有在無產階級的，蘇維埃政府的政綱中才能完全代表出來。

因爲蘇維埃政府是在工農聯合的基礎上，在此兩大階級的共同利益上經營的。

最後，因爲政府機關的成分，不僅是工人，尚有農民；他們與工人反抗共同的敵人，在工人領導之下共同創造新的生活。

這樣，“工農政府，這個口號，並不是一個空洞的“宣傳，口號，它是社會主義無產階級的口號，以共產主義的政綱爲基礎的。

這就是我對於第四個問題的答覆。

現在回答第五個問題。

五

問題五：

有幾個同志解釋我們對農民的政策，以為是擴大了農民的德謨克拉西，變更了蘇維埃政權的性質，這種解釋，是否正確？

答覆：

實際上我們有沒有擴大農村中的德謨克拉西？

是的，確實擴大了。

這是不是對於農民的讓步？

當然，是的。

此種讓步的限度如何？有無與國憲衝突？

我以為此種讓步不見得有怎樣大，而且絲毫沒有變更我們的憲法。

那末，在此種情形之下，我們所變更的是怎樣呢？表示讓步的在那一個地方？

我們要變更農村中不適合於新的發展條件的實際工作，我們要變更農村中阻礙農工聯合的策略。

有許多農業區域裏，只有少數人做指導的工作，他們只與省區及縣區發生密切關係，而與鄉村農民的關係，則非常疏遠。此種情形，直到現在還是這樣，致使農村中行政者祇看到上層工作和縣區，而不會注意到下層工作和鄉村農民。他們自己祇覺得向縣區省區負責，而不會向農村和選舉者負責。實際不知道“上層，”和“下層，”的工作是代表一條鎖鏈，下層的鎖鏈破壞了，整串的鎖鏈，亦難保其周全。此種結果，一方面是因為行政者的失檢，自恃和剛愎自用的緣故；另一方面又是因為農村中發生不平和怨詛的緣故。你們都知道黨內文部的指揮者和黨員，皆因此而走入迷途了。現在鄉村中所有此種現象，應該堅決的將他消滅，告一個結束。

有許多地方的鄉村蘇維埃選舉並不是真正的選舉，只是一種指派“代表”。這少數的鄉村的執政者，怕失掉了政權，採用許多狡猾和壓制的方法。這種現象的結果，使得與民衆親密接近的蘇維埃機關成爲與民衆漠不相關的機關，而工人對於農民的領導作用，無產階級專政的基礎與要素，完全消失了。你們都知道黨是不得不注意蘇維埃的改選問題的，在改選當中，看到各地的實際工作，還有許多軍事共產主義的殘餘，實有取締的必要，因爲他祇有妨礙實際的工作。現在此種農村的選舉，也應該堅決地消滅，告一個結束。

我們的讓步，就站在這種的基礎上，在農村德謨克拉西擴大的基礎上。

此種讓步，不僅對於農民是必需的，對於無產階級，也是必需的，因爲他增加了無產階級的力量，提高了無產階級在鄉村中的威信，鞏固農民對無產階級的信仰，讓步與妥協的主要作用，是在他們能使無產階級強健而穩固。

此種讓步目下有無一定的限制？

關於讓步的限制，全俄共產黨第十四次臨時大會和全蘇聯第三次代表大會已經指出了。你們都知道，此種讓步不是怎樣寬泛的。關於這一點我已講過了。但這又不是說此種讓步，是經久而不變的。這是要依照國民經濟的發展，無產階級經濟和政治力量的加強，東方和西方革命運動的高漲和蘇聯國際地位的穩固而擴大的。一九一八年，列甯曾經說到“全民剝削者的反抗減少了，蘇維埃的憲法，一定有擴大的必要，（“列甯全集，十五卷一四九頁）。這裏所講的，你們會看到是關於憲法在全民衆身上的伸張，資產階級也在內。這是列甯在一九一八年三月所講的話。

自那時起到列甯死以前，過了五年多。但在這時期內，列甯並沒有一次這樣說，應當馬上把這摺事實行起來。爲什麼？因爲擴大憲法的時期，還沒有到哩。不過當蘇聯政府的內外情勢完全穩固的時候，那就可實現了，這一點是毫無疑義的。

雖然我們看到將來德謨克拉西的擴大，然而我們認爲現時的讓步必須在第十四次全俄黨臨時大會及全蘇聯第三次蘇維埃代表大會所規定的德謨克拉西範

圍以內。

此種讓步是否變更我們政權的性質？

沒有變更？

此種讓步，有無變更無產階級專政的系統（就減弱一方面來講）？

沒有，絕對沒有。

無產階級專政，不但沒有減弱，且因蘇維埃之興奮、農民優秀分子之參加工作而鞏固了。無產階級對於農民的領導，因為德謨克拉西擴大的緣故，不但得到保障，並且形成了新的力量，使農民信仰無產階級的空氣，益加濃厚，這是當我們講到無產階級專政的系統中的工農相互關係的時候的主要問題。

同志們如果了解無產階級專政只是暴力，這是錯誤的觀念。無產階級專政，不僅是暴力，而在領導非無產階級的勞動羣衆，以大於資本主義的經濟生產力來建設超於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的經濟。無產階級專政是：（一）用暴力對付資本家和地主，不受任何規律的限制；（二）無產階級去領導農民；（三）建設社會主義的社會。瞭解無產階級專政，必須注意到這三方面，否則無產階級專政這個觀念必受到篡改的損失。只有從這三方面來觀察才能得着整個完滿的無產階級專政的觀念。黨在蘇維埃德謨克拉西方面的新方針，有沒有減弱無產階級專政的系統？不。新的方針，祇有改良和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系統。假使說到專政系統中的武力問題，那末，表現武力的便是紅軍。在鄉村中欲實行蘇維埃的德謨克拉西，祇有增進紅軍的生活狀況，使之團結在蘇維埃政權的周圍，因為紅軍中大多數是農民，這是無須證明的。

假使講到專政系統中的領導問題，那末與蘇維埃的口號，祇有使無產階級更容易的領導，使農民對於無產階級的信仰，更加鞏固，這又毋容懷疑的。假使講到專政系統中的建設問題，那末黨的新方針，是使社會主義的建設更容易，因為它加強工農的聯合，假若沒有工農的聯合，就沒有建設社會主義的可能，這又無須證明的。

只有一個結論，就是在目前的環境當中，對農民的讓步，祇有加強無產階

級及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絲毫沒有變更我們政權的性質。

這就是我對於第五個問題的答覆。

現在來回答第六個問題。

六

問題六：

我們的黨是否因資本主義的穩定，對共產國際內的右傾分子讓步？如若有的，那麼，此種讓步是否是實際上所必需的策略？

這裏所講的，顯然是關於捷克斯拉夫共產黨及與斯密拉爾和沙波託茨基等同志妥協來反對黨內右傾分子的問題。

我以為我們的黨，絲毫沒有向共產國際內的右傾分子讓過步。正是相反，在共產國際擴大會議中，始終使右傾分子處在孤立的地位，你們只要看一看共產國際關於捷克斯拉夫共產黨的決議及關於布爾塞維克化的決議，就很容易知道共產國際主要的目標，是瞄在右傾分子的靶子上的。

因此不能說我們的黨有向共產國際內右傾分子讓步的行動。

嚴格地說來，斯密拉爾與沙波託茨基同志並不是右傾的分子，他們沒有贊成右派的政綱，也沒有贊成勃爾派的政綱；他們在列甯派與右派中間搖動着而有往右的傾向。他們在這次共產國際擴大會議上的行動，最特別的，就在：他們一方面，在我們嚴刻批評的壓制之下，另一方面在右派內部破裂的前途恐怖之下，這一次動搖到我們方面來了，到列甯派方面來，與列甯派協同向右傾分子進攻。這對他們是一件很榮幸的事。可是同志不要以為我們不應該與那些搖動分子合作的；他們既然傾向於列甯派，向列甯派讓步，反對右傾分子，難道我們不應當和這些搖動分子合作麼？我想，如果在我們中間，還有不了解極初步的布爾塞維克政策的人，那麼這是一件可驚而又可嘆的事！難道擺在我們眼前的事實還未證明共產國際對於捷克斯拉夫共產黨的政策是一個唯一正確的政策麼？難道斯密拉爾及沙波託茨基同志沒有繼續與列甯派合作向右傾分子攻擊麼？

難道捷克斯拉夫黨內的勃列派已經不在孤立的地位麼？

有人問：他們能永久是這樣麼？我不是預言家，當然不能斷定。不過，這是一件很明顯的事，目前是斯密拉爾派與右傾分子爭鬥的時候，我們就不妨與之合作，如果他們變更現在的立足點，就必須消失雙方合作的効力。問題完全不在這裏。現在的問題是要增加列甯派的力量反對右派，給以新的可能將動搖份子拉到自己方面來。所以，主要的問題在這裏，並不是在斯密拉爾和沙波託茨基同志將來還有搖動與否的問題。

有些人以為列甯派應當擁護任何左派的狂論和囂語，又以為列甯派是一切共產黨左派的保護者，同志們，這是不正確的。我們只是比工人階級中非共產主義的左些，但並不是一定要“比一切都要左”，像已死的巴爾附斯有一個時候曾經要求這樣——他因此也曾受過列甯嚴刻的責備，我們在共產黨裏面不是左也不是右，我們只是一個純粹列甯主義者。列甯一方面反對左派，另一方面攻擊右派，在兩條戰線的鬥爭上，他知道一切所應做的事。列甯著“共產主義在派幼稚病”，這本小冊子，自有他的深意存在哩。

假使你們早注意到這一點，或許不會向我發這第六個問題了。

這就是我對於第六個問題的答覆。

在我來回答第七個問題。

七

問題七：

在新的情形之下，農村中因為黨的組織薄弱，有沒有形成反蘇維埃宣傳之思想上的危險？

是的，這樣的危險是有的。在興辦蘇維埃的口號下進行蘇維埃的選舉運動，當然是一種擴張地方選舉權的宣傳。用不着說，那些反蘇維埃的分子不會錯過良好的機會，來乘隙沾污蘇維埃政權的。因此在農村中有加緊和形成反蘇維埃宣傳的危險。古彭，西伯利亞，烏克蘭選舉經過中的各種事實，已經告訴我：

們了。在這些區域內，因我們農村組織的薄弱，增加了此種危險，這是毫無疑義的。同樣，帝國主義列強的干涉勢力，促進此種危險的增劇，也是毫無疑義的。

此種危險究竟怎樣？而其起因又怎樣呢？

此種危險至少有兩種原因：

第一，反蘇維埃分子，會感覺到最近農村中有富農得力的傾向，因為各區域內的中農都要變為富農了。這在蘇維埃改選以前可以猜想到的。在改選後，此種揣想，便能成為無爭辯餘地的事實。這是在農村中形成反蘇維埃宣傳的思想之主要的根本的危險。

第二，在各地區域內，我們對於農民的讓步，視為本黨薄弱的表證，這是在蘇維埃改選前可懷疑的一點，但在改選後，便不應有懷疑的餘地了。這樣，農村中的反動分子便會大聲疾呼地說：“繼續榨壓吧，，！所謂增加反蘇維埃宣傳的第二種危險（雖則他是不會實現的），也就在這裏。

一切共產黨員，首先應當了解，現在的階段是為奪取中農而鬥爭的階段。能把中農吸引到無產階級方面來，便是本黨在農村中最重要的任務；如果我們不能完成這個任務，那麼，反蘇維埃宣傳的危險的形成將會增加，而黨的新路線僅僅成為有利於白黨而已。

一切共產黨員，其次要了解，要奪取中農只有在蘇維埃，協作社，信用借貸，農業稅，地方預算等方面，就是在黨的新政策的基礎上，才能達到，所有行政式的強迫方法，只有破壞工作，應當用含有經濟和政治性質的例子去說服中農，使他們明瞭我們政策的正確，只有用具體的例證給他看，才可以“抓住，他。

此外共產黨員要了解新的路線，並不是為興奮反蘇維埃的份子而進行的，為的是要興奮蘇維埃，吸引大多數的農民羣衆。同時又要了解新的路線並不是放棄而是加緊與反蘇維埃分子決鬥。如若反蘇維埃分子說：“繼續榨壓吧，，，對於農民的讓步，視為本黨薄弱的表證，並要利用此種弱點作反革命的勾當；

那末，我們要將事實給他們看，蘇維埃政權是牢不可破的，他們須要記得蘇維埃的監牢，早爲他們預備了。

我以爲此種任務如果能現諸事實，那末，農村中反蘇維埃思想的形成和加增反蘇維埃宣傳的危險，將來可以根本剷除盡淨。

亦七個問題，就是這麼一回事。

現在來回答第八個問題。

八

問題八：

非黨分子的影響在蘇維埃中擴大起來，有無形成非黨小組的危險？

講到這種危險，在現時只是有條件的。假若有組織的非黨分子影響的發展，在共產黨影響還沒有侵入的地方，並無何種危險。例如城市的職工會與鄉村中非黨的蘇維埃的聯合。只有在非黨組合開始以自已來代替黨的時候，才有危險。

但這種危險怎樣產生的呢？

很明顯的，我們在工人階級中看不出有這樣的危險。因爲在黨的周圍，有許多非黨工人的積極分子，他們在黨的周圍充滿着信服的空氣，整千整萬的工人羣衆與黨聯合起來。

但此種危險在農民羣衆中却厲害些。因爲黨在農民羣衆中間還是薄弱的，並沒有很多非黨農民的積極分子，經過他們把黨與數千萬農民羣衆聯結起來；沒有一個地方對於非黨積極份子的需要，比在農民中還要急切的。

由此可以得出一個結論來：要免除黨與非黨農民羣衆脫離的危險，就必須要在黨的周圍組織無數的非黨農民的積極分子。

但是這種積極分子的養成，並不是一兩月就可以做得到的事。我們只有在工作中，蘇維埃中及合作社的種種機關中，把他們漸漸的訓練出來。因此每個共產黨員都是應當和這些非黨羣衆很親密的接近，而且必須以極平等的態度去

對待這些非黨羣衆。每個共產黨員對他們應當如弟兄般的親密與信任。如果不信任他們就根本不能取得非黨羣衆對黨的信仰了。所以列甯同志說過：黨與非黨間的關係應當建築在‘相互的信任’上面。這句話我們應當牢記在心。這些黨與非黨間‘相互信任’的關係，就是在黨外養成許多非黨農民的積極分子所必須具備的條件。

但怎樣建築起這些相互間的信任來呢？這當然不是即刻可以做到的，不是一下道命令即可辦到的。如列甯同志所說的，只有在黨與非黨羣衆間的‘相互考察’，上及在日常實際工作中的相互考察，才能漸漸建築起來。在第一個清黨時期，經過非黨羣衆而審查了黨員以後，收到很圓滿的效果，在黨的周圍，充滿了信任的空氣。列甯在當時對於這件事實曾這樣說過：我們應當把這一部分黨與非黨間相互考察的教訓，應用及推廣到一切工作部門中去。我覺得，我們應當把列甯的遺訓時刻記在心頭，而隨時隨地的把他實施到生活中去。

這種黨與非黨間的相互批評與考察，是在日常實際工作的過程中實現出來的，這是造成他們相互間信任的唯一方法。黨只有走這條路才能掃除幾千萬非黨羣衆脫離黨的危險，而在鄉村中培養許多非黨農民的積極分子出來。

第八個問題就是這麼一回事。

現在來回答第九個問題。

九

問題九：

沒有外國的幫助，我們能否實際的改造生產及擴大工業的固定資本？
這個問題可以作兩種解釋。

或者蘇維埃國家從現代資本主義國家裏得到信用借貸的幫助，作為發展蘇維埃工業的必須條件。那末，這可以算是第一種解釋的答覆。

或者蘇維埃國家在將來西歐無產階級勝利以後，從那裏得着幫助，作為建設社會主義經濟的必須條件。那末，這是第二種解釋的答覆了。

現在我試將這問題的兩種解釋給以答覆，但我，也不使誰難堪。

在資本主義包圍的條件之下，沒有外國的信用借貸的幫助，能不能發展蘇維埃的大工業？

可能。不過事情是很困難的，並且要經過很嚴重的試驗，但無論如何，沒有外來的借貸，我們還是可以使我們國家工業化。

歷史告訴我們，大工業的國家的形成和發展有三條道路。

第一是侵佔和掠奪殖民地的道路。例如英國，他就是這樣發展起來的，在全世界上佔領許多殖民地，盡量榨取“剩餘資本”，來發展已經繼續兩百年的工業，結果變成一個“世界工廠”。你們知道，這條道路我們是不走的，因為侵佔和掠奪殖民地，與我們蘇維埃建設的本性，是根本不能相容的。

第二條路，是某一國家對於別一國家的軍事破壞及取得賠款的。例如德國在普法戰爭中，以武力對付法國，從他那裏榨取了五十萬萬的賠款，作為發展本國工業的費用。你們要知道，這條路同樣與我們蘇維埃制度的本性不能相容，因為這和第一條路一樣，沒有什麼區別的。

第三條路，是資本主義先進國在資本主義落後國中獲得租借與出借款項的路。例如沙皇俄羅斯向西歐列強借款而出讓了企業，使他自己不免蹈進了半殖民地的圈套。但是牠將來還能再跳到單獨發展工業底路上來，不過這當然至少必須要有一點“順利”的戰爭來幫助，而且當然也免不了要去掠奪牠的鄰國。我們必須要證明，這條路同樣為蘇維埃政府所不能採辦，我們與全世界帝國主義血戰了三年，辛苦艱難地獲得了國內戰爭的最後勝利之後，當然決不情願再放帝國主義的奴役的。

有些人發生很謬誤的思想，以為每一條路發展到實際生活中的時候，必定有很清楚的界限，而且與別一條路，是毫無聯結的。但我們根據歷史上的事實看來，各國所走的路，都是很密切的聯繫着，結成了一條錯綜的網。這樣的例子很多：譬如美國發展的歷史，也是按照各種不同的路綫發展的，相互間雖然有很多的分波與差別，但是他們有不少的共同點，密切地聯繫着，第一他們都

是向形成資本主義工業國家的路上進行，第二他們都用各種方法盡量獲取外來的“多餘資本”，，因為這是形成那種國家所必須的條件。但是如果將這個發展的三條道路混淆不清，合為一團，並不明白這三條發展的道路，都是形成資本主義工業國家的三種不同的方法，每條路都給這個國家特殊的痕跡，那就更錯誤了。如果蘇聯政府不採取那舊的國家工業化的路，又不能靠外來的借款來擴張新的資本，那末抽走那條路呢？抽走的是一條新的為別國沒有採用過的路，這是一條不靠外來借貸而發展大工業的道路，這是一條不必要外國資本而使本國工業化的康莊大道，這條路，列甯在他的“只要好，不怕少”的那一篇論文裏，給我們指出來了。列甯說：“我們應當努力建設我們的國家，在這國家裏要保持工人階級在農民中的領導地位，保持在農民對於本階級發生信任，用偉大的經濟建設把以前所有的社會關係的殘跡，一齊掃除。我們應當使我們的國家機關，達到十分節儉的限度，……”“我們如果能够保持工人階級對於農民羣衆底領導作用，那我們就可以在本國裏面，用小小節省得來的積蓄來發展大機器工業，使國家電氣化，……”列甯繼續說：“只有這樣，我們才可以從一匹馬上轉騎到其他一匹馬上，跳到建設大機器工業，電氣化，伏爾夫火水電廠等的馬上。這匹馬，無產階級現在正在為自己尋找，不得不尋找，。（“列甯全集”，第十八卷第二部第一三八頁）

我們現在已經開始走這條路了，也是我們應當走的，這條路可以使我們的大工業得到空前的進展，使我們國家成爲一個強大工業的無產階級國家。

我已經說過，這條路是其他資產階級國家所未會走過的路，但這決不是使無產階級國家沒有實現這條路的可能，因為有許多為資產階級國家所不可能，或幾乎不可能做得到的事，而無產階級國家却完全可以做到的。無產階級國家有許多為資產階級所不能佔有的特權，也不會有的。工業的國有化，運輸及信用企業的國有化，對外商業的壟斷，國內商業的調節，——這一切都是使我們國內工業發展的“多餘資本”，底新源泉，到現在沒有一個資產階級國家有過這樣特權。你們知道，這些發展工業上資本的新源泉，無產階級的政權，已正在

着手運用了。你們知道，在這條道路上，我們已得到了許多很緊要的成就了，所以這條發展的路，是為資產階級的國家所做不到，雖然要經過許多困難與嘗試，而無產階級的國家能夠把牠實現。

除此以外，還有一點應當特別指出來的，就是在某一時候，也不得不要藉一點外來資本的幫助。你們知道，現在已經有好些外來的資本，開始流入我們國內了。這種資本的流入，牠們將要隨着我們國民經濟的發展與鞏固而向上進展，這是毫無疑義的。

對於這問題的第一個解釋的答覆，就是如此。

現在來講到第二個解釋。如果歐洲各國的社會主義還未得到初期的勝利，如果無產階級勝利的歐洲還沒有給我們一種技術上的幫助的時候，在我們國家內有無建設社會主義經濟的可能？

在未講這問題之先，我還有一句話要說，就是當這講演剛開始的時候，我想解釋與這一個問題有聯繫的誤解。這誤解就是有一部分同志，把“改造和擴大工業固定資本，問題與在本國建設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混為一談。我們能不能同意這個混為一談之說呢？不，不能。因為第一個問題，講到擴大工業固定資本祇是國民經濟問題的一部分——工業。當講到建設社會主義經濟的問題，包括了全部的國民經濟——工業與農村經濟。因為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就是整個國民經濟的組織問題，也就是工業和農村經濟的正確聯繫問題。到那時候，嚴格的來說，擴大工業固定資本這一問題，也就不成為問題了。就算是工業固定資本，已經在改造而且也大大地擴張，可是這完全還不能說把建設社會主義的經濟問題已經解決了。社會主義的社會，是一個由工業及農村經濟的工作人員結成的生產消費組合，與供給原料糧食及種種工業需用品的農村經濟不發生密切的聯繫，如果工業與農村經濟不能成爲一個統一的整個的國民經濟，——那就沒有什麼社會主義了。

因此，工業與農村經濟的相互關係問題，及無產階級與農民的相互關係問題，就成了一個建設社會主義經濟之根本的問題。

因此，改造生產與擴大工業基金這個問題，不能與建設社會主義經濟這個問題，混為一談的。

但是在其他國家，社會主義尚未勝利以前，或者在西歐已勝利的無產階級沒有給我們以技術和生產上的直接幫助以前，究竟在我們國家內有無建設社會主義的可能呢？

是的，可以的。不僅可能，而且是必須的，不可避免的。因為我們已經開始建設社會主義，發展國有工業及使之與農村經濟發生密切聯繫，設立鄉村合作社，將農村經濟包括在蘇維埃發展的總系統之內，促進蘇維埃的活動，使一切國家機關與整千整萬的民衆發生密切關係，預備創造新的文化和建設新的社會。毫無疑義的，在這條路上，當然有很多的困難，但我們將必須經過許多困難的試驗。毫無疑義的，如果我們能得到西歐社會主義勝利的幫助，那末，事情根本就容易多了。但是第一，西歐社會主義的勝利，不能像我們所想的那樣快；第二，凡可以征服的困難，我們已經征服了，這也是誰都知道的事實。

關於這一切的話，我在這次講演開始時已經說過了。從前我在莫斯科積極分子會議的報告中，早就說過。再早些，我在‘到十月革命之路，’這一本書上的‘序言，’中也說過了。我曾經這樣說過：否認在我們國家內有建設社會主義可能的人，是蘇維埃國家內的取消派，使黨蠱化。如果拿從前的話，再來重說一番，是很不值得的，我希望你們再去把‘列甯文集，’研究一下，那裏你們就可以找到關於這問題的許多豐富的材料。

我想關於這個問題的歷史，及其對於黨的意義再來講幾句話。

若是不推究一九〇五年到一九〇六年之爭論，那末在一國內能否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黨在一九一五年——當帝國主義大戰時候早就提出來了。你們都知道，列甯在那時候，已經發表他的意見說，“在一個，隨便那個資本主義國家內，單獨建設社會主義是可能的，，。（‘列甯全集，第十三卷一三三頁）”。這個時候正是由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的時候。而當時托洛茨基曾與列甯爭論，他說，“以為革命的俄國能在那守舊的歐洲面前站的穩

定，乃是夢想……。」（參看『托洛斯基全集』第三卷第一部第八九——九〇頁）

在一九二一年（十月革命及國內戰爭以後），建設問題列入於當時的議事日程中，建設社會主義這個問題，也就在黨內重新提出來了。這個時期，正是進到『新經濟政策』的時期，那時就有許多同志認為此種政策是放棄了社會主義的任務，離開了社會主義的建設。列寧在他『論糧食稅』這本小冊子上，曾經肯定的說，轉變到『新經濟政策』是工業與農村經濟聯合的必需條件，是建設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根本條件，也是一條建設社會主義勝利條所必經的道路。這是在一九二一年四月間的事。到了一九二二年一月，托洛茨基在他的著作『一九〇五年』的序言中，給在我們國家內建設社會主義這個問題一個恰恰相反的答覆，他說：『在經濟落後國家內的工人政府與佔人口大多數的農民間的矛盾，只有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舞台上，在國際的規模內，才能得到一個相當的解決。』

一年後（一九二二年），他們相互間重新發生衝突的意見；列寧在莫斯科蘇維埃會議上說到『從新經濟政策的俄羅斯將來它定成為社會主義的俄羅斯』的話。而托洛茨基在『和平大綱』的序言中却這樣說：俄國社會主義經濟的真正發展，只有在西歐主要國家的無產階級勝利之後才有可能。』

再經一年後，列寧離死期不遠的時候，在他『合作社問題』的論文中（一九二三年五月）又把這問題重新提出來。他在那篇論文中說：我們在蘇聯內具有『建設整個社會主義社會一切所必需的條件』。

關於這個問題的歷史的梗概，就是如此。

從這個歷史的引據上看來，我們就可以知道，在我們國家內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是我們黨的最重要的一個實際問題。這是無須證明的，如果列寧不認為是實際工作中最重要的問題，那末他就不至於那樣嚴重的發番提出來了。

本國經濟的向前發展，社會主義成分與資本主義成分間爭的增劇，尤其是資本主義的暫時穩定，這些都加緊促進了本國建設社會主義可能問題的意

義。

從黨的實際觀點上看來，這個問題的重要點在那裏？在於這個問題牽連到我們建設的前途和建設的目的與任務。如果不知道要建設些什麼，那就不能真正的建設了。如果是不知道進行的方向，當然不能向前移動一步。所以關於建設的前途這個問題，是我們黨內最重要的一個問題。我們須向着一個明確的目標努力進行。我們建設社會主義，是否在估量社會主義勝利的一方面去進行或是隨意的盲目的爲要“期待全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降臨，而去撫育資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這是現在根本問題之一。如果對於這問題，不首先予以一個明確的答覆，那根本也就不能建設起什麼新的東西來。整千整萬的黨的，職工會的，合作社的，經濟方面的，教育方面的，軍事方面及青年團的工作人員，都很緊迫地向着我們追問，向着我們的黨追問：怎麼樣做？爲什麼建設？可憐那些領導人物，都不會，或不願意給這個問題以一個明確的答覆，使他們對於我們社會主義建設的將來發生了一種知識分子的懷疑態度。

列甫主義的意義之所以這樣偉大，就是在他絕對不承認我們的建設是隨意的，盲目的，他也完全否認我們的建設是沒有什麼希望的，他給我們關於工作的前途這個問題一個很肯定而明白的答覆；他說：我們現在已具備了社會主義經濟的一切條件，我們能够，而且也應當建設整個的完滿的社會主義的社會。

關於建設社會主義經濟的可能的問題，就是這麼一回事。

但是還有一個問題——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的經濟能否一定獲得勝利。這不僅要靠我們自己，而且也必須要靠外面敵人與友人的力量之強弱如何而定。如果我們有建設的可能，如果這穩定的“休息，期能够延長。如果以後沒有嚴重的武裝干涉，如果這些干涉沒有得到勝利，如果一方面國際革命運動的力量，一方面我們本國的力量，都十分強大，使這種嚴重的武裝干涉的企圖成爲不可能，那末我們當然能够把他建設起來。但是如果以後的事情都完全相反，我們終於被武裝干涉而失敗，那末我們也就當然不能把他建設起來了。

這是我對於第九個問題的答覆。

現在來回答最後的一個問題。

十

問題十：

試述資本主義穩定和世界革命停滯期中，站在本黨與蘇維埃建設面前之最大的困難，特別是在黨與工人階級，工人階級與農民羣衆有相互關係之處。

最主要的困難，據我看來，共有五個。資本主義穩定的作用，就在稍微加重了這些困難而已。

第一個困難：就是與武裝干涉的危險有連繫的困難。這並不是說我們現在處於帝國主義直接武裝干涉的危險前面，不是說帝國主義已經立刻能夠向我們國家施行武裝的干涉了。最近在摩洛哥的戰爭，及對於中國的干涉，都不過是將來一齣大戰和武裝慘劇的演習罷了；而且也很足證明，帝國主義的靠背已經在開始衰弱倒塌了。這種直接的干涉且不去說牠，我們所說的只是目下在帝國主義包圍中，將有武裝干涉的危險，這種干涉的危險我們每年必須要費去幾千萬盧布作為維持海陸軍防禦的使用，但這每年幾千萬的海陸軍費是從何處得來的呢？這就是由於縮減教育及經濟建設的費用而來的。如果沒有這種干涉的危險，那我們就可以把這項款子至少大部分可以用在發展工業，改良農村經濟，改良初等義務教育等等的上面。因此在建設工作中的困難，與外來的危險很有關係的。

這個困難與別的困難所不同的特點，就在抽不僅只靠我們，而且要靠我們國家與一切其他各國的革命運動的努力一同強大起來，才能把這些困難消滅。

第二個困難：這個困難就是無產階級與農民間的矛盾。關於這個矛盾點，我在農村間階級爭鬥的問題中已經說過了，沒有再重複的必要。這個矛盾發生在農產品和工業品價格的政策方面，發生在農業稅和鄉村的管理方面。這個危險在於破壞工農的聯合，破壞無產階級在農民中的領導的理想。

這個困難與上述的困難不同之點，就在這個困難只要用我們內部的力量，就可以掃除的。農村的新改造，為掃除此困難所必走的路。

第三個困難：這是我們蘇聯內部民族間的矛盾，是“中部，與“邊境，間的矛盾，這個矛盾因“中部，與“邊境，的經濟和文化的發展條件的各異而進展，因後者比前者落後而發展。如果在這些地方政治的矛盾已經被戰勝和消滅了，那麼。文化方面的，尤其是經濟方面的矛盾還祇是在那裏形成，因此應當迅速將他消滅。這裏有種危險：一方面是蘇聯中央各機關的人員，往往以強硬的，高傲的，任意的態度對待其他各民族。他們不願意，或者是不會很敏捷地應付蘇聯內各民族共和國的要求；另一方面，是民族間的不信任，及各民族對“中部，關係出之以閉關自守的態度。與這種危險爭鬥，特別與第一種危險爭鬥，就是掃除民族問題中的困難的唯一方法。

這個困難的特性，和第二個困難相同，也只要用蘇聯內部的力量，就可把牠消滅的。

第四個困難：這個困難，就是國家機關有脫離黨的危險，也就是黨在國家機關中的領導力量逐漸薄弱起來的危險。對於這種危險，我在關於黨的脫化的危險問題中已經說過了，沒有重複再說的必要。這種危險因國家機關中資產階級官僚分子的存在，推動並加速國家機關的發展，而使牠（國家機關）的比重更強大。我們目前的主要任務首先要盡可能的縮減國家機關，有系統的把這些官僚化的資產階級分子，從這種機關中驅逐出去，必須要把黨的領導力量，放到國家機關中去，這樣才能保持黨在他們中間的領導作用。這個困難的特點，也和第三個困難相同，都可用我們本身的力量來征服的。

第五個困難：這就是黨的組織及職工會有與廣大的工人羣衆部分裂和不能供應這些羣衆需求的危險。這危險因黨的機關及職工組織（支部及工廠委員會也包括在內）中的官僚化分子力量之增大，亦隨之而增大。這危險最近在“面向農村，的口號下更形加劇而強大，這個口號使我們的組織，把注意力由城市轉移到農村身上，由無產階級轉移到農民身上。同時有許多同志不瞭解：面

向農村，却不要成爲背向着無產階級。他們不瞭解：“面向農村”，的口號，只有經過無產階級的力量，才能實現的。不注意工人階級的需要，只會增加黨與職工組織脫離工人羣衆的危險。

這種危險有什麼特徵呢？

第一，我們黨與職工會的組織，對於廣大羣衆的需要，失掉了很敏捷的注意力；第二，不明瞭工人階級已抬高了牠們自尊與統治階級的觀念，他們不懂得和不會去消滅黨與職工組織中官僚式的辦公處式的工作關係；第三，不明白，不加考慮的命令去對付工人是不行的，我們現在的重心點，不是在於這個‘方法’，而是獲得一切工人階級對於黨的信仰；第四，他們不明白，事前在工人中沒有什麼廣大的改釋運動，不實行廣大的生產的會議，那末任何廣大的方法，都是完全不能應用的（比方在紡織區內過渡到使用三個織布機）。

這一切的結果，就是黨與職工組織脫離廣大的工人階級的羣衆及其他在企業中的衝突。不久以前，在紡織工業區，曾發生了這樣的衝突，主要的原因是我們許多黨的及職工會的組織中存在有這些病態。

這就是在我們建設的路上第五個困難的特性。要掃除這些困難，首先就必須要把我們黨的及職工會的組織從明顯的官僚份子手中拯救出來，從事改革工廠委員會的成分，實現生產會議，把黨的工作重心點移到大生產的支部身上，並且也必須要用較好的黨的工作人材。

對於工人階級的需要，多加一點注意與考慮，在我們黨及職工會的實際工作上少一點官僚的形式主義，對於工人階級的階級功績之感覺，多多加以體貼，這就是現在的任務。

第十個問題就是如此。

共產主義青年團的任務

(答覆「少共真理報」編輯部發的問題)

一

在現時蘇聯之國際與國內的形勢中，少共的基本任務是什麼？

這個問題問得太廣泛，因此，我的答覆也是很廣泛的。在現時蘇聯國際與國內的形勢中，少共的基本任務就是要在言論上及實際上去幫助全世界被壓迫階級的革命運動和蘇聯無產階級為社會主義建設、為無產階級國家的自由與獨立而作的鬥爭。但少共祇有在它能夠完全照着共產國際和俄國共產黨所指示給它的方針去工作的時候，它才能完成這個總的任務。

二

在取消派（喪失社會主義建設的前途）、民族主義（喪失國際革命的前途）縮小黨的領導等等危險中，就是在「問題與答覆」那本小冊子上所指出來的那些危險中，少共的任務是什麼呢？

簡單地說，少共在這方面的任務就是要把列寧主義灌輸到我們那些工農青年的頭腦中去。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第一要使他們瞭解社會主義建

設的勝利在我們一個國家內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要的；第二，要使他們相信我們的工人國家是國際無產階級的嬰兒，它是全世界革命發展的根據地，我們革命的完全勝利是國際無產階級的事業；第三，就是要教育這些青年羣衆，使他們信任俄國共產黨的領導。必須在青年團中造就一批幹部人才和積極分子，使他們到青年羣衆中去做這種教育工作。

在各種建設部門——工業、農業、合作社、蘇維埃、文化教育機關等等——中都有青年團員在那裏工作。必須要使每個少共的積極分子能把他們在各建設部門中的日常工作與建設社會主義社會前途聯繫起來。必須要使他們能在他們的日常工作中去努力地實現這個前途。

各種不同民族的工農中間也有青年團員在那裏工作。青年團本身就是一個特殊的國際一樣。青年團之所以像國際一樣，不僅是因其民族成分的複雜，同時也因為青年團是直接隸屬於俄國共產黨（世界無產階級國際的一支最重要的主力軍）的緣故。國際主義是青年團工作中的基本思想。這就是它的力量。必須使國際主義的精神時刻不離地覆蓋着青年團底全部。必須要在青年團員的意識中，把我們國內的無產階級鬥爭中底成功和失敗與國際革命運動底成功和失敗聯繫起來。必須要使每個青年團員不把我們的革命當作自己的目標而把它當作達到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勝利的工具和助手。

青年團在形式上是一個非黨的組織。但它同時也是一個共產主義的組織。這就是說，青年團在形式上是工農的非黨組織，但同時必須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工作。保證青年羣衆對共產黨的信任，保證黨在青年團中的領導——這就是少共的任務。青年團員必須牢牢記着，保證黨的領導是青年團全部工作中最主要的一件事。青年團員應當記着，沒有這一種領導青年團就不能完成它的基本任務——以無產階級專政和共產主義的精神去教育工農青年。

三

現時對於發展青年團的問題取何種態度：還是繼續保持吸收全體青年工

人，雇農，貧農及最優秀的中農青年羣衆到少共隊伍中來的主張呢，還是應當把我們的注意力集中來鞏固和教育業已吸收在團內的青年羣衆？

不能說：還是這樣，還是那樣。這兩種工作必須同時並進。必須盡可能的把全體青年工人及鄉村貧農和中農的優秀分子吸收到青年團內來。但同時必須把少共積極份子的注意力集中於教育和訓練新的團員。加強無產階級的核心是青年團最主要的基本任務。這個任務底實行，就使青年團能按着正確的道路進行工作底保證。但青年團並不是純粹是青年工人的組織。青年團是工農青年底組織。因此，在加強無產階級核心的工作中，也必須隨時吸收農村中優秀的青年羣衆，在青年團中保證無產階級核心與農村青年間底鞏固的聯合。不這樣做，就不能在團內保證無產階級核心對農村青年底領導。

四

有些青年團的省委仿效婦女代表大會的例子，以經常的成份組織非黨農民青年的代表大會。這種代表大會的作用就是把農民的（最主要的是中農的）青年積極份子組織在青年團的領導之下。這種主張是否正確呢？這種代表大會是否有變成一種非黨的青年農民團體，而與我們青年團完全對立起來的危險呢？

我認爲這種主張是不正確的。爲什麼呢？且聽我把原故講出來。

第一，這裏有一種懼怕中農的弊病，故意避開中農青年，拋開中農青年的傾向。這種傾向對不對呢？當然是不對的。我們不但不應當避開中農青年、並且應當使他們來接近我們，使他們接近青年團。祇有這樣，才能使中農青年信任工人，信任青年團的無產階級的核心，信任我們的黨。

第二，現時農民的集團都已活躍起來，在這種情形之下，在青年團之下的中農青年的代表大會，毫無疑義的，必然要變成一種特殊的中農青年團。而且這種中農青年團爲了保持它本身的存在起見，也必然要與共產主義青年團以及它的領導——俄國共產黨——對立起來，而且也必然要盡量的把少共中農青年都吸收到自己那方面去，這樣，也就必然要形成青年團的分裂——分裂成爲農

民青年團和工人青年團。我們可否不顧到這一種危險呢？當然是不可不顧到的。特別是在現時這種環境中，和現時這種發展條件之下，我們是否需要這樣的分裂呢？當然是不需要的。却巧相反，我們現在所需要的不是避開中農青年，而是要使中農青年接近青年團，不是要使他們分裂，而是要使他們鞏固的聯合。

第三，不能引證工農婦女代表大會的例子來證明這種主張（建立中農青年的代表大會）底正確。有特殊組織——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工農青年決不能與沒有特殊組織的工農婦女混為一談；同樣也不能把中農青年與代表工人階級之一部分女工混為一談。中農青年代表大會的存在對於青年團有很大的危險，而工農婦女代表大會的存在，却一點危險也沒有，因為現在工農婦女並沒有像青年團那樣經常的特殊的組織。

因此，我認為在青年團之下組織專門的中農青年的代表大會是多餘的。

我認為，青年團第六次大會僅主張在農村中組織青年團的輔助團體，如自修組，農村經濟組等等，是正確的。

五

在我們的環境中能否使青年團的積極份子將實際工作與馬克思主義和列甯主義悉心研究聯貫起來，青年團的組織和個別的青年團員是否應當照着這個方針去做？

第一，我對於馬克思主義和列甯主義首先有一個小小的說明。在這一種說法之下，似乎馬克思主義是一個東西，列甯主義又是另一個東西，似乎一個列甯主義者未必一定是馬克思主義者。這一種概念當然是不正確的。列甯主義並不是超乎馬克思主義的一種學說。列甯主義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換一句話說，列甯主義包含着馬克思的全部學說，再加上列甯增添到馬克思主義寶庫中去的新的學說。這種新的學說也完全是根據馬克思全部學說（馬克思關於無產階級專政，民族問題，農民問題，政黨，改良主義之社

會根源，共產主義中之基本傾向等等問題的學說）而來的。因此，最好把問題的公式變成這個樣子：馬克思主義或列甯主義（主要的是一樣的），而並不是馬克思主義和列甯主義。

第二，毫無疑義的，不把少共積極份子的實際工作與理論的研究（“列甯主義的研究，，）聯貫起來，在青年團內就根本不能進行任何有意義的共產主義的工作。列甯主義是全世界工人革命運動經驗底結晶。這種經驗是實際工作人員在他們日常工作中的明星指南。如果實際工作人員不領略這種經驗，他們在工作中就不能有什麼堅信力，也不能認識工作的正確性。如果實際工作人員不研究列甯主義，不努力的去探討列甯主義，如果他們不願意把實際工作與理論上的研究聯貫起來，他們的工作就只能在暗中摸索。所以，研究列甯主義是使青年團的積極份子變成真正能以無產階級專政和共產主義的精神去教育廣大的少共羣衆之最必須的條件。

但在現時少共積極份子負擔過多的情形之下，這種理論與實際的聯貫是否可能呢？是的，可能的。這種事情很困難的。但它已是這樣的必要，即沒有這個條件就不能在青年團內造就真正列甯主義的積極份子，那它就完全是可能的了。我們切不可仿效那些懼怕困難，只想尋找容易工作的人。困有了難就必須與之奮鬥，將它完全克服。布爾塞維克在與資本主義堅決鬥爭中，如果不會克服困難，也就早滅亡了。共產主義青年團如果懼怕困難，就不能成爲一個共產主義青年團。青年團的積極份子負擔了很偉大的任務。因此，它就必須振作自己的力量，去克服前途的一切困難。

如果少共的積極份子，真正想以無產階級革命的思想去教育廣大的青年羣衆，那麼，他就必須堅忍不拔地去研究列甯主義。

中央政治報告底結論

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三號聯共第十四次大會上

同志們！我對於同志們所發的許多問題不作個別的答覆了，因為我的整體結論實際上就是對這些問題底一個總的答覆。

此外，關於那些個人的攻擊，我現在也不想答覆，因為我認為，大會已有充分的材料可以去審查這些個人攻擊的用意和企圖。

關於那些“穴居的人”，——在基斯洛涅洽克那些地方組織聯盟，開會商量中央機關的人——我也不必講他們了。讓他們去聯合起來吧！這是他們的事，我對於這些事情是付諸度外的。我所要指出來的祇是這一點：拉舍維契同志在這裏很神氣地出來反對聯盟政策，可是他自己却就是聯盟中的一員健將，而且他在基斯洛涅洽克的那些“穴居的人”，的會議上盡了很大的作用。唉！真是天知道呵！（大笑）

現在再說到問題的本身罷。

一 沙珂尼考夫同志與我國道威斯化

首先，把我不同意於各位同志的意見講一講。

第一，我反對沙珂尼考夫同志底意見。他在發言中說道：“當斯大林同志

指出了我們經濟建設兩條總路線時，竟把我們弄得莫明其妙，因為他應當用另一種方式指出這兩條路線，他不應當說機器輸入，而應當說商品輸入，。我認爲沙珂尼考夫同志這種意見，完全是和沙甯同志底提綱相同。我認爲沙珂尼考夫的這種意見實際上就是主張使我國道威斯化。我在報告中所講的是什麼呢？難道我是講進出口口的計劃麼？當然不是的。大家都知道，我們現在不得不輸入器械。但是沙珂尼考夫同志却把這個需要變成了原則，變成了理論和發展前途。沙珂尼考夫同志底錯誤也就在這裏。我在報告中曾經說，在我們經濟建設方面有兩個基本的主要的路線。我所以要指出這點的原因，就是要說明在資本主義包圍中保證我國經濟獨立發展底道路問題。我在報告中所以要說到我們的總路線和我們的前途問題，意思就是要把我們國家從農業國變爲工業國。什麼是農業國呢？農業國就是輸出農產品和輸入重工業品（機器）的國家，而這種機器，農業國自己是不製造的。如果我們儘管停頓在這一種發展的階段上，祇是輸入這些機器，而自己完全不去製造，那麼，我們也就不能擔保我國不變成資本主義系統底一個附屬品。因此，我們應當堅持發展生產工具生產的主張。難道沙珂尼考夫同志連這一點淺近的道理都不能瞭解麼？須知我在報告中所說的就是這一點。

道威斯計劃所要求的是什麼呢？它要德國從國外的，尤其是我們蘇聯的市場上榨取金錢來支付賠款。這結果是什麼呢？結果就是德國把機器供給我們，我們把這些機器運輸進來，而把我們的農產品輸出國外去。這樣，我們的工業就是完全陷入歐洲各國底羈絆中。這就是道威斯計劃底基礎。我在報告中已經說過，道威斯計劃已牽連到我們的國家，那這就完全是一座空中樓閣。爲什麼呢？“因爲我們並不願意爲旁的任何國家，爲德國而把自己停留在農業國的狀態中，因爲我們要自己來製造機器和其他的生產工具，，把我們國家從農業國變成自己製造機器的工業國——這就是我黨總路線底基礎。我們應當使我們的經濟工作人員照着這個方針去進行他們的工作，把我國從輸入機器的農業國變成機器製造的工業國。因爲這是使我國經濟獲得獨立的保障。因爲這是使我國

不變成資本主義國附屬品的保障。沙珂尼考夫同志不願意瞭解這一派簡單而淺顯的道理。起草道威斯計劃的那些人，想限制我們布匹的生產，但我們不僅要生產布匹，而且還要生產為製造布匹所必需的機器。他們想限制我們汽車的製造，但我們不僅要製造汽車，而且還要生產為製造汽車所必需的機器。他們想限制我們靴子的生產，但我們不僅要製造靴子，而且還要生產為製造靴子所必需的機器。我們這樣可以依次類推下去。這就是兩條總路線之間的區別，沙珂尼考夫同志所不願意了解的也就是這一點。離開我們的路線，就是放棄社會主義建設底任務，就是維護我國道威斯化的主張。

二 加米涅夫同志和我們對農民的讓步

第二，我反對加米涅夫同志底意見。他說，我們在第十四次黨的代表會議上通過了關於經濟問題，發展蘇維埃問題，消滅軍事共產主義殘餘問題及確定租賃和雇傭勞動問題的決議案，這就是對富農的讓步，而不是對農民的讓步，換言之，這純粹是對資本主義份子的讓步。這種說法是否正確的呢？我可以斷言，這種說法是不正確的，這全是侮蔑黨。我認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決不能這樣的觀察問題，只有自由主義者才能這樣觀察問題。

我們在第十四次代表會議上所作的讓步，究竟是怎麼樣的一種讓步呢？這種讓步是否超出了新經濟政策底範圍呢？當然，是沒有超出新經濟政策底範圍的。是否我們四月代表會議上擴大了新經濟政策呢？這個問題倒要請反對派答覆一下：我們在四月代表會議上究竟是否擴大了新經濟政策呢？如果我們真是擴大了新經濟政策，那麼，他們為什麼舉手贊成十四次代表會議的決議案呢？難道他們不知道我們大眾都反對擴大新經濟政策的麼？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是就是加米涅夫同志弄糊塗了，因為在新經濟政策範圍內是允許貿易資本主義及雇傭勞動存在的。第十四次代表會議底決議就是列甯在世時所採取的新經濟政策之表現。列甯知不知道新經濟政策在第一個時期首先要被資本家、商人、富農所利用呢？當然是知道的。但列甯有沒有說過，我們的實行新經濟

政策是對投機商人、資本主義份子的讓步，而並不是對農民的讓步呢？列寧並沒有說過這樣的話，而且也決不會說這樣的話。恰恰相反，列甫時常說，爲了保持及鞏固與農民之聯合起見，我們允許貿易和資本主義底存在，採取新經濟政策，向農民讓步，因爲農民在現時條件之下沒有貿易，不允許資本主義有相當活動，還不能生活，因爲我們現在除了貿易之外，還不能料理事情，因爲我們祇有這樣才能鞏固聯盟和建設社會主義經濟底基礎。列甫對於讓步問題的態度就是這樣。我們對於一九二五年四月會議上的讓步問題的態度，也應當這樣。讓我吧列甫關於這問題所發表的意見讀一段給你們聽吧。列甫在莫斯科省支部書記聯席會議上所做的“糧食稅”問題的報告中，曾經這樣解釋黨轉變到新經濟政策的理由：

“這個政策從共產主義的觀點上看來如何適用，何以共產主義的蘇維埃政權要幫助自由貿易的發展呢？——這個問題，是我首先要加以說明的。從共產主義的觀點上看來這個政策好不好呢？要答覆這個問題，我們首先就必須把農村經濟中所發生的那些變動觀察一下。在最初，全體農民都是一致反對地主的。那時候無論貧農富農都同樣地反對地主，當然，他們的目標是不同的：富農的目的是想奪取地主的土地，來發展他自己的經濟。那時候在富農與貧農之間就已表現出了不同的利益和不同的目標。在烏克蘭，這種利益的區別，現在還比我們這裏更明顯的可以看得出來。能夠直接享用從地主方面奪過來的土地的貧農是很少的，因爲他沒有種田的資料和工具。因此我們可以看到，貧農是在組織起來，不讓富農去霸佔從地主那裏沒收來的土地。蘇維埃政權要盡量幫助這種貧農委員會的組織。結果怎麼樣呢？結果，鄉村中最佔多數的是中農……富農已漸漸的減少起來，貧農也已漸漸減少起來，結果，大多數農民都差不多成了中農。如果我們要提高農村經濟底生產率，那我們就首先要顧慮到中農。因此，共產黨不得不根據這種情形來規劃它的政策……這就是說，根據農民本身狀況的變更，來改變我們對農民的政策。中農在鄉村中已日益發展，要提高農

村經濟的生產率，我們就必須顧計到他們。，（“列甯全集，第十八卷，上册，一九五至一九六頁）

接着，列甯在十八卷的一四六頁上又做了一個總的結論：

“我們必須適應中農經濟來建設我們的國家經濟，這種中農經濟，我們在過去的三年之內還不能改造過來，而且就在十年之內也還是不能改造過來的。，，

換句話說，我們實施自由貿易，我們允許資本主義的活躍，我們實施新經濟政策；就是爲了提高生產率，增加國內生產品底數量，鞏固與農民間的聯合。聯合農民，就是我們在新經濟政策方面讓步底基礎——列甯對於這個問題就是這樣觀察的。

列甯那時候知不知道新經濟政策——對農民的讓步——要被投機商人，資本家，富農所利用呢？當然是知道的。這種讓步是否實際上就是對投機商人和富農的一種讓步呢？決不是的。因爲利用新經濟政策——尤其是商業——的不僅是資本家和富農，而且還有國家機關和合作社機關。因爲做買賣的不僅是資本家和富農，還有國家機關和合作社機關。同時國家機關和合作社機關正在努力的學習商務。將來必可佔私有商人的上風（現在就已經佔上風了），把我們的工業與農業聯接起來。

這證明什麼呢？這就是證明我們讓步的主要目的是鞏固聯合。

誰不了解這一點，誰就不是以列甯主義者的態度去觀察問題，而是以自由主義者的態度去觀察問題。

三 誰 的 失 算 ？

第三，我反對沙珂尼考夫同志底意見。他說：“從秋季以來我們在經濟方面所遭受的許多損失，恰恰就是由於過分的估計我們的力量，過分的估計社會主義的成熟程度，及過分的估計我們國有經濟現在已能指揮整個國民經濟的可能性所致。，，

照他說來，在貯藏方面和對外貿易方面的一切失算——指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五年度之入超而言——並不是因為我們調節機關的錯誤，而完全是由於過分的估計我們經濟的社會主義之成熟程度所致。照他說來這應當歸咎於布哈林，因為布哈林“派”，專門誇張我們經濟的社會主義之成熟程度。

當然，說話是“可以”，隨便瞎說的，這是沙珂尼考夫的慣技。但是柳也應當有個止境才對。怎麼可以在大會前面說出這樣完全不合事實的不通的說話來呢？難道沙珂尼考夫同志不知道政治局在十一月初曾召集了一次特別會議討論貯藏和對外貿易的問題，難道他不知道在那次會議上中央——所謂過分的估計我們社會主義之可能性的大多數中央委員——曾經糾正了調節機關的錯誤麼？在大會上怎麼可以這樣的胡說亂道呢？這與布哈林派或布哈林個人有什麼關係呢？為什麼要把自己的過失放在人家身上呢？難道沙珂尼考夫同志不知道中央會議上關於經濟失算問題所發表的一切講演記錄都已發送到各省省委去了麼？怎麼可以違反着昭彰的事實而說話呢？話是隨便“可以”，說的，但也應當有個止境才對。

四 沙珂尼考夫同志怎樣擁護貧農？

第四，我同樣反對沙珂尼考夫同志的意見。

他曾經在這裏申言，他（人民財政委員）極力想保證我們能以所得稅的形式來徵收農業稅，可是人家妨礙着他去這樣做，因為人家不准他去擁護貧農和壓迫富農。同志們，這是不正確的。這完全是傷寒黨。以所得稅的形式來徵收農業稅的形式上的變更——我所以說是形式上的變更，因為它實際上就是所得稅——在去年十月間召集的中央全體會議上，就已經提出來了。但除了沙珂尼考夫同志之外，誰也不主張把這問題提到這次大會上去討論，因為這問題在大會之前，還沒有好好的研究過。那時候，沙珂尼考夫同志就取消了他自己的提議。但現在沙珂尼考夫同志却故意利用這件事來攻擊中央，這當然並不是為了貧農底利益，而祇是為了反對派底利益。沙珂尼考夫同志既然在這裏提到了貧

農，那麼，我也不客氣地要告訴你們一件事實。從這件事情中你們就可以明白這位貧農的擁護者——沙珂尼考夫底真正的主張。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人民財政委員米留金同志，在不久以前曾決定免除一個盧布以下的貧農經濟的稅捐。從米留金同志給中央的書面報告中可以知道，這項一個盧布以下的稅捐，蘇俄羅斯總共也不過三四萬盧布，單是這項稅捐的微收費，也祇比這項稅捐的總數稍為少些。這位貧農的擁護者——沙珂尼考夫同志對這個問題取什麼態度呢？他取消了米留金同志這個決定。中央得到了十五個省委對於這件事情的抗議。但沙珂尼考夫却祇是固執己見。祇有在中央壓制之下，沙珂尼考夫同志才沒有取消蘇俄人民財政委員關於免除一個盧布的貧農經濟的捐稅的正確決定。大概這就是沙珂尼考夫同志所謂“擁護，貧農利益。負擔這樣重大的職務的同志，竟會有這樣大的勇氣公然出來反對中央。同志們！這確是很奇怪的。

五 思想上的鬥爭，還是侮蔑？

最後，我還反對一種意見。我反對“爭論問題材料彙集，編者底意見。昨天很秘密地把剛才出版的“爭論問題材料彙集，分發給了代表大會上的各位代表。在這本書上說我在四月間與鄉村通信社的代表的談話中會同情于恢復土地私有制的思想。有一位通信社代表在“貧農報，上也發表了同樣的“感想，，我當時並不知道，也並沒有看過。我直至十月間才知道這件事。在比這更以前，本年四月間，專門造謠侮謗我們的“里寺，通信社，也在外國報紙上發表了同樣的一種消息，我們的同志會把這件事從巴黎打電報來報告人民外交委員會，要我們更正這謠言。我那時候就叫我的助手對齊切林同志說，“如果齊切林同志認為有更正的必要，就讓他去更好了，，（參閱“中央文庫，）

這些神秘“彙集，的作者們知不知道這一件事情呢！當然知道的。那末他們為什麼還要繼續散佈這些罵我的謠言呢？怎麼他們反對派竟仿效“里寺，通信社底手段呢？難道他們竟到了這個地步麼？（會場上叫道：可恥呀！）

我知道“穴中人，底道德，我知道他們是會仿效“里寺，通信社底手段。

因此，我向“貧農”，編輯部寫了一個申明。這種謠言本來是不值得申明的，但我知道和我糾葛的是些什麼人，因此我終於做了一個申明。下面就是我的申明書：

‘致“貧農”，編輯部的信。

編輯同志！不久以前，我從同志方面得到一個消息，說一九二五年四月五號的“貧農”，上曾經發表了一位鄉村通信代表關於鄉村通信代表團同我談話的感想，這篇感想我當時並沒有看到，在這篇感想中說我似乎同情於土地佔有權繼續四十年或四十年以上的主張，同情於土地私有制的思想等等。這種虛構的無聊的消息，雖然毫無更正的必要，因為牠很明顯是荒謬絕倫，但如果你們肯在“貧農”，上做一個小小的更正，申明那個消息完全是錯誤的，完全是作者無中生有的造謠，那我也認為不是多餘的事。

斯大林。，，

這本“彙集”，底作者們知不知道這封信呢？毫無疑義地是知道的。那麼，他們為什麼還要繼續發佈這種無聊的謠言呢？這難道是鬥爭的方法麼？據說這是思想上的鬥爭。同志們！這決不是思想上的鬥爭。用我們簡單的俄國話說起來，這簡直是侮蔑吧了。

現在我們來談一談基本的原則問題罷！

六 新經濟政策問題

新經濟政策問題，在克魯卜斯加同志關於新經濟政策問題所發表的意見中間，我有一點不同意的地方。她說：“新經濟政策實際上就是在某種條件之下所許可的資本主義，是鎖在無產階級國家鎖鍊上的資本主義。，，這句話對不對呢？可以說它是對的，也可以說它是不對的。我們把資本主義鎖在鎖鍊上，而且它生存一天，我們就要鎖它一天，這是事實，這是對的。但如果說新經濟政策就是資本主義，這就完全是胡說了。新經濟政策是在一切經濟命脈都操於無產階級國家手中的條件之下，允許資本主義存在的無產階級國家的一種特殊政

策，這個政策底目標就是：使社會主義成份去與資本主義成份鬥爭，發展社會主義成份底作用以排擠資本主義之成份，使社會主義的成份戰勝資本主義的成份，澈底消滅階級，建築社會主義經濟的基礎。誰不了解新經濟政策這種過渡的兩重性，誰就是背棄了列甯主義。如果新經濟政策是資本主義，那末，列甯所說過的“新經濟政策的俄羅斯，，就成了資本主義的俄羅斯。但現在的俄羅斯難道是資本主義的俄羅斯，而不是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俄羅斯麼？爲什麼在那時列甯不是簡單地說：“資本主義的俄羅斯將變成社會主義的俄羅斯，，而偏要說：“新經濟政策的俄羅斯將變成社會主義的俄羅斯，，呢？反對派是否同意克魯卜斯加同志說新經濟政策就是資本主義的這種說法呢？我想在代表大會上是沒有一位代表同意她的這種說法的。克魯卜斯加同志（請她原諒我！）這種說法完全是胡說亂道。決不能用這種糊塗說法到這裏來擁護列甯攻擊布哈林。

七 論 國 家 資 本 主 義

布哈林同志底錯誤是與這個問題關聯着的。他的錯誤在什麼地方呢？列甯在什麼問題上曾經與布哈林爭論過呢？列甯認爲國家資本主義與無產階級專政是相容的。可是布哈林否認這一點。他認爲——左派共產黨人沙法羅甫同志等也都認爲——國家資本主義與無產階級專政是不能相容的。當然列甯是對的，布哈林是不對的。他自己也已經承認了這個錯誤。布哈林底錯誤就在這裏。但這已經是過去的事了。如果在現在，在一九二五年的五月，他還是重覆地說他在國家資本主義問題上還與列甯有不同的意見，那我認爲完全是一種誤會。或者他應當直接放棄這種主張，或者是出於誤會，因爲他現在在國家工業的實質問題上所擁護的路線就是列甯底路線。並不是列甯同意了布哈林，而是布哈林同意了列甯。正因爲這樣，所以我們要擁護布哈林（鼓掌）。

加米業夫和季諾維埃夫兩位同志的基本錯誤就在他們完全是學究式地、而不是以辯正式地來觀察國家資本主義問題。他們沒有把國家資本主義問題與歷

史環境轉貴起來。這樣觀察問題是完全違背列寧主義的。列寧是怎樣提出這個問題來的呢？一九二一年列寧知道我們的工業不很發達，而農民又非常需要商品，他知道工業是不能立刻發展起來的，同時工人在當時環境之下，主要的不是從事於工業，而是製造火器——在這種情形之下，列寧認為在所有一切可能方法中最妥當的一個，就是吸收外國資本，藉外國資本來整頓我們的工業，這就是說，採用國家資本主義制度，經過這種制度來建立蘇維埃政權與農村的聯合。這種方法在那時完全是正確的，因為那時候我們絲毫沒有其他方法可以滿足農民底要求，因為那時候我們的工業是很衰頹的，運輸事業差不多完全陷於停頓的狀態，燃料也非常缺乏。在那時候列寧是不是認為國家資本主義（我們經濟的主要形式）是可以容許的呢？是的，他認為是這樣。但這是在一九二一年。現在怎麼樣呢？現在我們可否說我們沒有自己的工業，運輸事業停頓，燃料缺乏等等話呢？不，不能這樣說。現在我們能不能夠否認我們的工商業已經依靠自己的力量直接建立了工業和農業間的聯合呢？不，我們決不能否認這件事實。我們能不能否認“國家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者的作用在工業方面已起了變動呢（因為社會主義的工業已佔了統治的地位，而租界和租借事業底比重，已經降到最低限度，前者有五萬工人，後者祇有三萬五千工人）？不，決不能否認這件事實。列寧在一九二二年就說租借事業已經不行了。

由此可知，從一九二一年起，我們的環境已起了很劇烈的變更，在這時期內，我們的社會主義工業和蘇維埃合作社商業已經成了主要的力量，我們已經能用自己的力量來建立城市和農村的聯合，國家資本主義之最顯著的形式——租界和租借事業——在這個時期內也並沒有好好的發展起來。在現在，在一九二五年，說國家資本主義是我們經濟中的主要形式，就是曲解我們有工業底社會主義性，就是不了解過去和現在兩種環境中間的一切區別，就是不以辯證法去觀察國家資本主義問題，而完全是以學究式、玄學式地來觀察這個問題。

你們要不要聽一聽沙珂尼考夫同志所說的話呢？他在發言中說：

“我們的對外貿易是一種國家資本主義的營業……我們的內部貿易

——也是一種國家資本主義的營業。同志們！老實說，我們的國家銀行也同樣是國家資本主義的企業。我們的貨幣制度是什麼呢？我們的貨幣制度是建築在下面的基礎上的：在蘇維埃經濟中，在建設社會主義的條件之下，採取了根據資本主義經濟原則的貨幣制度。”

沙珂尼考夫同志是這樣說的。

他恐怕把人民財政委員部也快要當作國家的企業了。我們大家一向都認為國家銀行是國家機關底一部分。我們大家一向都認為對外貿易（如果把對外貿易中的一部分國家資本主義的營業除外）是國家機關的一部分，我們的國家機關是無產階級式的國家機關。我們大家一向都是這樣想的，因為無產階級政權是這些營業之唯一的主人翁。可是如今照沙珂尼考夫的說法，這些國家機關底部分都是國家資本主義的機關。大概我們的蘇維埃機關也是國家資本主義的機關，而并不是像列寧所說的無產階級式的國家機關了吧？怎麼會不是呢？難道我們蘇維埃機關不使用着“根據資本主義經濟原則的貨幣制度”麼？你們看，這樣的說話可得出怎樣不通的結論。

讓我先來引證列寧關於國家銀行的性質與意義的問題所發表的意見吧。同志們！我所需要引證的，是列寧在一九一七年所著的“布爾塞維克能否保持政權”那本書裏的一段話，列寧在著那本書的時候，還祇主張監督工業（而不是使之國有化），可是那時候他就已經認為操在無產階級國家手中的國家銀行十分之九是社會主義的機關了。他關於國家銀行問題曾經這樣寫道：

“大銀行就是我們實現社會主義所必需的國家機關，這種大銀行，是我們從資本主義方面現成地奪過來的，我們底任務祇在把損害這個優越機關的一切資本主義的妨礙物除去，使這種機關成為更龐大，更德謨克拉西、更包羅盡致的機關。數量變成質量。從許多非常巨大的國家銀行中形成一個統一的大銀行，再在各工廠中分設銀行的分行——這就已經是十分之九的社會主義的機關了。這就已經成了全國的核算局，這就已經成了全國生產與分配的統計局，這也就已經變成了社會主義的骨幹。”（見“列寧全

集”第十四卷下冊第二三一頁)

你們只要把列寧的話與沙珂尼考夫同志所說的話比較一下，你們就可知道沙珂尼考夫是錯誤到什麼地步了。如果他把人民財政委員部也稱為國家資本主義，我是毫不驚奇的。

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沙珂尼考夫同志的這種錯誤是從何而來的呢？

是的，就是因為他不了解新經濟政策的兩重性，不了解我們商業在現時社會主義成分與資本主義成分鬥爭的環境中之兩重性，他不了解無產階級專政的環境中、過渡時代的環境中（那時社會主義的成分利用資產階級的方法和武器來克服和消滅資本主義的成分）之辯證法。問題並不是在於商業和貨幣制度是『資本主義經濟』底方法。問題是在於社會主義的成分，在與資本主義的成分作鬥爭的時候，就利用着資產階級的這種方法和武器來克服資本主義的成分，他們正節節勝利地利用着資產階級的這種方法和武器來反對資本主義，來建築我們經濟底社會主義基礎。因此，問題就在資產階級的這種工具底功能與任務，因我們發展的辯證過程而起原則上的、根本的變化，這種變化是有助於社會主義而不利於資本主義的。沙珂尼考夫同志的錯誤就在於他不了解我們經濟中所發生的過程底一切複雜性與矛盾性。

現在讓我再把列寧關於國家資本主義的歷史性問題，關於什麼時候、為什麼及在何種具體的條件之下他不得不把國家資本主義當作主要形式的這個問題所發表的話，引它一段出來給你們大家看。（座中叫聲：『請吧！』）

“我們無論什麼時候都決不能忘記這件事實：我們在國家工廠的工人中間時常可以看到一種社會主義的制度，在這種工廠中工人們自己搜集燃料、原料和食品，工人們用運輸工具把工業品送到農村中去，盡量把這種工業品正確地分配給農民。這就是社會主義。但除了這種社會主義的經濟之外還存在着小經濟，這種小經濟的存在是完全不依賴於社會主義的經濟的。為什麼它們能夠不依賴於社會主義的經濟而存在呢？因為大的工業還沒有恢復起來，因為社會主義的工廠還只能得到它們所應得的成分的十

分之一。它們所沒有得到的那許多成分，便依然不受社會主義工廠的管轄而獨立地存在着。我們的國家會遭受了強烈的破壞，燃料、原料和交通工具，又非常缺乏，因此，使小的生產還能離開社會主義而獨立地存在着。在這種條件之下，國家資本主義是什麼東西呢？我說：這就是小生產底聯合。資本把小的生產歸併起來，資本從小的生產中生長起來。關於這一點是用不到隱瞞的。當然，自由貿易就是資本主義的增長；這一點是決不能否認的，誰要是否認和掀開這一點，誰就是自己安安慰自己。如果有小經濟和自由貿易的存在——就有資本主義的存在。但如果在我們的手中掌握着工廠、製造廠、運輸事業和對外貿易的時候，這種資本主義的存在對於我們是不是非常可怕的呢？我以前曾經說過，我現在也不妨再說一遍：這種資本主義對於我們是並不可怕的。租借企業也就是這樣的一種資本主義。”（“列寧全集”第十八卷上冊第一九七——一九八頁）

列寧對於國家資本主義問題的意見就是這樣。

在一九二一年的時候，我們自己的工業差不多還完全沒有，那時候原料非常缺乏，交通完全陷於停頓的狀態中，列寧在那時候就主張採取國家資本主義作為農業與工業聯繫的工具。這是很正確的。但列寧是不是把這種方法當作了在任何的條件之下都可採用的一種方法呢？當然不是的，他之所以主張採取國家資本主義作為工業與農業聯繫底工具，因為那時候我們還沒有很發達的社會主義的工業。可是現在呢？我們現在可不可以說我們還沒有很發達的社會主義的國家工業呢？當然決不能這樣說。發展的方向完全不是如此。租借的企業差不多絲毫沒有進展，國有工業已日漸發達起來，國家的商業、合作社也日趨發展，城市與鄉村的聯繫也經過社會主義的工業而開始建立起來。我們現在所處的情況比我們自己所預料的還要好得多。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怎麼可以說國家資本主義還是我們經濟的主要形式呢？

反對派最糟糕的地方，就是他們根本不願意了解這些簡單的道理。

八 季諾維埃夫同志與農民

農民問題。我在報告中已經說過了，許多發言的同志也都指出，說季諾維埃夫同志有輕視中農的傾向，說他在不久以前還堅決的主張使中農中立，祇有到了現在，在黨內的鬥爭之後，他才換了一種主張——堅固聯合中農的主張。這對不對呢？讓我引證幾段話給你們看吧。

季諾維埃夫同志今年做了一篇文章，題目叫做“論布爾塞維克化”，在那篇文章中他寫道：

“有許多任務，是共產國際之下的各國政黨底共同任務，例如……正確的應付農民，便是這些任務之一。在全世界的農民中間有三個階層，這三個階層，我們可以而且應當把他們抓住，使他們成為無產階級的同盟者（農業無產階級及半無產階級——不雇傭他人勞動的自耕農和小農）。還有另一種階層（中農），我們至少應使他們中立。”（一九二五年一月十八號的“真理報”）

在第八次黨代表大會之後經過了四年（在那次大會上列寧推翻了“使中農中立”的口號，提出了“堅固地聯合中農”的口號），季諾維埃夫同志關於中農問題還說出這樣的話來。巴加也甫同志問道：這有什麼要緊呢？我請你們把季諾維埃夫的文章和列寧關於中農問題的提綱對照一下，你們就可以回答得出來，季諾維埃夫同志究竟是不是離開了列寧的提綱……（座中叫聲：“這是指其他的國家而言，並不是指俄國呀！”嘈雜聲）。同志們！不能這樣解釋的；因為在季諾維埃夫同志的文章中所說的是“共產國際之下的各國政黨底共同任務”。難道你們還會否認我們聯邦共產黨也是共產國際底一部分麼？在他這篇文章中是很直截了當地寫着：“各國政黨”。（會場中列寧格勒的代表叫道：“在一定的時候。”全場哄笑）

你們祇要把季諾維埃夫文章中的這一段話（所謂“使中農中立”）與列寧在第八次黨大會上所說的話（堅固的聯合中農）對照一下，你們就可以知道，

這兩種主張是完全不同的。

拉林同志，這位農村“第二次革命”的鼓吹人，讀了季諾維埃夫同志的這篇文章之後，就立刻附和了季諾維埃夫的意見，這是很值得我們注意的。我認為拉林同志在他最近的發言中雖然已起來反對季諾維埃夫同志和加米業夫同志，而且他的話也說得很中肯，但是這仍舊遮掩不了我們和他的爭論，我們應當與他分別清楚。拉林同志關於季諾維埃夫這篇文章的批評如下：

“共產國際的主席——季諾維埃夫同志以各國政黨的共同任務的觀點來指出‘對於農民之正確的態度’，是完全正確的。”（拉林著的“蘇維埃農村”第八〇頁）

我曉得拉林同志要出來抗議，申明他在他所著的那本書中曾經指明他對於季諾維埃夫同志把中農中立的口號也應用於俄國這一點是不同意的。不錯，他在他的大作中確實曾經指明了這一點，他在那本書上說：我們祇是使中農中立還不够，我們還須更進一步的“與中農妥協以反對富農”。但是，可惜他的反對富農的“第二次革命”的主張弄昏了他，使我們不能與他一致，使他與季諾維埃夫同志的主張接近起來，使我不得不和他略為離開一點。

你們可以看到，季諾維埃夫同志在我上面所引證的那篇文章中是很直截了當的、明顯的主張中農中立的口號，他這種主張，是違背列寧所謂使中農中立還不够，更必須堅固的聯合中農那種主張的。

我們還有一個證據可以證明這一點。季諾維埃夫同志在他所著的“列寧主義”那本書裏面引證了列寧指一九一八年那個時期而說的下列的一句話：“與全體農民共同地完成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與貧農、農村無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共同地前進到社會主義的革命。”而得出了這樣的一個結論：

“我們現在所研究的基本問題，完完全全包含在上面所引證的列寧的那兩句話裏面。這裏我們一點也用不到補充，一個字也用不到增加。在這兩句話中充滿了列寧所特有的簡捷和明確底色彩，這兩句話比概要錄中所敘述的還概要和清楚。”（“列寧主義”第六〇頁）

這就是季諾維埃夫對於農民問題中之列寧主義的一個淋漓盡致底敘述。與全體農民共同反對沙皇和地主——這是資產階級的革命。與貧農共同反對資產階級——這就是十月革命。這一切都對的。這是列寧的兩個口號。但是列寧的第三個口號與中農共同為社會主義的建設而反對富農——究竟是怎麼樣呢？列寧的這第三個口號究竟那裏去了呢？從季諾維埃夫同志這本書裏，我們簡直找不到這個口號。這個口號大概是落掉了。雖然季諾維埃夫同志肯定的說，這裏“我們一點也不用補充”，但我們如果不把列寧的第三個口號——無產階級和貧農與中農作堅固的聯合這個口號——補充進去，那我們就會像季諾維埃夫那樣曲解列寧主義。季諾維埃夫同志落掉了列寧的第三個口號——我們現在最切要的口號——是不是偶然的一回事呢？不，決不是的，因為他主張中農的中立。第一段話和第二段話的區別僅僅是在於：他在第一段話中直截了當的反對堅固聯合中農的口號，而在第二段話中却避開了這個口號。

還有第三個證據——季諾維埃夫所著的“**時代之哲學**”。我現在所說的，祇是未經中央委員會修改和補充之前的那個原稿。這篇文章的特點就是它也和第二個證據那樣完全避開了中農問題，避開了這個非常切要的問題而高唱什麼民粹派的平等、不劃分階級區別的平等的高調。在這篇文章中他曾講到貧農、富農、資本家，也會攻擊到布哈林，講到社會革命黨式的平等，講到烏斯脫拉羅夫，可是一個字也沒有提到中農和列寧的合作社計劃，雖然這篇文章的題目叫做“**時代之哲學**”。當莫洛托夫同志把這篇文章給我看的時候（那時候我在旁的地方），我就毫不客氣的給了這篇文章一個嚴厲的批評。是的，同志們，我確是一個直爽的、粗暴的人，我毫不否認這一點。（揚中哄笑聲）我當時毫不客氣的給了季諾維埃夫一個很嚴厲的批評，因為他在一年以來有系統的避開了或曲解了列寧在農民問題中的那個非常重要的主張——堅固聯合農民基本羣衆底我們黨的實際口號，對於這一點，我實在不能再忍耐下去了。那時候我是這樣答覆莫洛托夫同志的：

季諾維埃夫的“**時代之哲學**”一文完全是對黨的路線的一種拉林式

的曲解。在這篇文章中高談第十四次黨臨時大會，可是它把這次大會上的主要問題——中農問題及合作社問題——却完全避開了。在這篇文章中列甯的合作社計劃和中農問題完全失了音跡。這決不是偶然的事。他在這種情形之下來高唱“爲討論第十四次黨臨時大會之決議而鬥爭”，就是要破壞這種決議。像季諾維埃夫同志那樣把布哈林和斯託雷平混在一起，就是侮蔑布哈林。如果這樣，我們也就同樣可把斯託雷平和列甯混在一起了，因爲列甯也曾說過：“你們要去做買賣，而且要去學習做買賣，。平等的口號，在現時，祇是一種社會革命黨人的假仁假義的手段吧了。當階級和熟練與不熟練的勞動還存在着的時候，無論什麼平等都不會實現（參閱列甯“國家與革命，。）。我們所應當說的並不是空虛的平等，而是階級的消滅和社會主義。把我們的革命稱爲“非標本式的，革命——就是投降孟塞維克主義。我認爲這篇文章必須加以根本的刪改，使它不帶有批評第十四次黨大會之提綱的性質。

斯大林，一九二五年，九月十二號。，

這封信中的每個字，每句話，都是我現在所要堅持的。

在重要的負有指導作用的文章中，不對平等下一個嚴格的定義，就決不能隨口亂說平等，他並沒有說明他所指的平等是什麼樣的一種平等——工人與農民的平等，農民內部的平等，工人階級內部的平等，熟練與不熟練勞動之間的平等，抑或是指消滅階級而言的那種平等。我們決不能在負有指導作用的重要文章中避開黨關於農村工作的實際口號。我們決不能這樣隨便的高唱平等的高調，因爲這不是開玩笑的事，同樣我們也決不能避開了列甯在農民問題中所提出的實際口號而來高談列甯主義。

我們這裏一共有三個證據：季諾維埃夫同志在一九二五年一月所做的文章（主張中農中立），季諾維埃夫同志在一九二五年九月所著的“列甯主義，（沒有提到列甯對中農所提出來的第三個口號），和季諾維埃夫同志最近所做的（一九二五年九月）“時代之哲學，，在這篇文章中也絲毫沒有提到中農問

題和列寧的合作社計劃。

季諾維埃夫同志在農民問題中這種經常的動搖，是不是偶然的呢？

你們可以知道，這決不是偶然的。

不久以前，季諾維埃夫同志在列寧格勒所做的中央的報告中，才決定擁護堅固聯合中農的口號。這是在鬥爭之後，在中央委員會上爭論之後的事。這姑且不講它。但我總不能堅信季諾維埃夫同志將來能不再改變他的主張，因為歷來的事實證明，季諾維埃夫同志在農民問題上從來沒有表示過它的堅決性，可是這種堅決性恰巧是我們所最需要的（鼓掌）。

季諾維埃夫同志在農民問題中動搖的事實我現在可以舉出幾個來。一九二四年的時候，季諾維埃夫同志在中央的全體會議上曾主張在中心區域及在各地組織非常農民的團體並出版週刊的那種“農民政策”，這種提議，結果因中央的反對而被否決。在這不久以前，季諾維埃夫同志甚至以其“農民傾向”，為自誇。例如，他在第十二次黨大會上說道：“當人家說我有‘傾向’，說我傾向於農民的時候，我就回答說道：不錯，我們不僅應當‘傾向於農民和它的經濟需要，而且還當向他們低頭，在必需的時候，我們甚至還應當向着跟從無產階級的那一部分農民的經濟需要叩頭。，你們聽吧：‘傾向’，‘低頭’，‘叩頭’，這三個字（哄笑，鼓掌）。後來，當農民的狀況已好了一點，我們在農村中的情形也已大有起色的時候，季諾維埃夫同志就翻了個“大筋斗”，他一下子從傾向而轉為懷疑中農，提出中農中立的口號。經過了一些時候之後，他又翻了一個“筋斗”，實際上提出了重新審查第十四次黨臨時大會的決議之要求（“時代之哲學”），把農民傾向這個頭銜幾乎加到全體中央委員會的頭上，他已更要堅決地“傾向”，於反對中農。最後，到第十四次黨大會的時候，他又翻了一個“筋斗”，居然開始主張堅固地聯合中農，洋洋自得地向人們顯示他自己又重新準備向農民“叩頭”，了。

怎麼樣可以担保季諾維埃夫同志不再動搖一次呢？

同志們！這不是一個政治家，祇是一副搖擺不定的鞦韆架罷了（哄笑聲，

鼓掌聲)。同志們！這簡直是一個有神經病的人，那裏還像一個政治家呢！（會場上喊道：“對呵！，，）

有些人說，我們用不到特別去注意反對第二個傾向的鬥爭。這是不對的。如果現在確是有兩個傾向——博古舍甫斯基的傾向和季諾維埃夫的傾向——存在着，那末，你們就應當明白，博古舍甫斯基無論如何是不能與季諾維埃夫同志比較的。博古舍甫斯基已經是完了的人（哄笑聲）。博古舍甫斯基也沒有它自己的機關報。可是中農中立的傾向，反對堅固聯合中農的傾向，即是季諾維埃夫的傾向却有它自己的機關報，而且直到現在還繼續地與中央鬥爭着，這個機關報就叫做“列甯格勒真理報”，不久以前在列甯格勒風行的“中農主義的布爾塞維克”，這個新名辭，就是從“列甯格勒真理報”，的口中傳播出來的。難道這還不是證明它（“列甯格勒真理報”，）在農民問題上已經離開了列甯主義麼？難道從這些地方還不很明顯的可以看出與第二個傾向鬥爭比與第一個傾向——博古舍甫斯基的傾向——鬥爭還要困難麼？第二個傾向既有像“列甯格勒真理報”，那樣的代表人和保護人，因此，我們就應當想法使黨特別用心地與第二個傾向鬥爭，這個傾向是很複雜很有力量的，我們應當集中我們的火力去反對這個傾向。因此我認爲這個傾向是我們的黨所必需特別注意的對象（會場上叫道：“對呵！，！鼓掌）。

九 分歧底歷史

現在讓我把中央委員會內部大多數中央委員鬥爭的歷史來講給你們聽。我們的爭論是從什麼地方開始的呢？我們的爭論最初是從“如何對待託洛茨基”，這個問題上開始的。這是一九二四年年底的事。列甯格勒的同志起初主張開除託洛茨基。這說的是一九二四年的爭論時期。列甯格勒的省委通過了開除託洛茨基的決議案。當時我們，即多數中央委員，不同意這個決議（會場上叫道：“對呵！，，），與列甯格勒的同志作了一番鬥爭，勸他們把開除託洛茨基這一項從決議案中刪去。經過了不久，在開中央全體會議的時候，列甯格勒派又與

加米業夫聯合起來，一致要求把托洛斯基從政治局中立刻開除出去，我們那時候也依舊不贊成反對派的這種提議，經多數中央委員的同意，結果祇撤消托洛斯基人民軍事委員的職務。我們之所以不贊成季諾維埃夫和加米業夫的提議，就因為我們知道，開刀的政策對於黨是非常危險的，開刀的方法、放血的方法——他們要求放血——，是很危險的一種方法：今天趕走一個，明天趕走一個，後天再趕走一個——結果在我們黨內還剩下什麼人呢？（鼓掌）

在中央委員會內部的這一個衝突中，已可看到我們與他們的黨的組織政策問題上底基本差別。

引起爭論的第二個問題就是沙爾基斯發言反對布哈林的問題。這是在一九二五年一月所召集的第二十一次列寧格勒黨代表會議上的事。那時，沙爾基斯在會議上的發言中曾罵布哈林是工團主義者。他說道：

「我們在莫斯科的『真理報』上，讀到了布哈林論工人和農村通信員的一篇文章。布哈林所宣傳的那種方法，在我們的組織中沒有一個人是贊成的。可是那一種類似工團主義的、反對布爾什維克的、反黨的觀點，却得到了好多負責同志（我再重複說一遍：並不是列寧格勒組織中的負責同志，而是其他組織中的負責同志）的擁護。他們主張工農羣衆的社會組織應脫離共產黨，管轄而完全獨立。」（第二十一次列寧格勒黨部代表會議記錄）

第一，這段話是沙爾基斯的一個原則上的錯誤，因為，布哈林在工人和農村通信員運動的問題上絕對是正確的；第二，他完全破壞了（他當然也受了列寧格勒黨部的領導人物底慫恿）同志間討論問題的基本規則。這種話當然不能不影響到中央內部關係的惡化。後來，沙爾基斯在報上公開承認了他的錯誤，事情才算了結。

這件事情證明，公開的承認錯誤是避免內部公開的鬥爭和消滅糾紛之最好的方法。

第三個問題，就是列寧格勒少共的問題。現在省委的委員們也都在麼？他

們大概總還記得，政治局關於列甯格勒的省委不經過少共中央的許可和同意，擅自企圖在列甯格勒召集全俄少共臨時會議這個問題，曾經做了一個決議。俄國共產黨中央的決議你們都是讀過的，我們決不能允許除了正式的少共中央之外，同時還有另一個中央的存在，與正式的中央競爭而對立起來。我們每一個布爾塞維克，決不能允許兩個中央的存在。因此黨的中央認為必須設法更換允許這種分立主義的少共中央，及撤消沙法羅夫同志所任的列甯格勒省委領導者的職務。

這種事情很明白的表示出，列甯格勒的同志確有一種把他們的列甯格勒組織變成反中央之鬥爭中心的傾向。

第四個問題，這就是季諾維埃夫同志所提出的問題——他提議在列甯格勒出版一個專門的雜誌，雜誌的名稱叫做：‘布爾塞維克’，編輯人是季諾維埃夫、沙法羅夫、法爾亭、沙爾基斯、太爾哈諾甫。我們當時不贊成這個提議，認為這一種與莫斯科的‘布爾塞維克’雜誌同時獨立存在的雜誌，必然要變成反對派的小組織的機關報，這種辦法是很危險的，將能破壞黨的統一。換一句話說，我們禁止了雜誌的出版。現在他們想用‘禁止’這字來嚇我們。但是同志們！這是沒有什麼關係的。我們不是自由主義者。在我們看來，黨的利益要比形式的民主主義高得多。不錯，我們禁止了小組機關報的出版，這類的出版物我們都是要禁止的（場下聲：‘對呵，！大鼓掌’）。

這件事情證明，列甯格勒的上層領袖想形成一個特別的派別。

再說到布哈林同志的問題。我現在所要講的就是‘發財罷’，這個口號。這個口號是布哈林同志在他的四月間的演說中提出來的。經過了兩天之後，黨的臨時會議便閉了幕。當時在主席團的會議上（當時季諾維埃夫、沙珂尼考夫、加米業夫和加李甯等同志都在座）起來反對這個口號，說這個‘發財罷’的口號不是我們的口號的人，不是別人，正就是我。我不記得當時布哈林同志曾經起來反對我的意見這一回事。當拉林同志要求在會議上發言反對布哈林的時候，起來要求不准發言反對布哈林的，不是別人，正就是季諾維埃夫同志。可是

，在這件事情之後，克魯卜斯加同志又做了一篇文章反對布哈林，要求我們把它發表出來。布哈林同志當然也不肯默不作聲地受人攻擊。他也做了一篇文章反駁克魯卜斯加同志。多數中央委員決定不發表一切爭論的文章，也不進行這種爭論，並勸告布哈林同志在報上申明‘發財罷，這個口號的錯誤，布哈林同志同意了這個提議，他答應從休養所回來之後，在反對烏斯脫略洛夫的文章中申明這點錯誤。現在加米業夫同志和季諾維埃夫同志就想拿‘禁止，這個字來嚇人，他們心目中充滿了自由主義的憤慨，因為我們竟敢禁止發表克魯卜斯加同志的文章。但你們這樣是嚇不倒什麼人的。第一，我們禁止發表的不僅是克魯卜斯加的文章，我們也同樣禁止發表布哈林的文章。第二，如果爲了保持黨內的統一起見，必須禁止發表這種文章的時候，爲什麼我們便不能禁止發表克魯卜斯加同志的文章呢？試問克魯卜斯加同志與其他負領導責任的同志有什麼區別呢？你們是不是以爲個人的利益比黨的利益和黨的統一還要高呢？難道反對派的同志不知道在我們布爾塞維克看來，形式上的民主祇是一個空東西，而黨的實際利益是至高無上的東西麼？（鼓掌）

請他們向同志們指出來，黨的中央機關報——‘真理報，上究竟那一篇文章直接或間接地袒護了布哈林同志所提出的‘發財罷，這個口號。這樣的文章他們一篇也指不出來的，因爲根本就沒有這樣的文章。祇有一次，唯一的一次，斯特茨基同志曾經在‘少共真理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他在這篇文章中用很軟弱的隱隱約約的語氣極力替布哈林的這個口號辯護。怎麼樣呢？這篇文章發表後的第二天，中央的秘書處就寫了一封信（署名的是：莫洛托夫、安得列甫和斯大林）警告‘少共真理報，的編輯部。這是一九二五年六月二號的事。經過了幾天之後，中央組織部就議決把‘少共真理報，的主筆撤職，當時布哈林同志是完全同意這個決議的。下面就是那封信上摘下來的一段話：

‘一九二五年六月二日，莫斯科城。俄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致‘少共真理報，全體編輯和俄國共產黨出版部主任瓦來依克斯同志的一封信：——我們認爲斯推容基同志所著的‘新經濟政策之新階段，一篇文章中有些

地方很使人懷疑的。這篇文章用很和緩的隱約不明的話句在說“發財罷，，這個口號。這個口號不是我們的口號，這個口號是不正確的，是能引起許多懷疑和誤會的，“少共真理報，，上不應登載這篇文章。我們的口號是“社會主義的積累，，我們要把改善農村生活狀況的道路上所有的一切行政上的阻礙完全掃除。這種手段，毫無疑義的，能促進一切積累——私有資本主義的積累和社會主義的積累。但是黨從來沒有說它要把私有資本的積累當作它自己的口號，，……

這一切事實，反對派是否都完全知道呢？當然是完全知道的。那末爲什麼他們還要繼續攻擊布哈林同志呢？爲什麼他們還要高叫布哈林同志底錯誤呢？

我知道有些同志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時所犯的錯誤，比布哈林同志的錯誤還要嚴重得多。這些同志不僅犯了錯誤，而且還兩次“勇敢地，破壞了列甯指導之下所通過的中央的決議。但在他們承認了錯誤之後，黨也就忘掉了這些錯誤了。現在布哈林同志所犯的錯誤比這些同志所犯的錯誤還要小得多。而且他也沒有破壞過中央的任何一個決議。他們還要繼續攻擊布哈林同志究竟是什麼用意呢？他們究竟要把布哈林同志弄得怎樣才稱心如意呢？他們大概要布哈林的血。季諾維埃夫同志在他的結論中，特別攻擊布哈林的用意就是這樣。你們要布哈林的血麼？你們要知道，我們決不會把他的血給你們的（鼓掌，高叫“對呵！，，）。

關於布哈林的錯誤問題就是這麼一回事。

其次，再講到季諾維埃夫“時代之哲學，，那篇文章的問題，和加米業夫在本年夏末秋初所召集的莫斯科省委全體會議上的報告問題——這些問題也曾經引起我們內部的糾紛。這個問題我在講演中已經說過，現在我也不再重複了。那裏我曾經講到“時代之哲學，，這篇文章，曾經講到這篇文章的錯誤，講到我們怎樣糾正了這種錯誤；同時，也講到加米業夫同志在中央統計局之糧食（人糧與馬糧）預算問題上的錯誤，講到加米業夫同志怎樣輕易地相信了中央統計局關於在上層的農民中間有百分之六十的剩餘商品的統計，後來他又怎樣在同

志們的壓制之下，不得不在報上向勞動國防局寫的申明書中糾正了他自己的錯誤，承認剩餘的商品大半是在中農手中。這一切問題，毫無疑義的是曾經引起了我們內部的糾紛。

後來就發生了十月全體會議上的許多新的糾紛問題，反對派在這次會議上要求公開的討論，在這次會議上又產生了沙魯容基所發明的‘齊密圖’，這個新名詞的問題，最後，又有列甯格勒的代表會議，它第一天就公開地向中央開起火來。我所說的就是沙法羅夫，沙爾基斯、舍拉溫等人的發言，和季諾維埃夫在會議告終時的最後的一篇演說。季諾維埃夫在這篇演說中號召出席列甯格勒會議的全體同志向莫斯科的同志宣戰，提議選舉努力與中央作鬥爭的人充當代表。因此康馬洛夫和洛波夫這樣忠實的老布爾塞維克都沒有當選為列甯格勒的代表（因為他們不接受反對中央的綱領）。高爾登和太爾哈諾甫代替了他們，充當了代表。試把高爾登和太爾哈諾甫兩人與康馬洛夫和洛波夫兩人放在天秤上較量一下，任何一個沒有偏見的人都會說，前兩人趕不上後兩人（鼓掌）。康馬洛夫和洛波夫究竟差在什麼地方呢？他們就差在不願意反對中央這一點上。這就是使他們不能當選為代表的原因。一個月之前，列甯格勒派選主張要康馬羅夫當他們組織的第一書記。事情是這樣的。是不是這樣的呢？（列甯格勒的代表回答道：“是這樣的，，，）為什麼在一個月之後，康馬洛夫的遭遇便能起這樣的變化呢？（布哈林說道：“他在一個月內已經起了一次蛻變了，，）中央委員康馬洛夫同志，你們曾經要他去充當你們的組織的第一書記，為什麼在一個月之後，連當選大會代表的資格都沒有的呢？（會場有人喊道：“因為他侮辱了我們的會議，，又有人喊道：“奈烏莫甫同志，你不要造謠吧！，，喧鬧聲）。

十 反對派的綱領

現在再來講到季諾維埃夫、加米業夫、沙珂尼考夫和拉舍維契底綱領，現在已是談反對派綱領的時候了。他們的綱領是很新奇的。反對派要了許多不同

的五花八門的議論。加米業夫說的話是這個樣子，季諾維埃夫說的話是另一個樣子，拉舍維契和沙珂尼考夫所說的話又是另一個樣子。他們所說的話雖然是五花八門各不相同，但是有一個共同的主張却把他們聯合在一起了。他們的共同主張是什麼，他們的綱領是什麼呢？他們的綱領就是改革中央委員會的秘書處。使他們聯合在一起的唯一的共同主張——就是中央秘書處的問題。這是很奇怪而滑稽的，可是這確是事實。

這個問題是有一段歷史的。在一九二三年第十二次黨大會之後，聚集在“山洞中”，（哄笑）的那些人們，提出一個綱領，主張取消政治局，使秘書處政治化，就是，主張把秘書處變成季諾維埃夫、託洛茨基、斯大林三人組成的政治上和組織上的領導機關。這個綱領的用意是什麼呢？這究竟是什麼意思呢？他們的意思就是不要加李甯、湯姆斯基、莫洛托夫、列可夫、布哈林來領導我們的黨。但是這個綱領，結果一點也不能實現。這不僅是因為這個綱領在那時候是毫無原則的，同時也因為沒有上述的幾位同志來領導我們的黨完全是不可能的。從基斯洛伏克用書面寄來的向我所發的一切問題，我都給了否定的答覆，我說，如果同志們都贊成這種主張，那我馬上靜悄悄地，毫不爭執地，絕不要求保障少數的權利，把位置讓出來（笑）。

這是第一個階段。

現在我們已進到了第二個階段，與第一個階段恰巧是相反的。現在他們不主張秘書處的政治化，而主張秘書處的技术化了；不主張取消政治局，而主張把一切大權完全交給政治局了。

如果把秘書處變成一個簡單的技術機關，對於加米業夫同志倒確是一樁很便利的事，他也許可以贊成這種辦法。但是我恐怕黨是未必會贊成這種辦法的（寫下聲：“對，！，，”）。技術秘書處能否替組織局和政治局準備他所應當準備的問題，對於這一點我是很懷疑的。

至於說到掌握全權的政治局，這種主張簡直是不值我們的一笑。難道政治局不是掌握着全權麼？難道秘書處和組織局不是隸屬在政治局之下的麼？中央

的全體會議是什麼東西呢？我們的反對派為什麼不提到中央全體會議呢？他們是不是想把政治局變成比中央全體會議的權力還大的機關呢？

不，反對派的主張，關於中央秘書處的主張是得不到一點好結果的。

十一 他們的“愛和平”

你們一定要問，以後想什麼辦法才能從現有的狀況中跑出去呢？我們在大會前和在大會的時候一心一意所想的就是這個問題。我們必須達到黨內的一致——這就是現在最主要的一件事。反對派很歡喜講到困難。但有一個比一切困難還危險的困難——反對派替我們造成的一個困難——這就是黨內組織分裂和瓦解的危險（鼓掌）。首先我們就必需克服這個困難。因此我們在大會開幕的兩天之前用很妥協的條件寫了一封信給反對派，想把內部的糾紛儘可能地和解下去。這封信底內容如下：

“署名於下的中央委員認為在大會準備中有許多列寧格勒的領導同志離開了黨中央的路線，而且反對列寧格勒所有一切擁護中央路線的同志。署名於下的中央委員認為莫斯科會議的決議案（無論在實質上和形式上）是完全正確的，中央對於一切反黨的破壞黨組織的傾向都應當加以無情的打擊。

但是，爲了保持黨的統一及黨內的和平起見，爲了避免列寧格勒組織——俄國共產黨的一個最優秀的組織——離開黨的中央底危險起見，署名於下的中央委員認為可以——在保持明確的中央的路線之下——對他們讓一些步。因此，我們提出下列的提議：

（一）在起草中央報告的決議案時，必需以莫斯科會議的決議作爲基礎，但其中有些語氣必須和緩一點。

（二）爲了保持黨的統一起見，在報章上或雜誌上發表列寧格勒會議的來信和莫斯科省委的回信，認爲是不妥當的。

（三）政治局的委員在大會上不准相互攻擊。

(四)在大會上的發言中必須與沙爾基斯(黨內成分的調節)和沙法羅甫的意見分裂開來。

(五)以組織的手續糾正康馬洛夫和洛波夫和莫斯科文問題上的錯誤。

(六)在大會後立刻實行中央關於吸收列寧格勒的同志參加祕書處的決議。

(七)准許列寧格勒派一個人參加中央機關報編輯委員會的工作，以加強與中央機關的聯繫。

(八)「列寧格勒真理報」的主筆(格拉特尼夫)能力太薄弱，故必須經過中央委員會的同意另以更得力的同志來代替他。

加里寧 斯大林 布哈林 李可夫

魯祖塔克 湯姆斯基 莫洛託夫 吉爾仁斯基

同啓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同志們！我們當時曾提出了這些妥協條約。

但是反對派不肯同我們妥協。他們要在大會上作公開的劇烈的鬥爭。這就是反對派所愛的和平。

一二 黨必須達到一致

我們在基本方面現在還堅持着這個主張。在我們的決議草案中，我們爲了黨內和平起見，已把一部分語氣緩和了許多。

我們反對開刀，我們反對開刀政策。但這並不是說，領袖犯了錯誤我們就不必處罰他。不，我們對於領袖也是不客氣的。我們對於領袖，決沒有崇拜偶像的觀念。(會場上喊道：「對呵！」鼓掌)我們主張黨的統一，我們反對開刀政策。黨需要一致，黨必須要達到一致，如果加米業夫和季諾維埃夫也願意一致，那我們就要與他們共同地去達到這種一致；如果他們不願意一致，那我們就是沒有他們也同樣要去達到這種一致。(鼓掌)

達到一致所必須的條件是什麼呢？就是少數必須服從多數。沒有這個先決條件，就沒有而且也不能有什麼一致，黨也就不能存在。

我們反對出版辯論特刊。在“布爾塞維克”雜誌中有一個辯論欄，這就已經很夠了。我們切不可太沉醉於辯論。我們是統治全國的政黨，你們切不可忘記這一點。你們切不可忘記，上層領袖中每一種分裂，都是減弱我們在國內的力量，國外則更不用說了。

中央機關應當保持他們同有的狀態。黨決不肯把他們毀壞的（鼓掌）。政治局除了中央全體會議之外，是握有全權的，牠是站在一切中央機關之上的機關。可是黨中央的最高機關是中央的全體會議——這是有人常常忘記的。中央全會有決定一切的權力，當有的領袖開始動搖時，牠就起來糾正他們。（場上喊聲：“對呵，，！鼓掌”）。

我們應當達到一致，如果大會能表示出自己的精神，不被反對派嚇退，這種一致必定是可以達到的，如果我們中間有人要破裂這種一致，那我們就必須警告他。這是必須的。我們決不能在集體之外來領導黨。除列寧以外，誰要這樣幻想，那就未免太蠢了（鼓掌）。

集體的工作，集體的領導，在少數服從多數條件之下鞏固黨的一致和中央機關底一致——這就是我們現在所需要的。

至於說到列寧格勒的工人同志，我是無懷疑地堅信他們始終是站在我們黨底前列的。我們與他們一致建設了我們的黨，我們與他們一起經歷了艱難困苦，與他們一起在一九一七年舉起了暴動旗幟，與他們一起戰勝了資產階級，與他們一起同我們建設道路上的一切困難奮鬥過，而且還要與他們一起奮鬥下去。我堅信，列寧格勒的工人同志在為黨內鐵的列寧式的一致而鬥爭時，決不會落在其他工業中心的朋友們底後面的（大鼓掌，唱“國歌”，）。

聯共中央在十五次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三日至七日

一 世界資本主義恐慌底增長和蘇聯底國際地位

同志們，我們國家在資本主義包圍的狀況中，生存和發展。我國的情形，不但要看內部的力量，並且，還要看資本主義包圍的狀況，因為我們的資本國家內的情形，他們的強弱，全世界被壓迫階級的力量和這些階級革命運動的力量。我們的革命，是世界被壓迫階級革命運動的一部分，這點我儘可不必多說。所以我以為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報告，一定要從我國國際情形、資本主義國家及各國革命運動狀況講起。

(1) 世界資本主義的經濟狀況與 奪取國外市場鬥爭的加厲

一，第一個問題：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和貿易的情形。

同志們，關於這點的最主要的事實，就是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在本報告所包括的這二年中，已經達到戰前的程度，有的並且已經超過這程度。試舉幾個

統計：世界生鐵的生產，在一九二五年等於戰前之百分之九七·六，在一九二六年已達到戰前百分之一〇〇·五，一九二七年還沒有完整的統計，祇有上半年的統計，這個統計說明生鐵生產有向上的發展。世界鋼的生產統計：在一九二五年等於戰前之百分之一一八·五，在一九二六年等於百分之一二二·六。世界煤的生產統計：一九二五年等於戰前百分之九七·九，一九二六年稍微低落，等於九六·八，這顯然是受英國罷工的影響。世界棉花的消費，在一九二五至二六年等於戰前之百分之一〇八·三，在一九二六至二七年，等於戰前百分之一一二·五。世界主要五穀的收穫，在一九二五年等於戰前之百分之一〇七·二，在一九二六年等於百分之一一〇·五，在一九二七年等於百分之一一二·二。

世界生產的總指數，就是這樣地緩步前進，已達戰前的程度。

但是有幾個資本主義國家，例如美國和日本的一部份的生產不是緩步而是跳躍前進，遠超出戰前的程度。關於美國的統計如下：製造工廠的發展，在一九二五年等於戰前之百分之一四八，在一九二六年等於戰前之百分之一五二；採礦工業的發展，在一九二五年等於百分之一四三，在一九二六年等於百分之一五四。

世界商業的發展。世界商業的發展，沒有像生產那麼進行得快，平常商業的發展總較生產為落後；但是，商業現在也瀕臨了戰前的程度。全世界的和各主要國家國外貿易的指數，在一九二五年等於戰前之百分之九八·一，一九二六年等於百分之九七·一。據各國的計算：美國在一九二五年等於戰前之百分之一三四·三，在一九二六年等於百分之一四三；法國，百分之九八·二及百分之九九·二；德國，百分之七四·八及百分之七三·六；日本，百分之一七六·九及百分之一七〇·一。

一般的講，世界貿易已經達到了戰前的程度，在有幾個國家，例如美國和日本，已經超過了戰前的程度。

最後，還有許多事實說明技術上的進步，資本主義工業的合理化，新的工

業部門的創設，托拉斯化的加厲，國際範圍的工業卡爾爾化的加強。這些事實大家都已知道，所以不必多說。我祇要指明資本主義非但在生產品的發展上，貿易上，就是在生產技術的改良上，生產的合理化上，也獲得了進步，這些祇是使大托拉斯的勢力增加，使新的強有力的壟斷的卡爾爾更興發起來。

同志們，這就是我所要指出來的並且應作為分析上的出發點。

這些事實，是不是說資本主義的穩定，已經堅固了呢？自然不是！在第十四次大會報告上，已經說過就是資本主義可以達到戰前的程度，可以超過戰前程度，可以使他生產合理化，但這並不是說（絕對不是說）資本主義的穩定可以就此堅固起來，資本主義可以轉回到已過去的戰前穩定的狀況。反之正是因生產增加，貿易增加，技術進步和生產可能力的興發，而同時世界的市場，各帝國主義集團的世界市場和勢力範圍，已經相當的穩定，正是因為這樣，所以就發生世界資本主義最深刻最激烈的恐慌，包含着新的戰爭，并且要把什麼穩定，都消滅起。

從部分的穩定上，發生資本主義恐慌的加甚，這種前進的恐慌，消滅資本主義的穩定，——這就是在此現時這個歷史階段上資本主義發展的辯證法。

b) 世界資本主義生產和貿易的發展上，最顯著的事實，就是資本主義的發展，是不平衡的。發展的進行並不是資本主義國家平安地均衡地前後相繼而進，各不障礙，各不侵犯，恰是相反，在各洲各國為霸佔市場而起的殊死爭鬥中，一個國家衰落下來，別國興發起來。經濟的中心從歐洲移到美洲，從大西洋移到太平洋。這樣就使世界貿易中，歐洲所佔的部份減少，而美洲亞洲所佔的部份增加起來。試舉幾個統計：在世界國外貿易上，歐洲所佔的部份，在一九一三年為百分之五八·五，美洲為百分之二一·二，亞洲為百分之一二·三；那末在一九二五年，歐洲的部份，減少到百分之五〇，美洲部份，增至百分之二六·六，亞洲的部分，增至百分之一六。和往前直進的資本主義德國（美國，日本）正相反的有經濟衰落的國家（英國）。和向上發展的資本主義德國及近年來新興的國家（加拿大，澳大利亞，阿根廷，中國，印度），正相反的，

有停滯不前的資本主義國家（法國、意大利）。銷售商品市場的覬覦者增加起來，生產的可能力增長起來，供給增加起來，但是市場的範圍和勢力範圍的疆域，却相當的停滯不變。

這就是現代資本主義的衝突逐日加甚而無可調和的原因。

（C），市場問題是資本主義現時的基本問題，在這個問題上存在着生產可能力的增長和市場相對停滯不變的矛盾。一般的市場問題的緊迫，特別是國外市場問題、投資市場問題的緊迫——這些就是資本主義的現狀。這就說明爲什麼工廠局部的開工成爲通常的現象。加緊關稅屏障的，更是火上加油。在現在的市場和投資地裏面，資本主義已覺太擠迫了。想以和平方法解決市場問題，從沒有並且也不能發生什麼效果的。一九二六年銀行家關於貿易自由的著名宣言，結果一無所得。一九二七年由國際聯盟召集以「聯合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利益」爲目的之經濟會議，也一敗塗地。和平地解決市場問題的道路，對於資本主義，已經不通了。資本主義唯一的「出路」，祇有：以武力、以軍事上的衝突、以新的帝國主義戰爭來重新分配殖民地和勢力範圍。

從資本主義的穩定上，發生更擴大的資本主義的危機。

（2）資本主義的對外政策和帝國主義新戰爭的準備

一，因之，重分世界和勢力範圍（此乃國外市場的基礎）的問題，現在就成爲世界資本主義政策上的基本問題。我已經講過，現在殖民地 and 勢力範圍的分配，是因帝國主義大戰的結果而決定的，這種分配，現在已經太陳舊了。對於這種分配，美國不能滿意，因爲它正想侵入亞洲（首先是中國）；南美也不滿意，英國也不滿意，因許多自治屬地和許多東方的重要市場已從它的手裏脫去了。日本也是不滿，因英、美在中國「妨礙」它的行動，法、意兩國也是如此，因它們在多瑙河沿岸諸國及地中海，都各有無數「爭執之點」。就是德國也是那樣，因它還是毫無殖民地。從此就發生「共同」想重新分配市場和原料地的企圖。儘可不用證明即能明瞭亞洲的市場和到這市場去的道路，是鬥爭上

的主要戰場。從此發生許多錯綜的問題，而成爲新的衝突的主要來源。從此發生的所謂太平洋問題（美國、日本、英國間的仇視），是爲統治亞洲及到亞洲去的道路而鬥爭的來源。從此就發生地中海的問題（英、法、意大利的仇視），而成爲爭奪地中海沿岸霸權的來源，成爲爭奪到東方去的最近路線的來源。從此就發生煤油問題的緊張（英美間的仇視），因沒有煤油是不能戰爭的，那個在煤油業上佔據特權地位的，那末他在將來的戰爭中，就有勝利的機會。

不久以前，在英國報章上發表了張伯倫對於「調解」地中海問題的「最近」計劃。我不敢保證這個計劃的真實。但是這個計劃在報章上的發表，是一種徵兆，這點是沒有什麼可以懷疑的。這個計劃的內容如下：它把敘利亞的「代管」權，從法國手裏奪去轉給意大利，坦及耳轉給法國，但法國要在財政上賠償西班牙，坎麥峰還給德國，意大利一定要停止在巴爾幹半島「胡鬧」等等。這些事情，都裝掩於和蘇維埃鬥爭的旗幟之下。大家都知道，現在沒有一樁戰事不牽涉到蘇維埃。這個計劃的實際意義是什麼呢？這個計劃的意義就是要把法國的資產階級逐出敘利亞。敘利亞從古就是經東方去到美索不達米亞、到埃及的門戶。從敘利亞經蘇彝士運河及美索不達米亞二區域，可以侵犯英國，張伯倫就想把這個不利的事情消滅。所以儘可不必多說，即知道這個計劃在報章上的發表，不是一件偶然的事。這個事實的價值，就是在他明顯地指示出這種翻騰、衝突和軍事鬥爭的事實，這些東西，裝滿現在所謂「列強」中間的關係中。

關於現在政局，煤油問題和煤油鬥爭，很著名的美國雜誌「世界事業」在十一月號上講得很清楚：

「在盎格魯撒克遜（即英、美等）的民族中，存在着破壞和平和破壞相互諒解的真實危險。……當美國企業界更需要政府幫助的時候，那末美國政府對於他們的幫助，自然將更形加厲。倘然英國政府和英國煤油工業併合起來，那末遲早美國政府總也要和美國的煤油工業併合起來。鬥爭倘轉成政府間的鬥爭，則戰爭的危險不能不激烈地增加。」

這上面絲毫不能有什麼疑問：事實上，就是要組織新的列強的聯合，爲着國外市場，原料地和路線以預備戰爭。

b) 在我所報告的時期中，有沒有想以‘和平方法，解決將近的軍事衝突的危險底企圖呢？是，會有過的。是種企圖，較我們預料的還多。但是結果，則是毫無所得。其實這種企圖，祇是爲‘列強，作預備新戰爭的工作時的遮掩物，他的目的，祇在欺騙工農。

據欺人的資產階級報章和欺人度甚不較前者爲次的社會民主黨報紙意見，說國際聯盟是和平的工具。國聯聯盟爲和平，裁兵，縮減軍備等問題所召集的講廢話的會上，得到什麼結果呢？除了欺騙羣衆，繼續擴張軍備使將成熟的衝突更行緊湊以外，再沒有什麼其他好事。國際聯盟談及裁兵，已經二年，所謂第二國際幫助這個騙人的廢話，也已經三年，而各國更利害的武裝起來，擴大‘列強，間舊的衝突，堆積新的衝突，以此來破壞和平，這事實難道是，然的嗎？三強（英，美，日）裁減海上軍備會議的失敗，不就是說，太平洋問題是新的帝國戰爭的來源，‘列強，不肯解除。和裁減軍備嗎？爲預防這種危險起見，國際聯盟做些什麼呢？例如不久以前蘇聯代表在日內瓦對於真正（而不是作表面的裝飾）解除軍備問題所發表的言論。李脫維諾夫同志關於完全解除軍備的爽直和誠意的宣言，剛打中國際聯盟的麻痺處，這宣言對於國際聯盟完全是‘出於意料之事，，這件事實是說明什麼呢？這事實無非說明國際聯盟不是和平和解除軍備的工具，而是掩飾軍備，預備新戰爭的工具。從日本到英國，從法國到美國等各國被收買了的報紙，力竭聲嘶地呼喊蘇聯對於解除軍備問題提議的‘不忠實，，。但既是這樣，爲什麼不去審察蘇聯提議的忠實與否，爲什麼實際上不進去解除軍備或絕大地裁減軍備呢？這是爲什麼呢？例如再舉現在資本主義國家‘友好條約，制度，如法國和捷克斯拉斯洛伐克的條約，意大利和阿爾巴尼亞的條約，比爾蘇自基所預備的波蘭、立陶宛間的條約，‘洛加諾制度，，，‘洛卡諾精神，，等等。這是什麼，這不是預備新戰爭嗎；這不是分佈力量以備將來軍事上衝突的制度嗎？再舉下面幾件事實：從一九一三到一九二

七年，法，英，意，美，日等國軍隊的人數，自一百八十八萬八千增至二百二十六萬二千人；在這時期內，這些國家的軍事預算自二十三萬四千五百萬盧布增至三十九萬四千八百萬；這五國在建造中的飛機的數目，從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自二六五隻增至四三四〇隻；這五國軍艦的噸位，在一九二二年七十四萬四千噸，在一九二六年增至八十六萬四千噸；美國軍事化學處長福來斯將軍的聲明，很可以描寫出軍事化學事業上的情形：他說“裝置一個重四五〇磅羅格蘭姆魯意司特（一種毒氣）的航空化學炸彈，可以使紐約城中的十區，變成焦土，由五十隻飛機拋擲下重一〇〇噸魯意司特，最多在一星期內可以把紐約全城化成焦土。”，這些事實，不就是說新戰爭的預備，正在竭盡全力地進行呢？

這就是一般資產階級國家，特別是國際聯盟，尤其是為資本主義作走狗的社會民主黨之“和平政策，和“解除軍備，政策的結果。

從前，以對付全身武裝的德國為名，來辯白軍備的增加。現在這種“辯護辭，沒有了。軍備的增加，因“列強，間新帝國主義戰爭的不可避免而發生“戰爭的精神，是“洛加諾精神，上的主要原素。這難道不是很顯明的嗎？

我以為現在的“和平關係，，可以比作藍縷的破衣，這件破衣由碎布補綴而成，中間祇連以極細的線。祇要把這絲線，稍些撕得緊一點，這衣服立刻破碎。一處破碎，即使全體衣服都歸粉裂，而成多塊碎布，祇要在阿爾巴尼亞，或立陶宛，或在中國，或在北非洲，一搖動現在的“和平關係，，全體“和平關係，的“大廈，，就都要崩毀下來。帝國主義大戰前，當薩拉也浮（在塞爾維亞）地方的暗殺引起戰爭時的情況正是如此。現在的情況，也就是這樣。

從資本主義穩定上，產生新帝國主義戰爭的必然性。

（3）世界革命運動的現狀和新革命高漲的預兆

a) 倘要進行戰爭，那麼祇有軍備增長，新的聯合的組織，還是不夠的，此外在資本主義國家裏，還應鞏固後方。不先鞏固自己的後方，不壓住“自己

的，工人，不壓住“自己的，殖民地，那末沒有一個國家，能够進行極大的戰爭。因此，資本主義國家政策逐步的法西斯蒂化，在法國現在統治的是右派聯合，在英國是喜格斯，德特林（煤油托拉斯的領袖）、魏爾特（英國大資本家，戰前曾投巨量資本於俄國——譯者注）的聯合，在德國是資產階級的聯合，在日本是軍火的政黨，在意大利和波蘭是法西斯蒂的政府，這些事實我們絕不能認為是偶然的。

如對工人階級的壓迫，英國的職工會法，法國的“民族武裝，的法，許多國家廢八小時工作制的取消，資產階級在各地向工人階級的進攻。

如對殖民地和附屬國家壓榨的加緊，分佈於這些國家裏的帝國主義軍隊增加起來，他們的數目，已經達到百萬，其中有七十萬以上，隸於英國的“勢力範圍，，和“屬地，，。

b) 不難明瞭，經過法西斯蒂化政府的這種野蠻底壓榨，決不能不引起殖民地民族及宗主國工人階級的反抗運動。如中國，南洋羣島，印度等地革命運動的發展，對於世界帝國主義的命運，決不能沒有重大的意義。你們自己可以推想一下。從全地球一九〇五百萬的人口中，一一三四百萬住在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上，一四三百萬住在蘇聯，二六四百萬住在中等的國家，祇有三六三百萬在壓迫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強大的國家裏。很明顯的，殖民地國家革命的覺醒，預告世界帝國主義的滅亡。中國革命，雖還沒有直接戰勝帝國主義，在講到革命的前途上，不能說沒有偉大的意義。偉大的民眾革命，一般的講，總非一鼓而勝的。革命是在許多成敗勝負中，發展和鞏固起來。各國革命都是這樣，在俄國也是如此。在中國也將是這樣。中國革命的最重要結果，就是他從大夢中驚醒了千百萬被剝削被壓迫的羣衆，把他們引入革命運動中，完全揭破了各軍閥的反革命作用，揭破反革命的走狗集團底假面具，在下層民眾中，鞏固了共產黨的威信，把全體運動提到最高階段，提到組織蘇維埃的階段，並且喚起印度、南洋羣島上千百萬被壓迫階級的新希望。中國的農工，向着新的革命高漲的路上走，對於這點懷疑的，祇有那些瞎眼和冷血的人們。

至於歐洲工人階級的運動，我們見到有下層工人左傾和革命運動活動起來的表誌。這些事實，如英國的總罷工和煤礦工人的罷工，維也納的工人暴動，因薩柯、凡宰特二人的處死刑而舉行的革命示威運動，德國和波蘭共產黨選舉上的勝利，英國工人運動中顯著的分化，工人向左，領袖向右，而走入顯然的社會帝國主義，第二國際蛻化為帝國主義國際聯盟的附屬品，在廣大工人羣衆中社會民主黨威信的低落，共產國際及其支部在全世界無產階級中間威信的逐日增長，在全世界被壓迫階級中蘇聯威信的增長，「蘇聯之友大會」等等，這些事實無疑義地說明歐洲已經進到新的革命高漲的階段。這種事實，如薩柯和凡宰特二人的處死刑之能作為工人階級示威遊行的藉口，無疑地說明在工人階級內部積累了革命的力量，這種力量尋找着時機。有時最微末的小端也能使它爆發起來，衝毀資本主義的統治。

我們正處在殖民地和帝國主義本國革命高漲的前夜。

從資本主義穩定上面，興發新的革命的高漲。

(4) 資本主義的世界和蘇聯

a) 因此我們就有資本主義最深沉的危機和極厲害的不穩定的象徵。假若一九二〇至二一年資本主義國家戰後暫時的恐慌與國內的混亂及對外關係的破裂，可以認為消除了，且因此開始部分穩定的時期，那末，十月革命的勝利，和蘇聯對於世界資本主義制度的脫離而起的主要的恐慌，不但沒有消除，並且逐漸更形加深，而搖動世界資本主義存在的基礎。資本主義的穩定不但不能阻止這種恐慌的發展，反之，他還成爲這種恐慌向前發展的根源。爲市場而鬥爭的發展，重分世界和勢力範圍的急需，資產階級的和平主義和國際聯盟的破產，積極的建立新組合的工作，因新戰爭勢力的分佈，軍備激烈的增長，對於工人階級和殖民地國家騷暴的壓榨，殖民地上和歐洲內部革命運動的發展，在全世界上共產國際威信的增長，蘇聯力量的鞏固和蘇聯和歐洲工人及殖民地民衆中威信的增長——這些事實，都不能不動搖世界資本主義的基礎。

資本主義的穩定，更形腐化而不穩了。

倘然在二年前可以並且應該說及歐洲革命潮流的消沉，那麼到現在我們有充分的根據斷言歐洲已顯然的進到新的革命高漲的階段上。我更不用說及殖民地上的情形，因為在那裏帝國主義者的情形，逐漸的更形黯暗了。

b) 資本家們希望壓服蘇聯，希望他轉變到資本主義，希望蘇聯的威信在歐洲工人和殖民地勞苦羣象中低落下來，結果，這些希望都烟消雲散了。建設社會主義國家的蘇聯，興發起來。他在全世界工農中的影響和信仰，發展並鞏固起來。建設社會主義國家的蘇聯的存在，本身就是在歐洲和殖民地上毀壞世界帝國主義，破裂他的穩定底最大原素。蘇聯很明顯的成為歐洲工人階級及殖民地被壓迫民族的旗幟。所以，為將來帝國主義大戰肅清障礙起見，為更澈底地壓榨‘自己’的工人階級及壓制‘自己’的殖民地以鞏固資本主義的後方起見，應該先征服蘇聯，因為她是革命的源泉和革命的播揚者，並且以前曾是資本主義國家的一個最大商品市場。由此，帝國主義者干涉蘇聯的趨向的活躍，孤立蘇聯的政策，包圍蘇聯的政策，準備和蘇聯戰爭條件底政策。

帝國主義營壘中干涉蘇聯傾向的增長，和戰爭的危險（對於蘇聯），是現在政局上最主要的事實之一。

在資本主義恐慌前進的境遇中，英國資產階級是最受危險最受苦難的一個國家。所以她是企圖武裝干涉的主動者。顯明的，蘇聯工人對於英國礦工的幫助，蘇聯工人階級對於中國革命運動的同情，這些不能不是火上加油。這些事實，決定了英國和蘇聯國交的斷絕，以及蘇聯和其他許多國家邦交的變壞。

c) 在資本主義世界和蘇聯中間的關係上，有二種傾向的爭鬥，一是軍事進攻的傾向（首先是英國），一是繼續和平關係的傾向（許多其他資本主義國家），這是我們在對外關係上最主要的事實。

所報告的時期中，表明傾向繼續和平關係的事實如下：和土耳其訂立的互不侵犯條約，和德國訂立的保障條約，和希臘訂立的關稅條約，和德國訂立的信用借款協定，烏拉圭對於我國的承認，和阿富汗訂立的保障條約，和立陶宛

訂立的保障條約，和拉脫維亞保障條約的草定，和土耳其訂立的商約，我國與瑞士間衝突的解決，和波斯訂立的中立條約，和日本關係的改進，和美國及意大利的經濟關係的增長。

報告的時期中，表明傾向於軍事進攻的事實如下：爲蘇聯工人幫助礦工罷工的事件的英國通牒，在北京、天津、上海等處的搜捕，對於阿爾考斯（蘇聯在英國的商業機關。——譯者註）的搜查，英國和蘇聯國交的斷絕，伏以柯夫的被刺，英國走狗在蘇聯的恐怖行動，在召回賴可夫斯基問題上我們和法國關係的緊張。

假使二年前，可以說及並且應該說及蘇聯和資本主義國家間相當平衡和『和平共處』的時期，那末，到現在我們有充分的根據，可以說『和平共處』的時期已成過去了，而代之以帝國主義者猛烈前進，預備干涉蘇聯的時期。英國想建立統一戰線以反對蘇聯的企圖，現在還沒有成功。這種失敗的原因是：帝國主義者營壘中的利益的衝突，有幾個國家要與蘇聯維持經濟關係，蘇聯的和平政策，歐洲工人階級反抗，帝國主義者恐怕在和蘇聯發生戰爭之時，本國內部要發生革命。但是並不是說，英國因組織反蘇聯的統一戰線不成，就放棄了這稱工作，雖然英國暫時失敗，戰爭的危險還是依舊存在。

由此我們的任務就要估計到帝國主義營壘中的衝突，延遲戰爭，誘以微利，採取各種手段以保持和平的關係。我們決不能忘記列寧所說的話，說我們的建設事業有許多是依靠我們能否延遲和資本世界的戰爭。這種戰爭是不可避免的，但這戰爭可以延遲下去，直到歐洲無產階級革命成熟的時候，或是最後直到資本家爲殖民地的分割而自相肉搏的時候。所以和資本主義國家保持和平關係，是我們必要的任務。

我們和資本主義國家間關係的基礎，是在准許兩個相反制度有共同存在的可能。實際的事實，完全證實了這點。債務和債款的問題，常是這上面的障礙石。我們對這問題的政策，很明白的，我們的政策根據於這個公式：『你給我，——我便給你。』你給我們借款，以壟斷我們的工業，那末你就得到戰前

債款中相當的部分。你不給我，所有的債你也得不到。事實指示出，我們在工業信用借款上，已獲得了幾許的成功。這上面，我不但指德國，並且還指美國和英國。這上面有什麼秘密？秘密就是在我們國家是進口機件的最大市場，而資本主義國家正是需要這種產品的銷場。

(5) 總 結

我們可以得到下面的總結：

第一，在資本主義的範圍中，內部的衝突增長起來；資本主義需要以新的戰鬥，重新分割世界，以英國為首的一部分資本主義世界傾向於干涉蘇聯，其他一部分資本主義世界不願意連累於和蘇聯開戰的事件中，要想和蘇聯增進經濟關係；這二種傾向間發生鬥爭，蘇聯可以相當利用這種衝突以保持和平。

第二，我們看到資本主義的穩定正在崩毀；殖民地革命運動的興發，歐洲新的革命高漲的表誌，共產國際和其支部的威信在全世界上的增長，歐洲工人階級對於蘇聯同情的增長，蘇聯國內力量的發展和蘇聯工人階級底威信在全世界被壓迫階級中的鞏固。

由此，我們黨就應有下列的任務：

(1) 關於世界革命運動的：

- a) 努力使共產黨在全世界上發展起來。
- b) 努力鞏固革命的職工會和工人的統一戰線，以反對資本的進攻。
- c) 努力鞏固蘇聯工人階級和資本主義國家工人階級間的友誼。
- d) 努力增進蘇聯工人階級和殖民地國家解放運動間的聯合。

(2) 關於蘇聯對外政策的：

- a) 竭力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準備。
- b) 和英國的干涉傾向鬥爭，增進蘇聯的國防能力。
- c) 採取和平政策，和資本主義國家保持和平關係。

d) 在鞏固對外貿易壟斷權的基礎上，擴大蘇聯和外國的關係。

e) 和那些受帝國主義強國壓迫及剝削的所謂“弱小”，及“權利不全”，的國家接近。

二 社會主義建設的成績與蘇聯的內部情形

同志們，現在讓我來講一講我們國家的內部情形，我們社會主義建設底成績，無產階級專政的命運，牠的發展，和牠的鞏固。

第十四次黨代表大會委托中央委員會根據下列的基本任務去發展我們的國民經濟：第一個任務就是，我們應採取促進整個國民經濟生產迅速的發展底政策；第二，我們應採取加緊工業發展的速度和保證工業在整個國民經濟中之領導作用底政策；第三，應當在國民經濟的發展過程中保證社會主義成份和社會主義的經濟形式在國民經濟中之發展，應日形削弱私有商人和資本主義的成份；第四，必須努力的加緊我們的經濟發展，組織新的工業部門，發展原料的製造等等——使這種發展能保證我們國家底經濟獨立，使我們的國家不變成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系統底附屬品；第五，應當使無產階級的專政，工農的聯合，和無產階級在這個聯合中的領導鞏固起來；第六，我們應當不斷的提高工人階級和貧農物質上和文化上的生活條件。

中央委員會在這一個時期內究竟執行了這些任務沒有呢？

(1) 整個國民經濟

第一個問題，就是整個國民經濟底發展。第十四次黨代表大會到現在的這個時期中，關於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尤其是工業和農業的發展，我現在可以舉出幾個主要的數目字給你們看。這些數目字我是從國家計劃局的統計中得來的。我所說的就是國家計劃局對於一九二七至二八年預定數字和五年計劃的草案。

a) 兩年來整個國民經濟生產的發展。

農村經濟在一九二四至二五年的生產量，按國家計劃局新的統計，佔戰前的百分之八七·三，工業的生產量佔戰前的百分之六三·七，但到現在，兩年之後，農村經濟的生產量已達戰前的百分之一〇八·三，工業的生產量已達戰前的百分之一〇〇·九。按照國家計劃局一九二七至二八年的預定數字，預定農村經濟的生產量要增加到百分之一一一·八，工業要增加到百分之一一四·四。

兩年來國內商品流通的發展。如果我們假定一九二四至二五年的商品流通是一百（共計一四，六一三，〇〇〇·〇〇〇金盧布），那麼，在一九二六至二七年間就已增加了百分之九七（二八，七七五，〇〇〇，〇〇〇金盧布），在一九二七至二八年間我們預定要增加到百分之一一六（三三，四四〇，〇〇〇，〇〇〇金盧布）。

兩年來我們信用事業的發展。如果我們假定一九二五年十月一號以前的一切信用機關的出入總數是一百（共計五，三四三，〇〇〇，〇〇〇金盧布），那末到一九二七年七月一號就已增加了百分之五三（八，一七五，〇〇〇，〇〇〇金盧布）。毫無疑義地，我們可以斷言，在一九二七至二八年中，我們國家的信用事業必將有更大的發展。

兩年來鐵路運輸事業的發展。我們在一九二四至二五年全國鐵路所運輸的貨物僅達戰前的百分之六三·一，但到現在，一九二六至二七年，就已達戰前的百分之九九·一，到一九二七二八年將達戰前的百分之一一一·六。此外，全國鐵路的長度在兩年來也已從七四四〇〇啓羅米突增加到七六二〇〇啓羅米突，和戰前的水平線比較起來增加了百分之三〇·三，和一九一七年比較起來共增加了百分之八·九。

兩年來國家預算的增加。我們在一九二五至二六年的總預算額（統一的國家預算加上地方的預算）僅佔戰前的百分之七二·四，（五，〇二四，〇〇〇，〇〇〇盧布），但到現在，即一九二七至二八年，總預算額就要達到戰前的百分之一一〇到一二（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以上）。兩年間竟

增加百分之四一·五。

兩年來對外貿易的發展。一九二四至二五年對外貿易的總流進一共祇有一，二八二，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即戰前的百分之二七），但到現在，一九二六至二七年，就已達一，四八三，〇〇〇，〇〇〇金盧布（即戰前的百分之三五·六），到一九二七至二八年，就要達一，六二六，〇〇〇，〇〇〇金盧布（即戰前百分之三七·九）。我們對外貿易發展速度緩慢的原因：第一，就是因為資產階級的國家常常阻礙我們的對外貿易，有時竟至於秘密的封鎖；第二，就是因為我們不能按照資產階級底公式——“自己不够，還應當輸出口去，——做生意。我們的對外貿易在一九二六至二七年一共出超了五七，〇〇〇，〇〇〇金盧布。這是一九二三至二四年以後對外貿易的第一次出超。

總結起來，我們全部的國家收入在兩年來一共增加了這許多；一九二四至二五年蘇聯的國民收入共計一五，五八九，〇〇〇，〇〇〇金盧布，一九二五至二六年共計二〇，二五二，〇〇〇，〇〇〇金盧布，即一年之中增加了百分之二九·九，一九二六至二七年則已達二二，五六〇，〇〇〇，〇〇〇金盧布，即在一年之中增加了百分之一一·四。按照國家計劃局的預算數字，到一九二七至二八年我們的國民收入將有二四，二〇八，〇〇〇，〇〇〇金盧布，即增加百分之七·三。

如果我們好好地注意一下，美國的國民收入平均每年至多祇增百分之三至四（祇有在一八八〇年美國的國民收入增加了百分之七），其他國家，例如英國和德國：國民收入每年平均也祇多增加百分之一至三，這樣看來，蘇聯國民收入近年來增加的速度與歐美資本主義國家比較起來，實可算為世界第一了。

結論：我們國家的國民經濟是在迅速地發展。

黨的任務：推動我們國民經濟的一切生產部門向前發展。

b) 我們國民經濟的發展並不是一種盲目的數量上的生產的增加，我們的國民經濟是按着嚴格規定的方向而發展的。下列兩點就是最近兩年來發展我們國民經濟之最主要的因素。第一，我們的國民經濟，是在國家工業化的表徵下

，增加工業對農業之領導作用底表徵之下發展起來的。第二，我們國民經濟的發展，國家的工業化是按着增加社會主義經濟成份在生產中及商品流通中比重與領導作用，縮小私有商人與資本主義成份底方向進行的。

工業在國民經濟中比重增加的數目字（運輸與電氣化除外）。在一九二四至二五年度，工業總生產量佔國民經濟全部生產量的百分之三二·四（按戰前的價格計算），而農業的生產量却佔百分之六七·六，至一九二六至二七年度，工業生產量已增加到百分之三八，農業生產量已降低到百分之六二。預計到一九二七年至二八年度，工業生產量要增加到百分之四〇·二，而農業生產量則須降低到百分之五九·八。

生產工具的生產——工業的基本軸心——最近兩年來在全部工業中之比重的增加：一九二四至二五年度生產工具的生產佔全部工業的百分之三四·一，一九二六年至二七年度——佔百分之三七·六，一九二七至二八年度，預計要增到百分之三八·六。生產工具的生產兩年來在國家大工業中的比重之增加：一九二四至二五年度——佔百分之四二，一九二六至二七年度——佔百分之四四，及至一九二七年至二八年度，預計要增加到百分之四四·九。

工業的商品生產量兩年來在全部商品中之比重的增加：一九二四至二五年度佔百分之五三·一，一九二六至二七年度已達百分之五九·五，預計至一九二七至二八年度要增加到百分之六〇·七。農村經濟的商品生產量在一九二四至二五年度佔百分之四六·九，一九二六至二七年度就已降到百分之四〇·五，到一九二七至二八年度預計還要降低到百分之三九·三。

結論：我們的國家已漸漸要成爲工業國。

黨的任務就是：用各種方法盡量的推進我們國家的工業化。

兩年來社會主義經濟成份的比重和領導作用底增加與私有資本主義成份的縮小。大規模地投在國民經濟社會化成份（國家的與合作的工業，運輸事業，電氣化事業等等）中的資本在一九二四至二五年度是一，二三一，〇〇〇，〇〇〇金盧布，到一九二六至二七年度已達到二，六八三，〇〇〇，〇〇〇金盧

布，及至一九二七至二八年度，預計要增加到三，四五六，〇〇〇，〇〇〇金盧布，就是說，從百分之四三·八（一九二四至二五年度）增加到百分之六五·三（一九二七至二八年度），可是投在非社會化經濟成份中的資本，相對的數目祇是日益低降，而其絕對的也增加得很少，在一九二四至二五年度共計一，五七七，〇〇〇，〇〇〇金盧布，到一九二六至二七年僅達一，七一七，〇〇〇，〇〇〇金盧布，到一九二七至二八年預計也只增加到一，八三六，〇〇〇，〇〇〇金盧布。投在非社會化成份中之資本的比重已從百分之五六·二（一九二四至二五年度），低降到百分之三四·七（一九二七至二八年度）。

社會化工業的總生產量在一九二四至二五年度佔全部工業生產量的百分之八一，到一九二六至二七年度已達百分之八六，及至一九二七至二八年度預計就要增加到百分之八六·九，——非社會化工業底作用却一年年地低降：在一九二四至二五年度佔全部工業生產量的百分之一九，至一九二六至二七年度已降低到百分之一四，預計至一九二七至二八年度將要減少到百分之一三·一。私有資本在大工業中的作用不僅是相對的減低（一九二四至二五年度佔百分之三·九，至一九二六至二七年度已減低到百分之二·四），牠的絕對的數目也同樣的減少（一九二四至二五年共計一六九，〇〇〇，〇〇〇個戰前的盧布，至一九二六至二七年已減少到一六五，〇〇〇，〇〇〇個戰前的盧布）。

在我們國家的商品流通中，私有資本主義成份的作用也日形減少。社會化的成份在商業流通中的比重，一九二四至二五年度是百分之七二·六，在批發方面是百分之九〇·六，零賣方面是百分之五七·三，至一九二六至二七年社會化的成份在整個商品流通中的比重已增加到百分之八一·九，在批發方面增至百分之九四·九，零賣方面增至百分之六七·四，而私有商業在全部商品流通中的比重，在這個時期內却從百分之二七·四降低到百分之一八·一，在批發方面——從百分之九·四減低到五·一，在零賣方面——從百分之四二·七減低到三二·六，私有商業在全部商業中的比重預計到一九二七至二八年還要減少。

結論：我們的國家正在不屈不撓地，迅速地走向社會主義，已漸漸地得步進步地把資本主義的成份從國民經濟中排擠出去。

這件事實已向我們揭露出了問題的基礎：誰戰勝誰？這個問題是列寧在一九二一年實施新經濟政策之後提出來的。還是我們戰勝私有商人和私有資本，把社會主義化的工業與農業聯繫起來呢？還是私有資本戰勝我們，使無產階級與農民分裂開來呢？這就是當時的問題。現在我們已可以說：我們在這方面已經獲得了主要的成功。只有瞎子和失了腦筋的人才能否認這件事實。現在‘誰戰勝誰’，這個問題的性質已與前不同。現在這個問題已從產業方面轉移到生產方面，——轉移到手工生產和農村經濟方面，在這裏私有資本還有相當的比重，我們必須有系統地把牠們排擠出去。

黨的任務就是：擴大和鞏固我們社會主義的成份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無論在城市中或鄉村中）的領導作用。努力的設法消滅國民經濟中之資本主義的成份。

（2）我們社會主義的大工業發展的速度

a) 國有化的大工業（佔全部工業的百分之七七）之生產量的發展。國有化的大工業在一九二五至二六年度之生產量與前一年度比較起來（以戰前的盧布計算）增加了百分之四二，一九二六至二七年增加百分之一八·二，一九二七至二八年度增加百分之一五·八，按國家計劃局所規定的五年計劃草案，在五年之內生產量要增加百分之七六·七，每年平均增加百分之一五，工業的生產量至一九三一至三二年度與戰前的生產量比較起來共要增加兩倍。

我們國家全部工業的生產量（大的，小的，國有的，及私有的工業都算在內），按國家計劃局所規定的五年計劃草案，每年平均要增加百分之一二，到一九三一年至三二年度，全部工業的生產量與戰前的水平線比較起來，平均差不多要增加百分之七〇。

美國全部工業的生產量，在一八九〇至一八九五年之中，平均每年增加百分之八·二，一八九五至一九〇〇的五年之中平均每年增加百分之五·二，一

九〇〇至一九〇五的五年中平均每年增加百分之二·六，一九〇五至一九一〇的五年之中平均每年增加百分之三·六。俄國在一八九五至一九〇五的十年之中平均每年增加百分之一〇·七，在一九〇五至一九一三的八年之間平均每年增加百分之八·一。

我們社會主義工業的生產量，以及我們全部工業的生產量，每年增加的百分數實可稱為世界第一，這是世界上任何一個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所從來沒有達到過的。

雖然美國的工業，以及俄國戰前的工業有大批的豐富的外國資本之强有力的幫助，而我們國有化的工業却祇能依靠自己的積蓄。

雖然我們國有化的工業已進入了改造時期，這時改造舊的工廠和建設新的工廠對於工業生產量的增加是有很重大意義的。

我們全部的工業，尤其這社會主義的工業，就其發展的速度而論，將趕上與趕過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之發達。

b) 我們的大工業為什麼能有這樣空前的發達呢？

第一，因為他是國有化的工業，因此他就可以免除資本家之貪婪妨礙社會利益的慾望，可以按照整個社會的利益而發展起來。

第二，他是世界上最宏大的最集中的工業，因此他可以超越私有資本主義的工業。

第三，因為國有化的運輸事業，國有化的信用事業，國有化的對外貿易，國家的總預算，都完全操縱在國家手裏，因此，國家可以有計劃地領導國有化的工業，使他成為統一的工業經濟，使他在其他任何工業部門都佔有巨大的優勢及加倍地加速他的發展底速度。

第四，因為國有化的工業是最大的最强有力的工業，他可以實施不斷的減低成本費，減低批發價格、減低商品價格的政策，因此也就擴大了銷售他的生產品的市場，增加了國內市場的容量。替自己造成了不斷擴大生產的源泉。

第五，國有化的工業。由於許多原因，同時也由於他堅持着降低價格的政

策，所以能在城市與鄉村，無產階級與農民漸漸聯合的環境中發展起來，牠與資本主義的工業却巧相反，資本主義的工業是在資產階級的城市——榨取農民脂膏的城市——與日益破產的鄉村間之仇恨逐漸加深的環境中發展起來的。

第六，國有化的工業是依靠在我們全部發展的主宰——工人階級身上的，因此，牠很容易發展技術，尤其是勞動生產率，很容易實施生產與管理的合理化，牠有廣大的工人階級的幫助，這種情形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是決不可能的。

在最近兩年來我們技術之迅速的進步，及新的工業部門（機器的製造，氣管的製造，自動機與航空機的製造，化學品的製造等等）之迅速的發展，已毫無疑義地證明了這一切。

在縮短工作時間（七小時工作日）及不斷的提高工人階級物質上與文化上的生活狀況的條件之下所實行的生產合理化（還在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之下也是絕對不可能的），也同樣證明了這一切。

我們社會主義工業之空前的發展就是蘇維埃制度勝於資本主義制度之明顯的鐵證。

列寧在一九一七年九月，布爾塞維克未奪取政權之前，曾經說：我們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之後，在經濟上能夠而且必須“趕上與趕過先進的國家，。（“列寧全集，十四卷，下冊，第二一三頁）

黨的任務就是：鞏固現有的社會主義工業發展的速度，及在最近的將來加強這種速度，以造成趕上與趕過先進國家所必須的優越條件。

（3） 我們農村經濟發展的速度

a) 在農村中，却巧相反，生產量的增加是比較緩慢的。如果在一九二五至二六年農村經濟的總生產量（以戰前盧布計算）與前一年比較起來增加了百分之一九。二，一九二六至二七年增加百分之四。一，一九二七至二八年增加百分之三。二，那末按照國家計劃局所規定的五年計劃草案，在五年之中生產量一共要增加百分之二四，即平均每年增加百分之四。八，到一九三一至三二

年的時候，農村經濟的生產量與戰前的生產量比較起來，要增加百分之二八到三〇。

農村經濟生產量的每年的增加，照這樣看來總算還不差。但與資本主義國家比較起來，却不能算是一種超越的發展，是還不能在將來保持農業與我們國有工業間之必要的平衡的一種發展。美國農村經濟的生產量在一八九〇至一九〇〇十年之中平均每年增加百分之九·三，在一九〇〇至一九一〇十年之中每年增加百分之三·一，在一九一〇至一九二〇十年之中每年增加百分之一·四。在戰前的俄國，農村經濟的生產量在一九〇〇至一九一〇的十年之中每年增加百分之三·二至三·五。不錯，我們蘇聯農村經濟的生產量在一九二六至二七到一九三一至三二年五年之內每年要增加百分之四·八，與資本主義時代的俄羅斯的農業生產所增加的百分數比較起來，已經多了一些。但我們切不可忘記，國有工業在一九三一至三二年度的總生產量與戰前比較起來要增加兩倍，全部工業的生產量到一九三一至三二年的時候，與戰前的生產量比較起來要增加百分之七〇——而農村經濟在這時候的生產量與戰前的農村經濟生產量比較起來却祇增加百分之二八到三〇，即不到三分之一。

因此，我們認為我們農村經濟發展的速度是不能令人滿意的。

b) 我們農村經濟發展的速度與我們國有工業發展的速度比較起來，為什麼這樣緩慢呢？這一方面是由於我們農業技術非常落後，農村文化程度太低的緣故，另一方面（主要的原因），因為我們大規模的聯合的國有工業佔有很多的優勢，而我們渙散的農業生產是沒有這一種優勢的。最主要的，是因為我們農村經濟的生產還沒有國有化，還沒有組織起來，還是一盤散沙似的。農村經濟現在並不是有計劃地進行的，大部分還被小生產的自發性所支配着。牠還沒有按着集體化的原則組織和集合起來，因此牠還是富農分子剝削的好場所。由於這一切原因，所以渙散的農村經濟還不能像我們國有化的工業那樣，取得那些有計劃的大生產底優勢。

農村經濟的出路在什麼地方呢？是不是使我們的工業發展的速度緩慢一些

呢？決不能這樣的！這完全是反動的，反無產階級底烏托邦（座下聲：“對啊，對！”）。國有化的工業必須加速地發展起來。這是我們達到社會主義的保障。這同時也是農村經濟工業化底保障。

究竟出路在什麼地方呢？出路就在：使小的渙散的農村經濟轉變為大的聯合的公共耕種土地的經濟，轉變成以新技術為基礎的集體耕種土地的經濟。出路就在：用證明和說服的方法（而不是用強迫的方法）使耕種小的農民經濟逐漸不斷的在公共的集體的耕種土地的基礎上聯合成為大規模的經濟，採用農業機器和拖拉機，採用農業深耕化的科學方法。別的路是沒有的。不這樣做，我們就不能趕上也更不能趕過農業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加拿大等國）。節制農村經濟中之資本主義成份，發展農村中之社會主義成份，吸引農民經濟於合作社的發展中，使國家在供給與銷售及生產上來包羅農民經濟方面能有計劃的影響農村——這一切辦法，果然都是非常重要的，但總只能算是準備農村經濟過渡到集體制度的一種辦法。

c) 最近兩年來，黨在這方面做出了些什麼成績來呢？我們所做到的還太少。在我們可能的範圍之內實際上還可以做到許多。至於說到從外部從供給農村經濟以必需品及銷售農產品方面來包羅農村經濟，則我們有了下列的成績：現在差不多三分之一的農戶已組織在農業合作社裏面，消費合作社所包羅的供給事業已從百分之二五·六（一九二四至二五年）增加到百分之五〇·八（一九二六至二七年），合作社和國家機關所包羅的農業產品的銷售事業已從百分之五五·七（一九二四至二五年）增加到百分之六三（一九二六至二七年）。至於說到從內部，從農村經濟生產方面來包羅農村經濟，則我們所做到的還非常少。現在集體農場和蘇維埃農場的農業生產量一共祇佔全部生產量的百分之二多一點，商品生產量也只有百分之七多一點。這裏的原因當然是很多的，有客觀的原因，也有主觀的原因。我們的工作人員不會辦事，不充分的注意這件事實，農民的保守和落後，沒有充足的經費去幫助農民實行集體耕地制等等。這筆經費是很浩大的。列寧曾經在第十次黨代表大會上說，使農村經濟屈服在國

有制度或集體制度之下，必需有一大筆基金，可是現在我們還沒有這樣一筆基金。我認爲這一筆基金我們現在已快要有了，而且這筆基金必將與時俱增，現在的情形是這樣：如果不把一盤散沙似的農民經濟組織起來，不把他們過渡到集體耕地制，也就不能使農村經濟的深耕化，機器化向前進展，也就不能使我們農村經濟發展速度趕上加拿大那樣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因此，目前的任務就是要使我們農村工作人員的注意力都集中到這件重要的事業上去。我認爲隸屬於人民土地委員部和農業合作社之下的借貸所，在這件事業中應起最大的作用。下面就是一個實在的例子，足可證明蘇維埃農場有時往往幫助農民過渡到集體耕地制，使農民得到極大的利益。這件事實就是這樣：烏克蘭蘇維埃農場聯合會捐助拖拉機給敖得薩區的農民，敖得薩的農民寫了一封道謝的信給烏克蘭的蘇維埃農場，這封信不久前曾發表在“新報”上。容許我把這封信讀一下吧。（喊聲：“請讀呵，，）

“我們是舍甫瑾珂農場，克拉新農場，加里寧農場，‘巧達齊加’，農場，和‘旭日’農場的移民。我們向蘇維埃政府深深地表示我們的誠懇的感謝，感謝你們給了我們這樣大的幫助，使我們得能振頓我們的農業。我們大多數都是沒有耕畜沒有農具的貧農，我們不能耕種我們名下的土地，我們迫不得已，只好把土地租讓給富農，以取得一部份的收穫。收成總是很不好的，因爲那些佃戶們對於人家的土地總不肯好好耕種的。國家分給我們的那一點小小的借款，我們都用盡了，我們已一年不如一年地貧窮起來。今年烏克蘭蘇維埃農場聯合會的代表到我們這裏來向我們提議，說用拖拉機來替我們耕種土地，代替借款。我們全體移民，除了富農之外，都一致同意，雖然那時候很少人相信工作會做好的。誰知出人意料，拖拉機竟把一切土地都完全耕鬆，耕了五六次就把一切雜草石子割盡，在全部土地上播種下了質量優美的麥子，這真使我們高興得了不得，富農當然是怨恨得了不得。可是富農現在總已不敢再譏笑拖拉機隊的工作了。今年本區的農民，由於缺乏雨水的緣故，差不多都沒有種冬麥，就是在已經播種了

冬麥的土地上，也都還沒有發芽。可是在我們的土地上已佈滿了成千成萬鮮綠茂盛的一莖雙穗的麥子，這就是在最富裕的德國殖民地上也從來沒有的。除了播種冬麥之外，拖拉機已把一切土地都種滿了五穀。現在我們已沒有一畝土地是棄置不耕或租給別人的了。現在我們無論那一個貧農，都有好幾畝土地的好麥子。我們自從看見了這樣偉大的拖拉機的工作之後，我們已不願再經營小的貧農經濟，我們決定組織集體的拖拉機的農場，我們與舍甫瑾阿蘇維埃農場訂了合同，他們已答應了替我們組織拖拉機的農場，。（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二號，“新聞報，第二百六十七期）

這樣的例子如果再多一些，這事業就可大大的進展了。

黨的任務就是：用合作社和國家機關來擴大在銷售和供給方面對農民經濟的包圍，在農村中提出我們社會主義建設的目前任務：逐漸將渙散的農民經濟過渡到根基於使農業深耕化與機械化上的大規模的集體的經濟，過渡到公共的集體的耕地制，使這種發展的道路就是加速農村經濟發展的速度和克服農村中資本主義成份之最重要的方法。

這就是經濟建設方面一般的成績和總結。

這並不是說，我們在這方面的工作就都做得很好了。不，同志們，我們在這方面的工作還差得很。

例如，我們現在還有商品飢荒的成份。這是我們經濟中的缺點。不過缺點現在還是不可避免的。因為我們重工業發展的速度比輕工業還要快——這件事實的本身已使商品飢荒的成份在最近幾年之中還是要存在的。但我們如果要努力的使我們國家的工業化向前進展，那我們沒有別的法子，就只好這樣做。有些人，例如我們的反對派，盡量的在投機商人的尾巴後面，搜集他們理論上的材料，高叫商品飢荒，要求“超工業化”，但是同志們，這完全是無稽之談。只有糊塗人才會說這樣的話。我們決不能，也決不應該因為要發展工業而縮小重工業。而且不加速發展重工業，也就不能充分發展輕工業。反對派有一個時候曾經主張增加進口貨以消滅商品的飢荒。可是這一種蠢笨的主張，就是反對派

自己後來也只好放棄。但是我們，在我們條件下所完全可以做到的而且為黨所堅持的減少商品飢荒的事業到底做到了多少，那是另外一個問題。我認為正就是在這方面，我們的工作還不很好。

此外，在我們工業方面和商業方面都還有比較不少的資本家。這些份子的比重並不像我們有些同志所說的那樣小。這也是我們經濟中的一個缺點。不久前我把拉林同志著的“蘇聯之私有資本”，一書讀了一遍，這本書從各方面看來都是很有興趣的。我介紹同志們最好也就把這本書去讀一下。你們從這本書裏面就可以知道資本家怎樣狡猾地聰明地在生產合作社的旗幟之下，在農村經濟合作社的旗幟之下，在各種商業機關的旗幟之下掩藏起來。有沒有用盡了各種方法去節制和減少資本家，使資本主義成份終於從國民經濟的範圍內排擠出去呢？我認為沒有用盡各種方法。據我所知道的，例如在家庭手工業方面，尤其是在皮革和紡織工業方面，有很多新興的資本家在剝削這些手工業者和一般小生產者。我們有沒有用盡了各種方法把這些剝削分子從經濟上排擠出去，把手工業者與合作社或國家機關聯繫起呢？毫無疑義的，在這一方面還差得很。可是這個問題對於我們有非常重大的意義。

同時，鄉村中的富農也有了相當的發展。這是我們經濟中的一個缺點。有沒有用盡了各種方法去節制富農，使富農在經濟上孤立呢？我認為沒有用盡各種方法。有些同志認為應當用行政手段，經過國家政治管理局去消滅富農，他們說：“只要打個印子就完了，，；這是不對的。這個方法是很容易做到的，可是很不切於實際的。我們應當在革命法律的基礎上用經濟手段去對待富農。可是革命法律並不是一句話。採取相當的行政手段去反對富農當然也是可以的。但行政手段決不能代替經濟手段。在反對富農這一件工作中，我們對於我們的合作社機關，尤其是農業機關對黨的路線之曲解，必須加以鄭重的注意。

此外，我們還有這樣的事實：工業成本費，工業品的發行價格，及城市商品的零售價格，減低的速度都非常緩慢。這也是我們經濟建設中的缺點。在這一方面我們常常遇到國家機關，合作社機關和黨的機關的很大的反抗；這一點

也不得不指出的。我們的同志，大概都不瞭解降低工業品的價格是改善我們工業，擴大市場，及加強工業發展的源泉之最主要的槓桿。毫無疑義的，祇有與我們各級機關的這一種惰性，對降低價格政策的這一種反抗作無情的奮鬥，才能消滅這一個缺點。

最後，我們還有這樣一個缺點，就是，預算案中的燒酒事業，我們對外貿易發展的速度非常緩慢，同時又缺乏商品的積蓄。我認爲我們可以開始漸漸的縮小燒酒事業，發展電影和無線電事業，以這種收入的來源來代替燒酒事業。事實上，爲什麼不去攫取這一種很重要的事業，不把真正的布爾塞維克放到這種事業上去，使這種事業興隆起來，藉此而消滅燒酒事業呢？至於說到對外貿易，我認爲我們經濟上的許多困難都是由於出口不充分的緣故。我們可否使出口事業發展起來呢？我認爲是可以的。我們有沒有用盡一切方法去發展出口事業呢？我認爲是沒有。商品的積蓄也是這樣。有些同志，一方面是由於輕率從事，另一方面是由於不明白實際情形，便瞎說“我們沒有商品的積蓄”，這種說法是不對的。同志們，我們的商品是有一點積蓄的。我們的一切國家機關，上自中央的以及州的國家機關，下至省的以及縣的國家機關，是辛辛苦苦地積蓄了一些。但是這些商品的積蓄還太少，這是必須承認的。因此我們的任務就是要盡可能的增加商品的積蓄，有時甚至於必須減少一點日常的消費。

同志們，這就是我們經濟建設的一些缺點，對於這一種缺點我們必須加以鄭重的注意，而且無論如何必須把牠們消滅，使我們的經濟建設能夠加速地前進。

(4) 階級，國家機關，國家的文化發展。

我們現在要從經濟問題談到政治問題了。

A 工人階級。工人階級和雇傭勞動數量的增加。雇傭勞動的數量（失業工人除外）在一九二四至二五年共計八，二一五，〇〇〇人，一九二六至二七年共計一〇，三四六，〇〇〇人，一共增加了百分之二五。其中體力勞動的工

人（農業工人和季候工人也包括在內），在一九二四至二五年共計五，四四八，〇〇〇人；至一九二六到二七年則已達七，〇六〇，〇〇〇人，共增加了百分之二九，六。其中大工業的工人在一九二四至二五年共計一，七九四，〇〇〇人；至一九二六到二七年已達二，三八八，〇〇〇人，一共增加了百分之三三。

工人階級的物質狀況。雇傭勞動者的總收入在一九二四至二五年佔國民收入的百分之二四，一，至一九二六至二七年就增加到百分之二九，四，與戰前比較起來，增加了百分之三〇；可是其他社會階層（資產階級也包括在內）在國民收入中所佔的百分數，在這同一時期內倒反而減小了一些（例如，資產階級的成分已從百分之五，五減少到百分之四，八）。一切國家工業的工人，在一九二四至二五年的實際工資（公家所扣的款項除外）每月平均二五，一八個以莫斯科的價值來計算的盧布，一九二六至二七年共計三二，一四盧布，兩年之內一共增加百分之二七，六；超過戰前的水平百分之五，四。如果把公家所扣的款項（社會保險費，文化的消費，市政用費等等）也算在一起，一九二四至二五年的工資共達戰前百分之一〇一，五，至一九二六至二七年則已達戰前百分之一二八，四。社會保險的基金在一九二四至二五年共計四六一，〇〇〇，〇〇〇盧布，一九二六至二七年已達八五二，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即增加百分之八五，因此使我們可以派送五一三，〇〇〇人到休養所和療養所去休養，可以保證四六〇，〇〇〇失業工人的生活費，可以撫恤七〇，〇〇〇個廢人（因勞動和國內戰爭而殘廢的人），工人在疾病期內，可以得到完全的工資。

工人房舍的建設費在兩年以前，一九二四至二五年共計一三二，〇〇〇，〇〇〇餘盧布，一九二五至二六年共計二三〇，〇〇〇，〇〇〇餘盧布，一九二六至二七年共計二八二，〇〇〇，〇〇〇盧布，一九二七至二八年共計三九一，〇〇〇，〇〇〇餘盧布，中央執行委員的宣言上所規定的五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也包括在內。三年以來工人房舍的建設費一共是六四四，七〇〇，〇〇〇盧布，把一九二七至二八年所預定的數目算在一起，共計一，〇三八，

〇〇〇，〇〇〇盧布。這三年來的建築費一共建築了四，五九六，〇〇〇平方
米突的房舍，滿足了二五七，〇〇〇個工人的房舍需要（如果把工人的家眷算
在一起，約有九〇〇，〇〇〇人）。

失業問題：蘇聯職工會中央和人民勞動委員會在這個問題上有一種分歧。
我現在以人民勞動委員會的統計作為標準，因為這個統計是與勞動介紹所有關
係的失業工人底確數。按照人民勞動委員會的統計，兩年來失業工人的數目一
共從九五〇，〇〇〇人增加到一，〇四八，〇〇〇人。其中產業工人佔百分之
一六·五，智力勞動和不熟練的工人佔百分之七四。所以，我們失業工人的基
本來源是鄉村的人口過剩，我們工業容量的有限祇是一種次要的原因。

總結：整個工人階級的物質狀況是毫無疑義的提高了。

黨的任務就是：繼續改善工人階級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的狀況和提高工
人階級的工資的路線。

B 農民。我想，關於農民的分化問題用不到引數目字了，因為我的報告
太長，而且數目字大家都已知道了的。毫無疑義的，無產階級專政之下的分化
是不能與資本主義制度之下的分化混為一談的。在資本主義之下兩個極端日益
發展：貧農與富農日趨分化，中農一天比一天減少。而在我們國內却巧相反，
中農（一部分貧農漸漸升為中農）和富農日見增加，而貧農却一天天的減少。
這個事實就是證明農村中的中心人物還依舊是中農。依靠在貧農身上，與中農
聯合，對於我們整個建設的命運，對於無產階級專政有非常重大底意義。

鄉村物質狀況一般的發展。農民收入增加的數目如下：兩年以前，即一九
二四至二五年，農民的收入共計三，五四八，〇〇〇，〇〇〇盧布，至一九二
六至二七年就已增加到四，七九二，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即增加了百分之三
五·一，農民的人口在這個時期內一共增加百分之二·三八。這毫無疑義的證
明農村的物質狀況是日趨改善了。

但這並不是說，全國各地的農民的生活狀況都改善了，大家知道，這兩年
以來有些地方，收成很壞，一九二四年歉收的影響也還沒有完全消滅。因此國

家給一般的勞動農民，特別是貧農以經濟上的幫助。國家在一九二五至二六年幫助勞動農民的經費共計三七三，〇〇〇，〇〇〇盧布，一九二六至二七年共計四二七，〇〇〇，〇〇〇盧布。一九二五至二六年特別幫助貧農的經費如下：幫助最貧窮的農戶的共計三八，〇〇〇，〇〇〇盧布，貧農免繳的稅捐共計四四，〇〇〇，〇〇〇盧布，最貧的農民免繳的保險費共計九，〇〇〇，〇〇〇盧布，一共總計算起來是九一，〇〇〇，〇〇〇盧布。一九二六至二七年特別幫助農民的經費如下：幫助最貧窮的農戶的三九，〇〇〇，〇〇〇盧布，貧農免繳的捐費五二，〇〇〇，〇〇〇盧布，最貧的農民免繳的保險費九，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共計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

總結：基本農民羣衆的物質狀況是改善了。

黨的任務就是：繼續改善基本農民羣衆最先是貧農的物質的狀況和文化狀況，鞏固工人階級和農民的聯合，提高工人階級和黨在農村中的威信的路線。

○ 新興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新興資產階級的特點就是，牠同工人階級和農民完全相反，牠決不能滿意蘇維埃政權的。牠底不滿，並不是偶然的。這種不滿，是有生活底根源的。我已對你們說過，我們的國民經濟，我們的工業，國民經濟的社會主義成份，都已經一天天的發展起來，而私有資本以及小的商人却日見衰落。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如果我們的工業和商業機關發展起來，成千成萬的中小資本家就要隨之而破產。在這幾年來，多少私人的小店舖關了門呢？有好幾千。多少生產者無產階級化了呢？也有好幾千。在我們國家機關實行裁員以後，被裁的職員有多少呢？成千成萬。推進我們的工業，推進我們的商業機關和合作社機關，改善我們的國家機關，就是我們國家的一種進步和改良，這一種進步和改良只利於工人階級，利於農民的基本羣衆，而不利於新興資產階級，不利於一般中產階級，尤其不利於城市的中產階級。在這些階級中間對於蘇維埃政權不滿的情緒日形增長，這有沒有什麼奇怪呢？當然是毫不奇怪的。因此在這種階級中充滿了反革命的情緒，產生了改變黨標派的思想——這是新興資產階級政治市場上的最時新的貨物。

但如果以為一切職員，一切智識分子都處在一種不滿的狀態中，都是反對蘇維埃政權的，那末這也是錯誤的。新興資產階級的不滿情緒雖日見增長，但智識分子中間却發生了分化，他們漸漸的脫離改變道標派的思想，成千成萬勞動的智識分子都漸漸地轉到蘇維埃政權方面來了。同志們，這是一件很值得注意的事實。這些智識分子的主幹就是技術方面的智識分子，因為他們與生產的過程有密切的聯繫，他們不能不看到，布爾塞維克是在引導我們的國家向前進展。許許多多驚人的大建築，例如：伏爾加甯水電站，特內普羅水電站，斯維爾水電站，土耳其坦鐵路，瓦窩河頓河的開通，許許多多新工廠的建築（技術方面的智識分子與這一切大建築的命運是密切關聯着的），對於一部分技術方面的智識份子當然不能不發生一種很好的影響。這對於他們不僅是飯碗問題，這是一種偉大的創造事業，這一種偉大的創造事業自然而然地使他們與工人階級，與蘇維埃政權親近起來。鄉村中的勞動智識分子，尤其是鄉村的教師更不用說，他們早已站在蘇維埃政權方面，他們不能不慶賀鄉村教育事業的發展。因此在某一部分智識分子中間對蘇維埃政權的不滿情緒雖日見增長，但同時廣大的勞動智識分子却已經與工人階級聯合起來了。

黨的任務就是：要繼續使新興資產階級孤立及鞏固工人階級與蘇聯城鄉勞動智識分子聯合的路線。

D 國家機關及與官僚主義的鬥爭。官僚主義問題現在說的人非常之多，我不必再來多講了。官僚主義分子在我們的國家機關，合作社機關及黨的機關中當然是有的，這是不成問題。與官僚份子作鬥爭是必須的，在國家政權尚未消滅之前，在國家還存在着的時候，這個任務是時刻擺在我們面前的——這也是事實。但是總應當守一點分寸纔是。與國家機關中的官僚主義份子應當鬥爭的，但如果因此而主張消滅國家機關，解散國家機關，毀壞國家機關——這就走上了違反列甯主義的道路，就是忘記我們的國家機關是蘇維埃的機關，是世界上最完善的一種國家機關。我們國家機關的力量在什麼地方呢？牠的力量就在於：牠經過蘇維埃而使政權與廣大的工農羣衆聯繫起來。就在於蘇維埃

是成千成萬的工農羣衆學習管理的學校。就在於國家機關與廣大的人民羣衆沒有絲毫的隔閡，經過許許多多的羣衆組織，各種各樣的委員會，社會團體，代表會議等等，與民衆混合起來。牠們是圍繞於蘇維埃機關的周圍的，政權機關就是依靠在這種社會組織身上的。我們國家機關的弱點在什麼地方呢？就是官僚份子的存在，這些份子時刻在損害和破壞國家機關的工作。要把官僚主義從國家機關中驅逐出去（一兩年之內是驅逐不完的），就必須有系統地改良國家機關，使牠和羣衆接近起來，提拔忠於工人階級事業的新人才，以共產主義的精神去改造國家機關，而並不是破壞牠，解散牠。列寧說：“如沒有國家機關，我們早就滅亡了。如不有系統地堅決地改善國家機關，我們在未建築下社會主義的基礎之前，就必然要滅亡，，列寧這句話是千真萬確的。

關於我們國家機關中的那一些缺點，我不詳細的敘述了。這些缺點大家都看得很清楚。我首先要講一講“辦事遲緩的官僚主義，，在我手頭有一大卷材料，都充滿了這種官僚主義的事實。審判機關，行政機關，保險機關，及合作社等機關的工作人員辦事都非常遲緩，往往把一切重要事情擱置起來置之不理。有一個農民到保險所去了二十一次，想得到一點真確的消息，可是結果一點也沒有得到。還有一個農民，已經是六十六歲的老頭子，老遠的從六百俄里的地方跑到縣立社會保養所那裏去弄明白一件事情，可是結果一點也得不到什麼。還有一個五十六歲的鄉村老太婆，走了五百俄里的路，又坐了六百俄里的馬車，辛辛苦苦的跑到人民審判廳那裏打一件官司，可是結果還是得不到一點真理。這一類的事實，簡直不勝枚舉。同志們，這確實是我們的恥辱！這樣不成體統的現象我們怎麼能夠忍耐下去呢？

最後，還要講一點“壓制人才，，的事實。除了從工人中提拔人才之外，還有一種“壓制人才，，的現象，這些人才被他們的同事擠了下去，並不是因為能力薄弱，而正是因為他們肯努力的誠實的工作的緣故。有一個器械工人，因其能力高強，品格高尚而被提拔了起來。他做工作非常勤懇，極力振頓秩序，剷除一切浪費和不經濟的現象。因此妨害了一部分狼狽爲奸的“共產黨員，，底安

寧，引起了他們的仇恨。後來怎麼樣呢？這些狼狽為奸的「共產黨員」於是便多方面設法和他為難，迫使他辭職，硬把他「排擠」下去。「老兄，你想聰明過人！你不使我們安安靜靜地過活和享樂，哼，老子就要請你滾蛋！」還有一個工人，也是器械工人，也是由工廠中提拔出來的。他做工作也很誠懇而努力。可是這又妨害了一部分人的安寧。結果怎麼樣呢？結果這些「不得安寧的」同事們便藉故把他趕走了。這位工人被趕走時的感覺怎樣呢？他說：「無論派我到什麼地方去工作，我總是要努力證明人們對我的信任，毫不辜負他們。可是這一件惡作劇的事，我是永不忘記的。我蒙了極大的污辱。我希望把一切事情弄個清白，可是這終究是一個希望罷了。工廠委員會、工廠管理處以及支部都不願意聽我的話。我為提拔而死，他們即使把金子散在我的身上——我是無論如何不走的。」（「勞動報」，一二八期，一九二七年六月九日）同志們，這是我們的恥辱！這樣不成體統的事情怎麼能夠忍耐下去呢！

黨的任務就是：要與官僚主義鬥爭，改善國家機關，用赤熱的鐵條來燒滅上述這一切不成體統的現象。

E. 列寧關於文化革命的口號。——反對官僚主義最可靠的一個方法就是提高工農的文化程度。我們可以辱罵國家機關中的官僚主義，可以誹謗和辱罵官僚主義，但如果不提高廣大工人羣衆的文化程度，使他們能夠從下層以工人階級自己的力量來監督國家機關，那官僚主義還是可以存在的。因此發展工農羣衆的文化程度，不僅是要使他們識字（論字雖然是文化的基礎），而且也必須要使他們學會管理國家的那一種技能，——這是改善國家機關及其他一切機關的基本槓桿。列寧關於文化革命的口號底意義就在於此。列寧在一九二二年三月第十一次黨代表大會開幕之前，給中央委員莫洛托夫同志的信中，關於這個問題會這樣說道：

「我們最缺乏的就是文化和管理國家的技能。新經濟政策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已完全可以担保我們建築社會主義經濟的基礎。現在的問題“僅僅”在於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的文化程度。」

同志們，我們切不可忘記列甯這句話。（座下聲：對呵！）

黨的任務就是：要加強工人階級和勞動農民羣衆文化的發展。

關於我們國內的政治狀況可以得到怎樣的一個總結呢？

總結就是這樣：蘇維埃政權現在已成了全世界上最堅固的一個政權了（熱烈的拍掌聲）。

蘇維埃政權雖已算爲世界上最堅固的一個政權，是可以被任何資產階級政府所羨慕的一個政權，可是這並不是說，我們在這一面的情形完全都是很好的了。不，同志們，我們在這一方面還有許多缺點，我們每一個布爾塞維克不應當把這種缺點隱藏起來。第一，我們國家內還有失業工人。這是我們的一個缺點，我們必須克服這種現象，至少必須盡量地使牠減少到最低限度。第二，工人的住房不夠，發生了一種住房的恐慌，這一個現象在最近的將來也必須把牠消滅，至少也必須減少到最低限度。第三，不僅在中等階層中有反猶太人的情緒，就是一部分工人以及黨員中間也還有這一種的情緒。同志們，我們必須與這一種情緒作無情地鬥爭。此外，反宗教的鬥爭也有一種削弱的趨勢。最後，文化程度也非常落後，——不僅是從這個字的廣義方面來講，就是從這個字的狹義方面來講（即從最粗淺的識字的意義上來講），也是非常落後的，因爲蘇聯不識字的人還多得很。

同志們！如果我們要迅速的前進，我們就應當努力的去消滅這一類的缺點。

在第十四次黨大會到第十五次黨大會的時期中，曾經有幾次委任是非常值得注意的，關於這一點我還要講幾句話，藉此把這一段報告來作一個結束。關於委任賴可夫爲蘇聯人民委員長這件事姑且不講。此外，關於國民經濟最高委員會、人民商業委員部、蘇聯國家政治管理局等等的委任我也不講了。我現在所要講的就是有模範意義的三個委任。你們知道，現在已正式委任羅波甫爲蘇俄國民經濟最高委員會的主席。他是一個五金工人。你們知道，烏漢諾夫同志已代替加米涅夫而當選爲莫斯科蘇維埃的主席，他也是一個五金工人。同時，

康馬洛夫已代替季諾維埃夫同志而當選為列寧格勒蘇維埃的主席，他也是一個五金工人。現在兩大首都的“市長，都是五金工人了（拍掌）。他們固然不是貴族出身，但是他們管理京都的事務比任何貴族都要長得多（拍掌）。你們也許要說，這是五金化的趨勢。但我認為這絲毫沒有壞處。（會場叫道：“却巧相反，這是很好的現象，，。）希望資本主義的國家，希望倫敦和巴黎，希望他們最後能趕上我們，能提拔他們自己的五金工人來充當“市長，（拍掌）。

三 黨和反對派

（1）黨內情形

同志們，關於黨員數量上的和思想上的發展我在這裏不講了，關於這些情形珂西滿爾同志會細詳的告訴你們。此外，關於黨內的社會成份及其詳細的數目我也不講了，關於這一點，珂西滿爾同志也會報告你們的。我現在要略為講一講我們的黨在經濟與政治方面的領導工作之質量上的改善和提高。同志們，兩三年前，曾經有一部分同志，為首的大概是託洛茨基（會場上笑道：“大概？，，）他們責罵我們的省委、我們的州委和我們的中央，說黨的組織不應當參與我們國家的經濟事務。是的，曾經有過這樣的時候。現在大概沒有人敢反過口來，把這種罪名加在黨的組織身上了。省委和州委已取得了經濟建設的領導權，而並不是做了經濟建設的尾巴——這是一件非常明顯的事實，只有賭子和瘋子才會否認這樣的事實。我們已經決定，要在這次大會上提出五年經濟建設計劃的問題，這件事實的本身就已告訴我們：黨在我們全國經濟建設的有計劃的領導中已經有了極大的進步。有些人以為這是沒有什麼特別的。不，同志們，這是很值得我們注意的特別重要的一件事。有些人拿美國和德國的經濟機關來做例子，說這些機關也是有計劃地在領導國民經濟。不，同志們，在資本主義統治的地方，這種有計劃的領導，從來沒有達到過，而且也不能達到的。有計劃的領導國民經濟，在資本主義工業制度之下是不可能的，這必須在社會主義工業制度之下才有可能，至少必須要在工業國有，信用事業國有，

土地國有與農村社會主義聯合以及工人階級掌握政權等等的條件之下，才有可能。不錯，資本主義的國家，也有一些類似計劃的東西。但這只是一些猜想的暗中摸索的計劃，決不能根據這一種計劃來領導國家的經濟事業的。我們的計劃就完全不同。我們的計劃不是猜想摸索的計劃，而是一種指令式的計劃，是領導機關所必需遵守的計劃，是能決定將來我們全國經濟發展之方向的一種計劃。你們可以看到，這其間是有原則上底區別的。因此我認爲在大會上提出五年經濟計劃問題這件簡單的事實，也可以算爲我們有計劃的領導工作日益提高的一個表徵。

關於黨內德謨克拉西的提高，我在這裏也不必多講了。只有瞎子才不會看到我們黨內的民主，真正的黨內德謨克拉西，真正的提高黨員羣衆的積極性——是在一天天的發展起來。許多人都是高談德謨克拉西，但究竟什麼是黨內德謨克拉西呢？究竟是什麼人的德謨克拉西呢？如果把德謨克拉西解釋爲那些脫離了革命的智識份子有言論出版的自由，那麼這一種‘德謨克拉西’，我們是不要的，因爲這只是一小部份人的德謨克拉西，是破壞大多數人意志的德謨克拉西。如果把德謨克拉西解釋爲黨員羣衆有解決我們建設的自由，解釋爲提高黨員羣衆積極性，吸收他們去參加黨的領導工作，及發展他們在黨內的主人翁的感覺，那麼這一種我們是有的，德謨克拉西我們是需要的，而且將來我們也必須要把他努力地發展下去的（拍掌）。

同志們，除了黨內德謨克拉西之外，我們黨內領導的集體性也一步步的發展起來了。關於這點，我在這裏也不必詳述。且拿我們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來看吧。這個領導中心是由200——250個領導同志共同組成的，他們經常的召集會議，解決我們建設上的一切重要問題。這是我們黨內一個最德謨克拉西的集體行動的中心。難道這件事不是證明我們工作上許多重要問題的解決權已一天天的從一小部分人手中轉入廣大的中央機關——與一切生產部門，都是有最密切底聯繫的——的手中麼？

關於我們黨內幹部人材的發展，我也不再贅述了。毫無疑義的，在近幾年

來，許多舊的幹部人才已一天天的被新起的幹部人才——大部分是工人——擠了下去。以前我們的幹部人才，只不過是幾千，現在已有好幾萬了。從最下層的機關算起一直到全蘇聯的最高機關為止，我們黨的幹部人才，現在一共有十萬人，其中大多數都是工人。這是黨的一個非常偉大的發展。這是我們幹部人才及其思想上組織上的經驗與共產主義文化的一個非常偉大的發展。

最後，還有一個問題，雖不必詳述，但必須指出來的。這就是我們的黨在我們國內非黨工農羣衆中間及在全世界工人階級和一切被壓迫階級心目中底威信日益增加的問題。現在我們的黨已成了全世界勞動羣衆謀解放的旗幟，布爾塞維克這一個名稱已成了工人階級中間一個光榮的稱號，這一點，現在已經是毫無疑義的了。

同志們，這就是我們在黨建設中的一般成績。

同志們，這並不是說我們黨內毫無缺點。不，缺點是有的，而且是一種嚴重的缺點。現在我就要把這些缺點略為講一講。

例如就拿我們黨的組織對經濟機關及其他各種機關的領導來講吧。在這一面的情形是否都是很順利的呢？不，並不都是很順利的。有許多問題不僅在地方上，而且也是在中央，是用一種家庭式的和親屬方法來解決的。譬如，有一位伊凡諾夫，是某某組織的上層領導之一，壞了事，犯了極大的錯誤。但是費多羅夫不願意批評他，指摘他的錯誤，糾正他的錯誤，因為他不願意同伊凡諾夫“結仇”，“犯了錯誤，壞了事——這有什麼要緊！我們誰不犯錯誤呢？今天我費多羅夫饒恕了他，明天他——伊凡諾夫——也可以饒恕我。因為我怎麼能够擔保我自己將來不犯錯誤呢？替人家留點面子，和平了事就好了。犯了一點錯誤就算壞了我們的大事麼？有什麼要緊！我們總可以找到出路的。同志們，這就是我們有些負責的工作人員一般的論調。這是什麼意思呢？我們是批評全世界的布爾塞維克，我們——引用馬克思的一句話——是翻天覆地的人，如果我們爲了姑息有些同志的安甯而放棄自我批評，難道大家還不明白可以知道，這種行爲除了毀壞我們的偉大事業之外，一點好的結果也不會有麼！（會場

上叫喊“對啊，！拍掌”。馬克思說，無產階級革命與其他一切革命的一個不同之點就是，牠是自己批評自己的，牠是藉自我批評而鞏固起來的。馬克思的這一個指示是很重要的。用家庭式的方法來解決問題，互相遮蓋自己的錯誤，把一切病毒趕到我們黨的機體內部去——如果這樣，那末誰來糾正這些錯誤和這些缺點呢？如果我們不把這些庸俗下流的東西從我們自己的隊伍中趕出去，不把這種狼狽為奸地解決我們在建設中的一切重要問題的分子剷除出去，我們就不成其為無產階級的革命家，我們就勢必至於滅亡，難道這不是顯而易見的事麼？我們如果拋棄誠懇的直爽的自我批評，不去誠懇地坦白地糾正自己的錯誤，我們就是自己閉塞了前進的道路，自己斷絕了改善我們事業的道路，這一點難道大家還不明白麼？要知道我們的發展並不是一帆順風地前進的。不，同志們，我們國家內還有階級存在着，我們內部還有各種矛盾，我們國家內有過去的東西，有現在的東西，也有將來的東西，在他們中間有一種矛盾存在着。我們還不能一帆風順地在生活的駭濤怒浪中前進。我們的發展是要在鬥爭中，矛盾中，克服這種矛盾，揭露和消滅這種矛盾的過程中掙扎出來的。當這些階級還沒有消滅的時候，我們無論如何不能坦然自若地說：謝天謝地，現在什麼都很好了。同志們，這無論如何是不可能的。在我們的生活中，有些東西是在一點點的死亡。但是那些日趨死亡的東西，決不願意死亡的，他們要為他們的生存而鬥爭，要堅決地保持他們的腐朽的事業。在我們的生活中，新的生命也是在一天天的產生出來。但是這些新的生命也不是簡單地產生出來的。他們喧鬧着，叫喊着，堅決的要爭取他們的生存權。（會場上叫道：“對呵，！拍掌。”）新舊生命之間的鬥爭，將死的與新生事物之間的鬥爭——這就是我們發展的基礎。我們如果不真正拿出布爾塞維克的精神，去誠實地坦白地指出我們工作中的一切缺點和錯誤，我們就是自己斷絕了前進之路。可是我們是想前進的。我們既想前進，我們就應當提出一個非常重要的任務：誠實的革命的自我批評。沒有這一種自我批評就不能前進，不能發展。可是這一種自我批評的精神現在還很缺乏。往往因為一點小小的成功，便把一切缺點都完全忘記，洋洋自

得地以為可以高枕無憂了。得到了二三個大的成功，往往就手舞足蹈地自滿的了不得。可是一切錯誤和缺點還依然如故地存在着，一般病毒也還是在我們黨的機關內部滋潤着。

第二個缺點，就是在黨內採用行政的方法，以這種的方法來代替說服的方法。這一個缺點的危險性並不亞於前一個缺點。爲什麼呢？因爲這個缺點，可以使我們黨的組織由自動的組織而變爲空虛的辦公所。散佈在各種經濟機關，合作社機關和國家機關中的最積極的工作人員算起來大概不下六萬人，可是在這六萬人中間有一部分人在與機關內部的官僚主義鬥爭中，往往自己也被官僚主義所傳染，而且把這種官僚主義帶到我們的組織中了。同志們，這不是我們的罪過，而是我們的不幸，因爲在國家未消滅之前，這種現象，多少總是不免的。正因爲這種現象在生活中有相當的根源，正因爲這樣，所以我們必須武裝起來與這些缺點鬥爭，提高黨員羣衆底積極性，吸收他們來共同地解決我們黨的領導問題及有系統地栽培黨內的德謨克拉西。

第三個缺點，就是我們有許多同志，都只是喜歡安穩穩地，不顧前途，不顧將來地隨波逐流，想使周圍都充滿着歌舞昇平的空氣，要使每天都有慶祝大會，到處都聽到拍掌聲，要想我們每一個黨員都輪流着得到名譽主席團的位置。（笑聲，拍掌聲）只顧到處都充滿歌舞昇平的空氣，只顧修飾外觀，只願醉心於一切需要的與不需要的紀念節，不顧方向，只願隨波逐流，（笑聲，鼓掌聲）——這一切歸納起來湊成了我們黨的實際工作中第三個缺點，湊成了我們黨的生活上的一切缺點的基礎。有一種船夫，船划的非常努力，弄得汗流滿臉，可是他們不知道波濤會把他們沖到什麼地方去；這樣的船夫你們看到過麼？我在葉尼賽河會看到過這樣的船夫。這是一種忍苦耐勞的船夫。可是他們最不幸的地方，就是他們看不到而且不願意看到驚濤駭浪會把他們沖到海礁上去，會使他們觸礁而死。我們黨內有些同志也是這樣。他們只知道不息手地工作，盲然地隨波逐流，可是潮流會把他們漂到什麼地方去，他們不但不知道，而且簡直不願意知道。沒有舵，沒有帆，也沒有瞭望，只是順水漂游——這就是

我們有些同志的願望。結果會怎樣呢？結果是很明顯的：起初，他們身上漸漸生起了鏽，後來，就一點點變成灰色的人，然後就漸漸向庸人的泥沼中墮落下去，然後他們就完完全全變成了庸人。這就是真正墮落的道路。

同志們，這就是我們黨內實際工作中和我們黨內生活上的幾個缺點，關於這些缺點，我向你們說了一些辛酸的話。

現在我們就來講到討論的問題和我們的反對派。

(2) 討論的總結

我們的討論有沒有什麼意義和價值呢？有的人說：你們真見鬼，討論他幹嗎呢，誰要這種討論，一切爭論在內部解決就完了，家醜不可外揚，何必吵出去呢？同志們，這是不對的。公開的討論，有的時候是絕對必要的，而且是絕對有幫助的。問題是全在於討論的性質。如果這是一種黨的範圍內，同志的範圍內的討論，如果這種討論的目的是誠懇的自我批評，批評黨的缺點，如果這種討論是真正能夠改善我們底工作和武裝工人階級的，那麼，這一種討論當然是必要的，是有幫助的。可是還有另一種性質的討論，這種討論底目的並不是改善我們的工作，而是損害我們的工作，並不是鞏固我們的黨，而是瓦解我們的黨。這一種爭論決不能武裝無產階級，而只能解除無產階級的武裝。我們絕對不需要這樣的爭論。（會場上叫道：“對啊！”，拍掌。）

反對派會要求在代表大會未召集之前，在中央的提綱沒有做好之前，在這些提綱未公佈之前，舉行三個月全蘇聯的廣大的討論，他們想用這一種只能幫助我們敵人——工人階級的敵人，我們黨的敵人——工作的討論來牽制我們。因此，中央拒絕了反對派的計劃，我們把討論引到了正確的軌道上，以中央的提綱作為討論的基礎。現在我們已可毫不猶疑地說，整個討論所給與我們的只有好處。至於說到家醜不可外揚，同志們，這完全是無稽之談。我們決不怕在全體黨員的前面批評自己的錯誤。布爾塞維克的精神就在於他絲毫不怕批評，在批評他自己的缺點中間來努力的設法前進。因此，現在的這一種討論，正就

是我們黨的精神和黨的力量的一個最好的表誌。

同時我們也不可忘記，在一切大的政黨中，尤其我們這一種政黨中——政權已經掌握在他的手裏，其中有一部分是農民和職員的政黨中——必然逐漸地會產生一種隨波逐流的份子，這種份子對於黨的一切實際問題都抱一種冷淡的隨便的態度，他們只知閉着眼睛舉手，什麼事也不管。在黨內這種份子很多，這是很大的一個障礙，我們必須與牠努力的奮鬥。這些份子是我們黨內的泥沼。討論就是向這個泥沼的一種控訴。反對派向他們控訴，爲的是要從這個泥沼中抓取一部份人。而他們也確實從這個泥沼中抓取了最壞的一部份人。黨向他們控訴，就是爲的要把這泥沼中的較好的一部份人抓取出來，把他們吸引到積極的黨的生活中去。結果，這些泥沼中的人們，沒有法子，只好自己來決定。自決的結果，一部份人給了反對派，一部份人給了黨，因此，泥沼便不再存在了。在我們黨的發展過程中，這也可算爲我們的一個優點。這次討論的結果，泥沼中的人一定要減少，或甚至於完全會消滅。這就是討論的一個好處。

討論的結果怎麼樣呢？結果大家都知道了。昨天舉手贊成黨的路線的有七十二萬四千個同志，贊成反對派的只有四千個同志。這就是討論的結果。我們那些反對派總是說：中央脫離了黨，黨脫離了階級，如果他們的話是事實，那末也許有百分之九十九的黨員都會站在他們那方面。可是他們這些話都不是事實，所以站在反對派方面的黨員百分之一也不到。討論的總結就是這樣。

爲什麼反對派在整個黨內。在整個工人階級中間竟能陷於這一種孤立的地位呢？要知道反對派的首領都是那些鼎鼎大名的善於宣揚自己的人物（會場上的叫聲：“對呵，，，”）都是些不怕難爲情的（拍掌）善於自傲的吹牛大家。爲什麼他們這樣孤立呢？因爲反對派的領袖人物，都是些離開了實際，離開了革命，離開了黨，離開了工人階級的小資產階級的智識份子（拍掌）。不久以前我曾經說到我們工作上的成功，我們在工業方面，商業方面，整個的經濟方面以及對外政策方面底成績。但是反對派是閉着眼睛不管這些成績的。他們沒有看到這種成績，而且不願意看到這種成績。他們之所以不願意看到這些成績，

一方面是由於他們的愚蠢，另一方面是由於他們那種脫離實際生活的智識份子的頑固性之所致。

(3) 黨與反對派之間的主要分歧

你們一定要問，黨與反對派之間的分歧究竟在什麼地方？分歧在那些問題上呢？同志們，黨和反對派在一切問題上都是分歧的。（會場上叫聲：“對呵，，！”）不久前我曾看到一個剛纔入黨的莫斯科非黨工人的一封申明書。他對於黨和反對派之間的分歧問題是這樣瞭解的：

“以前我們會竭力的尋找黨和反對派的分歧之點。可是我們現在却已經找不到那一個地方反對派是同意於黨的了（鼓掌）。反對派在一切問題上都反對黨，因此，假使我是一個反對派，那麼我就不加入黨了。，，（笑聲，鼓掌聲）（“新聞報，第二六四期）

這位工人所說的話是非常確當而簡明。我認爲這是對於反對派的一個最簡明而確當的估計。這幾句話很明白的描寫出了反對派對於整個黨，對於黨的主張，黨的綱領，黨的策略所取的態度。正因為反對派在一切問題上都是與黨分歧的，所以反對派有他們自己的主張，自己的綱領，自己的策略，和自己的組織原則。凡是形成新的政黨所必須具備的一切條件，反對派都已完全具備了。反對派所差的只是一點“小東西”，，他們所缺乏的就祇是力量。（笑聲，鼓掌聲）

黨與反對派分歧的問題，最主要的有七個。

第一個問題 在我們國家內社會主義的建設能否勝利的問題。反對派關於這個問題所發表的文章和意見書，我不來多費時間一段段的引證出來。這些東西大家都已知道，不必再加以重複。大家都知道，反對派否認在我們國家內社會主義的建設有勝利的可能。他們在這一點上已公開的直接的轉到孟塞維克的立場上。反對派的這一種觀點，對於他們現在的領袖並不是一種新穎的觀點。加米涅夫和季諾維埃夫反對十月暴動的時候，也是從這一個觀點出發的。他們

那時候公開地說：我們如果暴動起來，我們就必然會滅亡，我們必須待立憲會議的召集，社會主義的條件還沒有成熟，而且離成熟的時候還早得很。託洛茨基參加暴動的時候，也同樣是從一個觀點出發的。因為他那時候公開地說：如果西歐勝利的無產階級的革命在最近將來還來不及幫助我們，那革命的俄羅斯也不能在保守的歐羅巴前面堅持下去。

實際上，加米涅夫和季諾維埃夫方面，託洛茨基方面，以及列甯和黨方面——這三方面怎麼樣參加暴動的呢？這是很有趣味的一回事，很值得拿來講一講。你們要知道，加米涅夫和季諾維埃夫的參加暴動是出於不得已的。列甯那時候拿着棍子趕打他們，以開除黨籍威脅他們，他們撻體強的去參加暴動（笑聲，鼓掌）。託洛茨基是自願地參加暴動的。而且他參加暴動並不是簡單的，他是有條件的，他那時已經與加米涅夫和季諾維埃夫接近起來。很有趣味的，託洛茨基却巧在十月革命的前夜，一九一七年的六月，在列甯格勒重新出版他的舊作——“和平的綱領”，好像表示他是在自己的旗幟之下參加暴動的。他在這本書中所說的是些什麼話呢？他在這本書上與列甯大爭辯一個國家內社會主義勝利之可能的問題，他認為列甯的這個意見是不正確的，他認為政權是應當奪取的，可是如果沒有西歐已勝利的工人底幫助，革命的俄羅斯就不能夢想與保守的歐羅巴堅持下去，誰不相信託洛茨基的批評，誰就是民族主義者。下面就是從那本書上摘引下來的一段話：

“我們不等待其他的國家，而在民族的範圍內先開始鬥爭，並且把這個鬥爭繼續下去，我們深信我們這種先發的舉動必能推動其他國家內的鬥爭；但如在其他國家內不發生這種鬥爭，那麼革命的俄羅斯也就不能夢想與保守的歐羅巴堅持下去，——歷史底經驗和理論的根據都這樣證明。，……”“在民族的範圍內來觀察社會革命的前途，這就蹈了社會愛國主義那種狹義的民族主義的覆轍。，（託洛茨基，“一九一七年”，第三卷第一部第九十頁）

同志們，這就是託洛茨基參加暴動的條件，也就是現在使您與加米涅夫，

季諾維埃夫聯合的根源和基礎。

列甯是怎樣參加暴動的，黨是怎樣參加暴動的呢？是不是也有條件的呢？不，列甯和他的黨是無條件地參加暴動的。下面就是從列甯的“無產階級革命的軍事綱領”，這篇有名的文章中（一九一七年九月發表於國外）摘引下來的一段話：

“在一個國家中得到了勝利的社會主義並不能一下子就把一切戰爭都完全消滅。却巧相反。社會主義是預料到這種戰爭的。資本主義在各國的發展是極不平衡的。在商品生產之下必然如此的。因此就可得出一個肯定的結論：社會主義不能在各國同時的獲得勝利。最初的時候，社會主義只能在一個國家或幾個國家獲得勝利，其他的國家在一個相當的時期內必然還保留着資產階級的或封建的統治，這不僅會引起衝突，而且也必然會引起其他的國家想剷滅社會主義國家內勝利的無產階級之野心。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這方面的戰爭是合法的，而且是公道的。這是為社會主義，為使其他民族從資產階級之下解放出來而作的戰爭，（列甯：“無產階級革命的軍事綱領”，“列甯學院筆記”，第二卷第七頁）

你們可以看到，這一個見解與前面的見解是完全不同的。託洛茨基參加暴動的時候，一方面與加米涅夫、季諾維埃夫親近起來，另一方面提出他自己的主張說：如果沒有及時的得到外來的援助，無產階級的政權是沒有什麼特別意義的。列甯去參加暴動的時候並沒有說這樣的話，却巧相反，列甯認為我國無產階級的政權，應作為其他國家無產階級解放運動底根據地。

布爾塞維克在十月暴動中的態度就是這樣的，這也就是託洛茨基和加米涅夫、季諾維埃夫，在十月革命十週年時所以能取一致態度的根源。

託洛茨基與加米涅夫、季諾維埃夫間形成反對派時的情形可以用談話的方式描寫出來。

加米涅夫和季諾維埃夫對託洛茨基說：“親愛的同志，我們以前說不必參加十月暴動，應當等待立憲會議的召集，歸根結底我們還是正確的。現在大家

都已看到，國家已開始蛻變了，政權也已開始蛻變了，我們是在走向滅亡的道路，我們是再也不能實現什麼社會主義了。當初根本就不應當去暴動。你那時候是自願的參加暴動的。你犯了一個很大的錯誤，，。

託洛茨基回答他們道：“親愛的同志，你們錯了，你們對我的態度是不公道的。暴動我是參加的，可是我當時是怎樣參加的，你們却忘之腦後了。要曉得我參加暴動並不是直捷了當的，而是有附帶條件的（全場哄笑）。現在既不能得到外來的援助，事業當會趨于滅亡的道路，這點我在“和平綱領”中早就已預言過的，，。

加米涅夫和季諾維埃夫便說道：“不錯，有這麼一回事。我們忘記了他的附帶條件。現在可明白了，我們的聯合原來還有思想上底基礎的，（全場哄笑鼓掌）

反對派否認在一個國家內社會主義建設有勝利之可能的主張就是這麼形成的。

這個主張究竟表示些什麼呢？這就是表示投降行爲。投降誰呢？當然是投降我們國家的資本主義份子。還投降誰呢？還投降全世界的資產階級。可是那些左的辭句和革命的高調，究竟跑到那兒去了呢？這些東西是化爲灰燼了。你們把反對派翻覆的仔細的觀察一下，去掉那些革命的辭句——你們就可看到，在反對派的骨子裏充滿着投降的細胞（鼓掌）。

第二個問題，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問題。在我們國家有沒有無產階級底專政呢？這個問題問得有些奇怪（笑聲）。可是反對派在他們每一個意見書中都提到這個問題。反對派說我們已發生了“幾密度”的蛻化。這是怎麼講呢？這就是說，在我們國家並沒有無產階級的專政，說我們的政治和經濟都在漸漸地崩潰，說我們不是在向着社會主義的道路進行，而是在向着資本主義的道路進行。這些話都是很奇怪的，而且是很愚蠢的。可是反對派却堅持着他們底見解。同志們，這就是我們意見上的第二個分歧，託洛茨基“論克里曼梭”，（是大戰時法國的內閣總理——譯者註）這個有名的提綱就是以這個爲根據的。如果政

權已經統化，或已開始統化，那麼我們還值不值得寬恕他，擁護他，保其地呢？當然，是不值得的。如果一有好的機會，譬如說，敵軍離莫斯科只有八十餘羅米突路遠的時候，那當然就要利用這個好機會，把這種統化的政權掃除，以新的克里曼梭式的、即託洛茨基式的政權來代替他。很明顯地，這種說法是絲毫沒有列甯主義底氣味的。這是清一色的純粹的孟塞維克主義。反對派現在已走上孟塞維克底道路了。

第三個問題，就是工人階級與中農聯合的問題。反對派一向總是掩飾着他們反對與中農聯合的主張。他們的糾纏和他們的反提綱底妙處並不是在於他們所說的話的內容，而是在於他們想對工人階級隱瞞自己的立場。可是結果還是跑出了一個人來——斯米爾諾甫，也是反對派的首領之一，他的胆子比人家大一些，他公開的宣佈了反對派的真正的主張，使反對派的主張在光天化日之下顯露出來。他們的真正的主張是什麼呢？他們認為我們是在走向滅亡的道路，只有與中農分裂，纔能從死路中脫救出來。這種說法雖然不很高明，可是很能使人明瞭。到底這孟塞維克的耳朵被大家所看到了。

第四個問題，就是我們革命的性質問題。既否認我們國家社會主義建設的可能性，既否認無產階級專政的存在及工農聯合的必要——那麼，對於我們的革命及其社會主義的性質還有什麼話可說呢？當然，是沒有什麼話可說的了。無產階級既已取得了政權，既已澈底地完成了無產階級的革命，農民既已得到了土地，所以也用不到什麼革命——因此，無產階級就可以引退，把位子讓給其他的階級。追根究底地把反對派的意見研究一下，反對派的主張就是這樣。這就是使我們的反對派投降於資產階級之前的一切根源。阿勃浪姆維契那樣出力的讚揚他們，確不是枉然的。

第五個問題，就是列甯對於領導殖民地革命的意見問題。列甯根據帝國主義國家與殖民地國家之間底區別，根據帝國主義國家的共產主義政策與在殖民地國家的共產主義政策之間的區別，在大戰的時期已經指出、保護祖國的主張在帝國主義的國家已經完全是不適用的反革命的主張了，可是在被壓迫的對

帝國主義的國家，却還完全是適用的正確的主張。因此，他認為在某一種階段上，在某一個時期內，殖民地的民族資產階級，只要他們反對帝國主義，不阻礙共產黨員去訓練工農羣衆，是可以與他們暫時聯合的。在這個問題上反對派的錯誤，就是他們完全離開了列甫的這個主張，而附和了第二國際的主張——即認為不必幫助殖民地民族反帝國主義的革命運動。反對派在中國革命問題上所作的那些結論，也就是根據這一點出發的。這也是我們意見上的分歧之一。

第六個問題，就是世界工人運動中底聯合戰線的策略問題。反對派在這個問題上的錯誤，就是他們完全離開了列甫在逐漸攫取大多數工人羣衆使其跑到共產主義方面來的這個問題上底策略。要攫取成千成萬的工人羣衆到共產主義方面來，單是黨底正確的政策，還是不夠的。黨底正確的政策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可是並不能包括一切。要使大多數工人羣衆都到共產黨方面來，就必須要使羣衆根據自己的經驗瞭解了共產黨政策底正確性。可是要使羣衆認清這一點，就必須花費好些時間，共產黨就必須到羣衆中去努力的做說服的工作，使這些羣衆瞭解共產黨政策底正確性。還在一九一七年四月裏，我們的主張已是很正確的了，因為我們知道，問題是在於推翻資產階級，建立蘇維埃政權。可是我們那時候並不號召廣大的工人羣衆去暴動。爲什麼呢？認為羣衆那時候還不能瞭解我們的政策之正確性。祇有當小資產階級的政黨，社會革命黨和孟塞維克黨在基本的革命問題上垮了台的時候，祇有當羣衆自己已經瞭解了我們的政策之正確性的時候，我們纔引導羣衆去暴動。正因為我們引導羣衆去暴動的時候，非常確當，所以我們獲得了勝利。聯合戰線的根源就在這裏。列甫之所以提出聯合戰線的策略，就是爲了要使資本主義國家內工人階級的千百萬羣衆，那些受到社會民主黨的妥協成見的傳染的羣衆覺悟的轉到共產主義的方面來。反對派的錯誤，就是在於完全否認了這種策略。有一個時候簡直誇大了甚至愚蠢地誇大了這一政策，以至用盡一切方法歡迎同英國總公會妥協，認為這種妥協是“和平的最嚴重的保障之一”，“反對干涉的嚴重的保障之一”，“防止歐洲改良主義的害處之最有效的的方法”，（見季諾維埃夫在聯共十四次代表大會

上的報告)。(但是對於用卑爾西與海克思共同防止改良主義的害處之希望失敗之後，他又跑到了另一個極端，完全否認統一戰線的策略。同志們，這又是反對派表示同列甯的統一戰線策略完全不同的地方，這也是我們意見上分歧之一。

第七問題。論列甯的黨的立場，論聯共內與共產國際內列甯的統一。這裏反對派是完全同列甯的組織立場分離的，牠跑到了組織第二黨，組織新國際的路上。

同志們，在這七個基本問題上，反對派已經是滾到孟塞維克主義方面去了。

我們能不能說這些孟塞維克的觀點能與我們黨的主張，與我們黨的綱領，與我們黨的策略，與共產國際的策略，與列甯主義的組織原則相容呢？絕對不相容的，一分鐘也不相容的！

你們一定要說：在我們黨內為什麼會產生這樣的反對派，牠的社會根源在什麼地方呢？我認為反對派的社會根源就是城市小資產階級在我們發展條件中的破產，使這種階層對無產階級專政的制度不滿及這些階層想變更這種制度，使這種制度改良成為資產階級民主制度的企圖。我在前面已經說過，我們的迅速的進步，我們工業的發展，及社會主義經濟組織的比重之增加，結果，必然要使一部分小資產階級，尤其是城市資產階級趨于破產。反對派就是這些階層對無產階級革命政權之不平和不滿的情緒底反映。

這就是反對派的社會根源。

(4) 以後怎麼樣？

以後反對派究竟怎麼處置呢？在未講這個問題之前，我要把加米涅夫在一九一一年與託洛茨基共同工作的一段歷史向你們講一講。這是一個很有趣味的問題。牠可以使我們更進一步的去正確的瞭解目前一個問題。在一九一〇年時候，我們中央曾在國外召集了一次全體會議。在這次會議上曾討論到布爾塞維克與孟塞維克（尤其是與託洛茨基）的相互關係問題（那時候我們與孟塞維克

遠處在一個政黨內，我們建立了自己的小組織)。全體會議上多數反對列甯的意見，主張與孟塞維克講和，就是說，與託洛茨基講和。列甯是居于少數的地位。加米涅夫那時取什麼態度呢？加米涅夫自願與託洛茨基合作。他與託洛茨基合作是經過列甯底同意的，因為列甯想在實際上證明給加米涅夫看：與託洛茨基合作反對布爾塞維克，是怎樣有害，怎樣不允許的。

你們試聽加米涅夫關於這件事說了些什麼話：

“在一九一〇年的時候，我們小組織的大多數曾企圖與託洛茨基同志妥協。列甯是竭力反對這個企圖的，我當時堅決的要實行與託洛茨基同志妥協的企圖，列甯就“罰我，代表我們的中央去參加託洛茨基同志所辦的報館的編輯部。到一九一〇年秋天，——我在這個編輯部裏做了幾個月的工作之後——我已相信，列甯反對我與託洛茨基的調和是正確的，于是我就得了列甯的同意退出這個編輯部。我們當時與託洛茨基的破裂，在我們中央機關報上的許多論文中已經指出來了。列甯那時候曾叫我著一本小冊子，把我們與取消派少數派及與託洛茨基的分歧作一個總結。列甯對我說：“你在與反布爾塞維克的左派（託洛茨基派）的合作中已得到了實際的經驗，你已經明白了這種合作是不可能的，你應當著一本小冊子把這件事總結一下，。當然，列甯那時候特別主張把布爾塞維克主義與託洛茨基主義的關係澈底的確定一下，。（加米涅夫在他的“兩個政黨，一書上的序言）

結果怎樣呢！你們聽下去吧！

“與託洛茨基合作底經驗——我敢說，這是我個人努力造成的經驗，關於這一點從我的信中（現在託洛茨基正在利用這封信）和私人的說話中都可證明——這個經驗已證明，調和派是必然要擁護取消派，澈底地跑到取消派方面去的，。

（加米涅夫“兩個政黨，）

再聽下去吧！

‘如果‘託洛茨基主義，得到了勝利——還在取消派，召回派看來，在一切反黨的派別看來是多麼稱心如意的一回事呵！，（同上）

同志們，這就是加米涅夫與託洛茨基合作底經驗（會場上有人說道：‘好一個教訓，！）。加米涅夫同志親身經歷了這番嘗試之後，曾特別著一本書，書名叫作‘兩個政黨，（出版於一九一一年）。我毫不否認，這本書當時對於那些還夢想與託洛茨基合作的同志，確有很大的益處。可是現在有一個問題：加米涅夫還不想再作一本書，書名也叫作‘兩個政黨，，把他現在與託洛茨基合作的情形告訴我們大家呢？（全場哄笑，鼓掌）這也許不是毫無裨益的。當然，我不能向加米涅夫保證託洛茨基現在不再像以前那樣利用他的信件和密談來攻擊他。（笑聲）但這是不值得害怕的。無論如何，兩者之間，必擇其一：或者是害怕託洛茨基利用加米涅夫的信札，公佈他和託洛茨基的秘密談話，那時候危險就留在黨外；或者大膽一點什麼也不害怕，而留在黨內。同志們，現在的問題就是這樣。兩者之間必擇其一。

有的人說，反對派要向大會申明他們完全服從黨的一切決議（會場上有人說道：‘又是玩一九二六年十月的那一套老手段麼，？），解散他們的小組織（會場上有人說道：‘我們聽見過兩次了，，），並且將在黨章的範圍內（會場上有人說道：‘再加上一個附帶的申明，‘我們黨的範圍不是橡皮做的，，）保持他們的觀點（會場上的聲音：‘得了吧！我們自己把他解散就完了，，）。同志們，我想這套把戲是玩不出什麼花樣來的了。（會場上的聲音：‘對呵！，，冗長的鼓掌聲）同志們，從這些申明書中我們也已得到了一些經驗（鼓掌），這樣的申明書我們已經接到過兩次，一次是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六號，一次是在一九二七年八月八號。這些經驗告訴我們什麼呢？我雖然不想著‘兩個政黨，那樣的大作，可是我敢說，這些經驗所給我們的感想是很不好的，牠告訴我們，反對派兩次欺騙了黨，削弱了黨的紀律。經過這兩次教訓之後，反對派怎樣還能叫我們——偉大的列甯黨的代表大會，再相信他們的話呢？（會場上的聲音：‘那就不免太蠢了，，。‘誰要是相信他們，誰就要遭到不幸，，。）

有人說，他們正在提起恢復被開除的黨員底黨籍問題（會場上的聲音：“混不進來的，，”“讓他們跑到孟塞維克的泥沼中去吧！，，）。同志們，我想這套把戲也是玩不出什麼花樣來的！（冗長的鼓掌）

為什麼黨開除了託洛茨基和季諾維埃夫底黨籍呢？因為他們是反對派的組織者，因為他們的目的是想毀壞黨的法律，因為他們自以為黨是不敢奈何他們的，因為他們想在黨內造成一種貴族的地位。難道我們能允許黨內形成享有一切特權的貴族和一無權利的農奴麼？難道我們布爾塞維克千辛萬苦地把貴族等級徹底剷除之後又想在黨內恢復貴族等級麼？（鼓掌）你們問：為什麼我們開除了託洛茨基和季諾維埃夫底黨籍呢？就是因為我們不允許有貴族存在於我們黨內。因為我們黨的法律只有一個，全體黨員的權利都是一律平等的。（會場上的聲音：“對呵！，，熱烈的鼓掌）如果反對派願意留在黨內，那他們就必須毫無條件地絕對地服從黨的意志，黨的法律，黨的命令。他們如果不願意這樣，那麼就請他們出去，讓他們隨便跑到那裏去。（會場上高叫“對呵！，，鼓掌）新的法律，特別優待反對派的法律，我們是不允許的，我們是不替他們創造的。（鼓掌）

有人問到條件的問題。我們的條件只有一個：反對派必須完完全全在思想上組織上解除武裝。（鼓掌）他們應當在全世界面前公開地誠懇地放棄他們反布爾塞維克的觀點。（鼓掌）他們應當在全世界面前公開地誠懇地承認他們所犯的反黨的錯誤。他們應當把他們的組織完全交給黨，使黨可以徹底的解散牠。（鼓掌）或是照這樣做，或是退出黨。如果他們不肯退出去，就把他們趕出去！（鼓掌）

同志們，反對派的問題就是這樣。

四 總 結

同志們，我的報告是完了。在第十四次大會到第十五次大會這段時期內可以得到怎樣的總結呢？總結如下：

一 不管我們的困難多麼巨大，不管列強各國的資產階級怎樣百般的向我們挑戰，我們終於與周圍的國家竭力保持了和平；

二 不管阻礙如何厲害，不管資產階級的報章如何造謠污蔑，我們終於鞏固了蘇聯工人階級與帝國主義國家、殖民地國家的無產階級之聯合；

三 我們提高了無產階級專政在全世界廣大勞動羣衆中底威信；

四 我們蘇聯共產黨幫助了共產國際和國際底各支部，鞏固牠們在世界各國的影響；

五 我們會用盡我們一國所能做到的力量去發展和加速世界革命運動；

六 我們提高了社會主義的工業，我們促進了社會主義工業發展的驚人的速度，固定了牠在全部國民經濟中的領導作用；

七 我們建立了社會主義工業與農村經濟底聯繫；

八 我們依靠貧農，鞏固了工人階級與中農底聯合；

九 不管國際的敵人怎樣包圍我們，我們終於在我們國內鞏固了無產階級的專政，向世界各國的工人證明：無產階級不僅能夠破壞資本主義，而且也能够建設社會主義；

十 我們鞏固了黨，擁護了列寧主義，澈底地打敗了反對派。這就是一般的總結。

結論是什麼呢？結論只有一個：我們是站在正確的道路上，我們黨的政策是正確的。（鼓掌）

由此可見，我們祇要按着這條道路進行，就一定可以達到全世界社會主義底勝利。（鼓掌）

但這並不是說，在我們的道路上，再不會遇到什麼困難了。困難是要遇到的。但是我們不怕這種困難，因為我們布爾塞維克是在革命的火燄中鍛鍊出來的。困難是一定會遇到的。但我們要像過去那樣的去克服這些困難，因為我們布爾塞維克是從列寧的鐵的政黨中專門鍛鍊出來與這種困難奮鬥的，而不是看見困難就喪氣和涕泣的。

正因為我們是布爾塞維克，所以我們一定是要勝利的。

同志們！勇敢的前進，向着我國共產主義的勝利而前進，向着全世界共產主義的勝利而前進吧！（熱烈的冗長的鼓掌聲。全場起立，唱“國際歌”，。）

結 論

同志們！在許多代表的講話之後，我要講的話已經很少了。關於耶甫陀琴莫夫和姆拉羅夫兩位同志的發言，沒有什麼可講的，因為他們的話實際上是沒有內容的。對於他們只有一句話可說：願上帝寬恕他們的罪惡，因為他們自己也不明白自己在說些什麼呢（笑聲，鼓掌）。我現在所要講的就是關於拉考夫斯基同志的講話，尤其是關於加米涅夫同志的演講，這是所有反對派的講演中最虛偽的一個講演。（會場上的聲音：“對啊，，！”）

一 關於拉考夫斯基同志的演說

甲) 論對外政策 我認為拉考夫斯基同志在這裏提到戰爭和對外政策的問題，是徒勞無功的。大家都知道，拉考夫斯基同志在莫斯科會議上，關於戰爭問題，曾出了一次醜。他在這裏出來講話，是想彌補他的醜事。可是結果却越鬧越醜了。（全場哄笑）所以，我想拉考夫斯基同志最好還是閉口不談對外政策，免得再丟醜。

乙) 論左派與右派 拉考夫斯基同志說，反對派是我們黨內的左派。同志們，這簡直是要笑得死人的。這一種說法，顯然祇是那些政治破產者的自慰罷了。實際上已經證明反對派是我們黨內孟塞維克派，反對派已走到孟塞維克的道路上，反對派在客觀上已經變成了資產階級的工具。這一切都已充分的證明了。反對派怎麼還說得上是左派呢？反對派既已是孟塞維克派，既已在客觀上變成了第三種力量——資產階級份子——底工具，這樣的政派怎樣還會比布爾塞維克更左呢？難道反對派還不很明顯的是蘇聯共產黨內的右派，孟塞維克派

麼？拉考夫斯基同志，很明顯的，完全把右派和左派混淆起來，弄不清楚了。還使大家想起戈果爾的一句話了：“噲，你……你簡直不知道那邊是左，那邊是右！”，。

丙) 反對派的幫助 拉考夫斯基同志說，如果帝國主義要來攻擊我們的時候，反對派一定挺身出來幫助黨。你們看，他們多麼慈悲呵！他們是一個很小的政派，在我們黨內只佔千分之五，可是他們竟那樣慈悲的慷慨的答應，在帝國主義侵犯我們國家的時候幫助我們。反對派的同志們，我們不相信你們的幫助，我們不需要你們的幫助！我們所要求於你們的祇有一點：不要擾亂我們，不要再妨礙我們！其他的一切，我們自己會幹，我們深信這一點。（鼓掌）

丁) 報信號的人 拉考夫斯基同志後來又說，反對派是真心地向我們報告信號，使我們知道我們的國家是處在危險的、困難的、崩潰的境地中。他們自己真是處在崩潰的需人援救的境地中，他們還想做一個報信號的人，還想來拯救我們的黨！他們自己都已經站立不穩了，還想來拯救別人！同志們，這豈非笑話？（全場哄笑）假定有一隻很小的船在海面上快要沉沒下去了，再假定有一隻很大的輪船，強有力地穩固地在冲着大浪前進。你們想，這隻小船能不能救這隻大輪船呢？（笑聲）這不是大笑話麼？我們這批反對派的救世主也正和這隻大海中的小船一樣。他們向我們高叫危險，困難和崩潰，可是他們不知道自己却正在崩潰，自己已經在一點點的沉沒到海底去了。反對派自以為是報信號的人，他們想來領導黨，領導工人階級，領導國家。試問他們有什麼根據呢？反對派是否的事實上證明過他們是能夠領導什麼東西的呢？要他們領導黨，領導無產階級，領導國家，更其是談不上了。難道誰不知道託洛茨基，加米涅夫，齊諾維也夫這班人已經領導了兩年的反對派了麼？難道事實上不是證明，反對派的首領們已把反對派領導到破產的末路了麼？難道誰不知道，反對派在這兩年來祇是節節的失敗麼？這證明什麼呢？這不是證明反對派首領們的無能麼？這不是證明他們的領導祇能領導到失敗而不能領導到勝利麼？反對派的首領們領導這樣小小的一個派別尚且不能夠，試問他們怎麼能夠領導那樣的大事

呢？在小派別的領導中已經破產了的人，誰還能信任他們去領導黨國大事呢？這就是我們的報信號人所不願瞭解的事。

二 關於加米涅夫同志的演說

現在再來講到加米涅夫同志的講話。這是所有反對派在這個講台上所講的話中間一篇最虛偽的騙人的講演。（全場上叫道：“對啊！”，鼓掌）

甲）一首兩面 加米涅夫同志在他的講演中所表現的第一副面目，就是遮蓋痕跡。黨的代表們在這次大會上曾經說到我們黨的成績，我們在建設上的成功，及我們工作的改良等等。同時他們也指出了反對派的孟塞維克的錯誤，指出反對派已墮落到孟塞維克主義，而反對派否認我們國家有順利的建設社會主義的可能，否認蘇聯無產階級專政底存在，否認工人階級與中農聯合政策底得當，散佈“幾密度”的謠言。最後，這些代表們都說，反對派的這種觀點是不配做一個共產黨員的，如果反對派真要留在黨內，就應當放棄這種孟塞維克的觀點。怎麼辦呢？加米涅夫同志沒有別的法子，只好避開這些問題，遮蓋痕跡，偷偷地跑過去。人家問他的問題是關於我們的政綱，我們的政策，及我們的建設種種重要問題。可是他避開了這些問題，好像這些問題於他毫不相認似的。加米涅夫同志的這一種行為能不能稱為一種鄭重的行為呢？當然，是不能够的。反對派的這一種行為怎樣來解釋呢？只有一個解釋：他們想欺騙黨，鬆懈黨的戒備力，企圖再一次的欺騙黨。反對派有兩副面目：一副是假情假義的騙人面目，一副是孟塞維克的反革命的面目。當我們的黨要他們放棄小組織的行動，拋棄分裂政策的時候，他們就擺出他們那副假情假義的騙人的面目來。當他們向非無產階級分子，向反共產黨反蘇維埃政權的人們說話的時候，他們就擺出那副孟塞維克的反革命的面目來。現在，他在向我們說話，所以他就向我們擺出那副假情假義的騙人的面目來，他還想再欺騙一次黨。所以加米涅夫同志竭力遮蓋痕跡，避開那些最重要的爭論問題。我們能不能够再忍受這種兩重人格，兩副面目的行為呢？當然，是一分鐘我們也不能再忍受下去了。

不是這樣，就是那樣：如果反對派認真地願意和黨說話，那末他們就應當拋棄一切假面具；如果他們還想保持他們的兩副面具，那麼他們就只好留在黨外。（會場上叫道：“對啊，，！”）

乙）論布爾塞維克的傳統 加米涅夫肯定地說，在我們黨的傳統中，在布爾塞維克的傳統中，並沒有這樣一條規則，說是一定要黨員放棄那些與我們黨的思想、黨的綱領有點不符合的觀點。這句話對不對的呢？當然是不對的。同志們，這簡直是造謠！我們大家，加米涅夫也在內，曾經把搆斯尼珂夫和搆斯尼珂夫派從黨內開除出去，難道這不是事實麼？我們大家也曾經和加米涅夫一致的把一部分“工人反對派”，從黨內開除出去，難道這也不是事實麼？我們為什麼開除他們呢？就是他們的孟塞維克底觀點與我們黨的觀點不相符合。我們為什麼要開除渦索甫斯基和達斯哥甫斯基呢？為什麼把馬斯洛夫，魯德費舍爾和卡察這班人從共產國際中開除出去呢？就是因為他們底觀點與共產國際的主張，與蘇聯共產黨的主張是不相容的。如果我們的黨認為可以允許反列甯主義的份子存在於我們的組織內，那麼牠也就不能成為列甯的黨了。既然那樣，那麼為什麼不把孟塞維克吸收到我們黨內來呢？那些已墮落到孟塞維克主義，宣傳着反對列甯主義的觀點的份子，怎麼可以留在我們黨內呢？在列甯的黨和這種人之間還有什麼相同的地方呢？加米涅夫侮蔑我們的黨，他離開了我們黨底傳統，離開了布爾塞維克底傳統，認為可以把那些宣傳孟塞維克觀點的份子留在我們黨的隊伍內。正因為加米涅夫和全體反對派用他們的污足在踐踏我們黨底革命的傳統——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們纔堅決的提出了要反對派放棄其反列甯主義之觀點的問題。

丙）反對派的所謂原則性 加米涅夫同志說，他以及其他的反對派很難拋棄他們自己的觀點，因為他們已慣於用布爾塞維克的精神擁護自己底觀點。他們，如果反對派拋棄了自己的觀點，就失了牠底原則性。照他這樣說來，反對派的首領倒是很高尚的遵守原則的人。同志們，事實究竟是不是這樣的呢？反對派的領袖們是不是真正這樣地重視他們底原則他們底觀點和他們底主張呢？

同志們，這有點不像事實。如果拿反對派形成的歷史來看一看，就可以知道他們完全不是這樣的人。（哄笑聲）事實上却巧相反。歷史告訴我們，事實告訴我們，誰都沒有像他們容易會改變他們的原則的，一下子從這個原則跳到那一個原則，誰都沒有像反對派的領袖們那樣容易的改變他們的觀點。現在黨要求他們拋棄自己觀點的時候，爲什麼他們就做不到了呢？

我現在從託洛茨基主義底歷史中舉出幾個例子來講給你們聽。

大家都知道，在一九一二年的時候，曾經在普拉加（是捷克斯拉夫的首都——註）召集了一次布爾塞維克的臨時會議。大家知道，這次會議在我們黨的歷史中是有非常偉大的意義的，因爲他在布爾塞維克和孟塞維克之間劃了一道很清楚的界限，並且把全國的布爾塞維克組織聯合起來組織成了一個統一的布爾塞維克黨。同時大家也知道，在這一九一二年，託洛茨基領導之下的八月聯盟也召集了一次孟塞維克的會議。這個會議曾向布爾塞維克的會議宣戰，並且會號召工人組織去消滅列甯的黨。那時候託洛茨基的八月聯盟會議怎麼樣漫罵布爾塞維克的普拉加會議呢？他們把一切死罪都加到布爾塞維克會議的頭上。他們罵布爾塞維克是暴徒，是教派，是國家政變的組織，還有其他許許多多的呢語。八月聯盟會議那時候在致第二國際底申明書中曾經這樣批評布爾塞維克底普拉加會議：

“八月聯盟會議認爲這種會議（即指布爾塞維克的普拉加會議——斯大林註）是一部分人自覺的想分裂黨及篡奪黨的旗幟底公開的企圖，我們八月聯盟會議對於有些黨的組織和同志實深表惋惜，他們做了這種弱局底犧牲者，而且因此而幫助了列甯教派底分裂政策和篡奪政策。八月聯盟會議深信，國內外的一切黨組織必將起來反對業已發生的國家政變。不承認普拉加會議所選舉出來的中央機關，而且必將用全力召集黨的真正的臨時會議，恢復黨的統一。，（摘自八月聯盟致第二國際的申明書，一九一二年三月二十六號發表於德國的“前進”，報上）

你們看：什麼列甯的教派哩，什麼篡奪哩，什麼國家底政變哩（錢密度）

，簡直什麼說話都有！

怎麼樣呢？經過了幾年之後，託洛茨基便拋棄了他自己的觀點，跑到布爾塞維克方面來了。不僅拋棄了他自己的觀點，而且混到布爾塞維克的黨內來，儼然成了布爾塞維克黨內一個積極的黨員。（聽衆的笑聲）

經過了這些光榮歷史之後，我們還怎麼能夠斷定託洛茨基和託洛茨基主義者不再放棄他們自己的觀點，不再拋棄他們關於我們國家的幾密度傾向以及篡奪等等的主張呢？

此外，還有一個例子。大家知道，託洛茨基在一九二四年年底曾經出版了一本書，書名叫作‘十月革命底教訓’，。在這本書中，託洛茨基把加米涅夫和齊諾維也夫兩人當作了我們黨內半孟塞維克的右派代表。大家也都知道，託洛茨基底這本書曾引起了我們黨內一番大大的爭論。怎麼樣呢？大概經過了一年的光景，託洛茨基又拋棄了他自己的觀點，宣稱齊諾維埃夫和加米涅夫不是我黨內右派的代表，而是我們黨內革命的左派底代表。

從齊諾維埃夫派的歷史中還有一個例子。大家知道，齊諾維埃夫和加米涅夫曾經寫了許多文章和書籍反對託洛茨基主義。在一九二五年的時候，齊諾維埃夫和加米涅夫兩人曾經與全黨一致宣佈託洛茨基主義不能與列甯主義相容。齊諾維埃夫和加米涅夫也曾經在黨的代表大會上和共產國際的第五次大會上，與全黨一致地通過決議，指出託洛茨基主義的小資產階級傾向。怎麼樣呢？還不上一年的功夫，他們兩人就放棄自己的意見，大聲宣稱託洛茨基派是我們黨內真正革命的列甯的派別了。（會場上有人說道：“這是相互的赦罪呵！，，）

同志們，這些事實，簡直不勝枚舉。

從這一切事實中，難道還不很顯而易見地可以看出，加米涅夫在會場上所講的反對派領袖們底高尚的原則性，完全是不合事實的胡說亂道麼？在我們黨內誰都沒有像託洛茨基，齊諾維埃夫，加米涅夫那樣容易的自由的會放棄自己的原則，這難道不是很明顯的事實麼？（笑聲）試問：我們還有什麼根據可以担保會幾次拋棄過自己的原則和觀點的反對派的領袖們不再拋棄他們自己底原

則和觀點呢？我們要求反對派拋棄他們孟塞維克的觀點，並不像加米涅夫所竭力描寫的那麼困難，這也不是很明顯的事麼？（笑聲）他們拋棄他們自己的觀點已不止一次，——爲什麼便不能再拋棄一次呢？（笑聲）

丁)或是黨，或是反對派。加米涅夫肯定地說，不能要求反對派放棄他們那些與黨的主張和政綱不相符合的觀點。我已經說過，如果把反對派過去和現在的歷史看一下，就可知道，這種說法是不正確的。但是我們暫時假定，加米涅夫的話是對的。那麼怎麼辦呢？我們的黨可不可以放棄他的觀點，他的主張和他的原則呢？可不可以要求我們的黨，叫他放棄他的觀點，他的原則呢？黨有他底固定的主張，就是一定要反對派放棄他們底反列甯的觀點，才能够容留他們在黨內。如果不可以要求反對派放棄他們底主張，那麼爲什麼就可以要求黨放棄他對反對派底主張呢？照加米涅夫的說法看來，反對派決不能放棄他們底反列甯的觀點，而黨却應當放棄他對反對派的主張，即反對派不放棄其反列甯的觀點就不能容留在黨內這個主張。這是什麼邏輯呢？（笑聲，鼓掌聲）加米涅夫同志肯定地說，反對派是剛毅的人，他們的主張是要堅持到底的。我不大相信反對派首領們有什麼剛毅的精神和原則上底堅決性。我尤其不大相信齊諾維埃夫和加米涅夫這種人有什麼剛毅的精神。（笑聲）他們昨天還與託洛茨基吵嘴，今天就和託洛茨基接吻了。（會場上有人說道：“他們玩慣猴子的把戲了，）我們姑且假定，他們那些反對派的首領們還有一點剛毅的氣概和原則上的堅定性。那麼，黨的剛毅精神和原則上的堅定性難道就比不上齊諾維埃夫，加米涅夫或託洛茨基這種人麼？難道黨比朝三暮四的反對派首領還更容易地會放棄他對反對派的主張——反對派的觀點不能與黨的思想和綱領相容的這個主張——麼？（笑聲）從這些地方不是很明顯地可以看出加米涅夫要求黨放棄他對反對派及反對派之孟塞維克錯誤所持的主張麼？加米涅夫同志未免太過分了嗎？他是否承認太過分是要發生危險的？現在的問題是這樣：或是留在黨內，或是留在反對派內。或是反對派放棄他們底反列甯的觀點，或是不這樣做——那時候他們在我們黨內一點影子也不會留下的（鼓掌）。

戊) 反對派已脫離了布爾塞維克的傳統 加米涅夫肯定地說，在布爾塞維克的傳統中並沒有這樣一項條文，說是每個黨員必須放棄他們自己底觀點，列可夫同志已充分地證明，這句話是不對的。事實告訴我們，加米涅夫所說的完全是謊話。但現在的問題是：在布爾塞維克的傳統中，會否允許及可否再繼續允許反對派存留在黨內？反對派已形成了小組織，而且把他們的小組織變成了我們布爾塞維克黨內底小政黨。什麼地方聽到過布爾塞維克的傳統可以允許這樣不成體統的事呢？使布爾塞維克的政黨分枝，在黨內形成新的反布爾塞維克的政黨，這怎麼還說得上布爾塞維克的傳統呢？此外，反對派還組織了他們的秘密印刷所，與資產階級的智識份子勾結起來，同時這些資產階級智識份子又與白黨勾結起來。試問：做出這樣不要臉的賣黨賣蘇維埃政權底勾當來，怎麼還配說布爾塞維克的傳統呢？反對派又組織了反黨反蘇聯的示威遊行，到街上去號召非無產階級的份子。號召街坊反對自己的黨和自己的蘇維埃政權，這種人怎麼還配說布爾塞維克的傳統呢？什麼地方聽到過布爾塞維克的傳統會允許過這樣不成體統的公開反革命的行為呢？加米涅夫之所以故意說到布爾塞維克的傳統，就是爲了代表他的反布爾塞維克的小組織來掩飾他們脫離布爾塞維克傳統底行為，這不是很顯而易見的麼？反對派號召街坊的結果什麼也沒有得到，因爲他們的團體太小了。但這不是他們的罪過，而是他們的不幸。但反對派的力量如果再比較大一點怎麼樣呢？他們號召街坊的時候不是很明顯的就會直接造成一種反蘇維埃政權底盲動麼？很明顯的，反對派的這種企圖實際上，不是與社會革命黨的左派在一九一八年的企圖絲毫沒有一點差別麼？照例，對反對派的這種企圖，我們在十一月七號這一天，早就應當把他們全體拘捕起來。（鼓譟）我們之所以沒有這樣做，就是因爲我們還惋惜反對派，我們對他們表示寬洪大量，希望他們再去考慮一番。可是他們却把我們的寬洪大量錯看作我們的懦弱無能。加米涅夫所謂布爾塞維克的傳統，僅僅是一種騙人的空話，其目的無非是想掩飾反對派脫離布爾塞維克傳統的行為而已。同志們，這不是很顯而易見的事麼？

己) 表面上的統一和真正的統一。加米涅夫在這次大會上也講到黨內統一的問題。他簡直老羞成怒，裝腔做勢地要黨出來救助黨內的統一，要黨“不顧一切地，保持黨內的統一。你們看，他們多麼反對兩個政黨的政策，他們多麼主張“不顧一切地，保持黨內統一呵。可是我們大家都知道，正當加米涅夫在這裏大唱其統一底高調時，他的同志們就在他們的秘密會議上通過了一個決議案，說反對派所發表的統一的論調只是用來保持他們的力量和繼續其分裂政策底一種手腕。他們一方面在黨的代表大會上高唱統一的妙曲。另一方面在秘密地進行分裂黨，組織第二黨，破壞黨內的統一的工作。這就是他們所謂“不顧一切地，來保持黨內統一。丟掉這些犯罪的把戲，已經到了時候了吧？

加米涅夫說到了統一。和誰統一呢？和黨統一還是和謝爾巴可夫統一呢？難道還不瞭解他們與黨及與謝爾巴可夫是不能同時保持統一的呢？加米涅夫說是要統一。和誰統一呢？和馬斯洛夫，蘇伐林這種人統一，還是和共產國際，蘇聯共產黨統一呢？難道現在還不明白列甯的觀點是不能與反對派的孟塞維克觀點聯合起來麼？難道現在還不明白列甯是不能與阿勃浪莫維契聯合起來的麼？同志們，這怎麼可以！不要再玩這種把戲了。

因此，我認為加米涅夫的統一論，完全是欺騙黨的裝腔做勢的把戲。

我們所需要的是真正的統一，而並不是這種弄把戲似的統一。在我們黨內有沒有真正的布爾塞維克的統一呢？有的。我們的黨員羣衆既然有百分之九十九投票擁護黨，反對反對派，這就是我們的黨內空前未有的真正無產階級的統一。你們看，在這次代表大會上，反對派的代表一個也沒有。（鼓掌）這難道不是我們布爾塞維克的統一麼？這就叫做布爾塞維克黨的真正的統一。

庚)“反對派——完了，，黨曾經盡可能地想使反對派走上列甯的道路。黨對於反對派會盡量地表示和善態度和寬宏大量，總希望反對派可以好好地反省一下，以糾正他們自己的錯誤。黨曾經勸反對派在全體黨員的面前，公開地誠懇地拋棄他們反列甯主義的觀點。黨曾經勸反對派承認自己的錯誤及指出自己的錯誤，希望他們永遠地脫離這些錯誤。黨也曾經勸反對派在思想上及組織

織上完全解除武裝。

黨爲什麼要這樣做呢？就是爲要肅清反對派，以便好好地進行黨的工作。就是爲了要消滅反對派，以便能專心地進行我們的建設工作。列甯在黨的第十次大會上曾說道：“我們現在不要反對派，反對派現在已經完了，這些反對派對於我們已經够了！，，。黨要使列甯的這個口號在我們黨的隊伍內實現出來。（熱烈的鼓掌）反對派解除武裝則已，如果他們不願意解除，那麼我們自己動手來解除他們。（鼓掌）

三 總 結

從加米涅夫的講演中就可以看出，反對派不願意完完全全地解除他們的武裝。反對派在十二月三號的申明書上也這樣說。看來反對派是祇配留在黨外的了。這有什麼——就讓他們留在黨外好了。他們祇配留在黨外，他們自己要離開黨——這是沒有什麼可怕的，也沒有什麼奇怪的。如果把我們黨的歷史觀察一下，就可明白，無論什麼時候，凡是在我們的黨的轉變關頭，總有一部份舊的首領會從布爾塞維克黨的四輪車中滾出來，讓出位置給新的人才坐上去。同志們，轉變——這是一件很嚴重的事。轉變對於一切不穩固地坐在布爾塞維克黨的四輪車上的人都是很危險的。在轉變關頭不是一切人都能够保持平衡的。車子一轉灣，你們看，便有人跌出車外去了。（鼓掌）

試看一九〇三年，我們黨的第二次大會時期的情形。還是我們的黨，從與自由黨人妥協而轉變爲拚命與自由黨鬥爭的時期，從準備與沙皇政府鬥爭而轉變爲公開與沙皇政府鬥爭的時期。那時我們的黨共有六大首領：普列漢諾夫，薩蘇里契，馬爾托夫，列甯，阿克雪洛德，樸德列梭甫。可是其中五大首領在這個轉變中都發生了危險。他們在轉灣的當兒都從車子上跌出來了。只有列甯一個人留在車子內。（鼓掌）結果，那些老首領，黨的創立人（普列漢諾夫，薩蘇里契，阿克雪洛德），再加上兩位年青的首領（馬爾托夫，樸德列梭甫），都反對列甯一個人。你們要知道，那時候會有多少人長噓短嘆，痛哭流涕地叫

威脅，說黨一定會滅亡，黨一定不能堅持下去，說沒有這些老首領是不成功的。可是，這些長嘯短嘆痛哭流涕的叫聲都沒有用處，祇有赤裸裸的事實還存留在歷史上。事實就是：正因為退出了這五大首領，黨纔能走上了康莊的大道。現在每一個布爾塞維克都已明白，如果列甯當時不與這五大首領堅決地奮鬥，不把他們排擠出去，我們的黨也就不能團結成爲真正能領導無產階級去推翻資產階級的布爾塞維克的政黨。（會場上叫道：“對啊！，，）

再看後一個時期，一九〇七年到一九〇八年的時期。這是我們的黨從與沙皇政權公開鬥爭轉變到秘密鬥爭——利用一切公開的可能，從保險所直到國會爲止——底一個時期。這是一九〇五年失敗之後的一個退守時期。我們那時候在這個轉變關頭必須細心的領略新的鬥爭，以便澄精蓄銳，重新與沙皇政府作公開的革命鬥爭，可是有許多老布爾塞維克在這個轉變關頭却發生了危險。阿克新斯基首先跌出了車外。他有一個時候曾經是一個很好的布爾塞維克。巴克唐諾甫也滾了下來。他曾經是我們黨內一位很重要的首領。跌下車來的還有羅日考甫，他曾經是我們黨的中央委員。此外，還有好些人跌出車外去。那時候的痛哭流涕的號叫聲，並不下於一九〇三年。可是這些號叫和呻吟終於消下去了，而事實却已深深地留在歷史上。事實告訴我們，我們的黨如果不將動搖的阻礙革命的份子清出去，牠也就不能在新的鬥爭環境中掙扎起來。那時候列甯所要達到的是什麼呢？他所要達到的就是：趕快使黨能擺脫那些動搖的喪氣的份子，使這些份子不再糾纏着黨。（鼓掌）

同志們，我們的黨就是這樣生長起來的。

我們的黨是一具活的機體。這個機體也和其他的一切機體一樣，內部的細胞不斷地在變化着：舊的無用的細胞不斷地在死亡下去（鼓掌），新的細胞不斷地在生長和發育起來（鼓掌）。到處有些人走出去了。新的人物到處生長起來，推動我們的事業向前進展。我們的黨過去是這樣生長起來的，將來牠也要這樣生長和發育下去的。

在我們革命的現時期中，也是這樣。我們現在正是在從工業和農業的恢復

時期轉變到整個國民經濟改造時期的轉變關頭上，我們將在新的技術基礎上去改造國民經濟，現在社會主義的建設已經不僅是一種前途，而是一種活的事實了，牠的任務是在消滅內外嚴重的困難。你們知道，這個轉變關頭對於我們那些反對派的首領們確是很難過的，他們被當前的困難嚇得胆戰心驚，他們想把我們的黨拉到投降的道路上去。現在有些首領，不願規規矩矩地坐在車子內，便必然會跌到車子外面去，這是一點也沒有什麼奇怪的。這只能使黨擺脫那些糾纏在脚上阻礙黨前進的份子。看來，他們自己也確實很想從我們布爾塞維克黨的車子中滾出去。如果那些變成了廢物的老首領，想從車子中滾出去，——那麼就痛快地請他們滾出去好了！（熱烈的鼓掌，全場起立）

聯共中央七月擴大會議的總結

一九二八年七月十三日在列寧格勒黨部積極分子會議上的報告

同志們，剛才結束的中央擴大會議，已把各種問題歸併為二部份而完成了他的工作。第一部份的問題，是關於共產國際的根本問題與將要開的第六次大會。第二部份是關於我們蘇聯自己建設的問題，即關於農村經濟方面的——如糧食問題和收集五穀——以及關於以技術人才來保證我們的工業，培養工人階級出身的分子成為技術人才的幹部的問題。

我們先來說第一部份的問題。

一 共產國際的問題

1. 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的根本問題

目前擺在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前面的有些什麼根本問題呢？

如果講到第五次大會和第六次大會間的這個階段，首先便要分析帝國主義者營壘內在這階段中成熟的各種矛盾。這是些什麼矛盾呢？在第五次大會的時候，我們還很少說起英美間的矛盾，是一個根本的矛盾，那時甚而一致地說到英美的聯合。那時常常說的，祇是說英法間的矛盾，日美間的矛盾，戰勝國與戰敗國間的矛盾。那一時期和這一時期的不同，就是現在美國的資本主義和

英國的資本主義之間的矛盾，已成了帝國主義者陣線內種種矛盾中之根本的矛盾了。

譬如煤油問題，對於資本主義經濟的建設以及軍事是很重大的意義的；如銷售商品的市場問題，對於世界資本主義生命及發展上是很嚴重意義的，因為要是這些商品的銷售市場沒有保證，這些商品就找不到出路；例如輸出資本的市場問題，是帝國主義階段的特點；又如到銷售商品的市場或到原料的市場上去的道路問題，——凡此一切的主要問題，都歸結到一個根本問題，歸結到英美間競取世界霸權的鬥爭問題。這個資本主義非常發展的美國，到那裏去找出路呢，到中國去罷，到殖民地去罷，到南美洲去罷，到非洲去罷，總是很困難，到處要碰到極大的阻礙，因為英國早已在這些地方鞏固了他的地位。

自然，這並不是說資本主義陣線內其他的矛盾，如美日、英法、法意、德法等等間的矛盾，都由此消除了。這是說那些許許多多矛盾，都停止在夕陽西下的英國和晨光初昇的美國之間的根本矛盾上。

這個根本矛盾，將產生一個什麼結果呢？毫無疑義的，他的結果，便是戰爭。當兩個巨人衝突時，當他們覺得世界狹窄時，他們訴諸武力，用戰爭來解決世界霸權的爭論問題。

這是第一點，須要注意。

第二個矛盾——便是帝國主義與殖民地間的矛盾。我們在第五次大會上，也已指出了這個矛盾。不過這個矛盾，到現在更加劇烈了。在那時，我們還沒有發覺得這樣洶湧的中國革命運動，還沒有像去年及現在仍佔重要地位的中國數千百萬農羣衆洶湧的潮流。並不僅這一點。在共產國際第五次大會時，還未像現在印度這樣强有力的工人運動及民族解放的鬥爭底活躍。這二件事實，使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問題成爲非常重要的問題。

這個矛盾的發展，將產生一個什麼結果呢？必然發生殖民地的民族戰爭和帝國主義的武裝干涉。這一點，也是應該注意的。

末了，第三個矛盾，便是資本主義的世界和蘇聯之間的矛盾，這個矛盾，

不是減弱，而是加強了。在共產國際第五次大會時，我們雖可以說，在兩個世界之間，蘇維埃的世界與資本主義的世界還可多少維持幾分相當時期的均勢，當然，是不穩定的；可是到現在，我們有充分的根據可以斷言，這個均勢的期限，已到末日了。

這個矛盾的繼續發展，將不能不發生武裝干涉的危險，用不着再說了。

我想第六次大會估計到這一點的。

因此，這一切的矛盾，不得不歸結到個根本的危險——帝國主義的新戰爭和武裝干涉的危險。

所以帝國主義新戰爭的危險和武裝干涉的危險是現在的根本問題。

現時的和平主義與他們的國際聯盟，“和平”的宣傳，“禁止”戰爭，空口說白話的“裁減軍備”，等等，這完全是催眠工人階級的覺悟，使工人脫離與戰爭危險底鬥爭的一種最普遍的方式。

許多人以為帝國主義的和平主義是和平的工具。這是根本不對的。帝國主義的和平主義，是準備戰爭的工具，是用和平二字虛偽的說話來做掩飾他準備戰爭之工具。要是沒有這種和平主義及這樣的工具，國際聯盟，要在現在的條件之下準備戰爭是不可能的。

只有傻子才會這樣的想，要是有了帝國主義的和平主義，戰爭便不會有了。這是完全不對的。恰恰相反，誰要得到真理，就必須反過來說，正因為和平主義及他底國際聯盟的高唱入雲，所以帝國主義的新戰爭及武裝干涉，必然要來的。

這裏最重要的，就在社會民主黨已成為對工人階級宣傳帝國主義的和平主義之主要角色，因此，他是資本主義在工人階級中的主要柱石，幫助資本主義準備新戰爭和武裝干涉。但是要準備新戰爭，僅僅一個和平主義，還不够，即使像社會民主黨那樣以全力擁護和平主義，也無濟於事。要準備新戰爭，還須要有幾個工具來鎮壓帝國主義國家內部的羣衆。如沒有鞏固帝國主義的後防，妄想替帝國主義取得勝利是不可能的。如果沒有把工人羣衆鎮壓下去，那末羣

面後防，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有了法西斯蒂的存在了。

於是資本主義國內勞資間的矛盾，便從此劇烈了。

一方面，爲要順利的準備新戰爭，社會民主黨就在口頭上宣傳和平主義；在別一方面，爲了以後順利的作戰，武裝干涉順利起見，到處採用法西斯蒂的方法，在後方鎮壓工人階級，征服共產黨，——這便是準備新戰爭的途徑。

所以共產國際的任務是這樣：

第一，要從各方面，無論從經濟方面及政治方面，和社會民主主義作不斷的鬥爭，同時，爲了奪取工人階級的大多數，必須揭破各種和平主義的假面具。

第二，爲要豫防戰爭的危險，必須把先進國家的工人和殖民地的勞動羣衆組織成一個統一戰線，要是到戰爭發生時，便須把帝國主義的戰爭轉變爲國內戰爭，撲滅法西斯蒂，推倒資本主義，建立蘇維埃政權，把殖民地從奴役制度中解放出來，組織保護世界上第一個工人共和國的全世界的保障。

第六次大會當前的基本問題及任務，便是這樣。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估計到這些問題及任務，只要你們把第六次大會的議事日程檢閱一下，就不難明白了。

2. 共產國際的綱領

與國際工人運動的主要問題有密切連繫的，便是共產國際的綱領。

共產國際綱領的重要意義，就在於他很科學地構成共產主義運動的種種根本問題，指出解決這些問題的根本途徑，並爲共產國際的一切支部規定明確底目的和方法，沒有這個明確的目的和方法，要使真實的運動向前進步是不可能的。

現在再把共產國際執委會的綱領起草委員會所提出的草案上的要點，約略說一說。至少，大概可以指出七個要點：

(1) 這草案所給的綱領不是爲這一國或那一國的共產黨而作的，是爲一

切的共產黨而作的，凡是關於他們的一般的和根本的都包括進去了。這是他的原則理論的特點。

(2) 從前的綱領，祇是為所謂“文明的，民族而作的。現在這個綱領的草案和從前的不同點，就在它包括全世界的民族，不管白種和黑種，宗主國和殖民地，一律都包括在內。他含有寬廣而深刻的國際性質。

(3) 草案不是取某一國，某一資本主義或世界上某一部份來作出發點，而是取整個資本主義的世界系統來作出發點，並把他和共產主義經濟的世界系統對立起來。這也是他和過去所有的政綱不同之處。

(4) 草案根據世界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平衡，得出這樣的一個結論：在一個國家內，社會主義的勝利是可能的，並且他的前途是形成兩個並列的中心，一個是資本主義世界的中心，一個是社會主義世界的中心，二者為統治全世界而進行鬥爭。

(5) 草案提出先進國與殖民地蘇維埃共和國大聯盟的口號來代替歐羅巴合眾國的口號，這個蘇維埃共和國是由帝國主義經濟系統中已經和正在崩潰而來的。這個蘇維埃聯盟在為世界社會主義的鬥爭中與世界資本主義系統相對抗。

(6) 草案指出必須反對社會民主黨，因為他是資本主義在工人階級中的柱石，是共產主義的主要敵人，並指出在工人階級中其餘的一切派別（無政府主義，無政府工團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等等），實際上都是社會民主主義的變相，都是共產主義的敵人。

(7) 草案提出第一須要鞏固西歐的以及東方的共產黨，這是保證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先決問題，也是無產階級的專政的先決問題。

中央擴大會議批准了共產國際綱領的草案作為基礎，同時，同志們如對草案有部份的修正，得向第六次大會政綱起草委員會提出。

對於共產國際的問題，便是如此。

現在再說一說我們內部的建設問題。

二 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底問題

1. 收買五穀底政策問題

首先讓我作一個小小的歷史更正。今年正月一日我們有怎樣的現象？大概你們從黨內的文件上可以知道，今年的正月一日比起去年來，缺少了一萬二千八百萬蒲特的糧食（或麥子）。

關於這個現象的原因，我將不復詳述，因為這些原因已經在報紙上公佈的黨的文件內解說明白了。對於我們重要的，就是我們缺少了一萬二千八百萬蒲特的糧食，使我們走了兩三個月艱困的羊腸小道。

因此，我們究竟怎樣去選擇我們的方向，我們還是填補我們的損失，規定將來收集糧食的經常的速度呢，或者到了我們整個的國民經濟嚴重的恐慌的必然性前面呢？！

要填補損失，應該採取怎樣的辦法呢？第一，應該對那些企圖飛漲糧食價格及以饑餓來威嚇全國的富農及投機商人，加以打擊。第二，在糧食區域的大宗商品，應該運送出來。最後，我們黨的所有的各機關一致動作起來，在我們收集糧食的工作中，造出一個轉變，驅除實際工作中的自流論。因此，我們迫不得已，採用了非常的手段。我們實行了這種方法以後，直到三月底，我們已收集了二萬七千五百萬蒲特的糧食。我們不僅填補了虧空，我們不僅預先征服了一般的經濟恐慌，我們不僅超過了過去一年收集糧食的速度，並且只要往後幾月內（四月、五月、六月）能保持相當的收集糧食的經常的速度，我們就可以絕無意外的危險，免去那已經醞釀了的恐慌。

但是，在烏克蘭的南部和北高加索的一部份的多耕荒歉的結果，烏克蘭全部及北高加索局部的失掉了糧食供給的作用，對國家糧食的供給，少了兩三千萬蒲特之多。既有這樣的情形，又加以糧食的過渡消費，於是使我們不得不加緊在其餘區域的收集，動用農民積穀，於是狀況不得不惡化。

在正月至三月中間，我們能收集到將近三萬萬蒲特的糧食，處理農民的積

蓄，已經有了辦法，可是從四月到六月，我們却沒有能收集到幾萬萬蒲特的糧食，因此，在青黃不接的條件下，使我們不得不動用農民的積穀。然而糧食始終是要收集的。於是又復演了非常的方法，用行政專橫，挨戶摧促，非法的搜索，破壞革命法律等，使國家的政治狀況惡化，使農民的聯合受了一種威脅。工農的結合，是否因此分裂呢？沒有，還沒有分裂。或者這是不要緊的小事？不是，這並不是小事哩！這是給工人階級與農民的聯合一種威脅。可以說，這是由於我們有些黨的工作人員沒有鐵錘和堅定性，以便切實的毫不誇張的去估量現存的狀況之緣故。

以後，我們有了良好的收成，便局部的取消非常的方法，使得狀況改良與平靜起來。

在解決糧食問題上，我們困難的中心點是什麼？這些困難的根源在那裏？我們現在所有的耕地地面積，差不多已經和戰前一樣（總計僅比戰前少百分之五），這難道不是事實？現在我們所出產的糧食，也已經和戰前差不多（總計，現在一年可以出產五十萬萬蒲特，比戰前僅少二萬萬到三萬萬蒲特），這難道不是事實？可是我們現在所出的商品糧食却比戰前的時候要少兩倍，這究竟是怎樣解說呢？這可以說，是由於我們農村經濟的零亂和散漫的緣故。在戰前，我們大約有一千六百萬農戶，現在我們大約已不下二千四百萬農戶，其間農戶繼續分裂的傾向，還沒有停止。

那末，小農經濟究竟是什麼？他祇有很少的商品經濟，很小的收入，而有比較多的自然經濟，祇有百分之十二或十三作為商品。此外，城市和工業，我們到是整個的發展起來，隨着建設的發展，對於糧食商品的要求的高漲，也就意外的迅速。這就是在解決糧食問題上我們困難的根本所在。

列甯在自己的“論糧食稅”的小冊子上，對於這點，便是這樣估計：

“要是農民經濟能繼續的發展，就必要堅決的保證他往後的轉變。而往後的轉變，必然在於這個獲利很少而很落後的散碎的小農經濟之漸漸統一起來，組成社會化的大規模的農業經濟。一切社會主義者常常是這樣想

的，我們共產黨也正是要這樣的去看。，（“列寧全集，十八卷第一部一八九頁）

這就是說明在解決糧食問題上我們困難的根源在那裏。

打破這個難關的出路又在那裏呢？

第一，我們的出路是要提高小農及中農的經濟，對於他們的生產和收穫，給以一切的幫助。用耕犁去代替他們的手鋤，給他們精良的種子，供給他們以肥料，供給簡便的機器，把單個的農戶組合到合作社的廣大系統中去，和整個的鄉村訂結契約——這就是我們的任務。我們採用還這樣的方法：就是農村經濟合作社與農民訂立合同，其目的在乎供給農民良好的種子，藉以提高糧食收成，使農民可以按時為國家供給麥子；同時國家方面除應付農民的價格以外，並給以額外的獎金以建立國家與農民間鞏固的關係。經驗告訴我們，這個方法是最容易得到效力的。

有些人以為，那種個人經濟自己會消滅的，值不得去幫助的。同志們！這話是不對的。這些人與我們黨的路線完全沒有相同之點。另一方面，有些人這樣想，農民的個人經濟一般的是農村經濟的始終。這也是不對的，更與列寧主義沒有相同之點。

我們不需要個人經濟的任何的咒詛者和頌揚者。我們只需要正確的政策，能最大限度的把這些農民奪過來，同時，逐漸把這些個人的農民經濟轉變為集體的經濟。

第二，我們的出路，是在把散碎的中小農民經濟，逐漸的統一於大規模的集體經濟及合作社，成爲一種完全自願的聯合，共同在新技術的基礎上工作，共同應用拖拉機及其他的農業機器。

集體農莊的優點在那裏？集體農莊的優點，就在於他能利用一切的已有的科學和技術，他最有利最穩固，生產的商品更多而更精良。在集體經濟中可以出產百分之三十到三十五的商品，每一俄畝常常可以收穫二百蒲特以上，這一點我們不應當忘記的。

第三，我們的出路是在於要改良舊的蘇維埃農莊和建設新的大規模的蘇維埃農莊。我們要知道，蘇維埃農莊是最能生產商品的經濟單位。我們現在有些蘇維埃農莊能夠貢獻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商品。

現在的主要任務，就在於要把這三個任務聯成一氣，而向着這三條坦途去加緊工作。現時的特點就是在於要完成第一個任務，僅在提高個人的中小農民經濟，已經是不夠解決整個的任務了；雖然提高個人的中小農民經濟在農村經濟底工作中，還是主要的任務。而是要以兩個新的實際任務來補充第一個任務：提高集體農莊和改善蘇維埃農莊的事業。

除掉這些主要原因以外，還有一些特殊的和臨時的原因，這就是將收集糧食的困難轉變成收集糧食的恐慌。這些原因是什麼？中央全會的決議指出下列幾點：

1. 因為由於鄉村收入的增高（如收成漸多之類），特別是由於殷實農戶及富農的收入增高，引起農民購買力的要求之發展的速度，比工業品的供給要快得多，於是破壞了市場的比重，並加劇了這個破壞。

2. 糧食的價格和其他農村經濟的生產品的價格沒有協調的相互關係，減弱了實現多餘糧食的刺激，同時，在本年的春季，黨又不能夠把這種情形變更過來，使不致破壞鄉村內力量弱小的農民的利益。

3. 主要的，在當時的運送商品及收稅方面，領導計劃的錯誤（鄉村富裕農民的稅收低微），同樣，在糧食消費方面，也有許多不正當的地方。

4. 收集糧食的機關及黨的蘇維埃的組織底缺點（缺乏統一戰線，缺乏積極性，聽其自然）。

5. 破壞革命法律，行政式的專橫，挨戶搜索，地方市場部分的停閉等等。

6. 城市的和鄉村的資產階級的分分子（如投機商人及富農）利用這些缺點，因此，破壞糧食底收集和國內政治狀況惡化。

要是—般性質的原因要經過幾年才能消滅，那末特殊的臨時性質的原因，在現在完全可以消滅，使得預先免去收集糧食的恐慌之復演。

爲要消滅這些特殊的原因，須要些什麼？要消滅這些特殊的原因，必須這樣：

1. 要實際上立刻取消挨戶檢查，非法搜索以及一切破壞革命法律的行動。
2. 立刻取消一切軍事共產時代搜索糧食的故事，消滅停閉商隊的企圖，政府隨機應變的來調劑商業。
3. 相當的提高糧食的價格。按照各區域及穀類種植的情形而加以變更。
4. 在收集糧食的區域內，應有商品之正確的運輸組織。
5. 要有供給糧食的正常組織，不許有過量的消費。
6. 應有國家糧食積蓄的組織。

在目下收成良好的條件之下，正當的有系統的去實行這些方法，形成一個很好的環境，無論如何，要變更收集糧食運動的非常手段。黨的當前的任務，就在注意到這些方法底確切執行。

與我們當前的糧食的困難問題有聯繫的問題，就是工農的聯合問題，工農聯盟的將來運命問題，鞏固這個聯盟的方略問題。

有的說我們現在並沒有什麼聯合，分裂代替了聯合。當然的，這種蠢話，只有那些張皇失措之徒才講的，一旦沒有這個聯合，農民就馬上不信任我們，捨我們而去，改變他對蘇維埃政權的堅固的信仰，他將縮小耕地，無論如何再也不去擴充耕地，他恐怕我們又去挨戶搜索，奪取他的糧食。

然而我們在事實上究竟怎樣呢？我們各區的耕地已擴大起來了。在生產糧食的主要區域，農民已經把耕地從擴大百分之二到百分之十五或二十，這是事實。農民不相信這種非常手段能夠永久，他很有根據去測度糧食價格的一定要提高，這難道不明顯嗎？這怎樣的分裂聯合呢？這自然也不是說，我們的聯合沒有受過什麼威脅。然從此就得出結論，說我們的聯合破裂了，——這完全是一種莫名其妙的無稽之談。¹

有人以爲，爲要鞏固聯合起見，須將重心由重工業轉到輕工業（紡織）方面去，而且認爲紡織是主要‘聯合’，工業。同志們，這是不對的，這完全不對

的。當然，紡織工業在配置社會主義的工業與農民經濟間底商品流通上有很大的意義。但是根據這一點而以爲紡織工業是工農聯合的唯一基礎——是犯了很嚴重的錯誤的。事實上，工業和農民經濟間的聯合，不僅在於爲農民個人所需的棉紗布匹方面，就是在五金工業方面，在種子、肥料及機器方面，也是糧食生產者的農民所必要的。我也並不是說，不發展重工業，那紡織工業也就不能發展和存在。

我們須要聯合，並不是要保存和鞏固階級的永久存在。我們須要聯合，正是要使農民接近工人階級，教育農民而使之變化，改造他底個人主義的心理，在集體主義的精神上鍛鍊他們，因此準備在社會主義社會之基礎上消滅階級。誰不明白或不願意承認這一點，便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不是列寧主義者，而是農民的哲學家，只看後面而不看前面的。

但是怎樣去改造和鍛鍊農民呢？

首先，並主要的，須在新技術的基礎上，在集體勞動的基礎上，去改造他們，才有可能。

列寧對於這點，這樣的地說：

“改良小農及改造他的一切心理和習慣這一件事，是整代的事。要解決這個問題，對於改造小農的心理，只有物質的基礎，技術，在農業中大規模的應用拖拉機和其他機器，大規模的電氣化，才能解決。只有如此，才能根本的非常迅速的去改造了小農。”，（“列寧全集，第十八卷上冊一三九頁）

事情已很明顯了：誰以爲要保證工農聯合，祇有發展紡織工業，而忘記了鋼鐵工業，那他便是永遠保持了階級的存在，他便不是無產階級的革命者，而是農民的哲學家。

列寧在別的地方又說：

“只有在這種情形之下，實際上能指示給農民看、社會的、集體的、合作的，勞動組合的耕種土地，確是能得到優勝的，只有在合作的勞動程

合的經濟幫助之下幫助農民，到那時候，掌握政權的工人階級能實際向農民證明自己的公平，能吸收幾千百萬的農民到自己方面來。，（‘列甯全集，第十六卷三九一至三九二頁）

這就可以知道要如何才能保證實際的堅固的吸引幾千百萬農民羣衆到自己方面來，到社會主義方面來了。

往往有人說，對於保證聯合，我們只有準備向農民讓步的一着。從這點出發，便構成了不斷的讓步理論，以爲只有工人階級不斷的讓步才能加強自己的力量。同志們，這是不對的，完全不對的。這樣的理論，只有破壞一切事業。這是一種毫無希望的理論。

爲要鞏固聯合，必須在自己的命令之下，除了讓步的一着外，還有其他的種種步驟，經濟的柱石（如發展合作社，集體農莊，蘇維埃農莊），別方面更有政治的柱石（如加緊在貧農中的工作，及保證貧農的擁護）。至於中農是一個動搖的階級，要是我們沒有貧農的擁護，要是蘇維埃政權在農村中太薄弱，那末中農便將跑到富農那邊去。反之，要是貧農的擁護有了保證，就可以確信的說，中農一定會跑到蘇維埃政權方面來的。所以在貧農中有系統的工作以及用種子和廉價食品去保障貧農，是我們黨當前的急務。

2. 造就工業建設的專門人材

現在來說一說關於以技術人材新的中堅分子來保證我們的工業問題。

先說我們工業方面的困難，及發現與贛山事件有聯繫的困難。

從改良工業的觀點上看來，煤礦事件的實質是什麼？煤礦事件的實質和意義，是表現我們在工業保證上差不多沒有武器，非常落後，落後到不成樣子，忠實於工人階級事業的專門家還是非常之少。

煤礦事件給我們的教訓，使我們對於教育和訓練從工人階級出身的分子成爲新的技術人材的速度加緊，使能爲社會主義盡力，在技術上領導我們社會主義的工業。

這並不是說把所有那些與蘇維埃的思想不相同的，或不是共產主義者而能與蘇維埃政權合作的專門家，我們一概棄而不用。我們將用全力去向前進行，吸引非黨的專門家，非黨的技師，準備使他們來和蘇維埃政權共同在建設我們工業的路上攜手前進。

我們並不一定要要求他們取消自己的觀點或要求他們立刻變更自己的觀點。我們只要求他們一點，——既然他們自願的贊成與蘇維埃政府合作，那末他們就應誠懇的與蘇維埃政府合作。

然而事實是這樣：那些願意和蘇維埃政府共同進行的專門家實在還很少。要有新的來補充他們，這是絕對的必要。所以黨以為要有新的補充，須要加速度的來養成，不要使我們期待新的又落了空，並且要選出工人階級出身的分子來把他養成。這就是說，養成新的技術人材，能夠滿足我們工業上的需要。

種種事實指示出來，人民教育委員部還沒有能夠盡這個重要的任務。我們沒有理由來設想人民教育委員部各自為各而與生產的連繫很少，同時在他那種保守性和不活動的現象之下能在最近的將來完成這個任務。所以黨的結論，要三個人民委員部（人民教育委員部，國民經濟最高委員會，以及人民交通委員部），分任加速養成新的技術人材之工作。黨認為這條道路是最便利的道路，最能保證完成這重要工作的必要的速度。因此，分出幾個高等工業學校給國民經濟最高委員會及人民交通委員部辦理。這自然不是說，分辦了幾個高等工業專門學校就算能盡了加速養成技術人材的新的中堅分子之任務。毫無疑義的，對於學生物質關係上的保障，自然有重大的作用。

所以蘇維埃政府，決定在培養新的幹部底消費與大建設的比重相平衡，因此決定每年提出四千萬盧布作為培養幹部底補充費用。

三 結 論

同志們！我們往往在我們的困難和錯誤中學會了，這是應該承認的。直到現在，事實總是如此：在困難中，在這個或那個危機中，歷史教訓了我們，並

鍛鍊了我們的黨。

這樣的事實在一九一八年曾有過的，那時因東方戰線上的吃緊和柯却克戰爭的失敗，覺着困難，於是我們明白了，必須要組織常備的步兵，結果，把他組織起來了。這樣的事實，在一九一九年也有過的，那時因我們的軍隊和白黨但尼金激戰於前，被馬孟託夫襲擊於後，受了困難，於是我明白了，必須要組織有力的騎兵，實際上就把他組織起來了，把工人階級的勁敵消滅了。

所以，我以為現在我們差不多又碰到這樣的事實了。糧食問題的困難，對於我們不是徒然的。他們（糧食的困難）督促着布爾塞維克，逼着他去從事發展農村經濟，特別是發展穀類的耕種事業。要是沒有這樣困難，說不定布爾塞維克還不會這樣嚴重的去努力於解決穀類問題呢。

關於煤礦事件及與這件有聯繫的困難，也應該說一說。煤礦事件的教訓，對於我們的黨，也完全不是徒然的。我以為這個教訓，迫着我們去提出這樣的問題：養成那些能為我們社會主義工業服務的新技術人材。你們都已知道，解決這個技術人材的問題，我們已走了很重要的第一步。我們希望這一步不是最後的一步。

（熱烈的繼續的鼓掌）

論國家工業化及蘇聯共產黨內的右傾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九日在聯共中央全體會議上的演說

同志們！今天我所要講的，就是在政治局的提綱中所提出來的三個基本問題。第一個問題，就是關於國家工業化的問題，並要講到工業化的要素就是發展生產工具的生產，並保證這種發展的速度盡可能的迅速。第二個問題，就是關於我們農村經濟發展的速度，農村經濟發展的速度，還遠不及工業發展的速度，因此現時在我們內政中最迫切的問題是農村經濟問題，尤其是五穀問題，就是關於如何在新的技術基礎上來提高並改造農村經濟的問題。最後，第三個問題，這就是關於傾向的問題，關於在兩條戰線上鬥爭的問題，並講到現時主要的危險是右傾。

一 工業化發展的速度問題

我們的提綱的出發點，就是認為：一般工業尤其是生產工具的生產迅速的發展，是國家工業化的基礎，也就是在社會主義發展的基礎上來改造我們全部國民經濟的鑰匙。但是究竟什麼是迅速的發展工業呢？這就是說，多投資本到工業中去。但這非使我們的一切計劃，無論預算內的或預算外的，都緊張起來不可。而且實在也是這樣，最近三年來，在改造時期中，我們的標準數字的特

點就是，牠們是在緊張的表誌之下而規定和實現的。你們如果把我們國家的標準數字和我們的預算案拿來看一看，你們如果和我們黨內的同志——無論是那些在黨的組織內作工的，或是那些領導我們蘇維埃經濟機關，合作社等等建設工作的同志們談談話，那末，你就處處可以看到一種特點，就是我們計劃的緊張性。現在就發生了這樣的一個問題，就是，到底我們的工作需不需要這樣緊張呢？不緊張不行嗎？難道我們不可以在比較“安靜”的環境中用比較緩慢的速度進行工作麼？我們採取的迅速發展工業的主張是否因為政治局和人民委員會委員們的性質浮躁？當然不是的，在政治局和人民委員會中都是些切實而平靜的人。如果祇憑空想，離開內外的實際環境抽象地來講，我們當然可以用比較緩慢的速度進行工作。但是事實上，第一，我們不能離開內外的實際環境，第二，我們如果根據我們週圍的環境看來，我們就不能不承認，正是環境叫我們去迅速的發展我們的工業。

現在讓我們來分析國內國外底條件及使我們採取迅速發展工業底速度底環境。

外部的條件。我們正在技術非常落後的國家內奪得了政權。在少數技術多少新一些的大工業之旁，我們還有千百個工廠和製造廠的技術從近代新發明的觀點上看來，簡直是受不住批評的。同時，在我們的周圍還有許多資本主義國家，他們的工業技術比我們完善得多和發展得多。你們如果把資本主義的國家觀察一下，你們就可看到，他們的技術不僅是在前進，簡直是在向前奔跑，越過了一切舊的工業技術。由此可見，一方面，在我們國內有世界上最先進的政權，蘇維埃政權；另一方面，社會主義和蘇維埃政權的基礎——工業的技術，却非常落後。你們是否以為在這種矛盾之下可以達到社會主義的最終勝利呢？要消滅這個矛盾應當怎樣做呢？這就必須要趕上並超過資本主義發展的國家之先進的技術。我們在建設新的政治制度——蘇維埃制度方面說來已經趕上並超過了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這是很好的。可是這還不夠。要達到社會主義的最終勝利，還必須要在經濟和技術方面趕上並超過這些國家。我們或者是達到了

這個目的，或者是失敗。這不僅從建設社會主義的觀點上看來是對的，而且從我們國家在資本主義的包圍中保持其獨立的觀點上看來也是正確的。我們的國防如果沒有一種充分的工業基礎，國家就沒有保持獨立的可能。在工業中沒有高的技術，也就不能造成這種工業的基礎。這就是我們為什麼要迅速發展工業的緣故。

我們經濟技術之落後，並非是我們憑空想像出來。這種落後是一種悠久的落後，這是由我國歷代歷史的傳統，遺傳給我們的。這種落後，無論從前在革命以前，或後來當革命的時代，早就覺着是件不幸的事了。當大彼得與西方更發達的國家周旋的時候，曾狂熱的建立了工廠製造機來供給軍需及加強國防，這也就是想從落後的圈套中跳出來的一種特殊的企圖。但是，很明顯的，在舊的階級中沒有一個階級，無論封建貴族或資產階級，能夠完成剷除我國落後狀態底任務。而且這些階級不僅不能完成這種任務，他們甚至也不會將這種任務用稍微令人滿意的方式提出來。只有靠着社會主義建設勝利的基礎，才能剷除我國悠久的落後，而且只有建立了自己的專政及掌握着國家的指導權的無產階級，才能剷除這種落後。

如果以為，因為我國的落後並非我們憑空想像的，而是歷代的歷史遺傳給我們的，因此我們就不能而且也不應該去管牠，這樣的來安慰自己是再愚蠢不過的了。同志們，這是不對的。我們既已取得了政權，而且自己負擔起在社會主義基礎上去改造國家的使命，我們對一切無論好的壞的，就必須並且應該負責。正因為我們對一切都要負責，所以我們就應該剷除經濟技術上的落後。假使我們在事實上要想趕上和超過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我們就必須去作這件事情。而且這件事情除了多數黨人而外是誰也不能作的。所以要使這種任務在生活中實現，我們就應該有系統的迅速的發展我們的工業。至於我們現在已經迅速的發展着工業，這是大家都看見的。

在經濟技術上趕上及超過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問題，對於我們多數黨人並不是什麼新的或意料之外的問題。這問題還是一九一七年在十月革命以前的

時候就提出來了。在一九一七年九月，十月革命的前夜，帝國主義大戰的時候，列甯在自己的小冊子——“可怕的災害及怎樣與它鬥爭”，中已把這個問題提出來了。

這就是列甯關於這個問題所說的話：

“革命在幾月中使我們的政治制度趕上了先進的國家。但是，這還不够。戰爭是極頑強的，它很嚴厲地提出了這樣的問題：或者是滅亡，或者是同樣的在經濟上也趕過他們。滅亡，或者開足馬力向前進展。這是歷史提出來的問題。，，

（“列甯全集”，一四卷下冊二一三頁）

列甯同志會這樣堅決地提出了剷除我們經濟技術落後的問題。

這一些都是列甯同志在十月革命前夜，無產階級尚未奪得政權的時候所寫的。當時多數黨人還沒有政權，沒有社會主義化的工業，沒有很普遍的包羅了千百萬農民的合作社，沒有集體農莊及蘇維埃農莊。現在當我們已有了一些能够在根本上剷除經濟技術落後東西的時候，我們可以將列甯的話大約這樣改變一下：“我們在政治方面趕上了並超過了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但是這還不够。我們應該利用無產階級專政，社會主義化的工業、交通、信用借貸制度、合作社、集體農莊及蘇維埃農莊等等，使我們能够在經濟方面同樣的趕上及超過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

假使我們有如德國那樣發展的工業，那樣發達的技術；假使我們工業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比重能像他在德國那樣的高，則工業發展的速度問題，對我們也就沒有現在這樣迫切了。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也就可以用稍緩的速度來發展工業了，不怕落在資本主義國家的後面，而且知道我們一下子就馬上可以趕過他們。可是那時候我們經濟技術的落後也就不會像現在這樣利害了。但是我們在事實上在這方面確是落在德國的後面，在經濟技術發展方面與他相差得還很遠。

★注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

如果我們不是唯一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而是無產階級專政國家之一，如果無產階級專政不僅實現於我國，並且實現於其他更先進的國家，譬如德國與法國，那末，工業發展的速度問題便不會這樣嚴重了。在這種條件之下，資本主義之包圍，對於我們亦不會像目下這樣嚴重地危險了，我國經濟獨立的問題，自然要成為次要的了，我們可以包括在更先進的無產階級國家的系統裏，我們以原料和食品去供給這些國家，而可以從這些國家裏得着機器來振興我們工業與農村經濟。所以，我們也就可以把發展我們工業的速度稍微緩慢一些。但是你們都很明白，我們還沒有這種條件，我們還是在資本主義國家包圍中的一個唯一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而其中許多國家，在技術上與經濟方面比我們要先進得多。

因此，列甯同志認為在經濟上要趕上和超過先進國家的問題，是我們發展中的生死問題。

這就是迫着我們以很快的速度去發展我們工業的外部條件。

內部條件。但是除了國外條件，還有國內條件要我們以很快的速度去發展工業（這是我們整個國民經濟底主腦）。這種國內條件就是指我們的農業，技術及文化之非常落後而言的。散漫零碎的小商品生產者及其落後的生產目下在我國還佔大多數，我們的社會主義大工業和這些小生產比較起來，實是大海中的一個小島，這個小島的基礎雖然每日都在擴大，然而他還是大海中的一個島嶼。我們平常都說工業是整個國民經濟（自然農村經濟也在內）底主腦，工業是一個鑰匙，在這個鑰匙的幫助之下，才能在集體化的基礎上來改造落後的星散的農業。這完全是正確的。這一點我們絕不應當放過一分鐘。可是要記着，如果工業是主腦，那末，農村經濟便是工業發展之基礎，農村經濟是銷售工業品的市場，是原料與食物的供給者，是出口貨之來源，我們必需有些出口貨以便能輸入機械供改造國民經濟之需要。如果農村經濟仍在技術完全落後的狀態中，不以農村經濟的基礎保障工業，不改造農村經濟，並且也不使他去接近工業，可不可以推動工業前進呢？決不能夠的。因此我們的任務就是盡量以必要

的生產資料與工具去保證農村經濟，以便在新的技術基礎上加速及推進農村經濟改造的事業。但是爲使這個任務得以實現，就必需使我們工業發展的速度加快。改造零碎的散漫的農村經濟，當然比改造統一的集中的社會主義工業更困難些。但是，這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任務，我們應當去解決他。但解決這個任務祇有在加緊工業發展的速度基礎之上才有可能。蘇維埃政權和社會主義的建設是不能過於長期的依靠在兩個不同的基礎上，一方依靠大的統一的社會主義工業，一方依靠着星散的落後的小商品生產之農業經濟。我們應當漸漸地而且系統地很堅決地把農村經濟推進到新技術的基礎和大生產的基礎上去，引導他接近社會主義的工業。如果我們能夠解決這個任務，那末最後的勝利便有了保障，如果我們退縮而不能解決這個任務，那末資本主義之恢復就將成爲不可避免的現象。

列甯關於這個問題，曾說：

“我們生存在小農國家中，俄國資本主義比共產主義有更堅固的經濟基礎。這是必須記牢的。每個注意觀察鄉村生活而與城市生活相比較的人都知道，我們還沒有掘出資本主義的根蒂，也還沒有剷除內部的敵人的基礎，國內的敵人牢守着小經濟，要剷除他只有一種方法，就是把國家底經濟，農業也在內，過渡到新的技術基礎上，移到現代大生產的基礎上去。只有電氣化是這種基礎。共產主義就是蘇維埃政權加上全國的電氣化。”（第十七卷第四二七至四二八頁）

你們可以看到，列甯所說的國家電氣化，不是孤獨的建立電站，而是漸漸的“把國家經濟，農業也在其內★，轉變到新的技術基礎上，過渡到現代大生產的基礎上去”，這種大生產，是這樣或那樣，直接或間接，和電氣化事業相連繫着的。

這是列甯在新經濟政策將要實行以前，在一九二〇年十二月第八次蘇維埃大會上的演說詞，那時他確定了所謂電氣化的計劃，即戰國國家電氣化計劃。

★注重點是我加的——新大林。

有幾位同志就根據這一點，說列甯在這一節中所說的話，已不合於現在實際情形了。那末有人要問，爲什麼呢？說是因爲從那時候到現在，情形已變動許多了。從那時候起，情形變動了許多，這自然是對的。我們現在有發達的社會主義工業，集體農莊已成了普遍的現象，我們有許多發展的合作社組織，我們有借貸所來供給農民經濟，我們現在採用契約方法，作爲與農民聯合的新形式，我們可以採用這些方法和許多別的方法，來逐漸把鄉村經濟束縛到新的技術基礎上去。所有這些都是對的。但另一方面也是對的，就是說，雖然有這一切，可是我們還是一個小農國家，一個小生產佔着優勢的國家。而這一點却是主要的。只要這個主要點還存在着，那末列甯的提綱中所說的“我們生存在小農國家中，在俄國資本主義比共產主義有更堅固的經濟基礎，”這段話，就還是有效力的，因此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也並非空話。

在新經濟政策已實行以後（一九二一年四月至五月間）列甯曾在他的“小冊子”“論糧食”，中也說過同樣的話，並且更加嚴格了：

“假使經過十年或二十年電氣化，小農民的個人主義及其在地方商品流通中的自由貿易就一點也不可怕。假使沒有電氣化，那末就無論如何都必不可避免的將恢復到資本主義去。”，又說：

“同農民保持十年或二十年的正確關係，那足以保證世界範圍內的勝利（即使西歐無產階級革命延遲下去，——而這些革命正在升漲着），反之，將有二十年或四十年白黨白色恐怖的痛苦。”，（“列甯文存，第四卷三七四頁，）

列甯就這樣嚴格的提出了這問題：或者是電氣化，就是“把國家經濟，農業亦在其內，轉到新技術基礎上，轉到現代大生產基礎上去，，或者是恢復到資本主義。

這就是列甯關於“和農民保持正確關係，問題的見解。和他們保持正確的關係，並不在於向農民獻媚。因爲獻媚是收不到大效果的。事情是在乎幫助農民，把農民經濟“轉到新的技術基礎上去，轉到現代大生產基礎上去，，因爲

這是農民從貧窮中解脫出來的根本道路。

可是，若不用很快的速度發展工業。尤其是生產工具生產，想要把國家經濟轉到新的技術基礎上去，是不可能的。

這就是迫使我們加快工業發展速度的國內條件。

這就是引起我國國民經濟的標準數字之緊張性底內外條件。

就是因為這個原故，我們的經濟計劃，預算內和預算外的都在內，才那樣緊張，才規定大大的向基本的建設中投資，以保障工業能迅速的發展。

有人將要問：在提綱內什麼地方談到這點呢？在提綱內那個地方呢？（台下喊道：“對呀，在什麼地方有這樣的話？”，）提綱中規定的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年向工業中投資的數目就可以表明這一點。我們的提綱叫做標準數字的提綱，是不是呢，同志們？（台下：是的！）

好了，在這個提綱內說，在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年裏我們要投十六萬萬五千萬盧布到工業中去。換句話說，我們在這一年中投到工業內的資本比去年要多三萬萬三千萬盧布。因此，可以得出結論說，我們不僅保持了工業發展固有的速度，並且向前進了一步，投在工業的資本比去年多了，這就是工業中的基本工作絕對的相對的都增加了。關於國民經濟標準數字的提綱之中心點就在這裏。然而有幾個同志，只是吹毛求疵的指摘和批評這提綱的小節，而重要的却未看見。

二 五 穀 問 題

我在上面所講的，都是關於提綱上的第一個根本問題，即工業發展的速度問題。現在就要講到第二個根本問題，即五穀問題了。提綱的特點就在於它注重了發展一般的農村經濟，特別是發展五穀經濟的問題。提綱上的這個立場是否正確呢？依我想來是正確的。在七月全體會議上面，我們就已講到在我們國民經濟之中最困難的地方，就是一般的農村經濟特別是五穀經濟的非常落後。當有些人講到農村經濟比工業落後的時候，而對於這種情形就悲嘆起來，這自

然是不鄭重的。農村經濟總是要比工業落後，而且將來還要比工業落後。這一點，在我們的工業已十分集中而農村經濟却十分散漫的條件下，更是正確。誰也懂得，統一的工業是要比散漫的農村經濟，發展得快。從這裏也就發生了工業對於農村經濟的領導作用。因此，農村經濟比工業普通的落後，還不是提出五穀問題的理由。只有在農村經濟比工業之平常的落後變為農村經濟發展的過度落後的時候，農村經濟的問題，特別是五穀問題，纔在舞台上出現。現在國民經濟狀況之特點，就在於目前蒸蒸日上城市和工業區域，對糧食商品的需要日益增加了。我們農村經濟發展的速度比工業發展的速度過度的落後，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的任務，並不是把工業發展的速度，減低到五穀經濟發展的速度之水平線（這便要貶低是非且會使發展向後退），而是使五穀經濟趕上工業發展的速度，並且把五穀經濟發展的速度提高到保證國民經濟，工業與農業迅速向前發展之水平線。我們若倘解決了這個任務，那末五穀問題也就因此而解決，我們不解決這個任務，那末社會主義的城市與小農的鄉村中間就不免要發生破裂。同志們，我們的問題，就是這樣，五穀問題的實質便是如此。

這是否說現時五穀經濟的發展是停頓了或者甚至退化了呢？伏龍肯同志在他的第二封信中正是這樣提出這個問題來。這封信，我們根據他的要求今天發給中央委員會及監察委員會了。他在信中直接說道，我們農村經濟中有了“停滯”，他說：“我們不能而且不應把關於退化的事，發表在報紙上，但是在黨內我們不應掩飾，這種落後，就是等於退化，”。伏龍肯同志的這種論斷是否正確呢？自然，是不正確的。我們政治局的委員完全不能同意於這種論斷。而政治局的提綱，也根本不是這樣來觀察五穀經濟的問題的。

事實上，什麼是退化，而且退化在農村經濟中該應表現於什麼地方呢？很明顯的，退化應表現於農村經濟之後退和下降，應表現於從新的經濟形式而退化到中世紀的舊經濟形式。退化應表顯於農民耕田之改變中，例如從三田制過渡到移耕制的經濟，從犁和機器過渡到鋤頭，從純潔一色的種子過渡到不純潔不一色的種子，從現代農業的生產品，過渡到下等的農業生產品，諸如此類皆

是。但是，我們現在難道看見了這類的事實嗎？難道大家不知道幾千幾萬的農戶每年由三田制過渡到四田制以至多田制，從不純潔的種子過渡到用純潔的種子，從鋤頭過渡到犁和機器，從下等的農業生產過渡到高等的農業生產麼？這怎樣會是退化呢？

伏龍青同志，總愛拿政治局這個或那個委員的話來做自己觀點的基礎。所以這次他也竭力想把布哈林同志，拖到自己一方面來，為的證明布哈林同志在他“經濟學家”的論文中，“也是這樣說的”，。但是布哈林同志並非“也是這樣說的”，，布哈林同志在他的論文中，提出了關於退化的可能或者是關於退化的危險之抽象的理論的問題。抽象的說來，這種問題的提法，完全是可能而且合法的。但伏龍青同志做的是什麼呢？他把關於退化的可能之抽象的問題，變為農村經濟退化的事實了。這就是他所謂關於五穀經濟現狀的分析！同志們，這豈不是好笑的事嗎？

要是蘇維埃政權在他存在的第十一年使農村經濟趨於退化，那還得了！那對這種政權簡直不應客氣要推倒他，而不是幫助他。而且這個政權如果真正是使農村經濟趨於退化，那末工人們就早已把他推翻了。所有資產階級的專門家都在向我們高唱退化論調，這些專門家睡在夢裏夢着農村經濟退化了。託洛茨基曾有個時候也在向我們高唱過退化。我們不料伏龍青同志也走入了這一條迷途！

伏龍青同志根據什麼來確定自己的退化論呢？首先就是今年播種五穀的面積比去年少些。這事實的原因何在呢？是不是蘇維埃政府的政策呢？自然不是的。這個事實發生的原因，是為烏克蘭與北高加索一部分的荒原區域經冬禾苗的枯死，與今年夏天在烏克蘭同一地方又遭受旱災的原故。假如沒有這樣的不利的氣候條件（而鄉村經濟又完全是依賴這些條件的），那我們今年播種五穀的面積至少要比去年多一百萬俄畝。伏龍青同志的論點，其次就根據：我們今年五穀產品的總數比去年多得有限（比去年多七千萬普特），而小麥與黑麥却比去年少過兩萬萬普特。這些事實的原因何在呢？這也是因為旱災和禾苗因大

籍而枯死的原故。假如沒有這些不利的氣候條件，那我們今年的糧食生產總量就會比去年多三萬萬普特呢？請問，這些事實——大霜旱災等，這些對於這區或那區的收成的極大關係的事實，我們如何可以忽略過去呢？我們現在已規定了這樣的任務——擴張百分之七的耕地，收成提高百分之三，五穀生產量增加百分之十。無疑義的，我們將用一切方法完成此任務。然而，無論我們如何採用方法，還是不能保證不再遭受部分的荒收與這一區或那一區的旱災或霜災；在這種不幸的條件之下，五穀生產總量也許難免較我們的計劃要相當的減低，也許甚至於比今年的收成還少。這種情形能不能說是鄉村經濟在“退化”，這種“退化”，能不能歸咎於蘇維埃的政策呢，能不能說我們“遲慢了，農民經濟上的興奮呢，能不能說我們“破壞了，農民經濟的前途呢？

幾年以前，託洛茨基曾經也犯了這樣的錯誤，他以為“下雨，對於農村經濟是無關係的，李可夫同志曾經在中央委員大多數的幫助之下，駁覆了他。現在伏龍肯同志也犯了同樣的錯誤，他把與農村經濟極有關係的氣候條件放開不，而大賣氣力的來歸咎於我黨的政策。

提高一般農村經濟特別是五穀經濟發展的速度，需要一些什麼路線與方法呢？這種方法有下面的三個：1.提高收成及擴大貧農中農個人經濟的耕地；2.繼續發展集體農莊；3.擴大舊的蘇維埃農莊與發展新的蘇維埃農莊。關於這點在七月全體會議的決議中已經說過了。提綱又把七月會議的議案重復一次，而把問題却更提得具體些了。同時並指出了為着發展這部工作所應投資的數目。伏龍肯同志這裏又找到攻擊的口實了。他以為如果把個人經濟放在第一位，把集體農莊與蘇維埃農莊放在第二位與第三位，這恰好就是說他的觀點得到勝利了。同志們，這簡直是笑話。自然，如果從各種農村經濟的比重看來，那自然要把個人經濟放在第一位，因為個人經濟出產的糧食比集體農莊與蘇維埃農莊的要多六倍。但是，如果從經濟形式的觀點出發，如果從那一種經濟最接近我們的觀點上看來，那末就應當把集體農莊與蘇維埃農莊放在第一位了，因為這種經濟與個人農莊比較起來，他是一種更高的經濟形式。這兩個觀點我們都採

用，難道還要證明嗎？

爲使我們底工作可以從這三條道路進行，以達到農村經濟特別是五穀經濟的發展速度實際的提高，須要怎樣辦呢？

爲要達到這一點，首先，就要使我們黨的幹部人才注意農村經濟方面的工作，把注意力集中在五穀問題上的具體問題上面。最後我們必需把關於一般農村經濟的空話和無稽之談丟開，應按照各區域的特殊條件製出提高五穀經濟的具體辦法。現在已經是從口頭轉到實際行動的時候了。我們應當研究下面具體的問題：怎樣去提高收成與擴大貧農中的個人經濟的耕地；怎樣繼續改善與發展集體農莊與蘇維埃農莊；怎樣使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幫助農民以好的種子與好的畜種；怎樣經過借貸所而給農民以機器與其他工具的幫助；怎樣擴大與改善訂合同的事業與一般農村經濟合作社的工作等等（喊聲——“這是實際主義，）。這種實際主義我們絕對需要，因爲沒有它，我們就只好空講一般的農村經濟而不能解決五穀問題這種嚴重的事情。中央決定叫主要糧食區域的重要工作人員在蘇維埃人民委員會及政治局報告農村經濟發展的問題。在這次全體會上你們可以聽到安得利夫同志關於解決北高加索五穀問題方法的報告。我想以後我們要依次叫烏克蘭，中部黑土區域，瓦爾加流域，西伯利亞等區作同樣的報告。爲轉移我們黨的注意力到五穀問題方面上去，及遷徙我們黨的中堅份子到具體的提出與五穀問題相關的問題的軌道上去起見，這是絕對必要的。

第二，必須使我們黨在農村的工作人員，在他們的實際工作中，嚴格地把中農和富農分別清楚，不把他們混在一塊，當打擊富農的時候，不要連累了中農。末了，我老實說，現在已是消滅這些錯誤的時候了。例如拿個別稅的問題來說吧。按照政治局的決議及關於該項稅則的法律，個別稅不得超過全體農戶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三，即是指富農中最富裕的一部分。但是實際上是怎樣呢？有許多區域這種稅達到了百分之十，十二，甚至更多的農戶，因此連累到中農了。肅清這些罪孽的時期不是已經到了嗎！我們親愛的“批評家，不來指出消滅這些及這一類的不成體統的方法，而偏要尋章摘句，提議把“富農中最富裕

的一部分，這句話改作“富農中最有力量的一部分”，或“富農中最上層的一部分”，好像這些字句是不相同的樣子！已經證明了我國的富農大約有百分之五，已證明了在個別稅的法律中只規定課農戶中百分之二至三，就是富農中最富的部分的這種稅。而且已經證明有許多區域在實際上是破壞了這項法律。那班“批評家，並不指出消滅這些現象的具體辦法，而只尋章摘句的批評，不願意了解這完全是無濟於事的。真是博學之士呵。

（喊聲：‘他們提議對全體富農徵收個別稅。’）

呵！那末就應該要求取消關於百分之二至三個別稅的法律了。不過我倒從來沒有聽見誰要求取消個別稅的法律。有些人說隨意擴大個別稅，其目的是在填補地方預算案。但是不應該用破壞法律，破壞黨的指令的方法，來填補地方的預算案。我們黨存在着，他還沒消滅。蘇維埃政權存在着，他也還沒有消滅。假使地方預算案的費用有不够的時候，應該提出地方預算案的問題；不應該破壞法律，不應該取消黨的指令。

以後，必須繼續發展對貧農和中農的個人經濟底激勵作用。提高糧食的價格，切實執行革命法律，用簽訂合同的手續實際地幫助貧農中農的經濟等等，毫無意義的更大大的加緊了對農民經濟的激勵作用。伏龍肯同志以為我們已完全消滅了或差不多消滅了這種激勵作用，剝奪了農民經濟的前途。當然這是無稽之談。如果真是這樣的，那末我就不懂得，工人階級和基本的農民羣衆的聯合，怎樣能保持得住呢？不能以為這種聯合是精神上的聯合。當然明白，工人階級和農民的聯合是打算盤的聯合，是兩個階級利益的聯合，工人階級和農民的基本羣衆之階級聯合，目的是在雙方相互有利。很明白的，假使我們毀滅了或者差不多毀滅了這種農民經濟的激勵作用，剝奪了農民經濟的前途，那末我們就沒有聯合，就沒有工人階級和農民的聯盟了。很明顯的，現在的問題並不在“建立，或破壞對貧農中農經濟的激勵作用，而是在於加緊這個激勵作用，並繼續發展他以達到工人階級和基本農民羣衆的相互利益，在關於國民經濟標準數字的提綱中所說的正是這個問題。

最後，必須增加對鄉村的商品供給，不僅消費的商品，而特別是含有生產性質的商品（如機器肥料等），這種商品能够提高農村經濟的生產品之生產。我們還不能說，在這方面一切的事情，都是很順利的。你們都知道，商品飢荒的現象並沒有消除，大概消除他也不是馬上就可辦到的。我們黨有些人有這樣的幻想，以為我們馬上可以消除商品的飢荒。這種幻想，可惜是不對的。要知道，商品飢荒的現象，第一是與工農的狀況一天一天的改善，商品的購買力大量的發展有關係的。因之生產品雖然逐年增加，但還不能滿足全部的需要；第二，商品缺乏的現象，是與目前工業改造的時期有聯繫的。工業的改造，就是把資本從消費品的生產移轉到生產工具的生產之過程。不這樣，就不會並且不能大規模的改造工業，特別是在我們蘇聯的條件之下。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投資到新企業的建築上面去，城市的數量和新的消費者增加起來，但新的企業也要經過三四年後才能够供出大批新的商品。很容易明瞭，這種情形是不能幫助我們消除商品飢荒的。但這是不是說，在商品飢荒現象的前面我們只好束手無策承認自己無能為力呢？不是，當然不是這樣說。事情是在於我們能够而且應當採取具體方法，來減弱和消滅商品飢荒，這些我們是可以做到的，而且我們現在就應當做。因此，我們先要注意到加強那些和農村經濟的生產的發展有直接關係的工業部門（如斯大林城的拖拉機工廠，羅斯多福的農村機器製造廠，瓦羅業世城的犁機工廠等）。為達到此目的起見，尤須盡可能的加強那種與缺乏商品有連帶關係的工業部門（布廠，玻璃廠，鐵釘廠……等）。

古巴克同志說，按國民經濟的標準數字，給個人農民經濟的款項今年比較去年少。我認為這是不正確的。很明顯的，古巴克同志沒有計算到簽訂合同上我們今年用訂合同的手續供給了差不多三萬萬盧布的借貸（比去年幾乎多了一萬萬盧布）。如果計算到這一點（這是不能不計算到的），那就可以知道，我們今年用作發展個人農民經濟的比去年增加了。至於說到舊的和新的蘇維埃農莊和集體農莊，今年投在其中的款項大約有一萬萬八千萬盧布（較去年多了七千五百萬盧布）。

要特別注意到集體農莊，蘇維埃農莊和訂立合同的方法。而且不能把這類東西僅僅視為增加我們食品來源底方法。他們同時還是工人階級和基本的農民羣衆聯合的新形式。關於訂合同的方法講得很多了，我用不着多說了。每個人都知道，大批訂立合同的方法，容易使個人的農民經濟力量聯合起來，並在政府和農民的互相關係中間造成固定的現象，並藉之而鞏固城市和鄉村中間的聯合。我希望你們注意到集體農莊，特別是蘇維埃農莊，因為他們使在新技術的基礎上改造農村經濟的事業更容易，並且能使農民的頭腦起一番革命，幫助他們從舊的頭腦的習慣中解放出來。大的農村經濟的機器和成排的拖拉機隊在生產糧食的區域中發現了，這對於周圍農民底經濟是不會沒有影響的。我們以種子、機器、拖拉機幫助鄉下的農民，必然會使農民估計到及感覺到工人政府力量的強大，並且工人政府是在盡量的使他們走上大大的提高農村經濟的康莊大道。這一點我們過去沒有顧計到，即現在我們也沒有充分的顧計到。我認爲這是目前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能在解決五糧問題和鞏固聯合的新形式中所盡的和能盡的最主要的作用。

這就是我們在解決五糧問題的工作中所應採取的道路和方面。

三 論反對傾向及調和派的鬥爭

現在要講到我們提綱上的第三個基本問題，即關於各種階級列寧主義路線的傾向的問題。

各種傾向之社會基礎，就是在我們國家內小生產佔優勢，從小生產中產生出資本主義成份來，小資產階級的勢力圍繞着我們的黨。最後，黨的某幾部分受了這種勢力的黨染。這就是各種傾向的主要社會基礎。這些傾向，都帶有小資產階級的性質。

此地主要的要說右傾，但這右傾要歸向到那裏去呢？牠向那方面牽引？牠牽引着去迎合資產階級的思想，要把我們的政策拉到適合‘蘇維埃’的資產階級的口味與要求的路線上面去。

假使右派在我們黨內得到勝利，對於我們將有怎樣的危險呢？這將是我黨的思想破產，將是資本主義份子的被解放，將增多資本主義復辟之時，或如列甯所說的“回復到資本主義”。

右傾的傾向，主要的是潛居在那兒呢？潛居在我們國家機關，經濟機關，合作社的與職工會的機關，甚至黨的機關，特別是在他的下級農村機關內。

我們黨內，有無表現右傾的黨員呢？不消說，是有的。李可夫同志曾引夏杜諾夫斯基同志為例，因他曾表示反對得聶普爾電站的建築。毫無疑義的，夏杜諾夫斯基同志犯了右傾，公開的機會主義傾向。但是，我想夏杜諾夫斯基同志，還不能做評判右傾及右傾的面目的標本。我想在這件事上的錦標應歸之伏龍肯同志。我所說的就是關於他第一封信（一九二八年六月）及他最近的第二封信，這封信已分送給中央委員及中央監察委員了（一九二八年十一月）。

我們現在來分析這兩封信。先分析第一封信的“根本意見”。

1. “鄉村內除了極少數的一部分貧農外，大部分的農民，都反對我們”，。真是這樣麼？很明顯的，這是不對的。假使真是這樣，那我們的聯合早已沒有了。然而自六月（該信寫於六月）以來，快要半年了，只要不是瞎子，總可以看到工人階級與農民的基本羣衆的聯合，仍然存在著與鞏固着。但是伏龍肯同志究竟爲什麼要寫這樣不符事實的信呢？爲的恐嚇黨，好使黨向右派讓步。

2. “最近所採用的方針，引導中農基本羣衆走到沒有希望及絕路的地步”，。果是這樣麼？完全不對的。很明顯的，假使我們今年春季，真把基本中農羣衆的經濟發展的希望及前途斷絕了，那末在主要的糧食區域內的中農就絕不會擴充春耕的土地了。我們的春耕是在四五月之間。而伏龍肯同志的信是在六月寫的。這正與事實相反。在蘇聯國內，誰是糧食的主要收買者？國家及和他有關係的合作社。很明顯的，假使中農羣衆苦於經濟沒有發展的希望，假使他們處在與蘇維埃國家“分離”的地位，那麼他絕不會爲了糧食的主要收買者的利益，而擴充他們的耕地了。伏龍肯同志所說的話，完全不符事實。他想以沒有發展前途的“危險”，來恐嚇黨，以便黨向伏龍肯同志及其觀點讓步。

3. “要回到第十四次及第十五次大會去，，這裏與第十五次大會毫不相干是無疑義的。這裏的要點並不在於第十五次大會而是在於回到第十四次大會的口號。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要拒絕“向富農加緊進攻，，（參看第十五次大會的決議）。我這樣說並不是詆譭第十四次大會。完全沒有這樣的意思。我所以這樣說，是因為伏龍青同志否認黨由第十四次大會到第十五次大會是進了一步，他號召同志們到第十四次大會去，否認黨前進了一步是把黨拉向後退。中央七月會議對於這個問題，已有評判。這次會議在他的決議案上直接的說，人們想逃避第十五次大會關於“更發展向富農進攻，，的決議案——這是“我們國內資產階級傾向的表現，，。老實告訴伏龍青同志，當政治局把這點列入七月擴大會議的時候，他便是指着伏龍青同志及他的第一封信而說的。

4. “盡量幫助加入集體農莊的貧農，，我們永遠在盡力的盡可能的盡量幫助加入集體農莊的甚或未加入的貧農。這並沒有什麼新的所在。第十五次大會的決議與第十四次大會比較起來，他們的不同點，並不在這裏，而在於第十五次大會提出盡可能的來發展集體農莊的運動，認為這是重要的工作日程之一。伏龍青同志說，要盡量的幫助加入集體農莊的貧農，這就是要離開第十五次大會所規定的盡可能發展集體農莊運動的任務。伏龍青同志實是反對在鄉村中努力在集體農莊方面加強社會主義成分。

5. “不要努力或過於努力來擴展蘇維埃農莊，，伏龍青同志不能不知道我們還是僅僅才開始加緊工作來擴大原有的蘇維埃農莊并建設新的蘇維埃農莊。伏龍青同志也不能不知道我們做這件事情，若是我們有相當的蓄積，那我們所應拿出的錢比之我們所已經拿出的要多得多呢。所謂“努力和過於努力，，在這裏僅是用來恐嚇人的，用來掩飾自己不願意切實的擴大蘇維埃農莊。伏龍青同志實在講來，祇是反對在鄉村中按照發展蘇維埃農莊的路線來增加社會主義的成分而已。

現在綜合伏龍青同志所有的這些意見，你們可以知道什麼叫做右傾了。

再說到伏龍青同志的第二封信。第二封信，同第一封信有什麼區別？就是

他加深了第一封信所犯的錯誤。在第一封信上說到中農經濟的前途無希望，而第二封信則說鄉村經濟“退化了”，。第一封信說到回到第十四次大會去，即減弱對富農的進攻。第二封信則說“我們不應當妨礙富農經濟的生產”，。第一信并沒說到工業。而第二信則發揚其“新的，理論，說應少去發展工業的建築。然而却有兩點，是兩封信相似的，即是關於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伏龍肯同志在兩封信上都是反對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的擴大。很明顯的，第二封信更加深了第一封信的錯誤。

關於“退化，，的理論，我已經說過了。毫無疑義的，這個理論是那些準備着亂叫蘇維埃政權滅亡的資產階級專門家的設想。伏龍肯同志被隱藏在人民財政委員部的資產階級專門家所恐嚇了，現在自己轉而企圖來恐嚇黨，希望黨對右傾讓步。關於集體農莊與蘇維埃農莊，已說得很夠了，因此不值得我們來重覆。再來看看其餘的兩點：關於富農經濟與對工業的投資。

關於富農經濟。伏龍肯同志說：“我們不應當妨礙富農經濟的生產，，。這是什麼意思？這就是說，不要妨礙富農剝削者經濟的發展。不要妨礙富農發展自己的剝削經濟，是什麼意思？這就是給資本主義在鄉村中發展的自由。這恰好是法蘭西自由主義者的老口號“讓我們去做吧，，，這就是不去妨礙資產階級做其自己的事，不要妨礙資產階級自由的動作。這個口號，是法國的老自由主義者在法蘭西革命時代，在同封建政權爭鬥時代提出來的，因為封建政權束縛了資產階級，而且壓制了他的發展。這樣一來，就是我們現在應當從社會主義的口號——“不斷的增加對資本主義份子的限制，，（參看標準數字的大綱），轉到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口號——不束縛資本主義在農村中的發展。難道我們想由布爾塞維克變為自由主義者嗎？在伏龍肯同志自由派的口號與黨的路線之間，有什麼相同的地方呢？

（伏龍肯：斯大林同志，讀讀其他幾點吧！）

我都要讀的，“我們不應當妨礙富農經濟的生產，同時須與其奴役式的剝削爭鬥，，。伏龍肯同志，你是不是以為這句話的下半節，有補於事而無害於事

呢？同奴役式的剝削作爭鬥，是什麼意思？須知同奴役式的剝削爭鬥，是資產階級革命反對封建與半封建的剝削方法之口號。在資產階級革命的時期，我們真提出過這個口號，那時我們分別出奴役式的剝削形式（這是我們要消滅的），與非奴役式的剝削，所謂‘進步’的剝削形式（這是在當時還不能限制和消滅的），因為資產階級的制度，還是有力量。可是當時我們是向着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共和國走的。而現在若是我說得不錯，我們的革命是社會主義的革命，這個革命的方針是要堅決的來消滅一切剝削的，也無論是奴役式的，或非奴役式的，並且他也不能不抱着這個方針。伏龍青同志，你真要使我們從我們的發展和推動着的社會主義革命，重新回到資產階級革命的口號嗎？伏龍青同志你為什麼能說得出這般無稽之談呢？

還有，不妨礙富農的經濟，這是什麼意義？這是給富農以自由。給他們以自由，是什麼意思？還是給他們以政權。當法蘭西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者要求封建政權不要妨礙資產階級的發展時，他們具體的要求是應該給資產階級以政權。當時他們是對的。為着要好好的發展，資產階級是必要有政權。因此如若徹底講來，應當說：給富農以政權。因為我們應當明瞭，奪得富農的政權，而集中之於工人階級之手就不能不束縛富農經濟。這就是當讀伏龍青同志第二封信的時候自然要得出的結論。

關於向工業中投資的問題。當我們討論標準數字的時候，一共有三個數目字：最高人民經濟委員會主張要八萬萬二千五百萬盧布，國家計劃局主張要七萬萬五千萬盧布，而人民財政委員部僅僅給六萬萬五千萬盧布。我們黨的中央委員會對於這個問題，究竟如何決定了呢？中央委員會結果即決定了八萬萬盧布。這個數目字已經比人民財政委員部的提議多出一萬萬五千萬盧布了。人民財政委員部提出這樣少的數目字，自然並沒有什麼奇怪，大家都知道人民財政委員部的吝嗇，他不能不吝嗇。但是現在問題并不在這裏。問題就是伏龍青同志堅持六萬萬五千萬盧布，並非出於吝嗇，而是建築在新奇的‘可能，論上面的。在他的第二封信內與人民財政委員部機關報的特別論文中，肯定的說道，

倘若我們給最高人民經濟委員會六萬萬五千萬盧布以上作投資之用，那我們的經濟一定要精確了。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伏龍格同志反對保持現時工業發展的速度。這是明顯地不了解這個速度的降低實際上會使我們整個的國民經濟的情形變壞。

你們現在若把伏龍格同志第二封信裏面關於富農經濟與工業的投資這兩點合攏起來，再加上‘退化’的理論，——你們就得到右傾的面目了。

你們要知道什麼叫做右傾與右傾的觀點如何嗎？那末請細讀伏龍格同志的這兩封信，好好的研究體會其意旨，就自然明白了。

右傾的面目就是如此。但是提綱不僅說到右傾而已，他還說到所謂‘左’，傾。但什麼叫做‘左’，傾呢？我們黨內是否真正的有所謂‘左’，傾呢？我們黨內是否有反中農傾向，好像提綱所說的過度工業化的傾向呢？不錯，是有的。他們傾向於那方面呢？他們是傾向於託洛茨基主義。關於這點，在七月全體會議的時候，就已說過了。我是指着七月全體會議關於收買糧食政策的議決案說的，在這個決議案裏說到了兩條戰線上的鬥爭：反對那些第十五次大會向後退的——這是右派，和反對那些將非常手段轉變為黨的經常政策的人，——這是‘左’，派，託洛茨基主義的傾向。很明顯的我們黨內現在還有託洛茨基主義的成份，與傾向於託洛茨基的思想。當第十五次黨大會前討論時，大約有六千人左右舉手反對我們的政綱（下面叫：‘一萬人’）。

我想若有一萬黨員舉手反對，那麼必定有兩萬同情於託洛茨基主義的黨員了，因為有未到會而完全未舉手的。這些託洛茨基主義者未脫離黨，但恐怕還未從託洛茨基主義的思想中解放出來。此外，我想已從託洛茨基組織脫離出來而轉回到黨內的一部分人，還未能完全拋開託洛茨基主義的思想，自然也不時散佈其觀點於黨員中。末了，在黨的下級黨部中還有過託洛茨基主義的思想死灰復燃的事實。若把這些事實湊合起來，我們就得出黨內託洛茨基主義傾向的基礎了。

自然，很明顯的，在小資產階級勢力存在的條件之下，在這種勢力影響到

我們黨的條件之下，託洛茨基主義的傾向是不能沒有的。流放或逮捕託洛茨基派中堅分子這是一件事，把託洛茨基主義的思想完全消滅，這又是另一回事。這件事比較困難。我們說：有右傾的地方就必有“左”，傾。“左傾”，是右傾的影子。列甯曾經指着召回派說過，“左派”，也同樣是孟塞維克，不過是他的背面。這句話是完全對的。現在的“左派”，也是這樣。傾向於託洛茨基主義的人，事實上也是右派的，右派祇是用“左派”，的話來掩蔽自己的本相而已。

所以要做兩條戰線之鬥爭，反對右傾與反對“左”，傾。

有人要說：若“左”，傾實際上是右派機會主義的傾向，那末他們中間有什麼區別呢，所謂兩條戰線到底在什麼地方呢？事實上若右派得到勝利便是增加資本主義復辟的良機，而“左派”，的勝利也是得同樣的結果。那末在他們中間還有什麼區別，為什麼一個叫做右派，一個又叫做左派呢？若左派與右派中果真有區別的話，那末究竟區別在什麼地方呢？這兩個傾向的社會基礎一樣，他們同是小資產階級傾向難道不對嗎？這個傾向得到勝利以後，終歸是一個同樣的結果，這難道不對嗎？他們中間的區別究竟在什麼地方呢？

不同的地方在於：綱領不同，要求不同，出發點與方法不同。譬如，右派說：“不應當建設得聶普爾水電站”，而左派却恰恰相反，他們說：“怎麼我們只一個得聶普爾水電站，要一年給我們一個得聶普爾水電站，（笑聲）。因此我們要承認，其中顯然是有分別的。如果右派說：“不要侵犯富農，讓他去自由地發展”，“左派”，恰恰相反，說：“我們不僅要打擊富農，並且還要同樣打擊中農，因為中農亦同富農一樣地是私有者”，這亦是我們要承認的，其中顯然是有分別的。如果右派說：“困難來了，還不是逃避的時候嗎，？而左派相反的說：“什麼是我們的困難，還有什麼難，飛向前去呵！”，（笑聲）。這亦是我們要承認的，其中顯然是有分別的。

你們看，這就是“左派”，特別政綱及其手段底一輻畫圖。因此，“左派”，才常用那種左傾而動人的言辭，欺騙了一部分工人，表明自己是右傾底最堅決的敵人；可是，誰都知道，左派與右派的社會根源是沒有什麼分別的。他們

時常走向妥協的道路，與右派聯合來作反對列甫主義路線的鬥爭。

所以我們列甫主義者，必須要在兩條戰線上作鬥爭：一方面反對右傾，一方面又反對“左傾”，。

可是，如果託洛茨基主義的傾向，是代表“左”，傾的，那末是不是說這個“左傾”，比列甫主義更左呢？不是的，列甫主義在全世界工人運動中是最左的（這個左字沒有括弧）一派了。我們列寧主義者，在帝國主義戰爭開始以前的時期，加入到第二國際中去，是社會民主黨中最左的一派。我們未留在第二國際中，我們在第二國際中宣傳分裂，因為我們是最左的一派，不願意與馬克思主義底小資產階級的叛徒及社會和平主義者社會愛國主義者，共居一黨。這個策略與這個思想，結果做了全世界布爾塞維克底基礎。我們列甫主義者在自己的黨內是唯一的沒有括弧的左派。因此我們列甫主義者，在自己的黨中，即無所謂“左”，亦無所謂右。我們的黨是馬克思主義者與列甫主義者的黨。在本黨內，我們不僅同那些已被我們公開的稱為機會主義者的人鬥爭，並且同那些企圖做比馬克思主義“更左”，比列甫主義“更左”，的人，用左而動人的言辭去掩飾右傾機會主義本質的人鬥爭。誰都懂得，稱那些還沒有從託洛茨基主義傾向解放出來的人為“左派”，這是諷刺的意思。列甫稱那些“左派共產主義者”，為左派，有時把他放在括弧內，有時不用括弧。但是誰都知道，列甫之稱他們為左派，即是諷刺的意思，要藉之以說明他們僅僅是在口頭上，表面上是左派，而在實際上却是代表小資產階級的右傾。那些託洛茨基派的份子，昨天還與公開的機會主義份子結成了反列寧主義的聯盟，並且與國內反蘇維埃的分子直接勾結，他們怎麼可以稱為左派（沒有括弧）呢？不久還有一個受資產階級分子贊助的反列甫黨底“左”，右派公開的聯盟，難道這不是事實嗎？難道這不是說，如果“左派”，與右派沒有一個共同的社會根源，如果他們沒有一個共同機會主義的天性，他們絕不能結合成一個統一聯盟嗎？託洛茨基派舞台已經有一年了。右傾的一部分，例如夏杜洛夫斯基志離開了這個聯盟。因此，右派今後將以右派的資格出台，而“左傾的”，就將用左傾的話去掩飾自己的右傾。

但是我們怎能保證這個“左傾的，與右傾的彼此不能再碰見呢（笑聲）？很明白的，簡直一點保證也沒有，也不會有。

如果我們擁護在兩條戰線上鬥爭的口號，那末是不是說，我們這就宣佈了我們黨內必須有中派呢？究竟在兩條戰線上鬥爭是什麼意思呢？不是中派的意思嗎？你們都知道，託洛茨基主義者正是這樣說：有所謂“左派的，，這就是“我們，——託洛茨基派，，“真正的列寧主義者，，；有所謂“右派的，，這是其餘的一切人；末了，有所謂“中派的，，即動搖於“左，右之間的。用這樣的觀點，來觀察我們的黨，能不能認為是正確的呢？很明顯，這是不能的。只有那些糊塗的，早與馬克思主義脫離了關係的人才能這樣說。只有那些看不見與不瞭解大戰時期以前底社會民主黨——無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利益聯盟底黨與共產黨——革命無產階級獨有的黨中間原則上的分別的人，才會這樣講。中派這個名詞，不是地位的觀念：例如我們說，在一邊坐着的是右派，在另一邊的是“左派，，在中部的——便是中派。中派是政治的觀念。他的思想是隨波逐流的思想，是在一個共同的黨內將無產階級的利益服從小資產階級的利益的思想。這是反列寧主義的思想。中派是大戰以前的第二國際內底天然產物。那裏曾經有右派（佔大多數），有左派（沒有括弧的），亦有中派。中派的一切政策，是用左派的言辭來粉飾右派的機會主義，並使左派服從右派。那時以布爾塞維克為中堅的左派底政策如何呢？即是堅決的與中派鬥爭，與右派作分裂的鬥爭（特別是在帝國主義戰爭開始以後），而從真正的左派中與真正的無產階級分子中，組織新的革命的國際。

為什麼那時在第二國際內能發生這樣力量的分配與布爾塞維克的這樣政策呢？因為第二國際那時是一個無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利益聯盟的政黨，這個黨是有利於小資產階級的社會和平主義者及社會愛國主義者的。因為那時布爾塞維克不能不集中火力來反對企圖使無產階級分子服從小資產階級利益的中央派。因為那時布爾塞維克的責任是宣傳分裂的思想，不然，無產階級就不能組織自己的，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政黨。

能否斷定在本黨內也有同樣的力量分配，及在本黨內應重演戰前布爾塞維克在第二國際內部所運用的政策呢？很明顯地，不可以。因為，這是不懂得無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聯盟的政黨同革命的無產階級獨有的政黨間原則上的分別。社會民主黨的階級基礎與共產黨完全不同。那裏（社會民主黨）中央派是一種自然的現象，因為各種利益聯盟的政黨，免不了要有中派，而布爾塞維克的責任，正是在採用分裂的路線。而此地（共產黨）呢，中派是沒有根據的，而且是與列甯的黨不相容的，因為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獨有的政黨，而不是各種階級成分聯盟的政黨。並因為本黨的統治力量，是世界工人運動中的最左派（列甯主義者），所以從列甯主義的觀點看來，在我們黨內採用分裂政策是沒有任何理由，而且也不能有任何理由去說這種政策是對的。

（座中人問：——本黨有分裂的可能沒有？）

問題不關於分裂是否可能，而是關於分裂政策在我們獨有的列甯的黨中，用列甯主義的觀點來看，是沒有理由說牠是對的。誰不懂得這種原則上的分別，那就是離開了列甯主義，毀壞了列甯主義。因此我想只有瘋癲的和一點馬克思主義氣味都沒有的人，才能够斷言說本黨在兩條戰線上鬥爭的政策，是中派的政策。

列甯在本黨內，不斷地在兩條戰線上進行鬥爭，反對“左派”，反對明顯的孟塞維克主義的傾向。你們去看一看列甯著的“共產主義”左派，幼稚病，這本書吧，看一看本黨的歷史吧，你們將懂得本黨是在與這兩種傾向——右派及“左派”，——鬥爭中生長及鞏固起來的。一方面，同召回派及“左派”，共產主義者鬥爭，另一方面，在十月革命前，十月革命時，十月革命後，同公開地機會主義傾向鬥爭；這就是本黨在他自己發展中所經過的階段。大家都知道列甯關於這問題的話：我們既要同機會主義鬥爭，又要同“左派”，的信條主義者鬥爭。

這是不是說列甯就是一個中央主義者，他採用了中央主義的政策呢？當然不是的。

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的‘左’，右傾是什麼呢？所謂右傾，這當然不是戰前社會民主黨的機會主義。傾向於機會主義，還不就是機會主義。我們知道，列寧當時曾解釋過‘傾向’的意思。傾向，是一種還未完全形成機會主義的東西，他還是可以糾正的。因此，不能拿右傾及已完成的機會主義來等量齊觀。說到‘左’，傾，他簡直是一種同戰前第二國際內部極左派——布爾塞維克——完全相反的東西。他們不僅不是沒有括弧的左派，按其實質，而且和右傾分子是一個東西；不過還有一個差別，就是，他們不自覺地將自己的真性，用左傾的辭句掩蔽起來。看不到在本黨內‘左’，傾分子及真正的列寧主義者——唯一的沒有括弧的左派——間的一切差別，這對於黨簡直是一種罪惡。

（座中人問：——那麼把傾向合法化就對嗎？）

假如和傾向公開的鬥爭是把傾向合法化，那麼，就要承認列甯好久以前就把他們‘合法化了’。他們，這些傾向分子，左派右派都在內，是從各式各樣非無產階級的階層中產生出來的。這些分子反映着小資產階級勢力對黨的影響，以及黨的某部分組織的腐化。一部份由別的政黨退出來的人；一部份帶託洛茨基主義傾向的人；過去黨內小組的殘餘；在國家的，經濟的，合作社的及職工會的機關中正在開始官僚化（及已經官僚化的）的黨員，他們與這些機關內的資產階級份子很明顯的勾結起來；在我們鄉村組織中的富裕黨員（他們是與富農同生并長的）等等，——這就是脫離列甯主義路線的傾向之滋養料。很明顯地，這些成分不能接受什麼真正地左派及列甯主義。他們祇有培養公開地機會主義的傾向，或者是用左傾的辭句來掩飾自己機會主義的‘左傾’。

因此在兩條戰線上鬥爭，是本黨唯一的正確的政策。

此外，在提綱上說，我們和右傾鬥爭的主要方法，應該是擴大思想上的鬥爭，這正確嗎？我想，是正確的。最好是來回想我們和託洛茨基主義鬥爭的經驗。我們用什麼開始和他們鬥爭的？用組織的方法嗎？不是，當然不是，我們是從思想上的鬥爭開始的。這種鬥爭從一九一八年作到一九二五年。在一九二四年我們的黨，與在一九二五年第三國際代表大會已經提出了關於託洛茨基主

義的決議，決定牠是一種小資產階級的傾向。然而託洛茨基依然還是在我們中央和政治局裏坐著。這是不是事實？是事實。我們“容忍”，了託洛茨基及託洛茨基主義者作中央的委員。爲什麼我們允許他們留在黨的指導機關裏呢？因爲，那時候託洛茨基主義者，雖然和黨是分歧着，但他們服從了中央的決議，并對黨是忠實的。到什麼時候，我們才在比較大規模的採用了組織方法呢？只有當託洛茨基主義者組織了小組，組織了自己的小組中心，轉變自己的組織爲新的政黨，並且號召人們參加反蘇維埃政權的示威遊行之後，才採取了組織方法。我想，和右傾鬥爭時我們也應該按照這條道路走去。右傾雖然在本黨內漸漸加強，但他還不是形成了的及結晶了的東西。他僅是開始形成及開始結晶了。右傾分子有沒有小組？我想，沒有。能說他們不服從本黨的決議嗎？我想，我們還沒有證據他們以此種罪過的證據。能否斷言說右傾分子一定要組織他們自己的小組呢？我對這點是懷疑的。從此地得出這樣的結論：在現時的階段上我們和右傾鬥爭的主要方法，應該是擴大思想上的鬥爭。況且在本黨內有些黨員有一種相反的傾向——和右傾鬥爭，開始不用思想上的鬥爭，而用組織的方法，所以擴大思想上的鬥爭更是正確的。他們一直的說：你給我們十個或者二十個這樣右傾的人吧，我們一轉眼就把他們消滅，這樣我們就可結束了右傾。同志們！我想這種情緒是不正確的，而且是危險的。爲着不羈掙在這種情緒之下，爲着把反對右傾的鬥爭放在正確的軌道上，必須明白地堅決地說，我們和右傾鬥爭的主要方法，在現時的階段上，是思想上的鬥爭。

這是不是說我們應廢去一切組織上的結論呢？不是。無疑義的，組織上的結論，只能起附屬的作用，假如右派沒有破壞黨的決議的事實，則我們不能將他們從各領導機關中開除。

（摩中聲：莫斯科的事情呢？）

我想在莫斯科的指導同志中沒有右傾的分子。那裏會有對右傾情緒不正確的態度，但可以說那裏會有調和的傾向。但是我不能說莫斯科省委中有右傾。

（座中間：組織上的鬥爭有過麼？）

組織上的鬥爭會有過；雖然他是處於附屬的地位，但他會有過。會有過這種鬥爭，因為莫斯科在自我批評的基礎上進行改選，而各區的積極分子有權利更換他們的書記（笑聲）。

（座中間：難道我們會宣佈過改選書記嗎？）

誰也沒有禁止過改選書記。中央六月宣言上直接講到，如不能保證下層機關有更換任何書記和任何委員會的權利，則發展自我批評將變成空話。你們能夠反對這種宣言麼？

（座中聲：在黨的臨時代表會以前？）

是的，就算在黨的臨時代表會之前吧。我看到幾個同志的面孔上帶有算命先生預知一切的笑容。同志們，這是不好的。我看到有些同志帶有不可抑止的希望迅速撤換右傾分子的職務。親愛的同志們，這樣不是解決問題。自然撤換職務比作廣大的解釋右傾和右傾的危險，以及與右傾鬥爭等的運動更要容易，但是最容易的並不是最好的。努力來組織廣大的反右傾的解釋運動。費些力，不要吝惜時間，結果你們會看到運動的範圍愈廣愈深刻，則對右傾愈壞。所以我說我們反對右傾鬥爭的中心應該是思想上的鬥爭。

至於談到莫斯科的委員會，我不知道對於烏格蘭諾夫同志在莫斯科委員會及監察委員會會議上所作的結論以外，還有些什麼話可以補充。他很直爽的聲明：‘若是略一回憶歷史，回憶一九二一年我在列甯格勒與季諾維埃夫同志之鬥爭，那麼當時的‘戰鬥，要大的多。當時我們戰勝了，因為我們是對的。現在我們遭了打擊，因為我們錯了。只要對黨有益，我們是要做的。’，這樣說來，烏格蘭諾夫同志現在所進行的鬥爭，同他當時所進行的反季諾維埃夫的鬥爭一樣。那末最近他所進行的鬥爭是反對誰呢？很明顯的是反對中央的政策。還反對誰呢？在什麼基礎之上進行這種鬥爭呢？很明顯的，這種鬥爭是基於同右傾調和的基礎。

因此提綱上很正確的指出，必須與維諾列甫主義路線的各種傾向的調和派

，尤其是對右傾的調和派奮鬥，這是我黨目前主要任務之一。

最後的問題。在提綱上說我們目前應當特別注意與右傾鬥爭，這是什麼意義呢？這就是說在我們黨內目前最主要的危險是右傾的危險。我們與託洛茨基主義傾向鬥爭，這是集中的鬥爭，已進行了十餘年了。託洛茨基主義基本幹部的破產就是這種鬥爭的結果。不能說最近與公開的機會主義已經作了怎樣緊張的鬥爭。鬥爭不特別緊張，因為右傾還是在形成與結晶的階段。右傾是隨小資產階級勢力的增強而發展的，這種小資產階級的勢力因為我們收買糧食的困難而增加起來。因此主要的應當給右傾以打擊。

在結束我的話之前，同志們，我要再指出此地所未講到的一個事實，這個事實照我的意見也有重要的意義。我們政治局的委員向你們提出標準數字的提綱。我在我的講演中擁護這非常正確的提綱。對提綱個別的修正，這是不成問題的。但是提綱在基本上是正確的，並切實能保證我們正確的執行列寧主義的路線——這點是不能有什麼疑義的。我們應當向你們聲明這個提綱在政治局是一致通過了的。我想這件事實對於黨的敵人以及對黨不懷好意的人在我們隊伍中所散佈的許多謠言是有些意義的。我所指的是那些說，好像在政治局內有右傾‘左，傾及調和派等等的謠言。這個提綱是政治局意見一致的又一個，第一百個，或第一百零一個證據；他證明我們政治局是始終一致的，將來還是一致的。我希望這次的全體會議也同樣一致的來通過這個提綱作為基礎。（鼓掌）

論德國共產黨內的右傾危險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十九號在共黨國際

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會議上的演說

同志們！因為莫洛託夫同志已經敘述了聯共代表團的觀點，所以我要說的話也不多。我所要講到的祇是在討論過程中發生的三個問題。就是：資本主義穩定問題，因資本主義穩定的動搖而產生的無產階級底階級鬥爭問題，和德國共產黨問題。

安白德羅同志和舍拉同志，——他們兩位在這些問題上都陷入了懦怯的機會主義的泥沼，這是深可惋惜的事。不錯，安白德羅同志現在只是關於形式上的問題發表了意見。但我所指的是他在共產國際執委政治秘書處會議上討論德國共產黨內右傾和調和派問題時所發表的那篇有原則性的演說。我認爲這篇演說就是共產國際執委少數委員在這次會議上所站的立場之思想上的基礎。因此我認爲不能默默地忽略過安白德羅同志在共產國際政治秘書處會議上的那篇有原則性的演說。我已經說過，安白德羅同志和舍拉同志已跌入懦怯的機會主義底泥沼中。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除了公開的機會主義之外，還有一種隱藏的不敢露出真面目的機會主義。這就是對於右傾取調和態度的機會主義。調和派是一種懦怯的機會主義。我再重複一遍：我們這兩位同志都已陷入了懦

怯的機會主義底泥沼，這是深可惋惜的事。

我們現在要從幾件事實上來觀察一下。

一 資本主義穩定問題

共產國際認定現時的資本主義的穩定是一種暫時的、不堅固的、動搖的、腐朽的穩定，而且在以後資本主義危機發展的過程中必將日趨動搖。這與資本主義的技術和合理化日益發展的這件衆目共觀的事實，是毫不矛盾的。資本主義穩定之內部的腐朽和動搖就是正在這個發展底基礎上加緊起來的。可是安白德羅同志在共產國際執委政治秘書處會議上對我們說是什麼呢？他完全否認資本主義穩定的動搖性和不堅固性。他在他底講演中直捷了當地說道：“共產國際第四次世界大會實際上祇是定出了一些空洞的辭句——腐朽的、動搖的、什麼的、什麼的……穩定，。他又說，在第六次大會關於第三時期的那個提綱中，沒有一個字提到穩定的動搖。安白德羅同志的這種說法是不是正確的呢？不，不正確的。因為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所下的斷言，却巧與安白德羅同志在他底講演中所說的話是相反的。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在關於第三時期的那個提綱中直捷了當地說道：

“這個時期（即第三時期——斯大林註），經過資本主義矛盾之繼續的發展，必然要引起資本主義穩定之日益動搖和資本主義總危機之劇烈的銳利化，。

你們聽——“穩定之日益動搖，，……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資本主義的穩定，現在已經是動搖了不堅固了，而且這種穩定在第三時期的環境中還要更動搖起來。安白德羅同志簡直是侮辱人家（德國共產黨也在其內），祇要他們說到穩定之動搖性和不堅固性，認為現時工人階級底鬥爭是在日益震動和破壞資本主義底穩定。安白德羅是在侮辱什麼人呢？當然，他是在侮辱第六次大會底決議。

所以，安白德羅同志在形式上雖擁護第六次大會底決議，而實際上是在修

改這些決議，以機會主義的觀點去瞭解資本主義的穩定。

問題的形式方面就是這樣。現在我們再來分析問題的實質。如果說，現在的穩定並不是一種動搖的，腐朽的和不安固的穩定，那末這究竟是怎麼樣的一種穩定呢？這樣，就只好承認牠是一種堅固的日臻鞏固的穩定。但如果現時資本主義的穩定是在日臻鞏固，那末世界資本主義日益加深和尖利化的危機又怎麼解說呢？如果現在所有的是一種堅固的穩定，那麼資本主義的危機又怎麼會加深呢？安白德羅同志完全自相矛盾，使他自己的頭腦都弄昏了。

列甯曾經說過，資本主義在帝國主義時代的發展是兩個並進的過程：一方面，資本主義在幾個國家內發展起來，另一方面，資本主義在許多其他的國家却一天天的潰爛起來。列甯的這個提議是不是正確的呢？如果是正確的，那末，不就很明顯的可以懂得資本主義的穩定必然是腐朽的麼？

最後，關於許多大家都知道的事實，還要講幾句話。我們現在可以看到，帝國主義的個別的集團，現在正在為銷貨的市場和輸出資本的市場而拚死命地鬥爭着。我們同時也可以看到，資本主義國家是在猛烈地加緊武裝，急急忙忙地締結軍事聯盟，公開地準備第二次世界帝國主義大戰。我們還可以看到，世界兩大帝國主義列強——英、美兩國之間矛盾的日益加緊，雙方都在努力地吸收其他的國家到自己方面去。最後，我們也可以看到這樣的事，例如：蘇聯的存在，蘇聯在各種建設方面——無論在經濟方面或文化政治方面——的發展和進步。僅僅是蘇聯的存在（牠的發展和成績更不必講了），就已足能搖動和破壞世界資本主義底基礎了。這些事實都一樁樁地擺在眼前，還來否認資本主義穩定的動搖和腐朽，還斷言資本主義的穩定不會隨着事變的行程而一天天的顛搖起來，這樣的人怎麼還配稱為馬克思主義者和列甯主義者呢？

你們試想，安白德羅以及繼他而起的舍拉同志究竟跌到什麼泥潭中去了呢？

安白德羅同志和舍拉同志的其他的錯誤都是與這個錯誤相聯繫着的。

二 無產階級階級鬥爭問題

安白德羅同志在關於資本主義國家中無產階級階級鬥爭的問題上，關於這種鬥爭之性質與意義的問題上，他的見解也同樣是錯誤的。從安白德羅同志在政治秘書處會議上的講演中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就是：工人階級與資本家底自發鬥爭，大體上祇是一種自衛的鬥爭，共產黨對這種鬥爭的領導應當限制在現存的改良主義工會的範圍之內。這種說法對不對呢？當然是不對的。這種說法是一種尾巴主義的說法。安白德羅同志忘記了現在工人階級底鬥爭是在日益動搖的資本主義穩定底基礎上發生的，他忘記現時工人階級的鬥爭常常帶有迎敵的，反攻的，向資本家直接進攻底性質。安白德羅同志在近來工人階級的鬥爭中一點新的東西也沒有看到。甚至於那樣的事實，如像：洛土的總同盟罷工，法國，捷克斯拉夫，德國為改良勞動條件而起的經濟罷工，德國無產階級力量在五金工人反歇業鬥爭中之強有力的動員等等，安白德羅同志甚至連這些事實也都沒有看到。

這些事實所告訴我們的是什麼，牠們所證明的是什麼呢？這些事實就是告訴我們，新的工人革命運動高潮底先決條件已在資本主義國家的內部發展起來。這是一種新的現象，這種新的現象是安白德羅同志和舍拉同志所看不到的，也是一般不會瞻前只顧後的人們所看不到的。不會瞻前只顧後，這究竟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只會跟在事變的尾巴後面跑，看不到事變中之新的現象，結果事情一臨頭就弄得驚惶失措。這也就是放棄共產黨在工人運動中的領導作用。德國共產黨在一九二三年革命中喪失了領導作用也就是這個緣故。因此，誰要是不願意再重複一九二三年的錯誤，誰就應當喚醒共產黨員底思想，號召他們前進，誰就應當準備羣衆去參加那將要醞釀成熟底鬥爭，誰就應當盡量設法使共產黨不再落在事變的尾巴後面，使工人階級遇到鬥爭時不致驚惶失措。

安白德羅同志和舍拉同志忘記了這一點，確實是非常令人奇怪的。

在魯爾工人的戰鬥時期，德國共產黨員指出了無組織的工人比工會內有組織的工人還要革命的事實。可是安白德羅同志却深為不平，他斷言這種事實是不會有的。真是奇怪極了，為什麼這種事實一定不會有的呢？魯爾一共有百萬工人，組織在工會內的約有二萬人。工會完全處在改良派官僚們底領導之下，他們與資本家是有密切的聯繫的。無組織的工人比有組織的工人還要更革命些，這又有什麼奇怪呢？不是這樣，難道還會有另一個樣子麼？從俄國革命運動底歷史中我還可以舉出許多更“奇怪”的事實。在我們革命的歷史中，羣衆常常比他們共產黨（有幾個）的首領還要革命些。列寧說我們不僅要教導羣衆，並且也要學習羣衆，他這句話也就是根據這種事實而來的。足能令人奇怪的倒並不是這種事實，令人奇怪的是安白德羅同志何以竟至於連布爾塞維克革命實際中這樣簡單的道理也不明瞭。

舍拉同志也是這樣。他也不贊成德國共產黨員在五金工人反對停業的鬥爭中越出了工會的範圍，並且破壞了這個範圍。他認為這種行動就是違反了職工國際第四次大會的決議。他肯定地說，職工國際祇叫共產黨員在工會內部工作。同志們，這完全是無稽之談。職工國際並沒有這樣的一種指令。這種說法，就是叫共產黨在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中祇做一個消極的旁觀者。這種說法，就是要葬送共產黨在工人運動中底領導作用。德國共產黨員的功績也正就在於他們不怕那些“工會範圍”，底空談，而決斷地越出了這種範圍，組織無組織的工人去反對工會的官僚們。德國共產黨員底功績也正就在於他們能細心地尋找和探求無組織工人之鬥爭和組織底方式。也許，他們在做這項工作的時候犯了許多小的錯誤。但一切新的事業不經過錯誤是不會成功的。祇要改良派的工會有羣衆，祇要牠是一個羣衆的組織，我們就應當到裏面去工作，——可是從這句話中並不能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我們底羣衆工作必須限制在改良派工會範圍之內，我們必須做這種工會的限制和要求之下的奴隸。如果改良派的領導已開始與資本主義混合起來（參閱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和職工國際第四次大會底決議），而工人階級却在與資本主義鬥爭着，在這種情形之下，可否肯定地說，共

產黨領導之下的工人階級一定不可以相當破壞改良派工會底範圍呢？當然，如果不落在機會主義的泥溝中，是決不能這樣說的。因此，在一個環境中必須建立兩個同時並存的工人階級羣衆組織，是很可能的，當然這種事情是違反那些出賣階級的工會官僚底意志的。美國現在已具備了這種條件。德國也很有這種可能。

三 德國共產黨問題

同志們，現在的問題就是德國共產黨能不能成爲一個有組織的團結堅固的和內部有鐵的紀律的共產黨。問題不僅在於右派或調和派，而是在於德國共產黨本身的存在。德國共產黨是存在着。但在共產黨的旁邊和內部還有兩種力量存在着，這兩種力量是在內部破壞黨，要使黨走到滅亡的道路。第一種力量，就是右派的小組織，牠在共產黨的內部組織新的反列甯主義的政黨，組織他們自己的中央和機關報，一天天的毀壞共產黨的紀律。第二種力量就是調和派，他們底動搖是在一天天的強固右派的小組織。右派小組織離開了列甯主義，拚命地在反對共產國際，關於這一點也不用我來證明。這是早已證明了的。調和派破壞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關於有系統地與調和派作鬥爭底決議，關於這一點我也不用來證明。這也是早已證明了的。現在的問題就是德國共產黨內的這種情形，再也不能容忍下去了。現在的問題就是如果把這一種“制度”，再容忍下去，再容忍右派以社會民主黨思想上的垃圾來糟塌人們的頭腦，再容忍他們有系統地破壞黨底基礎，再容忍調和派幫助右派——這就是反對共產國際，破壞列甯主義底基本要求。現在德國共產黨內的情形，已同聯共在與託洛茨基派鬥爭的最後一個階段上的情形一樣，那時候的情形已迫使聯共和共產國際不得不把託洛茨基派從牠的隊伍內趕出去。這一點，現在大家都是看到的。祇有安白德羅同志和舍拉同志沒有看到，或許是假裝沒有看到。這就更壞了。這就是說，他們不惜犧牲整個德國共產黨而去竭力幫助右派和調和派。

安白德羅同志和舍拉同志以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的決議作爲反對開除右派

底根據，他們說我們應當用思想上的鬥爭去克服右傾。這完全是正確的。可是這兩位同志忘記了第六次大會的決議並沒有說共產黨祇可以用思想上的鬥爭方法去反對右傾的危險。實際上完全不是這樣的！在討論到與一切離開列甫路線的傾向作思想上之鬥爭的方法時，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在根據布哈林的報告而作的決議中，曾說道：

“這不僅沒有說，不要儘量柔順黨內的鐵的紀律，不要少數絕對服從多數，不要下級機關及黨的其他組織（國會黨團，工會黨團，報章等等）絕對服從黨的領導中心，而且正是以這些東西為前提的。

安白德羅同志和舍拉同志忘記了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的這個決議的提綱，真是非常奇怪的。一切調和派，無論那些自己承認調和派或不願承認這個頭銜的人們，在引證第六次大會決議案的時候，總是有系統地忘記了共產國際的這一個重要的提綱，這也是非常令人奇怪的。

我們在德國共產黨內不但沒有看到努力地鞏固黨內鐵的紀律的事實，反而只看到右派以及一部分調和派不成體統地破壞一切紀律底事實，這究竟怎麼辦呢？這種情形能不能再容忍下去呢？

我們在德國共產黨內並沒有看到下級機關，工會黨團，以及黨的刊物機關絕對服從黨的中央底事實，而只看到右派和一部分調和派無禮地破壞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這個要求底事實，這怎麼行呢？這種情形能不能再容忍下去呢？

在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上所批准加入共產國際底條件，你們都是知道的。我們說的是那二十一條件。在這些條件的第一項上說道：“不管黨是否完全處在公開的或秘密的狀態中，黨的一切定期和不定期的刊物，以及黨的一切出版物，都必須完全服從黨的中央，。你們知道，右派手中共有兩個刊物機關。你們知道，這兩個刊物機關是絕對不肯服從德國共產黨底中央的。試問這樣不成體統的情形，能不能容忍下去呢？

在二十一條件的第十二項上說道：共產黨應當是一種“最集中的組織，，在它的內部應當有一種“與軍事紀律相仿的鐵的紀律，。你們知道，德國共產黨

內的右派，除了他們自己的小組織的紀律之外，絕對不願承認其他任何的紀律，絕對不願服從鐵的紀律。試問這樣不成體統的事實，能不能再容忍下去呢？

你們也許會說，在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上所批准的條件，對於右派並不是一定要遵守的。

安白德羅和舍拉同志在這裏高叫着名不符實的共產國際決議案的破壞者。現在我們都已看到了真正的（不是名不符實的）破壞共產國際基礎的人——右派。爲什麼他們倒一聲不響呢？是不是因爲他們想在口頭上維護共產國際決議的面具之下來暗裏擁護右派和修改這些決議呢？

特別有趣的是舍拉同志底申明書。他賭咒發誓地說他是反對右派，調和派等等的。但他從這裏做出怎麼樣的結論呢？你們以爲他一定是說要與右派及調和派鬥爭？哼，他不這樣說了！他從這裏做了一個非常奇怪的結論，據他的意見必須改組現時德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局。你們祇要想一想：德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是堅決地與右傾危險及動搖的調和派作鬥爭的；舍拉同志也是主張與右派及調和派作鬥爭的；因此舍拉同志主張不要觸犯右派及調和派，主張削弱與右派及調和派底鬥爭，變更中央政治局的成份，使牠成爲調和派的政治局。這就是所謂‘結論’，！我說一句不客氣的話（請舍拉同志原諒我），他在這一個問題上的立場，很像那種顛倒黑白的鄉下訟師一樣。這就是我們所謂訟師式的擁護機會主義份子。

舍拉同志主張改組德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就是說，要從中央政治局中拉幾個人出來，把旁的人補進去。舍拉同志爲什麼不直爽爽地說——要把什麼人補進去（舍拉道：“要把那些贊成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的人補進去，，）。但第六次大會並沒有叫調和派復職。却巧相反，他命令我們去有系統地與調和派作鬥爭。正因爲調和派沒有執行這個命令，所以在第六次大會之後，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又在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六號通過了一個關於右派與調和派問題底決議。舍拉同志想自命爲第六次大會決議之唯一的解說者。舍拉同志的這一種企圖是毫無一點根據的。第六次大會決議底解說者祇有共產國際的執行委員會及

其主席團。我知道，舍拉同志是不同意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十二月六號所通過底決議的，雖然他在口頭上沒有這樣直直爽爽地說出來。這對於他反而更壞。

結論怎麼樣呢？我們只能得出一個結論：安白德羅和舍拉同志在德國共產黨問題上所取的態度，完全是一種懦怯的態度，他們完全以鄉下訟師式的手段袒護右派反對德國共產黨和共產國際。

四 德國共產黨內和聯共黨內底右派

今天，我從幾位發言的同志底口中知道，德國有些調和派根據我在聯共中央十一月全體會議上關於同右派鬥爭之方法問題的講演，來替他們自己辯護。大家知道，我在那篇講演中（業已公佈）曾經說：在與聯共內部右傾危險鬥爭的現階段上，主要的鬥爭方法是思想上的鬥爭，但有時也可以採取組織上的手段。因為聯共內的右派還沒有形成小組織，還從來沒有破壞或不執行聯共中央底決議，我在那篇講演中也會說過，右派如果轉到小組織鬥爭底立場上，開始破壞聯共中央決議的時候——那末當然就要像一九二七年對待托洛茨基派那樣來對待他們。我想，我在這篇講演中已經說得很明白了，而調和派却想根據我的講演去幫助德國的右派和德國的調和派，這未免太蠢了吧？我們知道，德國的右派，已採用小組織的鬥爭方式，並且有系統地破壞德國共產黨中央底決議，而德國的調和派還沒有而且根本不願意和右派的小組織脫離關係。我覺得調和派還想利用我的講演來辯護自己，真是再蠢沒有了。祇有那些離開了辯證法的人，纔能不瞭解聯共黨內的右派和德國共產黨內的右派之間的區別。

在事實上，聯共黨內的右派的確還沒有形成小組織，他們，毫無疑義的，還是絕對的執行聯共中央底決議。德國的右派，就完全不同，他們已經形成了小組織，而且有小組織的中央領導着，他們有系統地破壞德國共產黨中央底決議。當然，現時與這兩個黨內右派的作鬥爭的方法決不能一樣的，這難道還不明顯麼？

再則，在我們蘇聯並沒有那樣有組織的強有力的能培養和激發聯共黨內右

傾危險的社會民主黨。而在德國，却巧相反，那裏除了共產黨之外，還有一個更強有力的堅固的有組織的社會民主黨，他正在培養着德國共產黨內底右傾，及在客觀上把右傾變成他的奸細。祇有瞎了眼的人，纔看不到蘇聯和德國情形的不同。

最後，還有一點。我們的黨是在與孟塞維克艱難困苦的鬥爭中發展和鞏固起來的，而且這種鬥爭曾經在好幾年之內都完全是國內戰爭的形式。你們不要忘記，我們布爾塞維克，在十月革命的時候曾經推翻了反革命的帝國主義資產階級之左派——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因此，在反對公開的機會主義底鬥爭中，世界上無論那一國共產黨的傳統，都沒有像聯共的傳統那樣強而有力。舉例來說，莫斯科的黨部，尤其是莫斯科省委，內部曾經有一種調和派的動搖，可是莫斯科的工人同志，以其剛強的毅力，在兩月之內就把莫斯科省委的路線糾正過來——你們只要把這些事實同意一下，就可以明白我們的黨在與公開的機會主義鬥爭中底傳統是多麼有力呵，德國共產黨有沒有這樣的傳統呢？可惜，他並沒有這樣的傳統，這一點我想你們大概是同意於我的。同時，我們也決不能否認，德國共產黨還遠未批離那種培養德國共產黨內右傾危險之社會民主黨底傳統。

這就是德國和蘇聯的客觀情形，因為情形不同，所以與聯共黨內和德國黨內右傾危險的鬥爭方法也就不相同了。

祇有那些沒有馬克思主義者精神的人，纔能不明白這樣淺顯的道理。

在聯共中央十一月全體會議的決議起草委員會中，曾經有一部分同志提議把決議案的主要之點推廣地應用到共產國際其他的支部中去，德國支部也包括在內。我們否決了這個提議，因為我們認為與德國共產黨內右傾危險的鬥爭環境，同聯共黨內鬥爭環境是有極大底區別的。

五 關於秘密信和公開信底草案

關於共產國際執委起草委員會所提出來的決議草案，還要講兩句話。舍按

同志認為這個草案，帶有地方的色彩。有人問，爲什麼呢？他說，因爲在那封公開信底草案中沒有分析產生右傾危險的那種政治環境。同志們，這簡直是笑話。在國際第六次大會的決議中就已經有這樣的分析。是不是一定要把牠重述一遍呢？我覺得，是用不到再重述一遍。其實我們只做一個短短的決議案，內中說明右派有系統地破壞第六次大會底決議，因此必須把他們開除出去，同時說明調和派不與右派鬥爭，因此須向他們下嚴重的警告，這也是可以的。但我們之所以並不僅僅做了這樣一個簡單的決議案就算完事，就是爲了要把右傾底實質向工人們解說明白，要把勃蘭特萊爾和太黑爾美底真面目揭露給他們看，告訴他們，這些右傾份子過去所代表的是什麼，現在所代表的是什麼，告訴工人們，共產國際和聯共會怎樣長久地容恕過他們（右派），希望改正他們底錯誤，告訴工人們，共產黨會怎樣長久地把他們容留在自己的隊伍內。並且告訴工人們，爲什麼現在已經再不能把這樣的人容留在共產國際底內部。因此，決議草案的內容，比最初所能預料到的，還要廣泛得多。

莫洛託夫同志在這裏已經說過，聯共的代表完全同意這個決議草案。我在這裏也祇能重述一遍莫洛託夫同志所說的話。

大轉變的一年

爲十月革命第十二週年紀念而作

過去的這一年，是社會主義建設的一切戰線上大轉變的一年。社會主義向城市及農村資本主義成分舉行堅決的進攻就是這個轉變底標誌。這個轉變已在這個標誌下進行了，而且還繼續在這個標誌下進行着。這個進攻底特徵，就是牠已經使我們在蘇聯國民經濟社會主義改造底各個基本方面，得到了許多可以決定一切的成績。

從這裏就可以看到，我們底黨是能夠在新經濟政策最初幾個階段中，適當地利用一種退守，以便在新經濟政策往後的階段中，進行一種轉變，並對資本主義成分施行一種順利的進攻。

“我們現在是向後退着，然而，我們這樣的後退是預備起初向後退，然後再迅速地向前跑，則跑得更遠。僅是因爲這個目的，我們在施行我們的新經濟政策中，才向退守……以便在退守以後，再開始最堅決的向前進攻，，。（見，列甯全集，第十八卷下冊，第一〇三頁）

這一年來的總結，已經肯定地證明：我們底黨在自己的工作中，執行了列甯這個極端重要的指示，並得到了勝利。

如果拿這一年來的經濟建設（這個對於我們是有極大意義的）底總結來說

，那我們在這裏進攻所得到的勝利，我們這一年來的成績，就可以歸納爲下列三點：

，第一，就是在勞動生產率方面。毫無疑義的，去年經濟建設最重要的事實之一（假使不是唯一重要的事實），就是我們在勞動生產率方面，達到了根本的轉變。這個轉變底表現，就是在社會主義建設中，數百萬工人階級羣衆創造的自動性和強烈的勞動興奮性之發展。這就是我們這一年內第一個和主要的成績。

羣衆底創造自動性和勞動興奮性之發展，是由下列三方面的鬥爭所引起來的：第一方面，是用自我批評的方法，來和壓制羣衆勞動自動性與勞動積極性的官僚主義作鬥爭；第二方面，是用社會主義競賽的方法，來和偷懶者及破壞無產階級勞動紀律的人作鬥爭；第三方面，是用實行不斷生產週的方法，來和生產中的頑固與守舊作鬥爭。結果，我們在勞動的戰線上，得到了極大的成績，例如勞動的熱情和在我們這樣廣闊無邊的國家內四方各處的廣大的工人階級羣衆彼此鼓勵的工作。這種成績底意義之偉大，確是不可計量的；因爲，只有廣大羣衆底勞動興奮和熱情，才能保證勞動生產率的向上提高；如果沒有這種提高，社會主義要徹底戰勝資本主義是不可能的。

列寧曾說：

“歸根到底說來，勞動生產率，的確是保證新社會制度之勝利的最重要的與最主要的條件。資本主義造成了在農奴制度下所未看到的勞動生產率。資本主義可以被徹底消滅，而且必然會徹底消滅，是因為社會主義能夠造成一種新的，更高度的勞動生產率，。（見“列寧全集，第十六卷第二五四頁）列寧根據這點，所以認爲：

“我們現在應當養成一種勞動的熱情和勞動的意志與犧牲，現在救助工農，救助國民經濟，全靠這種勞動的熱情和勞動的意志與犧牲，。（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卷，下冊第四三三頁）

這就是列寧在黨面前所提出的任務。

過去的一年已經證明了，黨的確是很有成效地執行這個任務，堅決地克服橫在這條路上的困難。

黨在這一年來第一個重要的成績就是如此。

第二，就是在工業建設方面。和黨底第一個成績相密切聯結着的就是黨底第二個成績。這第二個成績就是：在這一年內，我們在基本上已經把重工業的基本建設方面基金積聚的問題，好好地解決了；我們在生產工具的生產中，採取了很快的速度；並造成了一種先決條件，預備把我們的國家變成五金業的國家。這就是我們在這一年中第二個主要的成績。

輕工業問題是沒有甚麼特別困難的。因為在幾年以前，我們就把牠解決了。重工業問題是比較困難比較重要。牠所以比較困難，是因為牠需要大批的投資；同時，許多工業落後國家底歷史已經證明，沒有巨大的長期借款，重工業是不能發展的。牠所以比較重要，是因為如果不發展重工業，他們就不能建設任何的工業，就不能實行任何的工業化。我們過去沒有，現在也沒有長期的借款或若干長期的借貸，因此這個問題之困難，對於我們便更加明顯了。全世界資本家本着這個出發點而拒絕把借款和借貸借給我們；我們以為我們是不能用自己的力量來解決基金積聚問題的，以為我們一定會打消改造重工業的問題，以為我們一定要向他們叩頭求救，甘受他們的宰割。

這一年來在這方面得的總結底意義在甚麼地方呢？這一年來總結底意義，就在於他們把各資產階級先生們底計劃，打得粉碎了。這一年來的事實已經指明：不管帝國主義對我們蘇聯施行什麼公開的和秘密的財政封鎖，可是我們卻沒有向資產階級們投降而受其宰割，而且已經用自己的力量，勝利地解決了基金積聚的問題，築下了重工業的基礎。現在，就是工人階級底惡毒的敵人也不能否認這個事實了。實際上，如果去年投入大工業內的基金，共有十六萬萬多盧布，其中有十三萬萬盧布是投在重工業內面的，而今年投入大工業內的基金，則有三十四萬萬多盧布，其中有二十五萬萬盧布是投在重工業內的；如果，去年的大工業生產品總量，是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三，其中重工業底生產品是增

加了百分之三十，而今年的大工業生產品總量則要增加到百分之三十二，其中重工業底生產品總數則要增加到百分之四十六；那末，這難道還不明顯嗎，——建設重工業的基金積累問題，對於我們並不是不能克服的困難；我們正在發展重工業的路線上，很快地前進，超過以前的速度，拋棄我們‘向來的，落後性，關於這個事實，難道還可以懷疑嗎？

五年經濟計劃中的本年原定計劃已被超過了；而資產階級學者所認為是一種‘不可達到的幻想’，我們右傾機會主義者（布哈林同志一派）所聞之害怕的五年經濟計劃底最高標準，實際上，已變成五年經濟底最低標準了。這兩件事實，在我們看了上面所講的以後，難道還可以認為是奇怪的嗎？

列甯說：

‘我們知道，要拯救俄國不僅是需要農民經濟的豐收（這還不够）；不僅是要供給農民用品的輕工業興旺（這也還是不够）；我們需要重工業……。如果不救濟重工業，不恢復重工業，我們就不能建設任何的工業。沒有重工業，我們這個獨立國家，就要滅亡……。重工業是需要國家的補助金的。如果我們找不到這種補助金，我們這個文明國家——我已不說社會主義國家，——就要滅亡了。’（見‘列甯全集，第十八卷下冊第九十五頁）

從這裏就可以看到，列甯是曾經多麼確切地指明了積累問題和黨在建設重工業方面的任務。

這一年來的事實已經指明：黨是能夠堅決地克服這條道路上的一切困難；並很有成效地解決這個偉大的任務。

這自然不是說，工業就不會再有嚴重的困難了。建設重工業的任務，不僅是倚靠在基金積累問題上，而且還要倚靠在幹部人材問題上。第一，要吸收成千成萬同情於蘇維埃的技師和專門家，參加社會主義的建設；第二，要從工人階級隊伍中培養出新的紅色技師和紅色專門家。如果基金積累問題在基本上可以說已經解決了，那末，幹部人材問題，就還在等候解決。同時，在目前改造

工業技術的環境之下，幹部人材問題，正是社會主義建設中一個可以決定一切的問題。

列甫說：

“主要的（我們所缺乏的），是文化力量和管理的能力的問題。新經濟政策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滿能保證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問題僅僅是在於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之文化力量這一點。”（見“列甫文存”，第八本第六十八頁）

很明顯的，這裏首先就是講到“文化力量”的問題，講到對於一般經濟建設，特別是對於工業建設和管理的幹部人材的問題。

但是，從這裏就可以看到，雖然在基金積累方面，我們已得到了對於重工業有極大意義的成績，然而在幹部人材問題未解決以前，我們還不能把建設重工業的問題，當作完全解決了的問題。

因此，黨底任務就是嚴密地注意幹部人材問題和堅決地佔領這一個砲台。黨在這一年來的第二個成績就是如此。

第三，就是在農村經濟建設方面。最後，就說到黨在這一年來的第三個成績，這個成績是和上述兩個成績密切聯結着的。這就是我們農業發展中的根本轉變：由小而落後的個人經濟，轉變為大的先進的集團經濟，轉變為共同耕種，轉變為機器與拖拉機站，轉變為建築在新技術基礎上的合作社和集體農場，轉變為巨大的為數百拖拉機和康伯因機所武裝起來的蘇維埃農場。黨在這裏的成績，就是在許多區域內，我們已經把農民的基本羣衆從舊的資本主義道路（這個道路只對於少數的富裕資產階級有益，而使絕對多數的農民陷於貧困），轉到新的社會主義發展的道路，這個道路，能夠排擠富裕的資產階級，而將中農和貧農重新武裝起來，用各種新的武器，用拖拉機和其他的農村機器，將中農和貧農武裝起來，使他可以勝訴貧困和富農的剝削，而走上廣大的協作的集體耕種的道路。黨底成績就是：不管許多極大的困難，不管一切和各種反動勢力（自富農牧師起，到庸人和右傾機會主義者止）的拚死反抗，我們終久能夠

在農民本身當中進行一種**根本的轉變**，和將廣大的貧農和中農羣衆拉到自己方面來。

這裏就是幾個簡單的數字。在一九二八年，蘇維埃農場的耕種面積，共有一百四十二萬五千海克脫，其五穀商品量，共六百多萬担（約三千六百五十萬普特）；集體農場的耕種面積，共有一百三十九萬海克脫，其五穀商品量，約有三百五十萬担（約二千萬普特）。在一九二九年，蘇維埃農場的耕種面積，共一百八十萬六千海克脫，其五穀商品量，約有八百萬担（約有四千七百萬普特）；集體農場的耕種面積，共有四百二十六萬二千海克脫，其五穀商品量，約有一千三百萬担（約七千八百萬普特）。至於在目前，一九三〇年，照我們所定的標準數字，蘇維埃農場的耕種面積就應達到三百二十八萬海克脫，其五穀商品量要達到一千八百萬担（約一萬萬一千萬普特），而集體農場的耕種面積，則要達到一千五百萬海克脫，其五穀商品量，應達到四千九百萬担（約三萬萬普特）。換言之，就是在一九三〇年裏，蘇維埃農場和集體農場的**五穀商品量**，應達到四萬萬普特以上，就是說，要達到整個農村經濟五穀商品量底百分之五十以上（指在農村以外的五穀流通數量而言）。

這裏必須承認，就是，我們社會主義化了的大工業一般說來發展的速度已經是很快了，但牠也沒有過這種狂風般發展的速度。

我們的年青的大的社會主義農業（集體農場和蘇維埃農場），將有很偉大的前途，將有驚奇的發展，這難道還不明顯麼？

集體農場建設方面這種空前的成績，有許多原因。我們現在至少要將下列的幾個主要原因舉出來：

第一，得到了這種成績，是因為黨實行了一種列甯主義的教育羣衆的政策，因為黨能夠按部就班的用貫輸合作化意識的方法，來引導農民羣衆走向集體的經濟。得到了這種成績，是因為黨對一切傾向進行了一種勝利的鬥爭：一方面和那種企圖超過運動與企圖破壞集體農場之發展的傾向（“左派的，詞句）作鬥爭，他方面，和那種企圖把黨拉往後去，甘作運動底尾巴的傾向（右派的優

子)作鬥爭。如果沒有這種政策，黨就不能把集體農場運動，變為真正的農民本身的羣衆運動。

列甯說：

“當彼得格勒無產階級和彼得格勒衛戍隊的兵士奪得了政權的時候，他們就已經十分了解：爲了農村中的建設，必然要遇着許多很大的困難；這裏更須緩步前進；這裏，如果企圖用法律指令，來強迫實行共同耕種，那就未免是一種極大的錯誤；只有很少一部分覺悟的分子才能這樣做（意即共同耕種——校者註），而絕對多數的農民，是不會提出這種任務的。因此，我們只能作那種爲革命發展底利益所絕對必需的事，就是：我們無論如何不要超過羣衆底發展，而要等候着，等候着運動根據這些羣衆本身的經驗和鬥爭而向前發展。，，（“列甯全集，第五卷五〇〇頁）

如果，黨在集體農場建設方面得到了極大的勝利，那末，這只是因爲黨正確地執行了列甯這個策略的指示。

第二，農業建設方面這個空前的成績，是因爲蘇維埃政權能够正確地估量到了農民對於新農具和新技術的日益增長的需要；是因爲他能够正確地估量到了農民在舊的耕種形式下的沒有出路；因爲他能够估量到了這些，所以他就按時給了他們以幫助：例如，設立農具租借處，拖拉機隊，農業機器站，進行共同耕種，設立集體農場，以及用蘇維埃農場的力量來從各方面幫助農民經濟等等。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在世界中出現了蘇維埃政權，這個政權已經在事實上證明出已準備着和有能力對勞動農民羣衆施行有系統的和長期的生產上的幫助。十分需要農具的勞動農民，不能不接受這種幫助而走上集體農場運動的道路：這難道還不明顯嗎？從今以後，工人底舊口號“面向鄉村，，要用集體農場內農民底新口號“面向城市，來補充：這難道還有什麼奇怪嗎？

最後，集體農場運動方面得到了這種空前的成績，是因爲我們國家內的先進工人能把這種事業，抓到自己手裏。我這裏是指那些幫助農村的工人宣傳隊而言。這些宣傳隊成千成百地散在我國各個重要的區域內，奔走工作。必須承

認，在集體農場運動所有的宣傳家中，工人宣傳家是農民羣衆中間的最優秀的宣傳家。工人們已使農民相信大的集體經濟是比小的個人經濟佔優勢些，而且那些現成的集體農場和蘇維埃農場，正是說明這種優勢的明顯例子；這些事實難道還有什麼奇怪的地方嗎？

我們在集體農場建設方面的成績，就是在這個基礎上生長起來的。據我底意見：這成績是近年來一切成績中最重要，可以決定一切的成績。

以前，有人根據“科學”，來反對建設五萬公畝和十萬公畝的大五穀工廠，以為這是不可能而且不適宜的。現在，這些“科學”，底反駁已經完全破產和煙消雲散了。實際已經把“科學”，底反駁推翻了，已經再一次地證明：不僅實際是要求“科學”，來指教指教，就是“科學”，也是不妨向實際去學習學習的。固然，在資本主義國家裏，還沒有建設巨大的五穀工廠。但是，我們底國家並不是資本主義的國家啊。這個“小小的”，區別，是不能忘掉的。在資本主義國家裏，資本家如果不購買許多土地或不繳納絕對地租，就不能組織巨大的五穀工廠。他們要進行這種生產，就不能不花費一筆極大的支出，因為在那裏，土地私有權還是保存着。在我們這裏則完全相反，在我們這裏，既沒有絕對地租，又沒有土地底買賣制，因為我們這裏並沒有土地私有權；這種事實，就不能不為巨大的五穀工廠之發展，造下一種順利的條件。在資本主義國家裏，資本家建設巨大的五穀農場的目的，是要得到最高限度的利潤，或是至少也要得到與所謂平均利潤率相等的利潤，因為一般說來，如果沒有這樣的利潤，資本家就不會去組織五穀工廠了。至於在我們蘇聯則完全相反，我們底大五穀經濟同時也就是國家的經濟，這種經濟的發展，並不需要最高限度的利潤或平均的利潤率，只要有最低限度的利潤就夠了；有時甚至於不要任何的利潤；這個情形，也為大的五穀經濟之發展，造下了順利的條件。最後，在資本主義之下，對於大的五穀經濟，既沒有特別的優待借款，又沒有特別的優待稅制；但蘇聯的制度是為着要幫助社會主義經濟，在蘇聯的制度之下，這種優待，現在是存在着的，而且將來還是要存在的。高貴的“科學”，把這些事實都完全忘掉了。

右派機會主義者（布哈林同志一派人）底斷言，完全破產了。他們斷定：（一）農民是不會到集體農場內來的；（二）加緊集體農場發展的速度，只是以引起羣衆的不滿意，引起農民和工人階級聯盟的破裂；（三）農村中社會主義發展底“大道”，不是集體農場，而是合作社；（四）發展集體農場和進攻農村中資本主義成分，就會把我們國家變成沒有糧食的國家。所有這些說法都已經破產了，都似資產階級自由派的老廢物一樣地粉碎了。

第一，農民已跑進集體農場來了，他們整村，整鎮，整區的跑進集體農場來了。

第二，廣大的集體農場運動，不僅沒有把工農的聯盟減弱，而且把他加強了，而且給了這個聯盟一種新的生產上的基礎。現在，就是瞎子也可以看到：如果在基本的農民羣衆中還有甚麼很大的不滿意，那末，這種不滿意並不是因為他們認為蘇維埃政權底集體農場政策不好，而是因為蘇維埃政權在供給農民以機器和拖拉機方面，還不能趕上集體農場發展底速度。

第三，關於鄉村社會主義發展“大道”的爭論，是一種學究式的爭論，是一種年青的小資產階級自由派（如亞黑卜瓦爾德和史勒卜可夫一流人）所歡喜的爭論。很明顯地，當廣大的集體農場運動還沒有造成的時候，那麼所謂“大道”，就自然是初步的合作形式，即供給的和銷售的合作社，可是當高度的合作形式，即集體農場形式已跑上舞台的時候，那末，集體農場就成了鄉村發展底“大道”了。實際上，如果不用括弧來說，那末，只有列甯底整個合作化計劃，才算是鄉村社會主義發展底大道；列甯這個合作化計劃，是把農村經濟底一切合作形式（自最低的、供給的銷售的合作形式起，至最高的、生產的集體農場合作形式止），都包括在內的。如果將合作社和集體農場對立起來，就等於侮辱列甯主義，和表顯自己的愚昧。

第四，現在就是瞎子也可以看到：如果我們不向鄉村資本主義成分進攻，如果我們沒有集體農場和蘇維埃農場運動的發展，那麼，我們目前在收買糧食的事業上，就不會得到今年所得到的這樣大的成績，就不能得到那已經積聚在

國家手裏的幾千萬普特的穀類儲蓄。而且，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因為集體農場和蘇維埃農場運動的發展，我們正在完全跑出糧食的危機，或者說已經跑出了糧食的危機。如果我們集體農場和蘇維埃農場是日益迅速地發展，那末再經過三年以後，我們底國家即使不變成全世界中最產糧食的國家，也要變成最產糧食的國家之一；這個前途，是誰也不能懷疑的。

在目前集體農場運動中，有些什麼新的東西呢？在目前集體農場運動中，新的與最重要的東西：就是農民跑到集體農場來的時候，不是如以前一樣，幾個人一羣，幾個人一隊地加入集體農場；而是整村、整鎮、整區、甚至於整州、一下子共同加入集體農場。這表示甚麼呢？這就是表示，中農也跑到集體農場中來了。農村經濟發展中根本轉變底基礎，就在這裏。這個轉變就是蘇維埃政權在這一年來最大的成績。

託洛茨基主義底孟塞維克“意見”，說工人階級不能領導基本的農民羣衆以建設社會主義的“意見”，也完全破產了和被打得粉碎了。現在，就是瞎子也可以看到：中農是到集體農莊方面來了。現在對於任何人都明瞭了：工業和農村經濟底五年計劃，是建設社會主義的五年計劃，誰不相信在蘇聯可以建設社會主義，誰就沒有權利來恭維我們底五年計劃。

各國資產階級最後的一個希望，也完全破產了和完全變成泡影了。他們希望在蘇聯會要恢復資本主義，恢復私有財產的神聖原則；這個最後的希望完全破產了。他們認為農民是培養資本主義的肥料。可是農民却大批地拋棄了這個“私有財產，的光榮旗幟，而走上了集體化的道路，走上了社會主義的道路。恢復資本主義的最後一個希望，完全破產了。

然而，正因此也就引起了我國內部資本主義成分之拚命反抗的企圖。他們想發動一切舊世界的勢力，來反對正在進攻的社會主義，他們這種企圖使階級鬥爭加緊起來。資產階級是不願“生長成爲，社會主義的。

因為這個原因，所以最近來資產階級底馴服走狗：史脫里威，黑興，米留科夫，克倫斯基，丹恩，阿布拉罕維赤等才拚命地向布爾維克主義狂叫狂吠個

不休。我們可以肯定地說：資本主義恢復的最後一個希望，也完全絕望了。

階級敵人底這種憤恨，資產階級走狗這樣狂叫，若不是證明我們黨在社會主義建設的最困難戰線上真正得到了勝利，那麼還是證明甚麼呢？

列甫說：

“掌握國家政權的工人階級，只有在實際上能夠向農民證明：社會的集體的協助的合作的耕種方法，是比較其他耕種方法占優勢的時候；只有能夠用協作的組合的農場來幫助農民的時候；只有在這個時候，他才能切實地向農民證明自己的真理，才能切實地，可靠地，真正地把極廣大的農民羣衆吸收到自己方面來。，（見“列寧全集，第十六卷第三九二頁）

列甫關於吸收極廣大的農民羣衆到工人階級方面來的方法問題，關於使農民轉入集體農場建設道路的方法問題，就是這樣提出的。

這一年來的事實已經指明：黨的確是能夠有成效地完成這個任務，能夠堅決地克服橫在這條路上的一切困難。

列甫說：

“在共產主義社會中，只有當我們能夠改善和提高中農生活經濟條件的時候，中農才能站到我們方面來。如果，我們明天就能夠給他們十萬架頭等的拖拉機，就能夠供給這些拖拉機以揮發油，就能夠供給這些拖拉機以駕駛員（你們都十二分地知道，這個在目前還是一種幻想），那末，中農就會說道：‘我贊成共產呀，（即共產主義）。可是，爲要做到這一點，首先就要克服國際資產階級，就要強迫他們給與我們這樣多的拖拉機；或者，就要把我們底生產力提高到相當的程度，提到可以自己製造這樣多的拖拉機的程度。只有這樣地提出問題，才是正確的。，（見“列甫全集，第十六卷第一五三頁）

列甫關於使中農在技術上重新武裝的方法問題，關於吸收中農到共產主義方面來的方法問題，就是這樣提出的。

這一年來的事實已經證明：黨的確是能夠執行這個任務。大家都知道：在

一九三〇年春天，我們在農村中就會有六萬架拖拉機；從一九三〇年春天以後再經過一年，就會有十萬架以上；再經過兩年以後，我們就會有二十五萬以上的拖拉機了。在幾年以前還被認為是幻想的希望，我們現在已經可以把他加倍地變成事實了。

中農轉到‘共產’方面來的原因，就在這裏。

黨底第三個成績就是如此。

這就是黨這一年來幾個主要的成績。

結 論

我們正在用全副的力量沿着工業化道路前進，向社會主義前進着，把幾百年來的‘俄羅斯式的’，落後性丟到後邊去。我們底國家正在轉變為五金業的國家，汽車化的國家，拖拉機化的國家。當我們把蘇聯安放在汽車上面，把鄉下人安放在拖拉機上面的時候，——那時再讓那些以‘文明’，自誇的尊貴的資本家們去拚命在後面追趕我們罷。那時我們再來看看：可以把那些國家‘當作’，落後的國家，可以把那些國家‘當作’，先進的國家？

蘇聯的土地政策論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馬克羅

主義者的農業學家會議上的演說

同志們！現時我們社會經濟生活中的一個主要事實，一個引起一切人注意的事實，就是集體農場運動底突飛進展。

現在集體農場運動底特點，就是加入集體農場的不像從前一樣，只有個別貧農集團，現在加入集體農場的還有大批的中農。這就是說，集體農場運動由勞動農民個別的集團與個別的階層底運動，一變而為千百萬農民基本羣衆底運動了。用這個也可以說明一件很重要的事實：即集體農場運動帶着強有力的日漸高漲的和反富農運動的性質，這個運動掃除在道路上的富農底反抗，擊破富農，而為鄉村中廣大的社會主義建設開闢道路。

但是，如果我們有根據來誇揚社會主義建設底實際上的進步，那末論到一般經濟方面，尤其是農村經濟方面，我們理論上的工作的進步，就不能這樣講了。而且應該承認，我們的理論上的思想沒有趕上實際的進步，實際的進步與理論的發展，兩者之間有些隔離。但是理論工作不但需要趕上實際，而且要超過他，武裝我們的實行家為社會主義底勝利而奮鬥。

關於理論的意義，你們都很知道，這裏不必多講。大家都知道，理論如果

是真正的理論，牠會給實行家指示方針，指明前途，使他們在工作中有把握，使他們相信我們事業底勝利。所有這些，在社會主義的建設事業上都有——而且不能不有——重大的意義。我們的缺陷就在於我們恰恰在這方面，在經濟問題底理論的研究方面，表現得不健全。如果不然，怎樣來解釋在我們的社會政治生活上關於經濟問題何以還流行着各種資產階級的與小資產階級的理論呢？這些理論與理論家爲什麼到現在還沒有受到應有的打擊呢？馬克思與列寧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底許多基本論據都是反對資產階級的與反對小資產階級的理論極好的防毒劑，何以會被人遺棄，而不在刊物上通俗化起來，爲什麼不把牠擺在第一位上去呢？不站在馬克思，列甯的理論基礎上來與資產階級的理論作不調和的鬥爭，就不能完全戰勝階級的敵人，這一點難道還不容易了解嗎？

新的實際情形產生了新的看法來分析過渡時代的經濟問題。新經濟政策問題，階級問題，建設的速度問題，工農聯合問題，黨的政策問題等等，現在都與前不同了。如要不落在實際之後，現在就要馬上用新環境的觀點來把這一切問題加一番研究。不如此就不能征服那些滑頭實行家頭腦的資產階級的理論。不如此就不能剷除這些偏見很深的理論。因爲只有在理論上與資產階級的偏見作鬥爭，才能鞏固馬克思主義列甯主義底地位。

讓我來說明幾個命名爲理論的資產階級的偏見，說明他們對於我們建設上的幾個主要問題的解釋是毫無根據的。

一 “平衡”論

你們當然知道在共產黨員內還流行着所謂我們國民經濟各種成份底“平衡”論。這種理論當然與馬克思主義毫無相同的地方。然而還有許多右派營壘中的同志拿它來做宣傳。依這種理論講來，第一我們有一個社會主義的經濟成份——這是一個箱子，此外我們又有非社會主義的經濟成份，也可以叫做資本主義的成份——這是另一個箱子。這兩個箱子各有各的軌道，和平地向前行駛，彼此不相接觸。依幾何學講，平行線是永不相交的。然而這種高明理論底發明

家却認為這兩條平行線有一天總會交合起來；牠們一相交合，社會主義就出現了。可是，這個理論忘記了在這些所謂“箱子”，的後面站着各階級。這些“箱子”，底運動是在這複雜的階級鬥爭，拚死命的鬥爭，以“誰勝誰敗，為原則的鬥爭底條件之下進行着的。

很明白的，這理論與列寧主義毫無相同之點。這個理論客觀上的目的是要保持個人農民經濟底地位，而拿“新的”，理論去武裝富農份子，來做反集體農場的鬥爭而降低集體農場底地位。然而這種理論至今還流行於我們的出版界，牠還沒有受到我們的理論家方面的打擊，更不用說致命的打擊了。像這種怪現象底存在，除了我們理論思想的落後之外還有什麼緣故呢？

然而，只要打開馬克思主義底寶庫，取出複生產的理論來與各種成份平衡的理論對照一下，就可以使後一個理論消滅得無影無蹤。實際上，馬克思的複生產理論告訴我們，沒有逐年的積累，現代社會是不能發展的，而沒有逐年推廣的複生產，積累就不可能。這一點是顯而易見的。我們大規模的集中的社會主義工業是依馬克思的擴大複生產的理論而發展的，因為牠本身是逐年增長，有牠自己的積累，牠是大踏步地前進着。但是我們的國民經濟並不單是我們的大工業。反之，在我們的國民經濟中還是小農經濟佔大部份。是否可以說我們的小農經濟也是依然擴大複生產的原則而發展的呢？不是的，我們不能這樣說。我們的小農經濟大多數不但不能每年實現擴大複生產，而且還不常有實現簡單複生產的可能。這種小農經濟既不能擴大複生產，又在我們的國民經濟上佔着大部份，我們有這種農村經濟的基礎，是否能夠加速地繼續推進我們社會化的工業？這是不行的。蘇維埃政權與社會主義的建設是否可以在一個多少比較長久的期間內建立在兩個不同的基礎上——在最巨大的、統一的、社會主義的工業基礎之上，及在最散漫的、落後的小商品的農民經濟底基礎之上呢？這是不行的。如果這樣，連整個的國民經濟都要完全斷送了。那末出路又在那裏呢？出路在於擴大農村經濟，使牠能夠積累，能夠擴大複生產，並由此改造國民經濟底農業基礎。但是怎樣把牠擴大起來呢？要擴大牠有兩條道路：有資本主

義的道路，就是在農村內扶植資本主義來擴大農村經濟。這條道路是會使農民貧窮，使農業中的資本主義企業發展起來。這條道路是我們所要排斥的，因為它與蘇維埃經濟是不相容的。另外又有一條道路，就是社會主義的道路，就是在農業上扶植集體農場與蘇維埃的國立農場，這條道路能使小農經濟合併為大規模的集體農場，用技術與科學武裝起來，把農業中的資本主義份子排除出去。我們擁護第二條道路。道路只有採取一條，不取第一條便取第二條，不是後退——走向資本主義，即是前進——走向社會主義。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而且是不能有的。‘平衡，論就是我第三條道路的企圖。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而且是不能有的。‘平衡，論就是我第三條道路的企圖。正因為他打算走第三條（不存在的）道路，所以他是烏托邦的，是反馬克思主義的。所以，只要把馬克思的復生產的理論拿來同各種成份‘平衡，，的理論對照一下，就可以使後一個理論沒有存在的餘地了。

爲什麼我們的馬克思主義的農業學家不幹這件事呢？誰要滑稽可笑的‘平衡，論橫行於我們的出版界，而馬克思主義的復生產的理論倒反而拋在腦後呢？

二 社會主義建設的“自流，論

現在再來講政治經濟學上的第二種成見，第二種資產階級式的理論。這就是社會主義建設上的“自流，論。這個理論和馬克思主義沒有一點相同的地方，但是他却被右派營壘中的同志們所熱心提倡着。這個理論底發明家大概是這樣說法：我們曾經有過資本主義，工業曾經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上發展，而鄉村曾經跟在資本主義的城市後面自然地、自動行走，依照資本主義城市底模型而自行改造。在資本主義之下既是這樣，在蘇維埃經濟之下又何嘗不可這樣呢？鄉村，小農經濟又何嘗不可以用自動的辦法跟着社會主義的城市跑，依照社會主義城市底模型而自然改造呢？這個理論底發明家根據這一點，就斷定鄉村可以用自流的辦法而跟着社會主義的城市行走。這裏就要發生問題：假使鄉村本

來就可以跟着社會主義的城市跑，那麼我們是否還值得爲組織集體農場和圍立農場而操心費力，我們是否值得來斷干折戈呢？

這個理論底客觀上的目的又是把新的武器交給鄉村資本主義份子來反對集體農場。這個理論底反馬克思主義的實質是毫無疑義的。我們底理論家居然沒有工夫來擊破這種謬論，讓他淆亂我們實行家底頭腦，你想奇怪不奇怪？

社會主義城市對於小農經濟的領導作用是偉大而不可限量的，這一點是毫無疑義的。工業改造農村經濟的作用也就在這裏。但是，這個要素是否足以使小農的鄉村在社會主義建設上跟着城市跑呢？不，這是不夠的。在資本主義之下，鄉村所以自然地跟着城市跑呢，是因爲城市底資本主義經濟與農民底小商品經濟在基本上是同類的經濟。固然，小農商品經濟還不是資本主義的經濟；但是在基本上牠與資本主義經濟是同類的，因爲他是以生產工具的私有權爲基礎的。當列甯評論布哈林同志所著的“過渡時代底經濟”，一書時，列甯曾說到“農民底商品資本主義傾向，與‘無產階級底社會主義傾向，對立，列甯底這些話這是萬分正確的。★正因此，所以“小生產經常地、每日每時自然而然地、而且大批地產生資本主義與資產階級，（列甯）。是否可以說小商品的農民經濟基本上是與城市中社會主義的生產同類呢？如果你不脫離馬克思主義，顯然是不能這樣說的。要不然，列甯就不會說：“我們還是生活在小農的國家內，在俄國的資本主義比共產主義有更鞏固的經濟基礎，，因此，社會主義建設上的“自流論，是反列甯主義的。因此，要使小農鄉村跟着社會主義的城市跑，其他一切都除外，還必需在鄉村中建立如集體農場與蘇維埃農場那樣的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底經濟，作爲社會主義底基礎，這種基礎能够在社會主義的城市底領導之下率領農民的基本羣衆前進。

問題非常明顯。社會主義建設內的“自流論，是反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的城市應該率領小農的鄉村，在鄉村中建立集體農場和蘇維埃農場，把鄉村改造成社會主義的形式。

★着重符號“……”，是列甯標上的（斯大林註）

社會主義建設上的“自流”，論這種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直到現在還沒有從我們的農學理論家方面受到應有的打擊，這是很奇怪的事情。

三 小農經濟“穩固”，論

再講到政治經濟學上的第三個謬論，即小農經濟“穩固”，論。大家都知道，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反對馬克思主義謂大經濟勝過小經濟的有名的意見，依他們看來，這個意見只在工業上有效，却不能够應用到農村經濟上去。達達特，黑爾茨道班社會民主黨的理論家，宣傳這種理論，企圖“根據”，下述的事實：小農能堅持，善忍耐，只要保得尺寸之地，便什麼困苦都能忍受；因為如此，所以在農業方面小農經濟與大經濟鬥爭時，就表現出自己的穩固性來。我們不難知道，這樣的“穩固”，比任何的不穩固都要壞些。不難知道，這種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只有一個目的：頌揚並鞏固資本主義的制度。正因為他有這種目的，所以馬克思主義者就很容易的擊破了他。但是現在問題不在這裏。問題在於我們的實際已貢獻我們新的論證來反對這種理論，而我們的理論家不知怎樣竟不肯或不能利用這種新的武器來反對工人階級底敵人。這裏所講的實際是指推翻土地私有權底實際，土地國有底實際，以及實行解放小農，使他不再像奴隸一般束縛在自己的尺寸土地上，並由此而促進他走上集體化的軌道的這種實際。

在西歐各國，過去，現在，以及將來，是什麼東西把小農束縛在他的商品經濟之上呢？首先，而且主要的，就是他有那塊尺寸土地，就是那個土地私有權。他多年積累一點錢，就是爲的要買一小塊土地，買了土地之後，自然不願捨棄他，寧可忍受一切窮困，寧可過粗野的生活，也死守着這一小塊土地——他的個人經濟底基礎。是否可以說這種要素也在我們蘇維埃制度之下繼續發生作用呢？不，這樣說不行。因為我們沒有土地私有權。正因為我們這裏沒有土地私有權，所以我們這裏也不像西歐那樣，農民像奴隸一般的束縛在土地上。這種情況不能不促進小農經濟走上集體農場的軌道。在我們國家內，在土

地國有的條件之下，鄉村中的大經濟，鄉村中的集體農場之所以能夠如此容易表現他勝過小農經濟，其中的一個原因，也就在這裏。蘇維埃的土地法消滅了絕對地租，取消了土地私有，規定了土地國有，他的偉大的革命意義也就在這裏。但是由此我們就有新的論證來反駁資產階級的學者所謂小農經濟在他與經濟鬥爭中的穩固性。爲什麼我們的理論家（農學家）在他們反對一切資產階級的理論時，不充分利用這種新的論據呢？

而且，我們進行土地國有所根據的理論前提，是馬克思的‘資本論’，第三卷，他的著名的剩餘價值論和列寧的有名的土地問題的著作，這些著作都是理論思想底極豐富的寶庫。我所指的是一般的地租的理論，特別是絕對地租的理論。現在大家都知道，這些著作中的理論顯然都被我們鄉村與城市中社會主義建設底實際所證實了。所不瞭解的，只是笨牙諾夫式的‘蘇維埃’，經濟學家底反科學理論何以會橫行於我們的出版界，而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論地租與絕對地租的天才的著作反不能通俗化，反不提到首要的地位上去而拋在腦後呢？

你們總應記得恩格斯論‘農民問題’，的有名的小冊子。你們當然還記得恩格斯怎樣謹慎地講到小農轉上合作經濟，集體經濟的軌道的問題，讓我從他那書上引出一段相當的話來吧：

‘我們堅決地站在小農方面。我們盡可能地去改善他的生活，去幫助他進到合作經濟，如果他有這種決心的話。如果他還不能夠下這種決心，我們就給他以盡可能的較多的時間，讓他去坐在自己那一小塊土地上去思量一番。’，（重號是斯大林標上的）

你們看，恩格斯對於個人的農民經濟走上集體軌道的問題何等謹慎。恩格斯這種表面上似乎是過分的謹慎，到底怎樣來解釋呢？他的出發點何在呢？很明顯的，他的出發點就是土地私有權底存在，他就是根據農民佔有一小塊土地而不肯輕易放手的事實。西歐的農民就是這樣。凡有土地私有權的資本主義國家底農民都是這樣。當然這裏需要格外謹慎。是否可以說我們蘇聯也有這種情況？不，不能這樣說。因爲我們這裏沒有土地私有制，以致於把農民束縛在個

人經濟上，因為我們這裏是土地國有，所以容易使個體農民走上集體的軌道。我們最近的集體農場運動之所以比較容易發展，而且迅速發展，這也是原因之一。

所恨的，就是我們的農學理論家，還未曾打算十分明顯地揭露我們的農民狀況與西歐農民狀況底分別。然而這種工作不但對於我們蘇維埃的工作人員，而且對於各國共產黨員都有極大的意義。因為在資本主義國家裏是否應從無產階級奪得政權的那天起，就在土地國有的基礎上或不在這種基礎上來建立社會主義，這對於資本主義國家內的無產階級革命，並不是沒有什麼關係的問題。

我在不久以前一篇論文中（“大轉變的一年，”）發揮了一些論據，證明農業上大經濟比小經濟優越，當時所指的是大規模的蘇維埃農場。很明顯的，所有這些論據也完全適用於集體農場，因為集體農場也是大規模的經濟單位。我所指的不單是發達的有機器和拖拉機作基礎的集體農場，同時也指那些初級的依賴農民器具的，即所謂“手工作坊式”的集體農場。我談的是現時在統盤集體化的區域內所建立的，只依靠農民生產工具底簡單湊合的那些初級集體農場。例如在從前的頓河州，河帕拉區底集體農場。這種集體農場就技術上看來（機器少，拖拉機少）似乎和小農經濟差不多。其實農民工具簡單湊合在集體農場內，便得到了我們底實行家所夢想不到的功效。功效在什麼地方呢？功效就在於一成立集體農場，就使耕種的面積擴大了百分之三十，百分之四十，以至於百分之五十。這種“驚破腦袋”的功效是怎樣來的呢？這是因為農民在個人勞動的條件之下力量薄弱；一旦把工具合併起來，統一於集體經濟內，便變成了極大的力量；因為農民能夠耕種在個人勞動條件下難於耕種的荒地和生地；因為農民可以把生地拿到自己手裏來；因為一切荒地，小塊的土地，地畝的境界等等都有使用底可能了。

耕種荒地與生地的問題對於我們的農村經濟有偉大的意義。你們知道，從前俄羅斯革命運動底樞紐就是土地問題。你們知道，土地運動的一個目的就是要消滅土地缺少的現象。以前有許多人以為土地缺乏是絕對的，這就是說，再

沒有更多的空地可以耕種的了。事實上究竟是怎樣呢？現在大家都知道，蘇聯底空地會有幾千萬海克托。但是農民要用自己的一點可憐的工具來耕種這麼多的土地，是沒有任何可能的。正因為他們沒有耕種荒地和生地的可能，所以大家都往“鬆地”，上鑽，都眼巴巴地望着以前屬於地主的土地，都要想那些在個人勞動之下用農民自己的農具便於耕種的土地。這就是“土地缺乏”，底根源。所以，我們的“糧食托辣斯”，現在可以開墾兩千萬海克托的空地，這些土地是農民所不要的，是個人勞動之下，用小農器具所不能耕種的。集體農場運動（在牠的各階段上，無論在初期或盛期，即有了拖拉機的時候），牠的意義都在乎農民現在得到了使用荒地和生地的可能。農民一進為集體勞動，耕種面積就大大地增加。其原因就在這裏。集體農場勝過個人農民經濟，他的一個基礎，也就在這裏。在統整集體化的農業區內，若有拖拉機站與拖拉機隊來幫助初期的集體農場，集體農場自己又可以採辦拖拉機和“康拜因”，機，那麼集體農場比較個人經濟優越，更顯然無疑了。

四 城市與鄉村

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還發揮一種謬論，就是所謂“剪刀”，說。我們要毫不留情地反對這種理論，同反對流行於蘇聯出版界的一切其他的資產階級的理論一樣。我指的這種理論說：十月革命所給農民的要比二月革命少，老從說來，十月革命對於農民什麼好處也沒有。這種謬論曾經有個時候被一位“蘇維埃的”，經濟學家在我們的出版物上，大事鼓吹。固然這位“蘇維埃的”，經濟學家後來放棄了他的理論。（台下叫：到底是誰呢？）這就是格羅曼。但是這個理論大受託洛茨基與季諾維埃夫的反對派底稱許，曾被他們利用來反對黨。就是現在也絕對不能斷定說牠不流行於“蘇維埃的”，輿論界。同志們，這是一個極重要的問題，牠牽涉到城市與鄉村間的相互關係問題，牠牽涉到消滅城市與鄉村間的矛盾的問題。他牽連到極切實的，關於“剪刀”，的問題。因此我以為這一個怪論也值得研究。

說農民沒有從十月革命方面得到一點好處，這話對不對呢？

請看事實吧。在這裏有著名統計學家哥姆爾諾夫同志著名的統計表，該表曾經在我的‘糧食問題’一文內發表過。從這表上可以看到革命前地主‘生產了’，六萬萬普特糧食，富農‘生產’，十九萬萬普特糧食。這就是說那時的地主手裏握有六萬萬普特糧食，那時富農有極大的勢力。貧農與中農生產了二十五萬萬普特糧食。從前的鄉村，十月革命以前的鄉村就是這樣情形。十月革命以後鄉村中起了什麼變化呢？還是拿這統計表上的數目字來看。就在一九二七年吧。這年地主生產了多少呢？很明顯的他們什麼也沒有生產而且也不能生產，因為地主都被十月革命消滅了。你們知道這對於農民就輕易了許多，因為農民脫離了地主的火坑。這自然是農民從十月革命所得到的很大的利益。富農在一九二七年生產了多少糧食呢？已不是十九萬萬普特。而是六萬萬普特了。可見十月革命以後富農勢力縮小了三倍多。你們知道，這不能不使貧農和中農底狀況輕鬆起來。一九二七年貧農和中農生產了多少糧食呢？已經不是二十五萬萬普特，而是四十萬萬普特了。可見十月革命以後貧農和中農生產的糧食比革命前多十五萬萬普特。

這些事實就證明貧農和中農從十月革命方面得到了極大的利益。

這就是十月革命給貧農和中農的東西。

事實如此，如何還可以瞎說十月革命沒有給農民一點好處呢？

這還不算。十月革命推翻了土地私有權，廢除了土地買賣制，規定了土地國有。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農民要生產糧食並不必去買土地。從前他們多年積累幾箇本錢，爲的是要買一塊土地。負重債，當奴役，只爲的是得到一塊土地。購買土地的費用當然要算在糧食的生產價值上去。現在農民已不需要這樣了。現在他不買土地，可以生產糧食。這是什麼呢？這是不是減輕農民底負擔呢？很明顯的，是減輕。

其次。在最近以前，農民還用舊式農具，用個人勞動的方法去種田。大家都知道，個人勞動使用腐舊的，現在已經不中用了的生產工具，決不能賺得必

需的資料來進寬裕生活，經常地提高物質狀況，發展自己的文化，和踏上社會主義建設或廣闊大道。現在呢，自從加緊發展集體農場運動以後，農民就可以把自己的勞動和鄰人的勞動聯合在集體農場之內，開闢生地，利用荒地，得到機器和拖拉機，因此自己的勞動生產率提高了兩三倍。這表示什麼呢？這是說農民現在，因加入集體農場之故，可以獲同等的勞力而得更多的生產。這是說，糧食的生產比以前便宜得多了。這是說，如價格不變，則農民出賣糧食得到的比以前多得多了。

看了這些事實以後，何以能斷定十月革命沒有給農民以利益呢？

說這種怪話的人顯然是詆蔑黨與蘇維埃政權，難道還不明顯嗎？

但是由上述種種可以得出什麼結論來呢？

由此可以說，關於‘剪刀’，與消滅‘剪刀’，的問題，現在應有新的說法。又可以說，假使集體農場運動依目前的速度發展下去，則‘剪刀’，很快地就要消滅。由上述種種又可以說，城市與鄉村的相互關係問題立在新的基礎上，城市與鄉村的矛盾現象可以加速地消滅。

同志們，這一點對於我們的全盤建設是有極偉大的意義的。他改造了農民的心理使他們面向城市。他創造了消滅城鄉間矛盾的基礎。他造成了一種基礎使黨底‘面向農村’，的口號可以補上一個集體農民‘面向城市’，的口號了。這一點也不奇怪，因為農民現在從城市中得到機器，拖拉機，農學家和組織家，又得到了反對富農及克服富農底直接幫助。懷疑城市像懷疑強盜一樣的舊式農民現在往後退了。代他而興起的有新的農民，有集體農場的農民，他對城市懷着熱望，希望從城市裏得到真正的生產的幫助。舊式的農民害怕降為貧農，想偷偷的升到富農的地位（可以喪失選舉權！），現在起來代替他們的是新的農民，新農民有他們新的前途——加入集體農場，逃出窮困，而走上經濟發達的大道。

事情是這樣轉變了，同志們！

更可痛的，是我們的農學理論家不採用一切方法來澈底剷除企圖抹煞十月

革命勝利和不斷發展着的集體農場運動的那些資產階級的理論。

五 論集體農場底性質

集體農場是一種經濟底形式，是社會主義經濟形式之一種，這是毫無疑義的。

有位同志在這裏發言，抹煞了集體農場底意義。他斷定集體農場是經濟的組織，與社會主義的經濟形式沒有一點相同的地方。同志們，我應當申明，這樣評論集體農場是完全不正確的。毫無疑義的，這種批評與列甯主義毫不相容。

經濟形式是由什麼來決定的呢？當然是由生產過程中人底關係來決定的。難道還有別的東西可以決定經濟形式嗎？但是要問：在集體農場內難道有生產工具私有主這個階級和喪失了這些生產工具的階級嗎？集體農場內難道有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嗎？難道集體農場不是在國家的土地把主要的生產工具社會化嗎？有什麼根據來肯定集體農場這種經濟形式不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形式之一？

當然，集體農場內是有矛盾的。當然在集體農場內是有個人主義的甚至於富農的殘餘，這些殘餘還沒有消滅，但是一到了集體農場的鞏固和機器化的程度加强的時候，這些殘餘是一定要消滅的。可是整個集體農場，把他的矛盾與缺點都算在一起，把他當作一種經濟看，他在基本上是代表農村發展底新路線，農村社會主義發展的新路線，去對抗富農，去反抗資本主義的發展路線的，這難道也可以否認嗎？集體農場（當然不是指假的集體農場而言）在我們的條件之下是鄉村中社會主義建設底樞紐與基礎，是在與資本主義份子作死戰中生長起來的，這難道可以否認嗎？

有些企圖抹煞集體農場，宣佈他們是資產階級的經濟形式，這種企圖毫無一點根據，這難道還不明顯嗎？

一九二三年我們還沒有大規模的集體農場運動。列甯在他的“論合作，這

本小冊子內講到合作的一切種類及其最低階級形式（販賣合作社）和高級形式（集體農場的形式）。他關於合作，關於合作的企業怎樣講呢？他那本小冊子上有這樣一段話：

“在我們的現行制度之下，合作的企業和私人資本主義的企業有着分別，因為他是集體的企業，但是如果他是建立在國有的土地上，同時又有屬於國家的，即屬於工人階級的生產工具，那麼他就和社會主義企業沒有分別，，。（註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可見列甯並不把合作企業單獨拿來看，而是把牠們與我們的現行制度聯繫起來，看牠們是在國有的土地上，在生產工具國有的國家內而發生作用的，列甯既是這樣觀察牠們，於是肯定說，合作企業與社會主義的企業沒有分別。

這是列甯論到一般的合作企業的說法。關於我們現在的集體農場，更有根據來說這樣的話，這還不明顯嗎？

因此，列甯認為在我們的條件之下，“合作社底簡單發展，是與“社會主義底發展一樣，，。

你們知道，這一位發言的同志抹煞集體農場底意義，是犯了反列甯主義的極大的錯誤。

由這個錯誤又發生其他的一個錯誤——即關於集體農場內的階級鬥爭問題上的錯誤。這位發言的人描寫了集體農場的階級鬥爭，用了十分濃厚的色彩，以致令人設想集體農場內的階級鬥爭與集體農場外的階級鬥爭沒有分別。而且可以令人設想集體農場內的階級鬥爭更要劇烈些。同時在這方面犯錯誤的不單是這一位發言的人。浪談階級鬥爭，空喊集體農場內的階級鬥爭是現在我們的一切“左的”，空喊家的特徵。最好笑的是這些空喊家在沒有或差不多沒有階級鬥爭的地方偏偏“看見，階級鬥爭，但在階級鬥爭存在而且揚溢於外的地方倒反視而不見。集體農場內沒有階級鬥爭的成份嗎？有的。要是集體農場內還保有個人主義的甚至於富農的心理底殘餘，要是那裏還有些不平等，那末，階級鬥爭底成份是不會沒有的。是否可說集體農場內的階級鬥爭與牠以外的鬥爭是

相同的呢？不，不同。我們的‘左的’，空談家不看見這種差別，其錯誤就在這裏。在組織集體農場以前，集體農場以外的階級鬥爭是什麼呢？這就是反對握有生產資料和生產工具並藉此來奴役貧農的富農的那種階級鬥爭。這種鬥爭是拚死命的鬥爭。但在集體農場基礎上的階級鬥爭又是什麼呢？第一，這是富農被擊破了並且被剝奪了生產資料和工具；第二，這是貧農和中農在生產資料和生產工具社會化的基礎上聯合到集體農場裏面去了。最後，這是集體農場內部各份子間的鬥爭，其中有些份子還沒有脫去個人主義的和富農心理的遺跡，希望利用農場內一些不平等來謀個人利益，另一些人想把這些遺跡和不平等提出農場之外。只要不是瞎子，誰都會看見集體農場內部和外部的階級鬥爭底區別，這難道還不明顯嗎？

如果以為有了集體農場便算社會主義建設上必需的東西都有了，這是錯誤的。若以為加入集體農場的都已變成了社會主義者，那尤其不對。實際上還需要當許多功夫來改造集體農場的農民，糾正他們個人主義的心理，把他們造成社會主義社會底真正的勞動者。集體農場機器化底過程越快，則這步功夫也做得越快。但這絲毫不減少集體農場是農村社會主義改造底積得之偉大的意義。集體農場偉大的意義，就在於他們是農業上使用機器和拖拉機的基礎，他們是改造農民，依無產階級社會主義底精神而改造農民心理的基礎。

、 列寧說得好：

‘改造小農，改造他們的全盤的心理與習慣，這是需要幾代功夫的事業。只有物質基礎和技術，只有農業上大規模的應用機器和拖拉機和大規模的電氣化，能夠解決這個對待小農的問題，能夠健全他的整個心理。’，集體農場正是這種社會主義經濟的形式，只有經過這種經濟形式才可以使千百萬小農接近機器和拖拉機，接近這些提高經濟的槓桿，接近農村經濟的社會主義發展底槓桿，這一點誰能否認呢？

我們的‘左的’，空談家把這一點忘記了，
我們的這位發言的同志也忘記了這一點。

六 階級的變動和黨的政策上的轉變

最後講到階級的變動與社會主義對鄉村資本主義份子的進攻問題。

最近一年來我們工作底特點，就是我們的黨和我們的蘇維埃政權：第一，在各方面擴大了對鄉村中資本主義份子的進攻；第二，大家都知道，這一個進攻已經有了而且穩健的生出來很顯著的好的結果。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從限制富農剝削傾向進而消滅富農這個階級了；這就是說我們在全部政策上造成了而繼續還在造成一個舉足輕重的轉變。

以前黨一向是主張限制富農剝削。大家知道這個政策是在第八次代表大會上宣佈的，當實行新經濟政策時，在第十一次黨的大會上，又重新宣佈過這個政策。大家都記得列寧給普列布拉仁斯基底著名的信（一九二二年），在這封信中，他又講到必需實行這一個政策。最後，該政策又由第十五次大會批准了。我們一直執行到最近。

這個政策對不對呢？自然對，牠無條件是對的。我們在三五年前是否可以像現在這樣進攻富農？我們當時是否可以指望到這種進攻的勝利？不，不可能的。要是這樣，那就是極危險的冒險政策。就是極危險的以進攻為兒戲。因為我們一定要遭失敗，一遭失敗便會鞏固富農底地位。為什麼？因為那時我們在鄉村中還沒有像集體農場和蘇維埃農場那樣的支柱，作為大舉進攻富農的根據地。因為我們那時還不能拿集體農場與蘇維埃農場那樣的社會主義的生產來代替富農資本主義的生產。

一九二六到二七年，季諾維也夫與託洛茨基的反對派極力要把馬上進攻富農的政策強迫黨接受。黨不採用這種危險的冒險政策，因為黨知道穩重的人決不肯拿進攻來作兒戲。進攻富農是件嚴重的事情。不可把牠與反富農的宣言混淆了。也不可把牠與託洛茨基，季諾維也夫的反對派要強迫黨提出的向富農搔癢的政策混淆了。進攻富農就是打破並消滅富農階級。除了這些目的之外，那麼所謂進攻就是一個宣言，就是搔癢，就是空口白話，卻不是真正布爾塞維克

的進攻。向富農進攻就是準備動手打擊富農，打擊牠使牠再也站不住腳。我們布爾塞維克就把這個叫做真正的進攻。我們在三五年前是否能舉行這樣的進攻而希望得到勝利呢？這是不可能的。

實際上，富農在一九二七年生產了六萬萬多普特糧食，其中拿出來在農村以外去交易的有一萬三千萬普特。這是很大的力量，這是不可忽視的。當時我們的集體農場和蘇維埃農場生產了多少呢？一共八千萬普特，其中送到市場上去的（商品糧食）約三千五百萬普特。你們試想一想，我們當時能否拿集體農場和蘇維埃農場底生產與商品糧食來代替富農的生產與商品糧食呢？當然是不可能的。在那種條件之下向富農堅決的進攻的結果是什麼呢？結果一定是失敗和加強富農的地位，而且要落得沒有糧食吃。因此我們當時不能而且不應實行進攻富農，我們反對託洛茨基與季諾維也夫反對派的冒險宣言。

現在呢？現在事情怎樣呢？現在我們有充分的物質基礎來打擊富農，擊破牠的反抗，消滅牠的階級，拿集體農場和蘇維埃農場底生產來代替牠的生產了。大家知道，一九二九年集體農場和蘇維埃農場的糧食生產總共不下四萬萬普特（比一九二七年富農的生產少二萬萬普特）。大家又知道，一九二九年集體農場與蘇維埃農場所出產的商品糧食共一萬萬三千萬普特有餘（即比一九二七年富農的還多些）。最後大家還知道，一九三〇年蘇維埃農場和集體農場的糧食底總生產將不下九萬萬普特（即比一九二七年富農生產的要多），商品糧食將在二萬萬普特以上（即比一九二七年富農所生產的要多得多）。

同志們，這就是我們現在的情形。這就是我們國家經濟中所發生的變動。

你們已經看見，我們現在有了物質基礎，可以用集體農場與蘇維埃農場底生產來代替富農底生產。因此我們向富農進攻才有顯著的成效。所以講到進攻富農，要實際的進攻而不要限於一紙反富農的空文。

因此，我們最近才由限制富農剝削傾向的政策，進而為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了。

各方面都來問，怎樣實行消滅富農的政策呢，我們在整個集體化的區域內

是否可以消滅富農呢？問題太可笑了。當我們還主張限制富農底剝削傾向時，當我們不能堅決進攻富農時，當我們不能拿集體農場與蘇維埃農場底生產來代替富農的生產時，消滅富農是不可以的。在那時不容許消滅富農底政策是必需的，是正確的。現在呢？現在又是另外一回事了。現在我們有可能向富農作堅決的進攻，打破他的抵抗，消滅他的階級，拿集體農場和蘇維埃農場底生產來代替富農底生產了。現在消滅富農是由實現統整集體化的貧農中農羣衆自己來進行的。現在在統整集體化的區域內消滅富農已不是簡單行政的手段了。現在消滅富農在那些區域內是集體農場建設和發展底組成部分。所以現時多談消滅富農，未免滑稽可笑而且不莊重。已經割去了腦袋，便用不着去哭頭髮了。

另一個同樣可笑的問題：可否讓富農加入集體農場呢？當然不能讓牠加入，因為牠是集體農場運動底討厭的敵人。問題大概是明白了。

七 結 論

同志們！這是六個樞紐問題，忽略了這六個問題，我們馬克思主義的農學家底工作是不能進行的。

這些問題底意義，首先就是把這些問題加以馬克思主義的研究便可以澈底剷除一切及各種資產階級的理論，這些理論有時——真是丟臉——還被我們共產黨員同志所散佈，淆亂我們實行家底頭腦。老早就應該剷除並拋棄牠們，因為只有和這些理論作無情的鬥爭，才可以發展並鞏固馬克思主義的農學家的理論思想。

這些問題底意義，還在乎牠們能給過渡時代經濟底舊問題換上新面目。

現在，新經濟政策的問題，階級的問題，集體農場的問題，過渡時代經濟的問題等等都與以前不同了。有些人把新經濟政策了解為退守，而且僅僅了解為退守，這種錯誤一定要揭露出來。實際上列甯還在開始實行新經濟政策的時候就說了，新經濟政策並不盡在退守，他說，牠同時也是準備向城市和鄉村中資本主義份子作堅決的進攻的政策。還有些人以為新經濟政策只是為聯絡城市

與鄉村而需要的，這種錯誤也是要指出來的。我們所要的不是任何的城市與鄉村間的聯繫，而是那種足以保障社會主義勝利的聯繫。我們之所以主張新經濟政策，是因為他是為社會主義出力的；當他不能盡力於社會主義事業時，我們把他拋棄。列甯說過，新經濟政策底實行是認真的而且是長久的，但他從來沒有說過要永遠施行新經濟政策。

我還得要提一提馬克思的複生產理論底通俗化問題。應當研究我們國民經濟底均衡表的問題。一九二六年國家統計局所發表的國民經濟均衡表這不是均衡表而是玩弄數字。巴薩羅夫，格羅曼，對於國民經濟問題的意見也不合於事實。蘇聯國民經濟底均衡表由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來製定，要是他們想研究過渡時代經濟問題的話。

要是我們的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家能派出一批專門人材，來研究新環境中的過渡時代的經濟，那就很好了。

論消滅富農階級底政策

關於一九三〇年正月二十一日“紅星報”上的文章

“紅星報，第十六號所載的“消滅富農階級，一文，一般說來，毫無條件是正確的，可是在措辭方面，有兩個不確之點。我以為這兩個不確之點是應當改正的。

第一，在這篇文章中說：

“在恢復的時期中，我們執行了限制鄉村和城市資本主義份子的政策。從改造時期起，我們就開始由限制政策，轉入排擠的政策了。”，

這樣的說法是不對的。限制資本主義份子的政策與排擠資本主義份子的政策，並不是兩個不同的政策。這是一個政策。排擠鄉村的資本主義份子，是限制資本主義份子的政策和限制富農剝削傾向的政策必然的結果與組成部分。排擠鄉村中的資本主義份子，還還不是排擠富農階級。排擠鄉村中的資本主義份子，這是排擠和克服富農中那些不能擔負稅務的壓制，無力支持蘇維埃政權的限制方法的個別隊伍。很明顯的，限制富農剝削傾向的政策，限制鄉村中資本主義份子的政策，不能不做到排擠富農中的個別隊伍。因此，排擠富農個別隊伍，不能不認為是限制鄉村資本主義份子的政策之必然結果與組成部分。

在我們國內，不只是在恢復時期內執行了這個政策，在改造時期中也是執

行的。就是在第十五次大會以後（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在吾黨第十六次臨時代表大會時（一九二九年四月）及在這個代表會議以後，一直到一九二九年的夏天，都執行了這樣的政策；當時在我們國內開始了通整的集體化的時期，在消滅富農階級方面已經開始了轉變。

假使我們看一看黨的重要文件，那怕由一九二五年十二月第十四次大會起（參看根據中央委員會底報告而作的決議）到一九二九年四月第十六次臨時代表會議止（參看“論發展鄉村經濟的道路，”的決議），就一定會看見，關於“限制富農的剝削傾向，或者“限制資本主義在鄉村中的增漲，”的提綱，永遠是與“排擠鄉村中的資本主義份子，”“克服鄉村中的資本主義份子，”的提綱平行並列的。

這是什麼意思呢？

這是說黨沒有把排擠鄉村中的資本主義份子，與限制富農的剝削傾向的政策，限制鄉村中資本主義份子的政策分開。

黨的第十五次大會，與第十六次臨時代表會議的基礎，完全建業在下列的政策上面。即是：“限制農村資產階級的剝削趨勢，（第十五次大會“關於鄉村工作，”的決議），“採用限制鄉村中資本主義發展的新方法，（同上），“堅決限制富農的剝削傾向，（第十五次大會關於五年經濟計劃的決議），“進攻富農，，即是說“進一步的、更有系統的、和更堅決的限制富農與私商，（同上），“更堅決的在經濟上排擠，城市和鄉村中的“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份子，（第十五次大會對中央委員會報告的決議）。

因此，第一，該文的作者把限制資本主義份子的政策與排擠資本主義份子的政策，看作兩個不同的政策，這是不正確的。事實告訴我們，這是一個整個的限制資本主義的政策；排擠富農中的個別隊伍正是他的組成部分與結果。

所以，第二，該文的作者認為，在鄉村中排擠資本主義份子的政策，只是在改造時期，第十五次大會的時候才開始，這也是不對的。實際上這種排擠是在第十五次大會以前，恢復時期中，及在第十五次大會以後，改造時期中，都

有過的。在第十五次大會的時候，只是用補充的新方法加緊了限制富農剝削的傾向的政策，並因此也就要加緊排擠富農的個別隊伍了。

第二，在這篇文章中說：

“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完全是由排擠資本主義份子的政策中產生出來的，牠是這個政策在新的階段上的繼續，，。

這種說法不確切，因此也就不正確。自然，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不會從天上掉下來，牠是由於過去一切限制和排擠鄉村資本主義份子的時期準備成功的。可是這並不是說，牠根本上與限制（與排擠）鄉村資本主義份子的政策沒有分別，似乎牠是限制政策的繼續。照我們的作者這樣說，這就是否認由一九二九年夏季起，在鄉村發展中有了轉變。照這樣說，這就是否認在這個時期中吾黨在鄉村政策方面作了轉變的事實。照這樣說，就是為我們黨內的右傾份子造成一些思想上的護身符，這些右傾份子，現在拚命的咬着第十五次大會的決議來反對黨的新政策，正如伏龍背同志當時拚命抓着第十四次大會的決議，反對培植集體農莊與蘇維埃農莊的政策一樣。

第十五次大會主張加緊限制（與排擠）鄉村資本主義份子的政策，其出發點如何呢？其出發點就是認為，雖然要限制富農，但是富農階級總還要暫時留在鄉村中。在這個基礎之上，第十五次大會便保留了出租土地的法令，同時，很明顯的知道，大半的富農是承租者。在這樣的基礎之上，第十五次大會便保留了鄉村中僱傭勞動的法令，同時要求正確的執行這個法令。在這樣的基礎之上，再次的宣佈了消滅富農是不容許的。這些法令和決議與限制（和排擠）鄉村中資本主義份子的政策，是否矛盾呢？毫無疑義，是不相矛盾的。這些法令和決議與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是否矛盾呢？毫無疑義，是矛盾的！因此，現在在通盤集體化的區域內，應該放棄這些法令與決議。通盤集體化區域的影響的發展不是與日俱進，而是與時俱進的。同時，在通盤集體化的區域內，集體農莊運動發展的進程。早已把這些法令與決議推在一邊去了。

在這種解釋以後，是否還能夠認為，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是限制（和排

擠) 鄉村中資本主義份子的政策之繼續呢? 很明顯的, 是不能够的。

該文的作者忘記了, 當富農階級的手中還擺着生產工具與自由使用土地的權利時, 當我們實際還保存着鄉村中僱傭勞動的法令, 出租的法令, 及禁止消滅富農的時候, 用稅務及其他一切限制的方法, 是不能排擠富農階級的。作者忘記了, 在限制富農的剝削傾向的政策之下, 只能夠排擠富農的個別隊伍, 這與暫時保留富農階級並不矛盾, 而且預先決定這個問題的。要排擠富農階級, 那末限制和排擠其個別隊伍的政策是不夠的。要排擠富農階級, 就應該在公開的鬥爭中打破這個階級的反抗, 剝奪其生存與發展的生產來源(自由的使用土地, 生產工具, 租佃, 僱傭勞動權等)。這就是向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之轉變。沒有這種轉變, 排擠富農階級就是無味的空談, 這只對於右傾份子有利。沒有這種轉變, 在鄉村中任何大的, 通盤集體化都是無稽之談。我們鄉村中進攻富農及實現通盤集體化的貧農與中農, 對於這一點了解的非常清楚。很明顯的, 我們有些同志, 現在還不了解這一點。

因此, 目前黨在鄉村中的政策, 並不是舊的政策之繼續, 而是由限制(和排擠) 鄉村中資本主義份子的舊政策, 向消滅富農階級的新政策之轉變。

勝利衝昏頭腦

論集體農莊運動問題

現在，大家都在講蘇維埃政權在集體農莊運動方面的勝利。就是我們的敵人，也不能不承認我們所得到的嚴重的勝利。實在的，這些勝利是很偉大的。到今年二月二十日止，全蘇聯農民經濟已經集體化了百分之五十，這是事實。這就是說，到今年二月二十日止，我們已經超過了五年經濟計劃所規定的一倍以上。

到本年二月二十八日止，集體農莊在春耕時，已經播散了三千六百萬担的種子，這大約估計計劃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就是等於二萬二千萬普特的種子。在順利的完成了收買食糧的計劃以後，只是在集體農莊方面，就能够收集二萬二千萬普特的麥種，不能不承認這是個很大的成績。

這些事實告訴了我們什麼呢？告訴我們說：使鄉村轉變到社會主義去的根本轉變，已經可以認為是有保障的了。

這些進步對於我們國家的命運，對於領導我們國家的整個工人階級，對於黨的本身，都有很重大的意義，這是用不着證明的。暫且不講直接的實際結果，只就牠們（這些勝利）對於黨的內部生活，對於我們黨的教育方面來說，也有很大的意義。這些勝利鼓舞起了我們黨的勇氣和對於自己力量的信任。牠們用對我們事業勝利的信仰心武裝了工人階級。牠們為我們黨引來了幾百萬新的

後備軍。

由此，黨的任務就是：鞏固已得到的勝利，並且有計劃的利用這些勝利，使他更向前發展。

可是這些勝利也有他的不好方面，特別是當這些勝利來的比較“容易”，或者是“出乎意料”的時候。有的時候，這些勝利使我們很容易發生自大和驕傲，以為：“我們什麼都能幹！”，“我們什麼都不怕！”。這些勝利有時醜化了人們，而人們就因此弄得頭昏顛倒，失去了度量的感覺，失去了了解實際情形的能力，發生了過分的看重自己的力量和看輕敵人力量的趨向，表現出冒險主義的企圖，以為“一下子，就可以解決社會主義建設的一切問題。這樣的一來，對於鞏固已經獲得的勝利，和有計劃的利用這些勝利，使他更向前發展，這種顧慮，自然也就沒有了。爲什麼我們要來鞏固已經得到的勝利——我們“一下子，就可以達到社會主義的完全勝利：“我們什麼都能幹”，“我們什麼都不怕！”。

由此，黨的任務就是：向這些對於事業有害的和危險的情緒，進行堅決的鬥爭，從黨內把他們驅逐出去。

當然不能說，這種有害的和危險的情緒，在我們黨的隊伍中已經散佈很廣了。然而，這些情緒在我們黨內是存在的。同時沒有根據來肯定說，這些情緒不會繼續發展下去。如果這些情緒在我們隊伍中被認爲是正當的，那麼，毫無疑問的，集體農莊的事業就會大大的減弱，集體農莊破壞的危險，也將變成實際。

因此，我們的刊物的任務，就是：有系統的揭露這種情緒和其他一切類似的反列寧主義的情緒。

舉幾件事實：

一、我們集體農莊政策之所以能夠得到勝利，正是因爲這種政策是依靠着集體農莊運動的自願性和對蘇聯境內各區域特殊條件的估計。不能用強力來組織集體農莊。如果這樣，那就是愚蠢和反動的。集體農莊運動應該依靠基本的

農民羣衆積極的幫助。不應該把集體農莊建設發達的區域內的模樣，機械式的搬到不發達的區域內去。如果這樣，便是愚蠢和反動行爲了。這種“政策”，一下子就會使集體農莊的思想烟消雲散。在決定集體農莊建設的速度與方法的時候，必須小心的研究蘇聯各區域中特殊的條件。出產五穀的區域，在集體農莊運動方面比一切區域都先進。爲甚麼？第一，因爲在這些區域內，我們已經有了許多穩固的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正因爲這個緣故，農民才能够相信新技術的意義與力量，相信新的集體經濟組織的意義與力量。第二，因爲這些區域，在收買食糧的運動中，有了兩年來與富農鬥爭的經驗，這自然不能不使集體農莊運動事業的進行，更加容易些。最後，因爲在這些區域中，最近兩年以來，我們從工業中心裏，加派了大批優秀的幹部人材去工作。能不能說，在其他的區域內，譬如：在我們北部的消費區域，或者是落後的民族區域，例如土耳其斯坦，也有這些順利的條件呢？不能，這是不能說的。很明顯的，對於蘇聯各區域的特殊條件加以估計的這個原則和自願性的原則同樣是健全的集體農莊運動的最重要的先決條件之一。

但是，事實上有時是怎樣的呢？可不可以說，自願性和考察各地的特殊情形的原則，未在許多區域內一被破壞過呢？不，可惜不能這樣說。舉例來說罷，大家都知道，北方消費地帶的許多區域裏，立刻組織集體農莊所必須的順利條件，比較在五穀區域內要少些。但在這些區域內，往往不去進行組織集體農莊的準備工作，而却代以官僚式的辦法，來命令集體農莊運動，作些關於集體農莊發展的空決議，組織紙面上的集體農莊，事實上這些集體農莊並沒有存在，可是，關於牠的“存在”，却有一大堆吹牛的決議。或者我們再拿土耳其斯坦幾個區域來講，立刻組織集體農莊的順利條件，比較北方消費區域更要少些。大家都知道，在土耳其斯坦幾個區域內，曾有過這種企圖，就是想用軍事力量，恐嚇辦法，剝奪那些不願意現在加入集體農莊的農民的灌田水和工業品，企圖這樣的“趕上和趕過”，蘇聯先進的區域。這種軍閥式的壓迫“政策”，與黨根據自願性考察各地特殊情形而進行的政策，有些什麼相同的地方呢？自

然，在他們中間，沒有絲毫相同的地方。誰需要這種曲解黨的路線，官僚式的命令集體農莊運動，用恐嚇的方法來對付農民呢？除了我們的敵人而外，甚麼人都不需要！這些曲解可以得着什麼結果呢？這只有使我們的敵人強大起來，並且會使集體農莊運動的思想消滅下去。這些曲解路線的人們，自稱為“左派”，而事實上是在幫助右傾機會主義，難道這還不明顯嗎？

二、本黨政治戰略的一個極大好處，就是在每個時期，黨都會去選擇運動中的主要點，抓著這一點，然後再推動全部運動，向一個總的目標進行，以便解決問題。能不能說，黨在集體農莊建設的系統上，已經選定了集體農莊運動的主要點呢？可以這樣說，而且應該這樣說。這個主要點在什麼地方呢？是不是土地公耕社呢？不是的，不在這裏。在土地公耕社裏生產工具並不社會化，牠已經是集體農莊運動過去的階段了。這個主要點是農業公社嗎？也不是的，也不是農業公社。農業公社目前還是集體農莊運動中單個的現象。如果農業公社成了普遍的形式，那麼，不僅僅是全部生產已經社會化，而且分配也社會化了，這種條件還沒有成熟。集體農莊運動目前的主要點，牠的普遍的形式，而且是我們現在應該培植的，就是農業勞動組合。在農業勞動組合裏面，主要的生產方法已經社會化了，這主要的是與五穀經濟有關的，例如：勞動，土地使用，機器及其他的農具，牲畜，經濟建築物等。在這裏面沒有社會化的還有：園藝地（如小菜園，菜園等），住房，一部份的奶牛，小牲畜，家禽等。勞動組合所以是集體農莊運動的主要點，因為牠是解決五穀問題最適宜的形式。而五穀問題又是全部農村經濟系統中的主要點，因為要是不解決這個問題，那麼，無論是畜牧事業（小的或大的），或供給工業原料的特別農產物與原料植物的問題，都是不能解決的。因此農業勞動組合，在目前是集體農莊運動中的主要點。今天所公佈的集體農莊的“模範章程”，就是由此出發的。我們黨的與蘇維埃的工作人員，也應該由此出發，他們的任務之一，就是認真的研究這個章程，澈底的實行這個章程。

現在黨的意見就是這樣。

能不能說，黨的這個意見，在實行的時候，沒有什麼破壞和曲解呢？可惜，我們不能這樣說。大家都知道，在蘇聯許多區域內，為實現集體農莊而作的鬥爭，還說不上已經完結，勞動組合還沒有鞏固，但在那裏有一種企圖，要想超過勞動組合，一下子就跳到農業公社去。勞動組合還沒有鞏固，但他們就動手把住房，小牲畜，家禽等“社會化”了，而這種“社會化”，祇變成了紙頭上的官僚式的命令，因為還沒有必要的條件，可以實行這種社會化。有人以為在集體農莊中五穀問題已經解決了。這個問題已經是過去的階段，目前最主要的任務，不是解決五穀問題，而是牧畜與養家禽的問題了。現在要問，什麼人需要這種頭昏顛倒的“工作”，把集體農莊運動的各種形式都混在一起呢？什麼人需要這樣糊塗的對事業有害的向前瞎跑呢？當五穀問題還沒有解決，集體農莊的農業組合的形式還未鞏固的時候，把住的房子，取奶的牛，一切的牲畜家禽等，都社會化起來，用這樣的方法來挑撥集體農民這種“政策”，只是對於我們可恨的敵人才適當才有利，難道這還不明白嗎？有一個急於要社會化的人，甚至到了這樣的地步，他甚至在勞動組合裏下了一個命令，“限三天以內，把每個農家的家禽，按頭計算出來，，指出一些專門的“司令，來管理計算和監督，，“在勞動組合中掌握最高的領導，，“領導社會主義的鬥爭，不要放棄戰地，，——很明顯的，這樣就把整個勞動組合，緊握在一個拳頭裏了。這是什麼，是領導集體農莊的政策呢，還是破壞袖和吏袖失掉信仰的政策呢？至於那些組織勞動組合的事業從摘取教堂的鐘做起的“革命家，，就不用我再來說了。摘教堂的鐘，你們想一想，這是怎樣的革……革……革命呵！

怎樣能在我們的隊伍裏，發生這樣一些昏頭昏腦的“社會化”的行動，和怎樣發生這種可笑的，想跳過自己和想避免階級和階級鬥爭，而在實際上是幫助我們的階級敵人的企圖呢？只有在集體農莊建設方面的“輕易，和“出乎意料，，的勝利的條件之下，才能發生這類行動。牠們的發生，是我們黨內一部分昏頭昏腦情緒的結果：“我們什麼都能幹！，，，“我們什麼都不怕！，，。牠們的發生，僅僅是因為我們有些同志，被勝利衝昏了頭腦，並且他們一時失

掉了理智的明確性和穩健的觀點。

爲要使我們在集體農莊建設方面的路線更正確，就必須要徹底的消滅這些情緒。

這就是黨現在的主要任務之一。

領導的藝術是很嚴重的事情。不可以落在運動後面，因爲落後就是脫離羣衆。但是也不可以跑得太向前了，因爲太跑向前了，就是與羣衆失了關係。誰想領導運動，同時想與廣大羣衆保持關係，那末就應當在兩條線上鬥爭——既要反對落後，又要反對跑得太遠。

我們黨之所以有力量，誰也不會戰勝我們的黨，正因爲他在領導運動的時候，能夠保持和擴張與千百萬的工農羣衆的聯繫。

給集體農場工作的同志們的答覆

從報紙上大家都知道，斯達林所寫的名為‘勝利衝昏了頭腦’的文章，和中央委員會關於‘反對集體農場運動中曲解黨的路線’的有名的決議，在集體農場工作人員中間引起來了許許多多的回響。因為這個緣故，最近我就收到了許多集體農場工作同志的信，要我回答他們信裏所提出的問題。我的義務，是用個人通信的方法來答覆他們的信。但這是辦不到的，因為大半的來信，都未寫明寄信人的通信處（忘記寫通信處了）。同時，信裏所問到的問題，對於我們所有的同志，都是有很大的政治意義的。而且，很明顯的，我也不能不答覆那些忘記寫通信處的同志們。因此，我不得不公開的，即在報紙上選出一切實際上必要的問題給集體農場工作的同志們一個答覆。尤其是因為中央對於這點已經有了直接的決議，所以我更願意做這個答覆了。

第一個問題 農民問題上錯誤的根源在那裏？

答覆 在於不正確的對付了中農。在於在經濟方面用壓制的方法對付了中農。在於忘記了在經濟上聯合中農羣衆，是不應該靠着壓制方法的，是應該靠和中農協商，是應該靠着聯合中農的。在於忘記了現在集體農場運動的基礎是工人階級和貧農聯合中農，反對資本主義，尤其是反對富農。

在和中農聯合戰線進攻富農的時候，一切事都很順利。但及至我們有些同志被勝利衝昏了，不自覺的開始離開進攻富農的道路，爬上了反對中農的道路

，及至他們因為這程集體化最高的百分數，開始向中農使用壓制辦法，剝奪他們的選舉權，破壞他們，奪去他們的財產的時候，進攻的方向就變過來了。和中農的聯合戰線開始破壞，很明顯的，富農又能夠企圖重新站住他的腳跟了。

他們忘記了，在反對我們階級敵人的鬥爭中，壓制的方法是必要的，並且是有利的，但在對付我們的同盟者中農的時候，壓制的方法是不許用的，是有害的。

他們忘記了，像馬隊那樣的奔馳，在解決軍事問題的時候，是必須的，並且是有利的，可是在解決集體農場建設問題的時候，在聯合中農建設集體農場的時候，這種辦法就不中用了，就是有害的了。

問題上錯誤的根源，就在這裏。

你們看到列寧關於和中農發生經濟關係的問題，是怎樣講的：

“我們應該隨時記着這樣一個真理，就是：在這裏用強迫的方法，實在是什麼都得不到的。這裏的經濟任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此地並沒有像城市的資本家一樣，那種上層份子，把他們宰割以後，可以留下來全部的基礎，全部的建築。這種上層份子在鄉村裏面是沒有的。此地若強迫從事，就等於要毀滅全部事業……想在對中農的經濟關係方面實行強迫，這是再蠢不過的了。，，（“全集，十六卷一五〇頁）

“用強迫的方法對付中農，是最有害的。中農是許許多多的幾百萬羣衆的階層。甚至於在歐洲，在那裏沒有一個地方，中農達到這樣大的力量，在那裏技術和文化非常的發達，城市生活，鐵路等非常的發達。在那裏最容易發生這種思想，——可是從來沒有一個革命的社會主義者，會提過用強迫的方法去對付中農。，，（“全集，十六卷，一五〇頁）

大概明白了吧。

第二個問題 集體農場運動中主要的錯誤是什麼？

答覆 這些錯誤，至少有三種。

第一，在組織集體農場的時候，破壞了列寧主義的自願的原則，破壞了黨

的基本指令，破壞了關於根據自願性而建設集體農場的農業組合的模範章程。

列甯主義教訓我們說，應該用自願的方式，藉着說服農民，使之相信公共的集體農場比個人農場要好些的方法，來使農民走上集體農場的進路。列甯主義教訓我們說，要使農民相信集體農場的優點，祇有在實際上，在經驗上指示給他們看，證明給他們看，集體農場是比個人農場更好，更有利，集體農場能使農民，貧農和中農免除貧困。列甯主義教訓我們說，沒有這些條件，集體農場是不能鞏固的。列甯主義教訓我們說，凡是企圖用強力來維持集體農場，凡是企圖用強迫的方法來設立集體農場，就祇能夠得出壞的結果，只能夠把農民推出集體農場。

真的，在大家遠遵守這條基本規則的時候，集體農場運動是一步步成功的。但是我們有些同志，被勝利醜醉了，才開始忽略這個規則，開始表示非常躁忙的樣子，並且為趕着提高集體化的百分數，就開始用強迫的方法來設立集體農場。這種“政策”，的結果不久就發生了，這是沒有什麼奇怪的。發生很快的集體農場，你體時也和發生一樣的快，一部份農民昨天還相信集體農場，今天就開始脫離集體農場了。

這就是集體農場運動中第一個主要的錯誤。

你們看列甯關於集體農場建設中自願性的問題，是怎樣講的：

“現在我們的任務，就是變到土地公耕，變到大規模的公有農場。但是蘇維埃政權方面決不可採用任何的強迫。無論什麼法律也不能強迫進行公有農場。農業公社是自願組織的，並祇可以自願的來共同的耕種土地。在這方面，工農政府不可以用一點強迫的手段，並且法律也不允許。假使在你們中間看到了這種強迫的手段，那麼這就是濫用法律，這就是破壞法律，這種行動，我們始終是要用我們全部力量來設法改正的，。（“全集”，二十卷，下冊，三二〇頁）

繼續下去：

“祇有能夠在實際上表示給農民看到共同的、集體的、土地公耕的

、組合式的耕種土地的好處的時候，祇有在能够用土地公耕社的、組合的幫助來幫助農民的時候，祇有那時候，掌握國家政權的工人階級，才能够真正的向農民證實工人階級的真理，真正的能够將幾百萬農民羣衆，堅固的真正的引到工人方面來。因此，就不應該誇大任何種促進土地公耕社和組合式的農業的辦法的意義。我們這裏有幾百萬散漫的，分散在各鄉村中的各別農場……祇有在實際的農民容易懂得的經驗上，證實了改成土地公耕社和組合的方法經營農業是必須的，而且是辦得到的時候，我們才有權利說，在俄國這樣大的農民國家裏，是在社會主義農業的道路上，前進了一大步，。（“全集”，十六卷，三九二頁）

最後，列甯的著作中還有一個地方說：

“蘇維埃政權的代表要鼓勵各種各樣的聯合（中農的農業公社也一樣），他在組織這些聯合的時候，不應該使用一點兒強迫手段。祇有農民自動組織的並且又是他們在實際上證實了是有利的農業聯合，才有價值。在這方面過份的騾忙，是有害的，因為這種騾忙祇能够加深中農反對新現象的成見。蘇維埃政權的代表，凡是想採用強迫的手段（不僅是直接的，甚至是間接的手段）以使農民加入公社的，這些人都應該負嚴重的責任，並應該撤消他們在鄉村中的工作。，（“全集”，十六卷，一五九頁）（注重點都是我加的——斯大林加的）

大概很明白了吧。

黨預備十分嚴格的來實行列甯底這些指示，這難道還須要證明嗎？

第二，破壞了列甯主義的原則：就是應當估計蘇聯各區的各種不同條件，應用到集體農場的建設上去。忘記了在蘇聯有各種各樣最不相同的區域，各種各樣的經濟制度和文化的程度。忘記了在這些區裏有先進的、中等的和落後的區域。忘記了，在這些大不相同的地方，集體農場運動的速度和建設集體農場的方法，是不能够到處一樣的。

列甯說：

“倘若同志們簡單的按着死板板的格式來為全俄國各地方寫去一樣的法令，倘若烏克蘭和頓河布爾塞維克共產黨員，蘇維埃工作人員，不考察情形，籠籠統統的把這些法令傳佈到其他地方，那就錯誤了，，……“因為我們無論如何也不能守着死板板的老格式，我們不能一勞永逸的解決問題，不能說我們的經驗，俄羅斯中部的經驗，是可以完全搬到一切邊陲地方去的，（“全集，十六卷，一〇六頁）

列甯接下去說：

“把俄羅斯中部，烏克蘭，西伯利亞拿來按着一定呆板的格式來處理，這是最蠢的行爲。，（全集十八卷，上冊，一四三頁）

最後，列甯委托高加索的共產黨員，叫他們必須：

“了解他們的共和國和蘇俄情形和條件不同的特點，了解必須不抄襲我們的策略，要深思熟慮的按着具體條件的發展來變化這種策略的外形。，（“全集，十八卷，上冊，二〇〇頁）

大概明白了吧。

我們黨的中央，根據列甯的這些指示，在“論集體化速度，的決議案（見一九三〇年一月六日“真理報，，）裏，根據集體化的速度，把蘇聯各區分為三類，其中北高加索，中窩瓦流域和下窩瓦流域，在一九三一年春季，集體化基本上可以完結；另一種的五穀區（烏克蘭，中央黑土州，西伯利亞，烏拉爾，哥薩克斯坦等等），基本上在一九三二年春季可以完結；其餘區域，集體化要延長到五年計劃底，一九三三年才能完結。

大概明白了吧。

可是實際怎樣呢？實際上是，我們有些同志，看見了集體農場最初的勝利，就特別高興，老老實實的忘掉了列甯的指示，中央的決議。莫斯科州發狂似的趕着增加集體化的數目字，乃開始指示自己的工作者在一九三〇年春季結集體化的工作。可是他實際上至少還有三年的時間可用（一九三二年底）。中央黑土州不願意“落在人家後面，，也開始督促工作人員在一九三〇年上

年完結集體化的工作，可是按照計劃，他至少有二年的工夫的可用，（一九三一年底）。外高加索人和土耳其斯坦人在“趕上和追過，先進區域的努力中，開始企圖在“最短時期內，完成集體化，可是他們實在還有四年功夫可用（一九三三年度）。很明顯的，在這樣飛快的集體化的“速度，之下，在追着“超過，比較有準備的區域的時候，不十分有集體農場運動準備的區域，就不得不採用加緊的行政的壓迫手段，企圖用他們行政的火力，來填補加緊集體農場運動中所缺少的原素。結果是大家都知道的，大家都知道這些區域裏所得到的混亂情形，後來只好由中央干涉，而把這種情形變頓過來了。

這就是集體農場運動中的第二個錯誤。

第三，破壞了列甯主義建設集體農場的另一條原則；就是不許越過未完成的運動形式的原則。破壞了列甯主義的——不要越過羣衆的發展，不要命令羣衆運動，不要脫離羣衆，應該和羣衆一起前進，推動羣衆前進，引導他們接近我們的口號，使他們容易在他們自己的經驗中，相信我們的口號是正確的——這個原則。

列寧說：

“當彼得格勒無產階級和彼得格勒衛戍隊兵士奪得了政權的時候，他們就已經十分瞭解：爲了農村中的建設，必然要遇到許多更大的困難；這裏更須要緩步前進；這裏，如果企圖用法令來強迫實行公耕土地，那就未免是一種極大的錯誤，只有很少一部分覺悟的分子才能這樣做，而大多數的農民，是不會提出這種任務的。因此，我們祇能這樣作（這是爲革命發展底利益絕對必需的）：就是我們無論如何不要越過羣衆的發展，而要等候着，直等到運動依據這些羣衆本身的經驗和鬥爭而向前發展的時候。，（“全集，十五卷，五三八至五三九頁）

中央根據列甯這些指示，在著名的“論集體化速度，的決議裏（見一九三〇年一月六日真理報）認爲：（甲）現在集體農場運動的主要形式，是農業組合，（乙）因此必須製定農業組合的模範章程，因爲組合是集體農場運動中的

主要形式，（丙）在我們日常工作中，不應該自上的“命令，集體農場運動，把集體化當兒戲，”。

這就是說，我們現在不應該抱着農業公社的方針，不應該跳過農業組合，跳到農業公社，不應該用“命令，集體農場和“把集體農場當兒戲，的方法，來替代農民加入集體農場的農民運動。

大概明白吧！

可是實際上怎樣呢？實際上我們有些同志，被集體農場運動最初的勝利所驕醉了，老老實實的忘記了列甯的指示和中央的決議。這些同志不去組織羣衆運動，贊助農業組合，反而着手把個人農民直接的“渡到了，公社的章程去。他們不去鞏固組合式的運動，反而開始用強迫手段，把小牲畜，家禽，非商品的奶牛，小房子都“社會化，了。現在大家都知道這種列甯主義者所不應有的忙迫所得的結果了。他們，照例是未組織成堅固的公社。可是，因此却放過了許多農業組合。的確，留下了“很好看的，決議，但是還有什麼意思呢？

這就是集體農場運動中第三個錯誤。

第三個問題 怎樣會發生這些錯誤，黨應該怎樣去改正這些錯誤？

答覆 這些錯誤，是因為集體農場運動方面很快的得了勝利而發生的。有的時候，勝利是會衝昏頭腦的。有時候，勝利會造成過分的自信和自大。這種情形，尤其是在握政權的政黨的代表們方面容易發生。尤其是像我們黨這樣的政黨，因為他的力量和威信，差不多大得無法估量了。這裏很可以發生共產主義的誇大狂，這種誇大狂，列甯曾無情的反對過的。這裏很可以發生相信命令，決議，吩咐的萬能的情形。實際上在我們這樣廣大的國家裏，在某個小地方上，很可以發生一種危險，就是把黨的革命的設施，變為黨代表們的、空洞的、官僚式的命令。我所說的不僅是地方上的工作人，而且連各州的工作人，甚至於中央的某幾個委員也在內。列甯說：“共產主義的誇大狂，就是有一種人，加入共產黨裏，還沒有被清洗出去，他認為他可以用共產黨的命令，來解決一切的任務。”（“全集，十八卷，上冊，三八四到三八五頁）

集體農場運動的錯誤，集體農場的建設工作中對黨路線的曲解，就是根據這種根源而發生的。

倘若這些錯誤和曲解，還是繼續下去，倘若這些錯誤和曲解，不很快的消滅了，消滅的一點殘餘也沒有，那末，將有什麼危險呢？

這裏的危險就是，這些錯誤會直接的引起集體農場運動的破裂，與中農不睦，拆散貧農的團結，擾亂我們的隊伍，減弱我們社會主義建設，恢復富農。簡單的說，就是這些錯誤有一種推動我們脫離堅固聯合農民中基本羣衆的道路，脫離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道路，跑上與羣衆分裂的道路，跑上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的道路的趨勢。

這種危險在二月下半月就已經表現出來了。那時候，我們一部分同志，被以前的勝利迷住了眼，就狂蹶到列寧主義道路的對面去了。黨的中央估計到了這種危險，毫不遲延的干涉了這種現象，委托了斯大林做一篇專門論集體農場運動的文章，警告那些冒險的同志。有些人以為‘勝利衝昏了頭腦’，那篇文章，是斯大林個人獨出心材的作品。這當然是空話。我們，中央之所以存在，並不是爲了在這種事情上讓任何人發展他個人的私意。這等于無度的破壞中央。當然中央弄清楚這些錯誤的深刻程度和範圍的時候，中央就一點也不延擱的用中央威信所有的全部力量，來打擊這些錯誤，發表了他一九三〇年三月十五日的著名的決議。

人們在飛跑的時候，雖然快要落到深溝裏，還是很難停止的，很難回轉到正確的道路上來。但是，我們的中央委員會之所以叫做列寧黨的中央委員會，就是因爲他非常善於戰勝這些困難。並且基本的說來，他已經戰勝了這些困難。

這裏主要的問題就是，要有勇氣來承認自己的錯誤，並振作精神，在最短時期內消滅這些現象。被不久以前的勝利所矚醉後，就怕承認自己的錯誤了，怕自我批評，不願意很快很堅決的改正錯誤——這就是最大的困難。若想把這些錯誤去得乾乾淨淨，就要戰勝這種困難，丟掉誇大的數目字的計劃，丟開誇

事房中官僚主義的最高限度主義，要把自己的注意力轉到集體農場中經濟組織的建設工作方面去。可是黨已經基本上戰勝了這種危險的困難，這是一點可以懷疑的地方也沒有的。

列甯說：

“以前的一切革命的政黨，凡是受到滅亡的，都是因為自大的緣故，因為他們未能看見力量存在的地方，他們怕說自己的弱點。可是我們不會滅亡，因為我們不把怕說出自己的弱點，並且還學習着戰勝這些弱點，，”
（“全集”，十八卷，下冊五九頁）

列甯這幾句話，是不應該忘記的。

第四個問題 反對曲解黨路線的鬥爭，是不是向後退，是不是退却？

答覆 當然不是！只有那些以為繼續錯誤和曲解就是進攻，反對錯誤就是退却的人，才會說這是退却、充滿着錯誤和曲解的進攻，這不必說，當然是很好的“進攻，……”

我們認為農業組合是現在集體農場運動中的基本形式，並規定了模範章程，作為集體農場運動中的指南。這是不是我們要捨棄這種工作呢？當然不是！

我們認為鞏固工人階級及貧農和中農的生產聯合是現在集體農場運動的基礎。我們是不是退出這種工作呢？當然不是的！

我們提出消滅富農階級的口號，作為現在我們鄉村實際工作中主要的口號。這是不是我們要捨棄這種工作呢？當然不是！

我們在一九三〇年一月裏，便已對蘇聯農業集體化採取了一定的步驟，把蘇聯分為幾區，並為每區定下了一種特別的步驟。這是不是我們捨棄這種工作呢？

當然不是。

這樣，那裏有黨的“退却，，呢？

我們希望犯了錯誤和曲解的人們放棄他們的錯誤。我們希望頭昏顛倒的人們，放棄頭昏顛倒的舉動，走上列甯主義的道路。我們希望這樣，因為只有這

樣，才能够繼續的真正進攻我們階級的敵人。是不是可以說，我們因此就向後退了？當然不可以！這只是說，我們要進行正確的進攻，不是昏頭昏腦的把進攻當作兒戲。

只有呆子和“左”傾的分子，才會把黨的這種立場，估計成爲退却，這難道還不明白嗎？

胡說這是退却的人們。至少不懂得兩件事情。

第一，他們不知道進攻的規律。他們不懂得，不鞏固所奪到的地盤的進攻，是必遭失敗的進攻。譬如在軍事方面，什麼時候進攻才可以勝利呢？只有在人們不限于一味的前進，而同時還想方法鞏固已經奪到的地盤，把自己底力量重新安排一下，使之適合于已經變更的環境，充實自己的後方，準備一些後備的時候。爲什麼要這樣作呢？爲的是預防意外的事變發生，爲的是消滅各別的破綻，因爲意外的事變和破綻，是一切進攻所免不了的，這樣，就準備着澈底的消滅敵人，一九二〇年波蘭軍隊的錯誤，倘若只從軍事方面來看，就在於他們看輕了這些規則。這也就是他們之所以一口氣趕到基輔，後來又不得不一口氣逃回瓦薩的原因之一。倘若再只從軍事方面看，一九二〇年蘇維埃軍隊的錯誤，也於他們在進攻瓦薩的時候，重覆了波蘭人的錯誤。階級鬥爭戰線上進攻的規律，可以說也是這樣。不鞏固已經奪到的地盤，不重新把自己底力量安排一下，不預備後備軍來保證前線，不鞏固後方，這樣來作消滅階級敵人的進攻，也是不能勝利的。

整個的問題就在於那些昏頭昏腦的人們，不懂得進攻的規律。整個的問題就在黨懂得這些規律，且實行這些規律。

第二，他們不懂得進攻的階級性。他們大喊進攻。但是進攻那個階級，聯合那個階級呢？我們聯合中農，進攻鄉村中資本主義份子，因爲祇有這樣的進攻，才能得到勝利。但是，倘若在黨的各別隊伍與高烈烈，一味進攻的時候，進攻開始離開了正確的道路，把火力轉向了我們底同盟者中農，那時候怎樣辦呢？難道我們是什麼進攻都要的，而不是要聯合一定的階級向另外一定的階級

進攻嗎？

董其紅（小說裏的一個人物）和風塵比武，自己也說他這是進攻敵人。但是大家都知道，他這種進攻的結果，倒把自己的腦袋碰破了。

大概，董其紅的榜樣，使我們的‘左’，傾份子羨慕得覺都睡不成了。

第五個問題 那一種危險是我們的主要危險，右傾呢，還是‘左傾’呢？

答覆 我們的主要危險是右傾。右傾曾經是我們的主要危險，現在還是我們的主要危險。

這種說法和一九三〇年三月十五日中央決議裏著名的提綱是不是相矛盾呢？這條提綱裏說，‘左’，傾分子的錯誤和曲解，是現在集體農場運動的主要障礙物。不，不矛盾。這裏是因為集體農場運動方面‘左’，傾分子的錯誤，會造成一種順利的環境，去促進和鞏固黨內的右傾。為什麼呢？因為這些錯誤是用折光來映照黨的路線，他們使人更容易破壞黨的信仰，因此，他們使右派分子，更容易反對黨的領導。破壞黨領導的信仰，是右傾分子反黨的最基本的基礎，只有在這種基礎上，右傾分子才能發展他們反黨的鬥爭。‘左’，傾分子的錯誤和曲解，正好給右傾分子這種基礎。因此，為要使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得到勝利，就應該戰勝‘左傾’，機會主義者的錯誤。‘左’，傾分子客觀上是右傾分子的同盟者。

這就是‘左傾’，機會主義者和右傾機會主義者的特別關係。

我們應該用這種關係，來說明有些‘左傾’，分子與右傾分子談判聯合的事實，而下面的一種特別的現象也應該用這種關係來說明，就是：一部分‘左派分子’，昨天在‘進行’，大進攻，企圖在兩三星期內把全蘇聯集體化，但今天就消極起來，放下兩隻手，讓出鬥爭的地盤給右傾分子，這樣就執行了真正向富農退却（不加括弧的）的政策。

我們所處的時期的特點，就在於反對‘左’，傾分子錯誤的鬥爭乃是反對右機會主義鬥爭勝利的條件和特別的形式。

第六個問題 怎樣的估計一部分農民退出集體農場的現象？

答覆 一部份農民退出集體農場，這意思就是說，近來產生了不少不健全的集體農場，現在他們正在肅清不堅定的分子。這就是說誇大的集體農場消滅了，堅固的集體農場留了下來，並且還會鞏固起來。我以為這是十分平常的現象。有些同志見了這種現象，失望了，慌張起來，戰戰兢兢的抓住誇大的百分數不肯放手。另外有些人，非常高興，並且預言集體農場運動的“倒台”，這兩種人都大大的弄錯了。這兩種人都太不懂得馬克思主義關於集體農場運動的本意。

第一，退出集體農場的，首先就是那些所謂活死人。這甚至於可以說不是退出，而是留下空位子。我們要不要這些活死人？當然不要的。我以為北高加索人和烏克蘭人的行為完全是對的，他們解散活死人的集體農場，組織真正的和真正堅定的集體農場。這樣對集體農場運動只有好處。

第二，退出的就是異己的，公開仇視我們的份子。很明顯的，這些份子愈洗出早些，對於集體農場運動也愈好些。

最後，一部分退出的是那些動搖的農民，這些人不能把他叫異己份子，也不能叫做活死人。這些人，我們今天還未能夠使他們相信我們工作的正確，但是我們明天是會說服他們的。這些農民的退出，對於集體農場運動的損失，雖然是一種暫時的，但是很嚴重。因此，奪取集體農場中動搖的份子，是現在集體農場運動中最緊要的任务之一。

因此，一部份農民退出集體農場，不僅是壞的現象。倘若這種退出，是肅清集體農場裏的活死人和公開的異己份子，那末這乃是健全的和鞏固集體農場的好現象。

一個月以前，大家認為我們在五穀區內有百分之六十的集體化。現在都明白了，倘若這是指着真正的，相當堅定的集體農場說的，那末，這個百分數當然是誇大的。倘若在一部份農民退出之後，在五穀區裏，集體化的百分數能保住百分之四十——這大概是可以實現的——那末，這已經是現在集體農場運動中最偉大的成績了。我這是拿五穀區中平均數來說，——我很知道，其中有

幾個統盤集體化的區域裏集體化的數目要佔百分之八十到百分之九十。五穀區域內百分之四十的集體化，就是等於說，我們能够在一九三〇年春季，已經能超過了第一個五年集體化計劃的一倍。

誰敢否認蘇聯社會主義發展這種歷史上勝利的重要性呢？

第七個問題 動搖的農民，退出集體農場，這種做法好不好呢？

答覆 不，他們做的不好。他們退出集體農場，這是反着自己的利益而行，因為只有集體農場能使農民免除窮困和黑暗。他們退出集體農場，就是把自己放在更壞的地位上，因為他失去了蘇維埃政權給集體農場的優待和利益。集體農場中的錯誤和曲解，不足當做退出集體農場的藉口。應該留在集體農場裏面，共同努力來改正錯誤。因為蘇維埃政權要用全副力量 and 這些錯誤鬥爭，所以這些錯誤是很容易改正的。

列甯說：

“在商品生產制度之下，小經濟制度是不能够使人類去掉羣衆的窮苦和壓迫的，，（“全集，十四卷，上冊，四九頁）

列甯說：

“小經濟是不能脫離窮苦的，，（“全集，十六卷三七八頁）。

列甯說：

“倘若我們照舊的坐在小經濟裏面，雖然是自由民坐在自由土上，但我們終究免不了遇到滅亡的危險，，（“全集，十四卷，第一部，一六八到一八六頁）

列甯說：

“只有靠着公共的組合的聯合的勞動，才能夠脫離帝國主義戰爭逼着我們走上的絕路，，（“全集，十六卷，三百七十五頁）。

列甯說：

“必須轉變到大模範經濟中的公耕制度，因為不這樣做，就不能够脫離俄國現在所受的破壞，就不能够脫離那種簡直是絕望的情形，，（“全

集,,十四卷,上冊,一六九頁)

這些話是什麼意思呢?

意思就是,集體農場是使農民免除窮苦和黑暗的獨一無二的方法。很明顯的,農民退出集體農場,這種行動是不對的。

列甫說:

“蘇維埃政權認為公社、組合,和一切預備把個人小經濟變為公有的聯合或組合經濟並逐漸促進這種轉變的組織,都有極偉大的意義, (“全集,,十六卷,三九一頁)。

列甫說:

“蘇維埃政權直接給公社和聯合優待條件,把他們放在第一位, (“全集,,十五卷,五一八頁)。

這是什麼意思呢?

意思就是,蘇維埃政權要給集體農場優待條件和優先權,這是與對待個人農場不同的。意思就是,在供給土地方面,在供給機器、拖拉機及種子等等方面,在減輕捐稅方面,在借貸方面,蘇維埃政權都要給集體農場優待條件。

為什麼蘇維埃政權給集體農場優待條件和優先權呢?

因為集體農場是解除農民窮苦的唯一辦法。

因為用優待條件幫助集體農場,是幫助貧農和中農最真實的形式。

幾天以前,蘇維埃政權決定把集體農場中一切社會化的工作牲畜(馬,牛等)以及集體農場裏公有的和集體農場裏個人所有的一切牛,豬,羊和家禽等等免除兩年的稅。

此外,蘇維埃政權決定,集體農場由于所欠的款子延期到年底償還,而且加入集體農場的農民,在四月一日前的一切罰金和法庭的處罰,一概撤消。

最後,蘇維埃政權決定,必須在本年內借出五萬萬盧布給集體農場。

這些優待條件是用來幫助集體農場的農民的。這些優待條件是預備幫助那些能够在退潮的面前站穩腳的,那些在集體農場的敵人所作的鬥爭中,擁護集

體農場，緊緊地握住集體農場運動的旗幟等等的集體農民的。這些優待條件，是幫助這些集體貧農和中農的，他們是我們現在集體農場的基本核心，他們鞏固並且形成我們的集體農場，他們牽取幾百幾千萬的農民到社會主義方面來。這些優待條件，是幫助這些集體農民的，因為他們是現在集體農場的基本中堅，他們是完全配稱為集體農場運動的英雄的。

退出集體農場的農民，得不到這些優待。

農民退出集體農場是犯了錯誤，這難道還不清楚嗎？

他們只有回到集體農場，才能得到這些條件，這難道還不明白嗎？

第八個問題 怎樣對付公社呢，應該解散他們嗎？

答覆 不，不應該，解散是沒有道理的。我說的是真正的公社，不是紙上的公社。在蘇聯五穀區裏，有許多很好的公社，他們應該受到獎勵和幫助。我所說的是舊的公社，他們已經有了幾年的試驗，在鬥爭中鍛鍊過了，完全證實了他們的存在是對的。至於說到新的公社，不久以前才成立的公社，那末，他們要能存在下去，只有他們是由自願組織起來的，是得到農民積極的擁護，沒有什麼強迫的公共生活才行。

組織和經營公社，是很複雜，很困難的事情，必須要有經驗的中堅份子和老練的領導者，才能够使堅固的大公社存在和發展。趕快把組合章程改為公社章程，只能够把農民推出集體農場運動。因此，對於這個問題，應該用特別嚴重的態度，不應該有任何的急躁。組合是比較輕易的工作，並且是廣大農民羣衆比較容易接受的。因此，組合是現在集體農場運動最普遍的形式。只有漸漸的鞏固和充實農業組合，才能够造成一種基礎，使農民大批的組織公社。因此公社，最高的形式，只有在將來才能够成為集體農場運動中的主要環鏈。

第九個問題 怎樣處置富農呢？

答覆 上面所講的都是關於中農的問題。中農是工人階級同盟者，我們的政策是應該和他親善。但是對富農就不同了。富農是蘇維埃政權的敵人。我們和他們是沒有和平的，也不會有和平。我們對付富農的政策，就是消滅富農階

級。這當然不是說，我們一下子便能把他消滅。但這乃是說我們預備把他圍起來，消滅他。

你們看列甫關於富農是怎樣說的：

“富農是最野蠻的、最殘酷的、最凶惡的剝削者，在歷史上不只一次的恢復過地主、沙皇、教皇、資本家的政權。富農比地主和資本家要多。但是富農還是人民中的少數……這些喝血的人，在戰爭的時候，是靠人民的窮苦而發了財，他積聚成千成萬的錢，抬高麥子和其他生產品的價錢。這些蜘蛛，靠着被戰爭所破壞的農民，挨餓的工人，而養肥了自己。這些喝血的東西，喝勞動者的血。城市中工廠工人愈是飢餓，他們就愈發財。這些蝙蝠，不斷的收集地主的土地到自己手中，再去不斷的奴役農民，。”（‘全集’，二十卷，下冊，二五七頁）

我們忍耐了這些喝的東西，這些蜘蛛，這些蝙蝠，我們曾經實行了限制他們的剝削傾向的政策。我們忍耐過了，因為沒有旁的東西可以代替富農經濟和富農的生產。現在我們已經能夠很有利的用我們集體農場和蘇維埃農場來替代他們的經濟了。用不着再忍受這些蜘蛛和吸血鬼了。這些蜘蛛和吸血鬼，燒毀集體農場，殺死集體農民，企圖破壞播種。再忍耐這些東西，這就是等於背棄工人和農民的利益。

因此，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應該最堅決，最徹底的進行。只有布爾塞維克才有這種本事。

第十個問題 集體農場最近的實際任務是什麼？

答覆 集體農場最近的實際任務就是：努力春耕工作，努力盡量的擴張耕地的面積，努力為正確的組織播種而鬥爭。

現在集體農場所有的其他任務，都應該適應於播種的任務。

現在集體農場中所有其他的工作，都應該受組織播種的工作所支配。

這就是說，集體農場和集體農場中非黨的積極份子的堅固性，集體農場中領導者的能力，他的布爾塞維克的中堅份子的能力，都不是在流利的決議中，

長篇的歡迎詞中去證明，而是要在正確的組織播種的、活事業上去證明。

但是，爲要光榮的實現這種實際上的任務，就應該把集體農場工作人員的注意力，移轉到集體農場建設的經濟問題方面和集體農場內部的建設問題方面去。

直到現在，集體農場工作人員注意力的中心，是在追趕集體化高大的數目字，而且人們都不願意分清真正的集體化和紙上的集體化。現在這種數目字的誇大，應該丟開。現在工作人員的注意力，應該集中在鞏固集體農場，在正式組織集體農場，在集體農場裏組織實際工作。

直到現在，集體農場工作人員的注意力，都是集中在組織大集體農場，組織所謂“大農場”，其中有些“大農場”，時常是變成紙上官樣文章，在鄉村中沒有一點兒經濟基礎。陳列式的工作，因此就吞沒了實際上的工作。現在這種專心做陳列方面工作的現象，應該拋棄掉。現在工作者注意力，應當集中鄉村集體農場中組織的經濟的工作上。當這種工作得到應有成績時，“大農”，自然會出現的。

直到現在，人們都不很注意吸收中農去作集體農場中的領導工作。可是在中農中間，有很好的管理人，他們可充當集體農場建設中最好的經濟工作者。現在我們工作中的這個缺點，應該消滅掉。現在的任務是吸收中農中間優秀的份子做領導工作，讓他們在這方面發展他們的能力。

直到現在，人們還沒有充分注意到農婦中間的工作。過去的時期，表明農婦中間的工作是我們工作中最弱的地方。現在，應該堅決的徹底把這種缺點消滅掉。

直到現在，許多區裏的共產黨員，以爲他們能夠用他們自己的力量解決集體農場建設中的一切任務。因此他們就沒有充分注意到吸引非黨份子來參加集體農場中負責的工作，沒有充分注意到提拔非黨份子來做集體農場中的領導工作，沒有充分注意到組織集體農場中廣大的非黨積極份子。我們黨的歷史，證明這種立場根本不正確的，集體農場建設中過去這個時期，又一次的證明了這

點。倘若共產黨員閉關自守，用一堵牆與非黨的份子隔開，那末他們就要毀壞全部的事業。共產黨員之所以能够在社會主義鬥爭中得到光榮，共產主義的敵人之所以都被打翻，其中有一個原因，就是因爲共產黨員能够吸收非黨羣衆中的優秀份子來參加工作，他們能够盡量的應用廣大非黨羣衆的力量，他們能够團結廣大非黨的積極份子於自己黨的周圍。現在我們應該堅決的，澈底的把我們非黨份子工作中的缺點消滅。

改正我們工作中的這些缺點，根本的消滅這些缺點，這就是把集體農場中的經濟工作，推上正軌。

所以：

(一) 正確的組織播種，這就是任務。

(二) 集中注意力到集體農場運動中的經濟問題上面去，這就是解決這種任務所必要的方法。

蘇聯共產黨第十六次大會上 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

—

日益增長的世界資本主義的恐慌 與蘇聯的國際地位

同志們！自從第十五次代表大會到現在，已經過了兩年半。這一個時期，就表面上看來，似乎覺得不很大。但是，這一時期中，在各民族和各國家的生活上，都起了很嚴重的變化。若是簡單的拿幾句話來說明這一個時期的特性，那我們可把這個時期叫做轉變的時期。這一時期不僅對於我們蘇聯是一個轉變時期，而且對於全世界各資本主義國家，也是一個轉變時期。可是在這兩種轉變之間，却有根本不同之點。在蘇聯呢，這個轉變是向着新的更偉大的經濟興旺方面進行的一個轉變；而在資本主義的各國，這個轉變却是向着經濟低落方面走的一個轉變。在我們蘇聯，是工業和農業的社會主義建設天天的興旺；而在資本主義的各國，却是工業和農業中日益增長的經濟恐慌。

簡單的說，現在的狀況就是這樣。

你們可回想一下兩年半以前各資本主義國家裏的情形。那時候差不多所有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生產和貿易都是增長的。差不多所有農業國家的原料和食糧的生產都是增長的。十足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在那時候被人稱爲是光榮的。高唱美國經濟的“興盛”，崇拜美金，歌頌新技術的發達，讚揚資本主義的合理化，以爲資本主義“健康”，的時期和資本主義穩定而不可動搖的時期到來了。蘇維埃“必定倒台”，蘇聯“必定破產”，這些話成了資本主義世界的“總同盟，歡呼。

兩年半以前的情形就是這樣。

現在的情形怎樣？

現在，差不多在一切資本主義的工業國家裏，都是經濟恐慌。現在，一切農業國家裏都是農村經濟恐慌。不是“興盛”，而是羣衆的貧窮和失業工人的大大增加。不是農村經濟的高漲，而是千百萬農民羣衆的破產。一般對於資本主義萬能的幻想，特別是對於美國資本主義萬能的幻想，已被擊破了。美金和資本主義合理化的得勝歌聲，已一天天的弱小起來。對於資本主義的“錯誤，所抱的悲觀，却是一天天的厲害。對於蘇聯“必定倒台，的“同盟，歡呼呢，已變爲必要處罰“這個國家，的“同盟，咒詛聲，因爲這個國家，當到處恐慌的時候，他却敢發展自己的經濟。

這就是現在的情形。

結果，正像布爾塞維克兩三年以前所說過的一樣。

布爾塞維克曾經說過，資本主義國家裏的技術發達，生產力和資本主義合理化的加強，在千百萬工農羣衆生活水平線有限的範圍內，一定要走到嚴重的經濟恐慌。資產階級的出版物，當時對於布爾塞維克的這種“巧妙的預言，，曾經加以嘲笑。右派曾經聲明不同意布爾塞維克的預言，拿自由派的“有組織的資本主義，等空話，來代替馬克思主義的分析。但事實的結果是怎樣呢？結果正是像布爾塞維克當時所說的一樣。這是事實。

現在就來看看關於資本主義國家裏經濟恐慌的材料。

一 世界經濟恐慌

(甲) 在研究這個恐慌的時候，首先就有下面幾個刺目的事實：

(1) 現在的經濟恐慌，是生產過剩的恐慌。這就是說，商品的生產，比市場所能容納的要多。這就是說，布料、燃料、工廠製造品和食品等等的生產，比那些主要底消費者即（民衆）拿現錢來購買的能力要大，因為民衆收入的水平線，還是很低。民衆的購買力，既然還是停留在最低限度的水平線上，那麼商品，布料和麵包等等的“多餘品”，資本家都拿來放在堆棧裏，或者簡直拿來毀滅，以便維持市面上的高價；縮小生產，裁減工人，而民衆反因商品生產太多而貧困。

(2) 現在的恐慌，是歐戰後第一個世界的經濟恐慌。這個恐慌的成爲世界恐慌，不僅只是就他包括世界上一切的，或差不多一切的工業國家而講，其中甚至連有系統地吸吮德國幾十萬萬馬克賠款的法國，也不能避免經濟上相當的停滯，並根據所有的材料，也必定由停滯而轉爲恐慌。這個恐慌成爲世界的恐慌，而且是因為這個工業的恐慌，在時間上恰與農業恐慌相匯合，而後者却又遍及了世界上各主要農業國家原料和食品的生產。

(3) 現在的世界恐慌，在發展上是不平衡的，雖然他帶着普遍的性質，但是他打擊這一國或是那一國，在時期上和力量上都是不同的。工業恐慌，開始是在波蘭，羅馬尼亞，巴爾幹各地。這個恐慌，在這些地方繼續了去年整個的一年。農業恐慌的明顯的徵兆，還是在一九二八年底，在加拿大，美國，阿根廷，巴西和澳大利亞，就已經有了。在整個這個時期中，美國的工業是向上升的。到一九二九年年中，美國的工業生產，達到了空前的高度。僅從一九二九年下半年起，才開始轉變，隨後就是工業生產恐慌不斷的擴大，竟使美國回到了一九二七年的狀態。接着就是加拿大和日本的工業恐慌。其次是中國和各殖民地的恐慌與破產，這些國家的恐慌，因銀價低落而更加嚴重，且生產過剩的恐慌，與農民經濟破產相匯合，地主的剝削和軍閥的苛捐雜稅，使農民經濟

陷入完全不能生存的地位。至於西歐方面，經濟恐慌只是在今年初才開始，且爆發的力量，不是到處一樣，譬如在法國，那時候工業生產還是繼續着高漲。

我想，現在用不着特別舉出許多數目字，來證明現在的恐慌。恐慌的存在這件事實，現在已經無人爭論了。所以我只舉出一個不很大，但“很能表示現時世界經濟，特點的統計表來，這個表是不久以前德國“行市研究院，發表的。他表示美國，英國，德國，波蘭和蘇聯，從一九二七年起，礦業和大製造工業中各主要部門的發展，同時，把一九二八年生產的水平線，作為一百。

這個表如下：

	蘇聯	美國	英國	德國	法國	波蘭
1927	82,4	95,5	105,5	100,1	86,9	88,5
1928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929	123,5	106,2	107,9	101,8	109,4	99,8
1930(第一季)	155,5	95,5	107,4	93,4	113,1	84,6

這個表證明些什麼呢？

第一，他就是證明美國及德國和波蘭，在大工業生產上，處於很顯明的恐慌裏，同時，在一九三〇年的第一季中，美國經過一九二九年上半年的高漲後，生產水平線與一九二九年比較，低落了百分之一〇點八，就是降低到了一九二七年的水平線。德國經過三年的停滯狀態後，生產水平線與去年相比較，降低了百分之八點四，與一九二七年相比較，降低了百分之六點七。波蘭自去年恐慌之後，生產水平線與去年相比較，降低了百分之十五點二，比一九二七年低百分之三點九。

第二，這個表是證明英國已經三年停滯在一九二七年的水平線上，處在嚴重的經濟上的停滯狀態中，同時，在一九三〇年的第一季中，英國已經把自己的生產水平線，比去年降低了百分之〇點五，這樣，他就開始了恐慌的第一期。

第三，這個表是證明各大資本主義國家中，只有在法國，還有大工業稍許

高漲的情形，可是，他在一九二八年高漲的百分數是一三點四，在一九二九年是九點四，而在一九三〇年的第一季中，與一九二九年相比較，高漲的百分數只是三點七了，因此，他的高漲線是一年年下降的。

最後，這個表是證明世界上一切國家中，只有蘇聯的大工業是酒猛高漲的，同時，在一九三〇年的第一季中，生產水平線越過一九二七年水平線兩倍以上，而高漲的百分數，一九二八年是一七點六，到一九二九年漲到二三點五，而到一九三〇年的第一季中，已漲到三二，因此，高漲線是一年年的上升的。

或者有人說，本年第一季以前情形是這樣，那麼在本年的第二季中，情形或者可以變好。但是第二季中所有的材料，都不能證實這種說法。反之，這些材料都是證明第二季的情形，比以前更變壞了。這些材料，證明紐約交易所股票的價格更形低落，證明美國企業的破產更形增加，證明美國，德國，英國，意大利，日本，南美，波蘭，捷克斯拉夫等處的生產更形縮小，工人的工資更加減低，失業工人更加增多；證明法國工業中許多部門都已入於停滯的狀態，而這種停滯狀態，在現時國際經濟環境之下，是恐慌開始的徵兆。美國失業工人，現在已有六百多萬，德國近五百萬，英國有二百多萬，意大利，南美，日本等國，各近百萬，波蘭，捷克斯拉夫，與大利等國，各近五十萬。不要說使千百萬農民羣衆破產的農業恐慌之更加緊張。農村經濟生產過剩的恐慌已經達到了這樣程度，就是，爲了要保持高的價格和資產階級的利潤，在巴西拋棄了二百萬袋的咖啡到海裏去，美國已開始拿玉蜀黍代替煤炭作燃料，德國有數百萬蒲特的黑麥拿去喂豬，而在棉花和小麥方面，却設種種方法，把耕田面積縮小百分之十至十五。

這就是正在擴大的世界經濟恐慌的一般情形。

(乙)當現在世界經濟恐慌大行其破壞工作的時候，大批的中小資本家一落千丈，一部份貴族工人和農戶遭了破產，千百萬的工人羣衆受着飢餓，在這種情形之下，大家都問：恐慌的原因在那裏，他的根源在那裏，怎樣與恐慌奮鬥，怎樣消滅這種恐慌？於是就發生形形色色的關於恐慌的“理論”，竟有人

提出許多“減輕，，，“防止，，，“消滅，恐慌的計劃。資產階級的在野派，批評資產階級的政府，說他“沒有採取所有的辦法，以防止恐慌。“民主派，非難“共和派，，，“共和派，非難“民主派，，而這些派又共同起來非難胡佛派及其“聯合後備制，，因為這種制度未能“防止，恐慌於未來。還有一種“聰明人，，他們甚至把世界經濟恐慌的原因，看得是“布爾塞維克的詭計，，。我所說的是指一個有名的工業家列赫列格，看起來，這個人很少像是一個工業家，可是倒很像一個文學家中的“工業家，，或工業家中的“文學家，（會場大笑）。

很明顯的。這些理論和提議沒有絲毫的科學性。要承認，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在恐慌面前已表示完全破產了。不但如此，這些經濟學家甚至連他們的前輩們所不常拋棄的最小制度的徽紋都失掉了。這些先生們，忘記了恐慌不可看作是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中的一種偶然現象。他們忘記了經濟恐慌是資本主義制度必然的結果。他們忘記了經濟恐慌是隨着資本主義的產生而產生的。在百數十年的時間中，經濟恐慌是按期發生的，每十二年，十年，八年一次。在這個時期中，各式各樣的資產階級政府，大大小小的資產階級的行動家，都曾經企圖把自己的力量用來試一試“防止，和“消滅，恐慌。但是他們遭了失敗。他們的失敗，是因為他們不知道在資本主義的範圍內，是不能防止或消滅經濟恐慌的。無怪乎現在資產階級的著名角色也遭了失敗。無怪乎現在資產階級政府的辦法，事實上不能減輕恐慌的緊張，不能減輕千百萬勞動羣衆的困苦，反而引起更多的破產，失業工人的更形增加，引起強大的資本主義聯合吞併比較弱小的資本主義聯合。

生產過剩的經濟恐慌的基礎和他的原因，是在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本身裏。恐慌的基礎，是在生產的社會性質和生產結果底資本主義形式的佔有兩者間的矛盾裏。資本主義的這個根本矛盾的表現，就是資本主義爲要取得最大限度利潤而發展的生產可能猛烈地增高，但千百萬勞動羣衆的購買能力相對地縮小，而且資本家又時時努力把這些羣衆的生活水平線束縛在極低限度的範圍之

內。爲了要在競爭中取得勝利，且多得利潤，資本家不得不發展技術，實行合理化，加緊剝削工人，且把自己企業生產的可能性，提高到極大限度。所有的資本家，誰也不願比誰落後，因此，他必須用種種方法走上使生產可能性迅速發展的道路。但是，國內市場和國外市場，以及主要的購買者（千百萬工農羣衆）的購買力，還是在很低的水平線上。從此就發生生產過剩的恐慌。從此就發生一定的結果，這種結果是多久有定期的重復爆發，他的表現，就是商品賣不出去，生產縮小，失業工人增多，工資降低；因此，就使生產水平線和購買支付能力的水平線中間的矛盾，更加緊張起來。生產過剩的恐慌，是這個矛盾表現的最激烈而且破壞性最大的形式。假使資本主義能夠把自己的生產，不用他去取得最大限度的利潤，而用他去有系統的改良民衆的物質生活，假使他能夠把利潤不拿去滿足寄生階級的需要，不拿去完成剝削的方法，不拿去作資本的輸出，而拿去有系統的提高工人和農民的物質生活，那麼恐慌就不會有了。但是那時候的資本主義，就不得成其爲資本主義了。要消滅恐慌，須先消滅資本主義。

這就是生產過剩的經濟恐慌的一般底基礎。

但是要說明現在的恐慌，僅只有上面所講的還不夠。現在的恐慌，不是舊時代恐慌的一種簡單的重演。他是在一定的新條件下發生和發展着的。要瞭解現在恐慌的全景，必須對於這些條件加以說明。因爲他是由於許多特殊情形而更複雜和加深的，假使不說明這些特殊情形，便不能明確的認識現在的經濟恐慌。

這些特殊情形是什麼呢？

這些特殊情形，可以歸納成下面幾種事實：

（1）現在的恐慌，特別厲害的傷害了資本主義底主要國家，這個國家，就是至少擁有全世界一半生產和消費的美國。這種情形，很明顯的不能使恐慌影響的範圍大大地擴張，不能不引起恐慌的緊張和世界資本主義額外的許多困難。

(2) 在經濟恐慌發展的行程中，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恐慌，不是簡單的與農業恐慌相匯合，而是與農業國家的農村經濟恐慌交相混雜，因此就加深了困難，而且預先決定了經濟發展上一般的低落。不用說，工業恐慌將使農業恐慌加緊，農業恐慌又將使工業恐慌加緊，而這種情形，是不能不使整個經濟恐慌加深的。

(3) 現在資本主義與以前的資本主義之不同，就在於前者是壟斷式的資本主義，正因為，雖然生產過剩，而各種資本主義的聯合，也必然為保持商品的高度壟斷價格而鬥爭。很明顯地，因為這種情形，恐慌就使那商品底主要消費者——民衆，特別地遭受破產和痛苦，同時，不能不引起恐慌的延長，不能不阻礙恐慌的消散。

(4) 現在的經濟恐慌，是在資本主義普遍恐慌的基礎上擴展的，這個普遍的恐慌，開始於帝國主義大戰的時期，他動搖着資本主義的基礎，並促進了經濟恐慌的到來。

這是表明什麼呢？

這首先就是表明，帝國主義大戰和他的結果，加緊了資本主義的腐化，並破壞了資本主義的平衡，他表明我們所處的時期是戰爭和革命的時期，就是說資本主義已經不是一種世界經濟獨一無二且包羅一切的制度，現時除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外，還有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存在，這個社會主義制度，一天天發達起來，與資本主義制度相對立，他的存在這件事情，就是表示資本主義的腐朽，並且動搖他的基礎。

再就是表明，帝國主義大戰和蘇聯革命的勝利動搖了帝國主義在殖民地和被保護國的統治，表明帝國主義在這些國家裏的威信已被破壞，表明帝國主義在這些國家裏已不能再用舊的方法來維持自己的統治了。

這就是表明，大戰的時候和戰後的時期中，在殖民地和被保護國裏，發生並長大了本地的幼稚的資本主義，這個本地的資本主義，在市場上能順利的與老資本主義國家相競爭，因此就使爭奪市場的問題，更加緊張而複雜起來。

末了，這就是表明帝國主義大戰，給了多數資本主義國家一件困難的遺產，就是企業經常地不能開滿工和千百萬的失業軍，這些失業者，已經由後備軍變而為經常的失業軍，這種情形，還是在經濟恐慌以前就給資本主義造成了很多的困難，而在恐慌的時候，當使問題更複雜起來。

這就是使世界經濟恐慌更加深和更緊張的幾個特殊情形。

應當承認，現在的經濟恐慌，是直到如今所有的世界經濟恐慌中的最嚴重且最深刻的一個恐慌。

二 資本主義矛盾底銳利化

世界經濟恐慌的最重要的一個結果，就是世界資本主義本身矛盾的顯露和緊張。

(甲)各主要帝國主義的國家，爭奪出賣商品的市場，爭奪原料，爭着輸出資本等等的矛盾正在暴露和緊張。舊的勢力範圍和殖民地的分配，現在已經不能滿足任何資本主義國家了。各資本主義國家看見力量的對比關係已經起了變化，要相當的重新分配市場和原料來源以及勢力範圍了。這些矛盾中的主要的，就是美國與英國中間的矛盾。無論在商品輸出方面或資本輸出方面，主要的鬥爭，都是英、美中間的鬥爭。對於這一點，拿關於商品和資本輸出的任何一種經濟報紙或文件來看，都不難明瞭。他們中間的鬥爭和主要的地方，就是南美洲、中國和老帝國主義國家的殖民地和被保護國。在這個鬥爭中，以力量的比重看起來，美國是比較強。除這個主要的矛盾外，還有不主要的，但亦是很現實的矛盾，即美國與日本間的矛盾，德國與法國間的矛盾，法國與意大利間的矛盾，英國與法國間的矛盾等等。

因為現在恐慌的發展，爭奪市場，爭奪原料，爭着輸出資本的鬥爭，定將一月一月、一天一天的加強起來，這是毫無疑義的。

這種鬥爭的方法，就是：關稅政策，廉價商品，廉價借貸，重新團結力量 and 新的軍事政治聯盟，增加軍備和準備新的帝國主義大戰，最後就是戰爭。我。

在上面已經說過，現在的恐慌牽動了所有的各生產部門。但有一個生產部門是沒有受恐慌影響的，這個部門就是軍事工業。雖有恐慌，但這部門工業却是經常地發展。資產階級國家都拚命的武裝，過度的武裝。爲的是什麼呢？當然，不是爲的要談判而是爲的戰爭。帝國主義者所以需要戰爭，是因爲戰爭是重新瓜分世界的唯一方法，重新瓜分商品市場、瓜分原料來源地、瓜分投資勢力範圍的唯一方法。

在這種情形之下，所謂和平主義，自然走到自己的末日了；國際聯盟祇是一個還未埋葬的死屍；「裁兵計劃」已一個個的破產，裁減海軍會議，却變成了革新和擴充海軍的會議。

這就是說，戰爭的危險將以更快的步驟緊張起來。

讓那班社會民主黨人去高叫什麼和平主義、和平、資本主義的和平發達等類的鬼話吧！但是社會民主黨在德國和英國執政的經驗告訴我們，所謂和平主義僅僅是他們掩蓋準備新的大戰的假面具。

(乙)戰勝國與戰敗國兩方間的矛盾正在顯露出來，並且這種矛盾必將緊張起來。我所講的戰敗國，主要的是指德國。因爲恐慌和市場問題緊張的緣故，戰勝國對於德國的壓迫，毫無疑義的是加強了，而德國不僅祇是一個欠債的，並且還是很大的一個商品輸出者。戰勝國與德國之間的關係，好像一個寶塔似的，坐在這個寶塔之上當老爺的是美國、法國和英國等等，他們手裏拿着榮氏的計劃，計劃上面寫着「付錢」二字，而被坐在下面的是千方百計不得不用盡九牛二虎之力去付清幾十萬萬賠款的德國。你們想知道這是怎樣一回事嗎？這就是「洛卡諾的精神」。假使以爲這種情形能夠輕易的過去而無須世界資本主義費絲毫氣力，那就是簡直連一點實際生活也不懂。假使以爲德國資產階級能够在最近的十年內付清兩百萬萬馬克的賠款，而處在「自家」資產階級和「外來」資產階級兩層壓迫下的德國無產階級，能不經過激烈的鬥爭，給德國資產階級好好地從血汗裏吸吮去兩百萬萬馬克，這也是等於癡人說夢。讓德國和法國的政治家去裝腔作勢，說他們相信會有這樣神奇的事情吧，我們布爾

誰敢還是信什麼神鬼的。

(丁)帝國主義國家與殖民地及附屬國兩方面矛盾的顯露和緊張。日形高漲的經濟恐慌，不能不使帝國主義者對於殖民地國家和附屬國加緊壓迫，因為這些國家是銷售商品和取得原料的主要市場。而實際上，這種壓迫也確是達到了最高的程度。歐洲的資產階級，現在是處於和“自己，殖民地（印度，安南，東印度羣島，北非洲）作戰的狀況，這是事實。“自主的，中國，實際上已經分成許多勢力範圍，而反革命的國民黨中的各派軍閥，彼此交戰又是執行帝國主義營壘中自己主人們的志願，中國民眾乃因之而破產，這也是事實。

有種騙人的謊話，以為破壞中國“和平與治安”，的罪人，是俄國公使館的工作人員，這種話已經完全破產了。中國的中部與南部，好久已經沒有俄國的公使館了。可是那裏有英、日、德、美以及其他國家的公使館。無論在中國的中部或南部，早已都沒有俄國的公使館了。可是在各交戰的軍閥之下，有德、英、日等國的軍事顧問。中國已經好久沒有俄國公使館了，可是有英國、美國、德國、捷克斯拉夫及其他國家的大炮，步槍，飛機，坦克車和殺人的毒氣等等東西。結果是怎樣呢？現在中國的南部和中部並沒有“和平與治安”，但是有最混亂，最帶破壞性的軍閥戰爭，並且這種戰爭，是有歐美各“文明，國家供給財政並指導的。這樣看來，資本主義國家的“文明洗禮，工作的情形，却很令人驚駭，只不知道這與俄國的布爾塞維克有什麼關係。

假使以為帝國主義者的這種橫行，不會受絲毫的懲罰，那是笑話。中國的工人和農民，已經拿建立蘇維埃和紅軍來回答帝國主義者。有人說中國已經成立了蘇維埃政府。我想如果這話是正確的，那也沒有什麼奇怪。毫無疑義的，只有蘇維埃能夠把中國從最後的破產和貧困裏救出來。

至於印度、安南、東印度羣島和非洲等地方，這些國家裏的革命運動，有時候帶着謀解放的民族戰爭的形式，這種運動毫無疑義的是在那裏發展着。資產階級的老爺們，依靠警察的刺刀，且號召甘地一流人物來幫助，一心想把這些國家殺成血河。毫無疑義的，警察的刺刀是一種不可靠的東西。俄國沙皇政

府，也曾經依靠過警察的刺刀，但結果怎樣，是大家所知道的。至於甘地式的還頂助手，俄國沙皇政府也曾經有過一大批，就是各式各樣的白頭派的安瑟芬，但是結果，除倒台外，沒有別的。

(丁)資本主義國內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方間矛盾的顯露和緊張。恐慌早已使資本家加強對於工人階級的壓迫了。恐慌早已引起了資本主義合理化的新浪潮，工人階級生活的惡劣化，失業的更增加，失業工人常備軍的更擴大，工資的更減低。很明顯的，這種情形會使環境革命化，使階級鬥爭緊張，使工人們起來幹新的階級戰鬥。

因此，工人羣衆中那種社會民主黨的幻想，日形消散。破壞罷工，指使工廠關門和開除工人的社會民主黨人，在他們掌握政權之後，什麼“生產的德謨克拉西”，“工業和平”，鬥爭的“和平方法”，等等騙人的鬼話，在工人們的耳朵聽來，已是很可惡的笑談了。現在能相信社會法西斯蒂那種騙人宣傳的工人們，還可以多找嗎？一九二九年八月一號的工人示威（反對戰爭危險），以及一九三〇年三月六號的示威（反對失業），證明工人階級中較好的份子，都已經脫離了社會法西斯蒂的影嚮。經濟恐慌，給工人中對於社會民主黨的幻想一個新的打擊。現在找不出許多的工人，在因恐慌而破產和貧窮之後，還同意和相信“每個工人，有參加“德謨克拉西化了的，合股公司而發財的可能。不用說，恐慌能給這一切類似的幻想以致命的打擊。

但是，工人羣衆的脫離社會民主黨，是表明他們（工人）向共產主義方面的轉變。事實上確也是這樣的。在共產黨影嚮下的職工運動的增漲；共產黨在選舉運動中的勝利；在共產黨員領導下的罷工運動的增多；經濟罷工轉變為共產黨員所組織的政治上的示威；同情於共產主義的工人們的羣衆示威遊行，這些示威遊行又引起了工人階級中最積極的情緒；這一切現象，都是證明工人羣衆把共產黨看作是能和資本主義鬥爭的唯一的政黨，值得工人信仰的唯一的政黨，可以跟着這個政黨，去為謀從資本主義下解放出來而鬥爭。這就是羣衆向共產主義方面的轉變。這就是我們各兄弟黨能變成工人階級的大羣衆政黨的保：

證。不過須要共產主義者能估量環境，且適當的利用這種環境。各國共產黨曾與資本家在工人階級中的走狗——社會民主黨作下調和的鬥爭，且曾打破幫助社會民主黨的，離開列寧主義的各種傾向，這都是證明各兄弟黨是站在正確的道路上。但必須他們能堅固的站在這條道路上，因為只有在這個條件下，他們才能取得工人階級中的大多數，且能順利的準備無產階級起來作目前的鬥爭。因為只有在這個條件下，才能使共產國際的影響和威信更加增高。

這就是世界資本主義各根本矛盾的狀況，這些根本矛盾，因世界經濟恐慌而緊張到了極點。

這些事實表明些什麼呢？

他們表明資本主義的穩定到了窮途末日。

他們表明羣衆革命運動的高漲，將更有力的強烈起來。

他們表明世界經濟恐慌，將在許多國家裏轉變成政治的恐慌。

第一，這是說資產階級在內政上，將用加緊的法西斯蒂化的方法去尋找出路，爲了這一點，他將利用一切反動勢力，連社會民主黨也在內。

第二，這就是說資產階級在對外政策上，將在新帝國主義大戰中和武裝干涉中去尋找出路。

末了，這就是說無產階級反對資本主義的剝削和戰爭危險，必將在革命中去尋找去路。

三 蘇聯與各資本主義國家的關係

(甲)我在上面已經說過世界資本主義的矛盾。但是除了這些矛盾以外，還存在有一種矛盾，這就是蘇聯和資本主義世界間的矛盾。不錯，這種矛盾，不是資本主義內部的矛盾。他是整個資本主義與正在建設社會主義的國家間的一種矛盾。但是這不妨礙他動搖和破壞資本主義本身的基礎。不僅這樣，這個矛盾并把資本主義所有的矛盾都揭穿到底，并把這些矛盾積成一團，使他們變成資本主義制度本身生死存亡的大問題。因此，當資本主義矛盾每次開始緊張

起來的時候，資產階級總眼望着蘇聯，企圖在蘇聯的腿上來解決資本主義的某個矛盾，或資本主義所有的一切矛盾，因為蘇聯是革命的大本營，他的存在，就使工人階級和殖民地革命化，他妨礙進行新戰爭，妨礙重新瓜分世界，妨礙統治廣大的蘇聯市場，而這種市場，因經濟恐慌的緣故，現在對於資本家是特別需要的。

由此，就生出對蘇聯的冒險行動和干涉的趨勢，這個趨勢，因經濟恐慌的擴展更要加緊。

這個趨勢在現時最明顯的代表者，就是現在資產階級的法國，即可愛的“大歐羅巴”，的故鄉，開洛和約的“搖籃”，世界上各侵略國各軍國主義國家中最利害的侵略的和軍國主義的國家。

但是武裝干涉這件東西，是一條棍子的兩端。這是資產階級最明瞭的。資產階級想，假使干涉的事情能“一帆風順”，結果蘇聯失敗，那是好的。但是，假使這種干涉的結果，是資本家失敗，那就怎樣辦呢？不是已經有過一次干涉嗎，那次的干涉是破了產的。在第一次干涉的時候，布爾塞維克還是軟弱的，但干涉却破了產，那麼，怎樣能保證第二次干涉不會遭同樣的破產呢？因為大家都知道，現在的布爾塞維克，無論在經濟上，政治上，以及國防的準備上，都比以前強多了。同時，對於資本主義國裏的工人們要怎樣辦呢，這些工人們不是不准干涉蘇聯，不是將反對武裝干涉，在必要時，不是能夠打擊資本家的後方嗎？這樣看來，不如還是採取和蘇聯加緊通商關係好，並且布爾塞維克也是不反對這種辦法的。

由此就生出與蘇聯綏和和平關係的趨勢。

這樣，我們便有兩種不同而方向相反的趨勢：

(1)破壞蘇聯與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關係，採取對蘇聯的挑撥行兇，公開的和秘密的準備武裝干涉以反對蘇聯。這就是使蘇聯國際地位有危險的元素。譬如英國保守黨內閣與蘇聯的絕交，中國軍閥的奪取中東路，財政上封鎖蘇聯，以羅馬教皇為首的教徒底“征討運動”，反對蘇聯，外國的奸細組織我們的專

鬥家起來作破壞經濟的行動，舉行炸毀和焚燒（如‘連那金場’，幾個職員所幹的事），諷刺蘇聯代表（波蘭），阻礙我們的出口（美國，波蘭）等等事實，都是這種元素的作用。

（2）各資本主義國家裏工人們的同情和擁護蘇聯，蘇聯在經濟上和政治上威力的增大，蘇聯在國防上力量的加強，蘇維埃政權所堅決執行的和平政策。這些，都是鞏固蘇聯國際地位的元素。中東路事件的勝利，和英國恢復邦交，和資本主義國家經濟聯繫的增多等等事實，就是這些元素的作用。

蘇聯的國外狀況，是由這兩種趨勢的鬥爭來決定的。

（乙）有人說，改良與資產階級國之經濟聯繫的事情上的困難點，是債務問題。我以為還債這不是一個理由，而是侵略份子作武裝干涉宣傳的一種口實。我們在這方面的政策是明白且完全有根據的。在借款給我們的條件下，我們同意償還一小部份戰前的債務，而把這種還款看作是借款的補充利息。沒有這個條件，我們是不能還債，而且不應還債的。要向我們多要求些嗎？根據在那裏？難道不知道這些債是沙皇政府所借的，而沙皇政府已被革命所推翻，而沙皇政府的債務是蘇維埃政府所不能負責的嗎？有人要提起國際公法和國際義務來。那麼，試問‘協約國’的老爺們，根據何種國際公法，把比沙拉比亞從蘇聯奪去，而把他交給羅馬尼亞的貴族呢？試問法、英、美、日等國的資本家，根據何種國際義務進攻了蘇聯，干涉了蘇聯，且整整的搶劫了他三年之久，使他的民衆破產呢？假使這還叫作國際公法和國際義務，試問什麼叫作搶劫？（會場上笑聲，鼓掌）‘協約國’的老爺們既幹了這些搶劫的事，他們就不能拿國際公法和國際義務來作根據了，這事難道還不明白嗎？

又有人說，是俄國布爾塞維克的宣傳，妨礙確定‘正當的’關係。爲了要提防布爾塞維克有害的宣傳，資產階級的老爺們用‘哨兵線’，和‘鐵絲網’，把自己保衛起來，而把看守‘鐵絲網’的官職，很慈愛的交給波蘭，羅馬尼亞，芬蘭等國。有人說德國很吃醋，因爲人家不願意委託他看守‘哨兵線’，和‘鐵絲網’。他們亂喊布爾塞維克的宣傳，不是爲着要確定‘正當的關係’，而

是一種宣傳武裝干涉的口實，這還待證明嗎？他們如果不願意作可笑的人，怎樣會自己‘‘用電網隔起來，，以‘‘提防，布爾塞維克的思想哩，難道在他們自己的國家內，沒有合於這種思想發展的基礎嗎？沙皇政府當時也曾經‘‘這樣隔起來，，‘‘提防，布爾塞維克主義，但是人人都知道，他是沒有‘‘提防，得了的。他所以沒有提防得了，是因為布爾塞維克主義到處發展，不是從外而來的，乃是從內而來的。中國、印度、安南等國，恐怕在‘‘提防，俄國布爾塞維克一方面，比任何國家都要‘‘保衛，得好，但是結果怎樣的呢？雖然設有‘‘哨兵線，，但布爾塞維克主義在這些國家裏，現在是發展着，將來還是要發展的，因那裏有適合於布爾塞維克主義發展的條件。這又與俄國布爾塞維克的宣傳有什麼關係呢？假使資本家老爺們，能夠設法和經濟恐慌，羣衆的貧窮，失業，工資的低落，勞動羣衆的被剝削等等‘‘隔離起來，，——那就是另外的說法了，那時候他們國家裏的布爾塞維克運動也不會有了。但問題就在於他們沒有這種能力，却拿俄國布爾塞維克的宣傳來掩蓋自己的懦弱無能。

又有人說，問題的難點，是在於我們的制度是蘇維埃的制度，在於我們的經濟集體化，在於我們和富農鬥爭，在於我們作反宗教的宣傳，在於我們與‘‘科學人物，中的賊害份子和反革命者鬥爭，在於我們驅逐了比雪都夫斯基，索羅門諾夫和德米托列夫斯基這班人等等。但是這說得未免太無聊了。他們不喜歡蘇維埃制度，不知我們也是同樣的不喜歡資本主義的制度呢（會場上笑，鼓掌）。我們不喜歡他們有幾千萬的失業工人，被逼得挨餓和流離失所，而同時，無數萬的財產，却都被一小部份資本家所操縱着。但是我們同意了不干涉別國的內事，那就值不得再提起喜歡與不喜歡的問題了。農業集體化，反對富農，反對經濟上的賊害分子，反宗教宣傳等等，是蘇聯工農底不可侵犯的權利，這些權利載在蘇維埃憲法上，是不能被人剝削奪掉的。蘇聯的憲法是我們必須徹底施行的。誰要不願意承認我們的憲法，他就可以走開，四面八方都無阻礙。至於比雪都夫斯基，索羅門諾夫和德米托列夫斯基這班人，我們現在是要把他們當作無用的貨物驅逐滾蛋的。因他們是革命所不需要的，是對於革命有害

空。誰要是對於這種懷有特別的同情心，就讓他收留他們去好了。（會場上笑）我們革命的磨石底工作是很靈敏的，把一切有用的東西都交給蘇維埃，把一切廢物都去掉。聽說法國巴黎資產階級中很需要這種廢物，讓他們運回國去作康健辯論。不錯，這種輸入品要稍許加重些法國在商業上的入超，是資產階級的老爺們所永遠反對的。但這已經是他們的事情，與我們沒有關係。讓我們不去干涉法國的內政吧。（會場上笑，鼓掌）

妨害與資本主義國家確定「正常的」關係的一些「障礙物」的問題，就是這麼一回事。

看起來，這些「障礙物」是種有名無實的「障礙物」，是用來作反蘇維埃宣傳的口實的。

我們的政策，是和平的政策，是和一切國家加緊商業關係的政策。這個政策的結果，就是和許多國家的關係都好些，並訂立了許多的通商條約，技術幫助的條約等等。蘇聯簽訂開洛和約，根據開洛和約，我們和波蘭、羅馬尼亞、立陶宛等國簽了有名的和約，與土耳其續訂了和善並中立的條約。這些，也是我們對外交和平政策的結果。最後，還有一件事實是這個政策的結果，就是雖有挑戰者的許多挑撥和冒險行爲，但我們却得以維持了和平，未讓敵人把我們牽入戰爭的漩渦。這個和平政策，是我們以後還將用一切力量和種種方法來繼續實行的。我們不願意拿人家的一寸土地，但是我們自己的土地是一尺也不給人家的。（鼓掌）

這就是我們的對外政策。

我們的任務，就在於以後還是用布爾塞維克的堅決性繼續實行這個政策。

二

社會主義建設不斷地發展和蘇聯底內部情形

現在來講蘇聯底內部情形。

在各資本主義國家裏，現在流行着經濟的恐慌和不斷增加的失業，而我們

國家的內部情形，却恰好相反，是國民經濟不斷興旺和失業不斷地減少。大工業發展起來，並且加快了發展的速度。鞏固了重工業。社會主義部份的工業，已經大大的前進了。在農業中發展了新的力量，就是蘇維埃農場和集體農場。倘若兩年前我們有過五穀生產的危機，在收買糧食方面，主要的全靠個人經濟，那末，到了現在，重心已經移到集體農場和蘇維埃農場上去了，而五穀的危機，六體上可以說是解決了。農民中間的基本羣衆，澈底的轉到集體農場方面來了。富農的反抗，已被打退。蘇聯的國內地位，更其堅固了。

現在蘇聯國內的一般情形，就是這樣。

我們來考察一下具體的統計。

一 整個國民經濟底發展

(甲) 如果一九二六年至二七年裏，即黨的第十五次大會前，全部鄉村經濟，連木材業，漁業等等都在內，他的總生產，照戰前盧布計算，總共有一百二十三萬萬七千萬盧布，即等於戰前百分之一百零六點六；那末下一年，即一九二七至二八年，就是百分之一百零七點二；一九二八至二九年，是百分之一百零九點一，到了今年，一九二九至三〇年，根據鄉村經濟發展的情形來算，將至少等於戰前百分之一百十三到百分之一百十四。

這裏我們見到整個鄉村經濟不斷的增長，雖然他的速度是比較慢些。

一九二六至二七年，即黨的第十五次大會以前，全部工業，大小都在內，連麵粉工業也在內，總的生產品，照戰前盧布計算，有八十六萬萬四千一百萬盧布，就是等於戰前百分之一百零二點五；第二年，一九二七至二八年，是百分之一百二十二；一九二八至二九年，是百分之一百四十二點五；到了今年，一九二九至三〇年，根據工業發展的情形來說，至少將要等於戰前百分之一百八十。

這裏我們見到整個工業空前的發展。

(乙) 一九二六年至二七年裏，即黨的第十五次大會前，我們所有鐵路上

的貨物轉運量，是八百一十萬七千萬啓羅米突噸，即戰前的百分之一百二十七；到了第二年，一九二七到二八年，是百分之一百三十四點二；一九二八至二九年，是百分之一百六十二點四；今年，一九二九至三〇年，根據所有的統計，將要等於戰前百分之一百九十三以上。至於說到新鐵路的建築，那末，在報告所包括的時期內，即從一九二七至二八的年度開始，鐵路從七萬六千啓羅米突噸增加到了八萬啓羅米突噸，這就是等於戰前百分之一百三十六點七。

(丙)倘若把一九二六到二七年裏國內商品買賣的流轉，當做一百（三百一十萬盧布），那末一九二七至二八年裏，流轉的數量，就增到了百分之一百二十四點六；一九二八至二九年裏，增到了百分之一百六十點四；到了今年，根據所有的統計，流轉的數量就將等於百分之二百零二，這就是說，等於一九二六至二十七年的兩倍。

(丁)倘若把一九二七年十月一日我們全部信用借貸機關的總賬目算做一百（九十一萬七千三百萬盧布），那末，一九二八年十月一日就增加到百分之一百四十一；到一九二九年十月一日，就增加到百分之二百零一點一，即等於一九二十七年的兩倍。

(戊)倘若把一九二六至二七年裏的國家總預算，算做一百（六十三萬萬七千一百萬盧布），那末，一九二七至二八年，國家預算增加到了百分之一百二十五點五；一九二八至二九年裏增到了百分之一四六點七；到了一九二九至三〇年，就增到了百分之二百零四點四，即等於一九二六至二十七年的兩倍（一百二十六萬萬零五百萬）。

(己)倘若一九二六至二七年我們對外貿易的流轉量（進出口）是等於戰前百分之四十七點九；那末，一九二七至二八年，我們見到對外貿易的流轉量增到了百分之五十六點八；一九二八至二九年裏，增到了百分之六十七點九；到了一九二九至三〇年，根據所有的統計，將要至少等於戰前百分之八十。

(庚)總計在報告所包括的時期中，全部國民收入增加的情形，（按一九二六至二十七年的不變價格計算）根據國家計劃局的統計，是：一九二六至二十七

年的國民收入等於二百三十一萬萬二千七百萬盧布；一九二七年至二八年等於二百五十三萬萬九千六百萬盧布，增加了百分之九點八；一九二八年至二九年等於二百八十五萬萬九千六百萬盧布，增加了百分之十二點六；一九二九至三〇年，根據所有的統計，國民收入應該至少等於三百四十萬萬盧布，那就是一年中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三年來平均每年的增加，超過百分之十五以上。

倘若我們注意一下美、英、德等國的國民收入，平均每年祇增加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八，那末，應該承認，蘇聯國民收入增加的速度真正要算是破天荒的

二 工業化的成績

我們國民經濟的發展不是盲目的，而是朝着一定的方向的，就是正朝着工業化方面的，是在增加工業在全部國民經濟系統中的比重的目標之下進行的，是在把我們國家從農業國變成工業國的旗幟之下發展的。

(甲)從工業在全部國民經濟的總生產量中的比重來說，全部工業和全部鄉村經濟之間互相關係的變動，在報告所包括的時期中有如下的情形：戰前，工業在全部國民經濟總生產量中所佔的部分是百分之四十二點一，鄉村經濟所佔的部分是百分之五十七點九；一九二七至二八年工業所佔的部分等於百分之四十五點二，鄉村經濟佔百分之五十四點八；一九二八至二九年工業佔百分之四十八點七，鄉村經濟佔百分之五十一點三；一九二九至三〇年，根據一切的統計，工業應該佔百分之五十三以上，鄉村經濟應該佔百分之四十七。

這就是說，工業的比重，已經開始超過鄉村經濟的比重了，我們現在已經處在變農業國為工業國的前夜。(鼓掌聲)

(乙)從工業國民經濟的商品生產中的比重方面說來，工業的比重更要大，倘若在一九二六至二七年，工業的商品生產，在國民經濟商品生產的總數內所佔的部分，是等於百分之六十八點八，鄉村經濟所佔的部分是百分之三十一點二；那末，一九二七至二八年裏，工業就佔百分之七十一點二，鄉村經濟佔

百分之二十八點八；一九二八至二九年，工業佔百分之七十二點四，鄉村經濟佔百分之二十七點六；到了一九二九至三〇年，根據一切的統計，工業將要佔百分之七十六，鄉村經濟佔百分之二十四。

在鄉村經濟這種不利的條件中，其中有一點是因為鄉村經濟的小農性和商品生產量少。由此很明顯了，用蘇維埃農場和集體農場的方法去鞏固鄉村經濟，去增加他的商品，這種情形必有相當的變更。

(丙)但是，一般工業的發展，還不就表明工業化速度的全景。為要見到全景，就必須再確定輕重工業間的關係。所以，生產工具的生產（重工業）在全部工業生產中所佔的比重的不斷增加，應該算是工業化發展的最明顯的表徵。倘若一九二七至二八年裏生產工具的生產在全部工業中所佔的部份是百分之二十七點二，大眾消費品的生產佔百分之七十二點八；那末，在一九二八至二九年裏，生產工具的生產就要佔百分之二十八點七，消費品佔百分之七十一點三；一九二九至三〇年，生產工具的生產，根據一切統計，要佔百分之三十二點七，消費品佔百分之六十七點三。

倘若不拿全部工業來看，只拿國民經濟最高委員會所計劃的，一切基本生產部門的工業來看，那末，生產工具的生產和大眾消費品的生產之間的關係，就要更好些：一九二七至二八年，生產工具的生產佔百分之四十二點七，消費品佔百分之五十七點三；一九二八至二九年，生產工具佔百分之四十四點六，消費品佔百分之五十五點四；一九二九至三〇年，根據一切的統計，生產工具生產將要佔百分之四十八以上，而消費品的生產佔百分之五十二。

我們國民經濟的發展，是在工業化的表徵之下，是在鞏固和發展本國重工業的表徵之下進行的。

這就是說，我們已經提高了，並繼續發展着我們經濟獨立的基礎——我們的重工業。

三 社會主義工業底指導地位和他發展的速度

我們國民經濟的發展，是在工業化的表話之下進行的。但並不是隨便什麼工業化我們都需要。我們所需要的工業化，是要他能保證社會主義式的工業不斷地超過小商品式的工業，尤其是資本主義式的工業。我們工業化的特點，就在他是社會主義的工業化，他能夠保證社會化部份的工業戰勝私人經濟式的部份，戰勝小商品的和資本主義的部份。

下面就是關於各部份經濟中的投資和總出產量的幾個總計。

(甲) 倘若拿各部份工業中投資數量的增加來看，那末，我們就可以見到下列的情形。社會化部份：一九二六至二七年裏為十二萬萬七千萬盧布；一九二七至二八年為十六萬萬一千四百萬盧布，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年為二十萬萬四千六百萬盧布；一九二九至三〇年為四十二萬萬七千五百萬盧布。私人經濟和資本主義部份：一九二六至二七年為六千三百萬盧布；一九二七至二八年為六千四百萬盧布；一九二八至二九年為五千六百萬盧布；一九二九至三〇年為五千一百萬盧布。

第一，這就是說，社會化部份工業中投資的數量，增到了三倍以上（百分之三百三十五）。

第二，這就是說，私人經濟和資本主義部份的投資，在這個時期中，減少了五分之一（等於百分之八十一）。

私人經濟和資本主義部份，是依靠着舊資本過活，並在走向滅亡。

(乙) 倘若按部份來看工業的總出產，那末，我們見到下列的情形。社會化的部份：一九二六至二七年是一百十九萬萬九千九百萬盧布；一九二七至二八年是一百五十三萬萬八千九百萬盧布；一九二八至二九年，是一百八十九萬萬零三百萬盧布；一九二九至三〇年是二百四十七萬萬四千萬盧布。私人經濟和資本主義部份：一九二六至二七年是四十萬萬四千三百萬盧布；一九二七至一九二八年是三十七萬萬零四百萬盧布；一九二八至二九年是三十三萬萬八千九百萬盧布；一九二九至三〇年是三十三萬萬一千萬盧布。

第一，這就是說，社會化部份工業的總生產，在三年裏邊增到了兩倍以上

(百分之二百零六又二)。

第二，這就是說，私人經濟和資本主義部份工業的總出產，在同一時期，減少了五分之一(百分之十八點九)。

倘若不拿全部工業的生產來看，只拿大工業來看，並且把他分兩部份來看，那末，我們就見到社會主義部份和私人經濟部份間的關係有以下的情形。社會化部份在本國大工業生產中所佔的比重：一九二六至二七年是百分九十七點七；一九二七至二八年是百分之九十八點六；一九二八至二九年是百分之九十九點一，一九二九至一九三〇年是百分之九十九點三。私人經濟在本國大工業生產中的比重：一九二六至二七年是百分之二點三；一九二七至一九二八年，是百分之一點四；一九二八年至二九年是千分之九；一九二九至三〇年是千分之七。

你們可以見到，資本主義的分子在大工業中，已經走向末路去了。

很明顯的，‘誰勝誰，’的問題，工業中社會主義戰勝資本主義分子，還是他們戰勝社會主義的問題，基本上已經是向着社會主義式的工業勝利方面解決了。澈底地解決了，再不會變更了。(鼓掌聲)

(丙) 國民經濟最高委員會所計劃的國有工業，在報告所包括的時期中的發展速度的總計，更可注意。倘若把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所計劃的社會主義工業，在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時候的總生產，算是一百，那末，一九二七至一九二八年，這種工業的總出產，就增到了百分之一百二十七點四；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年，增到了百分之一百五十八點六；而到了一九二九至三〇年，將他增加到百分之二百零九點八。

這就是說，國民經濟最高委員會計劃下的社會主義工業，包含一切主要工業部門和全部重工業，在這三年之中，已經達到了戰前的兩倍以上。

不得不承認，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底大工業的發展，有過這樣快的速度。這種情形就使我們有根據說到五年計劃四年完成。

(丁) 有些同志對於‘五年計劃四年完成，’的口號，抱著懷疑的態度。不

久以前，有一部份同志，把第五次蘇維埃代表大會所通過的五年計劃，當作幻想看待。我且不講資產階級的著作家，他們一聽見“五年計劃”，四個字，就驚訝得目瞪口呆。倘若我們從實行五年計劃第一二兩年的情形來說，事實是怎樣呢？審查執行最高度的五年計劃的情形的結果，告訴我們什麼呢？這不但證明我們能夠把五年計劃四年來完成；而且還證明，在許多工業部門中，我們能夠三年完成，甚至二年半完成。在機會主義營壘裏的懷疑論者看來，這好像是不會的。但這是事實，要爭論這點，就簡直是愚蠢，可笑。

你們自己來評判吧。

照五年計劃，煤油業在一九三二年至三三年，應該出產九萬萬七千七百萬盧布的生產品。而實際上，一九二九至三〇年，已經能出產八萬萬零九百萬盧布的生產品了，即等於五年計劃內預定在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三年出產的百分之八十三。所以，我們大概在兩年半以內，就能完成煤油工業的五年計劃。

按照五年計劃，泥炭工業到一九三二至三三年，應該出產一萬萬二千二百萬盧布的生產品。實際上，在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〇年，它已經能出產一萬萬一千五百萬以上盧布的出產品了，即等於五年計劃所預定在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三年所出產的百分之九十六。所以，我們在兩年半內（倘若不早些的話），完成泥炭工業的五年計劃。

照五年計劃，一九三二年至三三年全部機器製造工業要出產二十萬萬五千八百萬盧布的生產品。但實際上，在一九二九至三〇年裏它已經能出產十四萬萬五千八百萬盧布的生產品了，即等於五年計劃預定在一九三二至三三年出產的百分之七十。所以，我們在二年半或三年內就完成全部機器製造業的五年計劃。

照五年計劃，農業機器製造業，在一九三二至三三年裏應該出產六萬萬一千萬盧布的產品。但實際上，在一九二九至三〇年裏，已經能出產四萬萬盧布的產品了，即五年計劃所預定在一九三二年至三三年應該出產的百分之六十以上。所以，我們在三年內（倘若不早些的話）就能完成農業機器製造業的五年

計劃。

照五年計劃，電機工業，到一九三二至三三年時，應該出產八萬萬九千六百萬盧布的產品。實際上，在一九二九至三〇年裏，就已經出產五萬萬零三百萬盧布的產品了，即五年計劃預定在一九三二至三三年出產的百分之五十六以上。所以，我們在三年以內，就完成電氣工業的五年計劃。

我們社會主義工業發展的空前速度，就是這樣。

我們加速的前進，在技術經濟方面趕上資本主義的先進國家。

（戊）這當然並不是說，在生產的規模上說來，我們已經趕上了他們，或我們的工業，已經趕上了資本主義先進國家工業發展的程度了。不，還差得遠哩。不應該把工業發展的速度和工業發展的程度，混為一談。許多人把他們混淆起來，以為倘若我們達到了工業發展的空前速度，因此，我們就已經達到了資本主義先進國家工業發達的程度了。但是，這是根本不對的。

譬如，舉電力生產做例子，那裏的速度是很快。我們電力的生產，從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九年，差不多增加了百分之六百；而美國在同時期內，電力的生產，只增加到百分之一百八十一；坎拿大只增加到百分之二百一十八；德國只增加到百分之二百四十一；意大利只增加到百分之二百二十二。你們看，這裏我們的速度，是向來沒有過的，它超過了一切其他國家的速度。但是，倘若考察一下這些國家中電力生產發展的程度，例如一九二九年的程度，把他和蘇聯的發展程度比較一下，那末，蘇聯的情形，是很不可以安心的。蘇聯電力生產的發展，雖然有空前的速度，可是在一九二九年，只有六十四萬萬六千五百萬啓羅瓦特小時；而美國却有一千二百六十萬萬啓羅瓦特小時；坎拿大有一百七十六萬萬二千八百萬啓羅瓦特小時；德國有三百三十萬萬啓羅瓦特小時；意大利有一百零八萬萬五千萬啓羅瓦特小時。

你們看，差別是很大的。

結果就是，照發展的程度來說，我們還落在這些國家後面。

或者舉生鐵的生產做例子。倘若把一九二六至二七年的生鐵出產，當做一

百（二百九十萬噸），那末，三年來，即從一九二七至二八年度到一九二九至三〇年度，生鐵的生產，差不多增加到兩倍，增加到百分之一百九十（五百五十萬噸）。你們看，發展的速度是很高的。但是，倘若從我們生鐵生產的程度來看，把蘇聯生鐵生產和資本主義先進國家生產的規模比較一下，那末，情形就不十分可以安心了。開始先說到、我們到今年（一九二九至三〇年度）才趕上和超過戰前生鐵生產的程度。就這一點，就使我們得出一個確定的結論，就是說，倘若不加速五金發展的速度，我們就會使全部工業生產的命運發生危險。至於說到我們的和西方的生鐵生產的程度，那末，我們見到下列的情形：一九二九年美國生鐵的出產，等於四千二百三十萬噸；德國等於一千三百四十萬噸；法國等於一千零四十五萬噸；而蘇聯生鐵的出產，在一九二九至三〇年裏，總共只有五百五十萬噸。

你們看，差別是不少哩。

因此，結果就是，在生鐵出產發展的程度方面，我們是落在這些國家後面的。

這些情形是什麼意思呢？

這就是說：

- （1）不應該把工業發展的速度和工業發展的程度，混在一起；
- （2）在我們工業發展的程度方面，我們是比資本主義先進國家落後得多；
- （3）只有繼續加緊我們工業發展的速度，我們才能在技術經濟方面，趕上和超過資本主義國家；
- （4）噪嚷着要減低我們工業發展的速度底人們，那就是社會主義的敵人，是我們階級敵人的奸細。（鼓掌聲）

四 鄉 村 經 濟 和 穀 類 問 題

上面我講到全部鄉村經濟的情形，連林業，漁業等等都在內，並沒有把鄉

村經濟，按部門的來劃分。倘若我們從全部鄉村經濟中，劃分出基本的部門，例如穀類經濟、畜牧、原料植物，那末，照蘇聯人民農業委員部和國家計劃局的總計，就得到以下的情形。

(甲) 倘若把一九一三年五穀田的面積當做一百，那末，每年穀田變動的情形如下：一九二六至二七年等於百分之九十六點九；一九二七至二八年等於百分之九十四點七；一九二八至二九年等於百分之九十八點二；到今年（一九二九至三〇年），根據所有的材料，將要等於戰前的百分之一百零五點一。

你們看到，一九二七至二八年的五穀田是減少了。這種減少，並不是像右傾機會主義黨報中的庸人關於這點的胡喊那樣，說是因為五穀經濟退化；這乃是因為七百七十萬海克脫秋麥田（蘇聯秋麥田的百分之二十）被凍死的原故。

倘若再把一九一三年五穀的總出產當做一百，那末，所得到的情形如下：一九二七年等於百分之九十一點九；一九二八年等於百分之九十點八；一九二九年等於百分之九十四點四；一九三〇年，根據一切的總計，將要等於戰前百分之一百一十。

這裏也應該注意一九二八年五穀總出產的減少，這是因為烏克蘭和北高加索底秋麥凍死的原故。

至於說到五穀總出產中的商品部份（鄉村外的流通），那末，我們見到更有意思的情形。假定把一九一三年五穀總出產的商品部份當做一百，那末結果就是：一九二七年的商品生產，等於百分之三十七；一九二八年等於百分之三十六點八；一九二九年等於百分之五十八；而一九三〇年，根據一切的統計，將要等於戰前百分之七十三以上。

因此，結果就是耕田面積和五穀總生產方面，只到一九三〇年才達到戰前的程度，並稍稍的超過了一些。

再就是，在五穀的商品生產方面，我們離戰前程度還遠得很，今年還要差百分之二十五。

我們糧食缺乏的根源就在這裏，這在一九二八年尤其緊張。

五穀問題的基礎，也就在這裏。

(乙) 牧畜方面的情形，差不多也是這樣，不過尤其使人驚訝。

倘若把一九一六年各種牲口的頭數，當做是一百，那末，每年的情形就如下：一九二七年的馬匹，等於一九一六年的百分之八十八點九，牛等於百分之一百十四點三，綿羊山羊等於百分之一百十九點三，豬等於百分之一百一十一點三。一九二八年，馬等於百分之九十四點六，牛等於百分之一百十八點五，綿羊山羊等於百分之一百二十六，豬等於百分之一百二十六點一；一九二九年，馬等於百分之九十六點九，牛等於百分之一百十五點六，綿羊山羊等於百分之一百二十七點八，豬等於百分之一百零三；一九三〇年，馬等於百分之八十八點六，牛等於百分之八十九點一，綿羊山羊等於百分之八十七點一，豬等於百分之六十點一。

你們看，倘若注意到最後的一年，那末，很明顯地我們見到牧畜業有了開始縮小的表徵。

從牧畜業的商品生產上說來，尤其在肉和油類方面，情形更使我們不安。倘若把每年肉和油的總出產，當作一百，那末，每年肉和油的商品生產，在一九二六年就等於百分之三十三點四，一九二七年等於百分之三十二點九，一九二八年等於百分之三十點四，一九二九年等於百分之二十九點二。

因此，我們見到牧畜業中小經濟和少商品性的經濟，帶着明顯的不堅定和經濟上不可靠的表徵。

結果，沒有超過一九一六年的牧畜業的程度，而最後一年倒有了很明顯的不斷減少的表徵。

因此，在我們已經大體上順利地解決了五穀問題之後，又擺着肉類問題，這個問題的緊張程度，現在已經表現出來了，這個問題正需要解決。

(丙) 我們工業的原料植物的種植，就另是一種情形了。假定把一九一三年原料植物的耕種面積當做一百，那末，我們就見到，在棉花方面，一九二七

年等於戰前百分之一百零七點一，一九二八年等於百分之一百三十一點四，一九二九年等於百分之一百五十一點四，一九三〇年等於百分之二百十七；麻的種植，一九二七年等於戰前百分之八十六點六，一九二八年等於百分之九十五點七，一九二九年等於百分之一百十二點九，一九三〇年等於百分之一百二十五；糖蘿蔔，一九二七年等於戰前百分之一百零六點六，一九二八年等於百分之一百二十四點二，一九二九年等於百分之一百二十五點八，一九三〇年等於百分之一百六十九；油類，一九二七年等於戰前百分之一百七十九點四，一九二八年等於百分之二百三十點九，一九二九年等於百分之二百十九點七，一九三〇年等於百分之二百六十以上。

原料植物的總出產，同樣也有這樣好的情形。假定把一九一三年的總生產當作一百，那末我們就有：棉花，在一九二八年等於百分之一百一十點五，一九二九年等於百分之一百十九，一九三〇年，根據一切的統計，將等於戰前百分之一百八十二點八；麻，一九二八年等於百分之七十一點六，一九二九年等於百分之八十一點五，一九三〇年，根據一切的統計，將等於戰前百分之一百零一點三；糖蘿蔔，一九二八年等於百分之九十三，一九二九年等於百分之五十八，一九三〇年，根據所有的統計，將等於戰前百分之一百三十九點四；油類：一九二八年等於百分之一百六十一點九，一九二九年等於百分之一百四十九點八，一九三〇年，根據所有的統計，將等於戰前百分之二百二十。

因此，在原料植物方面，我們見到比較好一些的情形，這裏我們把一九二九年糖蘿蔔除外不算，因為那次收成被害蟲所損害了。

可是，就在原料植物方面，將來還有可能並必會發生嚴重的動搖和不穩定的表現，像已講過的麻和油類植物的數目字所表示的那樣，因為那裏小經濟佔優勢，而集體農場和蘇維埃農場的影響很小。

因此，在鄉村經濟上在我們面前擺着下列的問題：

(1) 鞏固原料植物的地位底問題，其方法就是保證在那些區域有足量的賤價的糧食生產品。

(2) 提高牧畜業和解決肉類問題，其方法就是保證那些區內有充分的五穀產品和草料。

(3) 徹底解決五穀問題，這是現在鄉村經濟的主要問題。

這樣看來，五穀問題是鄉村經濟中的基本問題，是解決一切其他問題的鑰匙。

因此，解決五穀問題，是鄉村經濟的各種問題中的第一種任務。

但是解決五穀問題和引導鄉村經濟走上長足發展的道上，——這就是根據消滅農村經濟的落後，供給他們拖拉機和農業機器，供給他們科學工作人材，提高勞動生產率，增加商品出產量。沒有這些條件，就用不着夢想解決五穀問題。

以個人的小農經濟為基礎，是否能夠實現這些條件呢？不，不能夠的。這是不能夠的，因為小農經濟不能使用 and 佔有新技術，不能夠充分的提高勞動生產率，不能夠充分的增加鄉村經濟的商品生產量，留下來的只有一條路，這就是擴大農村經濟的路，設立那種具備有現代技術的大經濟的路。但是蘇維埃國家，不能夠走那種組織資本主義大經濟的道路。他可以而且只應該着手組織社會主義式的大經濟，應用現代的新技術。蘇維埃農場和集體農場，就是這類的經濟。

因此，就發生一種任務，設立蘇維埃農場，聯合小農經濟成為大的集體農場，這是解決一般鄉村經濟問題，尤其是五穀問題唯一的方法。

自從第十五次大會以後，尤其是在一九二八年初，發現了糧食的嚴重困難之後，黨就在日常實際工作中，跑上了這條道路。

應該指出，我們黨在第十五次大會的時候，就會把這種根本的任務提在面前，當作實際上的任務，那時候我們還沒有遇到糧食的嚴重困難。在第十五次大會底著名的，“關於鄉村中工作問題，的決議裏，很明白地說：

“在現在這個時期中，應該把聯合和改造個人小農經濟為大的集體經濟，作為黨在鄉村的基本任務。

把第十五次大會上中央委員會報告中論到這個問題的地方引證一下，也許算不得是多餘的事。那裏鄭重的肯定的提出用集體化的方法消滅鄉村經濟落後的問題來。請聽那裏所說的話：

“出路在那裏，出路是把散漫的小經濟，轉變為共同耕田的大的聯合經濟，轉變為用新式高級技術來集體耕田的經濟。出路就是要使小的和最小的經濟漸漸的、不屈不撓的、不是用壓制的方法，而是用證明和說服的方法聯合成為公共的、聯合的、集體耕種的大經濟，使用農業機器和拖拉機，應用科學方法提高農業的強度。旁的出路是沒有的。”

五 農民之轉向社會主義和蘇維埃農場集體農場發展的速度

農民的轉向集體化，不是一下子開始的。這種轉變是不會一下子開始的。在第十五次大會時，黨的確已經喊出集體化的口號。但是要農民羣衆大批的轉向社會主義，僅僅喊出口號是不夠的。要達到這種轉變，至少還要一個條件，就是要農民羣衆自己相信所提出的口號是對的，接受他，當他是自己的口號。所以這種轉變是漸漸準備起來的。這種轉變的養成，是要靠我們發展的全部過程，首先就是供給農業機器和拖拉機的工業全部發展的過程。這種轉變的準備成功，是靠著堅決反對富農的政策和一九二八年及一九二九年新式收買糧食工作的過程，因為這種形式是使富農經濟受貧農中農羣衆的監督。這種轉變的成熟，是靠鄉村經濟合作社的發展，這類合作社教育個人農民學會了集體的進行事業。這種轉變的成熟，是靠集體農場的發展，農民在那裏看出了集體式農場比個人經濟優越的地方。最後，這種轉變的成熟，是靠散處全蘇聯的，具備新技術的蘇維埃農場的發展，在那裏農民有可能認識了新技術的力量和優點。倘若認為我們蘇維埃農場只是糧食的來源，那就錯了。實際上蘇維埃農場和他的新技藝，他的空前的經濟規模，對附近農民的幫助，都是一種引導的力量，能促進農民羣衆的轉變，推動農民走上集體化的道路。

就是在這種基礎上發生了幾百萬貧農中農的集體農場運動。這種運動是從

一九二九年下半年開始的，他在我們國家的生活中，打開了偉大轉變的時期。

中央委員會用過什麼方法，去全力的應付和領導這種運動呢？

中央委員會的方法，是由三方面進行的：組織和接濟蘇維埃農場，組織和接濟集體農場，組織製造拖拉機和農業機器，經過拖拉機站，經過拖拉機隊等等，把機器供給鄉村。

(甲)一九二八年四月，中央政治局已經通過關於在三四年中組織新的蘇維埃農場的決議，要使這些蘇維埃農場，能夠在三四年後，出產一萬萬蒲特以上的商品糧食。後來這條決議，經過中央全體會議批准。曾經創設了“五穀托辣斯”，委任這個托拉斯執行這條決議。同時，通過決議，鞏固蘇維埃農場，擴大他們的耕地。曾經組織了蘇維埃農場總局，委託他實行這條決議。

這裏不得不指出，這些決議是遇到過我們黨內的機會主義分子方面的反抗。然後才通過的。曾經有一種論調，說投到蘇維埃農場的款子，是“丟掉了的，款子。還有一種“科學，家方面的說法，這種說法會得到黨內機會主義分子的擁護：說組織蘇維埃大農場是不可能和無意義。但是，中央進行了自己的路線，不顧一切的進行到底。

一九二七至二八年付出接濟蘇維埃農場的款子，除流轉的短期借貸外，總共有六千五百七十萬盧布。一九二八至二九年，付出了一萬萬八千五百八十萬盧布。最後，在今年，付出了八萬萬五千六百二十萬盧布。在報告所包括的時期中，供給蘇維埃農場使用的拖拉機有一萬八千架，共等於三十五萬馬力。

這些辦法的結果是怎樣呢？

五穀托辣斯耕地的面積，在一九二八至二九年有一十五萬海克脫，一九二九至三〇年有一百零六萬海克脫，一九三〇至三一年有四百五十萬海克脫，一九三一至三二年將有九百萬海克脫，一九三二至三三年，即五年計劃底，將有一千四百萬海克脫。蘇維埃農場總局的耕地面積，在一九二八至二九年等於四十三萬海克脫，一九二九至三〇年有八十六萬海克脫，一九三〇至三一年是一百八十萬海克脫，一九三一至三二年是二百萬海克脫，一九三二至三三年將有

二百五十萬海克脫。烏克蘭蘇維埃農場大聯合的耕地面積，在一九二八至二九年有十七萬海克脫，一九二九至三〇年有二十八萬海克脫，一九三〇年至三一年有五十萬海克脫，一九三二至三三年將有七十二萬海克脫。糧業聯合的耕地面積（穀類的），在一九二八年至二九年有七十八萬海克脫，一九二九至三〇年有八十二萬海克脫，一九三〇至三一年將有八十六萬海克脫，一九三一至三二年將有九十八萬海克脫，一九三二至三三年將有九十九萬海克脫。

第一，這就是說，只一家五谷托拉斯，到五年計劃底，就將要等於現在整個阿根廷所有的五谷田的面積。（鼓掌聲）

第二，這就是說，把所有的蘇維埃農場合在一起，到五年計劃底，將要比現在整個坎拿大所有的五谷田，多一百萬海克脫。（鼓掌聲）

至於說到蘇維埃農場的五谷總出產和商品的生產，那末我們見到每年的變動如下：一九二七年至二八年，蘇維埃農場的總生產有九百五十萬担，其中商品生產佔六百四十萬担；一九二八至二九年有一千二百八十萬担，其中商品是七百八十萬担；一九二九至三〇年照所有的統計，將有二千八百二十萬担，其中商品為一千八百萬担（等於一萬萬零八百萬蒲特）；一九三〇至三一年將有七千一百七十萬担，其中商品將佔六千一百萬担（三萬萬七千萬蒲特）。

這就是我們黨在蘇維埃農場政策上現有的和希望的成績。

照一九二八年四月中央政治局關於組織新蘇維埃農場的決議，我們在一九三一至三二年，應該從新蘇維埃農場得到一萬萬蒲特的商品糧食。但實際上，一九三一至三二年中，只從一種新的蘇維埃農場那裏，就已經可以取到二萬萬蒲特以上的糧食了。結果是超過計劃兩倍。

這樣一來，譏笑中央政治局底決議的人們，是自己狠狠地嘲笑自己了。

照蘇維埃代表大會所批准的五年計劃，我們到五年計劃底，所有蘇維埃農場，總共應該有五百萬海克脫的耕田。可是實際上，今年蘇維埃農場的耕田，就已經有三百八十萬海克脫，明年，即五年計劃第三年，將要有八百萬海克脫的耕田。

這就是說，我們將在三年內完成並超過蘇維埃農場建設的五年計劃。

照五年計劃，我們到五年計劃底，蘇維埃農場的五谷總生產應該有五千四百三十萬担。可是實際上，今年蘇維埃農場的五谷總生產，就有二千八百二十萬担，而明年將有七千一百七十萬担。

這就是說，在五穀總生產方面，我們在三年內完成計劃，而且超過計劃。

五年計劃三年完成。

現在讓資產階級的江湖客和他的機會主義的附和者去胡謔吧，說什麼不讓在三年內完成和超過蘇維埃農場建設的五年計劃吧。

(乙)至於我們的**集體農場**建設的情形，還要好些。

一九二八年七月，中央已經關於集體農場建設通過了以下的決議：

“堅持的實行第十五次大會所提出的任務：‘聯合和改造個人小農經濟為大的集體經濟。’；這種集體經濟，是**自願的聯合**，是根據新技術而建設的聯合，他們在社會主義改造鄉村經濟方面和保證猛烈的提高生產率和商品量方面，都是代表高級的五穀經濟。’，（見一九二八年中央七月全會的決議：‘論一般經濟狀況下的收買糧食的政策。’）

後來，這條決議，得到第十六次黨代表會議決議中的批准後，又得到一九二九年中央十一月全會關於集體農場運動的決議中的批准。一九二九年下半年，正是農民根本轉向集體農場的時候，正是中農大批加入集體農場的時候，中央政治局就在那時候通過了一九三〇年一月五日公佈的一個專門的決議。即論“**集體化的速度和國家幫助集體農場建設的方法**”的決議。

中央在這個決議中：

(1)認為農民現在確是大批的轉向集體農場了，可以在一九三〇年春季超過集體農場建設的五年計劃；

(2)認為確是存在着一切必須的物質條件和其他的條件，可以用**集體農場的生產去替代富農的生產**，因此必須從限制富農的政策，變為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

(3) 指出一種前途，就是在一九三〇年春天，用社會化的方法來耕種的土地，就要大大的超過三千萬海克脫；

(4) 把蘇維埃分爲三種區域，規定出每區在基本上完成集體化的一種大概的時期；

(5) 重新審查了土地營造的方法，使他有利於集體農場，重新審查了接濟鄉村經濟的形式，規定了一九三〇至三一年借給集體農場的信用借貸，至少須有五萬萬盧布；

(6) 規定了組合式的集體農場運動，是現在集體農場系統中的基本形式；

(7) 責備了黨內機會主義分子，因爲他們企圖藉口機器和拖拉機的缺乏，去妨礙集體農場運動；

(8) 最後，曾預先警告黨的工作人員，預防集體農場運動中可能的過火行動，自上命令集體農場建設的危險，把集體化作爲兇戰而不努力真正的大批集體化所引起的危險。

這裏應該指出，中央這次決議，遇到黨內機會主義分子方面比不親善還要壞些的舉動。曾發生過“大談小論”，說中天彼幻想所迷住了，中央把人民的金錢“浪費”，到“不存在的，集體農場中去。右派份子洗了自己的手，預言“不免，場台。但是中央堅決的進行了自己的路線，不願右派分子愚蠢的嗤笑，不願“左傾，分子的過火和昏頭昏腦，不願一切的進行到底。

一九二七至二八年裏，支出了七千六百萬盧布去接濟集體農場；一九二八至二九年裏，交出了一萬萬七千萬盧布；最後，在今年，支出了四萬萬七千三百萬盧布。此外，又支出了六千五百萬盧布，作爲集體化的基金。規定給集體農場的優待條件，這樣就使集體農場在財政上的積蓄，增加了二萬萬盧布。把破壞了的富農經濟上的財產，大約價值四萬萬盧布以上，都交給了集體農場。三萬多架拖拉機，計有四千萬以上的馬力，交給集體農場的田地使用；還有拖拉機總局供給集體農場使用的七千架拖拉機，蘇維埃農場用來幫助集體農場的拖拉機，都沒有算在裏面。今年會借給和幫助集體農場一千萬担（六千一百萬

蒲特)谷種。最後，又直接的在組織上幫助集體農場，成立機器馬匹站，這種機器馬匹站的數目，現在已有七千處以上，所使用的馬在一百三十萬匹以上。

這些辦法的結果是怎樣呢？

一九二七年集體農場春耕的地面等於八十萬海克脫；一九二八年為一百四十萬海克脫；一九二九年為四百三十萬海克脫；一九三〇年春秋兩季的耕種面積都算在內，不得少過三千六百萬海克脫。

第一，這就是說，在三年以內，集體農場的耕地面積，增加到了四十倍以上。(鼓掌聲)

第二，這就是說，我們集體農場所有的耕地面積，等於法意兩國合在一起那麼多了。(鼓掌)

至於說到他們五谷的總生產和商品量，那末，我們見到下列的情形。一九二七年集體農場出產四百九十萬担，其中二百萬担是商品的；一九二八年出產八百四十萬担，其中三百六十萬担是商品的；一九二九年出產二千九百一十萬担，其中商品是一千二百七十萬担；一九三〇年，根據所有的統計，將出產二萬萬五千六百萬担(十五萬萬五千萬蒲特)，其中商品將有八千二百萬担(五萬萬蒲特以上)。

應該承認，一般地說來，算是發展得十分快的工業，其中沒有一個部門發展的速度，有過集體農場建設那樣快。

這些數目字表明什麼呢？

這首先表明，集體農場中五谷的總生產，在三年內增加到五十倍以上，而商品量增加了四十倍以上。

第二，這是表明，我們今年能夠向集體農場取得全國五谷商品生產的一半以上。

第三，這是表明，從今以後，決定鄉村經濟和他的基本問題的命運的，不是個人農民的經濟，而是集體農場和蘇維埃農場。

第四，這是表明，消滅富農階級的口號，是開足馬力的前進。

最後，這是表明，國內已經發生了經濟的變動，使我們有完全的根據可以肯定的說，我們已經把鄉村推上了新的道路，即推上了集體化的道路，因此，不僅是在城市裏，而且在鄉村裏，也保證了順利的建設社會主義。

中央政治局在一九三〇年一月五日的決議裏，規定到一九三〇年春季為止，根據社會化的方法耕種的集體農場的耕地計劃，要有三千萬海克脫。但結果超過了中央的這個計劃。

總果，嘲笑中央決議的人們，自己很狠的嘲笑了自己。集體農場運動中小資產階級的盲目性和過火，都救不了機會主義的胡喊。

照五年計劃，我們到五年計劃底，集體農場的耕地面積，應該等於二千零六十萬海克脫。但是在實際上，集體農場今年的耕地面積已經有三千六百萬了。

這就是說，我們在兩年之內，已經超過了集體農場建設的五年計劃的一倍以上。（鼓掌聲）

照五年計劃，我們到五年計劃底，集體農場五谷的總生產，應該有一萬萬九千零五十萬擔。但是實際上，今年集體農場五谷的總生產，已經有二萬萬五千六百萬担了。

這就是說，我們在兩年之內，已經超過了集體農場五谷生產的五年計劃百分之三十以上。

五年計劃兩年完成。（鼓掌聲）

現在讓機會主義分子去胡噴，說兩年以內不能夠完成和超過集體農場建設的五年計劃吧！

六 改良工農的物質條件和文化條件

由此可見，工業和農業方面社會化部份積極的增加，是一件無可懷疑的事實。

從勞動者的物質條件說來，這可以說是什麼呢？

這就是說，從此就放下了根本改良工農物質條件的基礎。

爲什麼？怎樣的？

第一，社會化部份的增長，首先就是表明城市和鄉村中剝削分子的減少和他們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底低落。這又是說，工農在全國國民收入中所佔的份數，必然因了剝削階級份數的減少而增加起來。

第二，因爲在社會化部份增長的時候，一向供養剝削階級和他的僕人們的那部份國民收入，從此以後就必將留在生產內，用來擴大生產，建設新工廠，改良勞動者的生活。這又是說，工人階級的數目和力量，又要增加，失業必將減少和消滅。

最後，因爲社會化部份的增長能促進改良工人階級的條件，所以這就使國內市場購買力積極的提高，使工農對於工業品的要求增加。這又是說，國內市場的擴大，將要超過工業的發展，推動他前進，督促他不斷的擴大。

所有這類的情形，都能使工農的物質條件和文化條件不斷的改良。

(甲) 開始先講工人階級人數的增加和失業工人的減少。

倘若僱傭勞動者的數量(除失業者外)，在一九二六至二七年等於一千零九十九萬人，那末，一九二七至二八年就有一千一百四十五萬人，一九二八至二九年有一千一百九十九萬七千人，一九二九至三〇年，根據所有的統計，將要有一千三百十二萬九千人。其中體力勞動者(連鄉村經濟工人和季候工人在內)，在一九二六至二七年是七百零六萬九千人，一九二七至二八年是七百四十萬四千人，一九二八至二九年裏是七百七十五萬八千人，一九二九至三〇年是八百五十三萬三千人。其中大工業中的工人(除職員外)，在一九二六年至二七年爲二百四十三萬二千人，一九二七年至二八年爲二百六十三萬二千人，一九二八年至二九年爲二百八十五萬八千人，一九二九年至三〇年爲三百零二萬九千人。

這就是說，我們所見到的情形，是工人階級不斷的增加，再，假使僱傭勞動人數的百分數，在三年內增加了百分之十九點五，而體力勞動的人數，是增

加了百分之二十七點七，那末產業工人增加的百分數，是百分之二十四點二。

現在講失業問題。我們應該說，在這方面，人民勞動委員部和蘇聯職工中央蘇維埃都有很多莫明其妙的地方。一方面，根據這些機關的統計，我們大約有一百萬的失業者，其中有最低限度的熟練程度的佔百分之十四點三，還有大約百分之七十三是所謂智識勞動者和不熟練勞動者，而且其中大多數是婦女和未成年的人，他們與工業生產都是沒有關係的。另一方面，根據同樣的統計，我們看到熟練勞動力可怕的缺乏，勞動介紹所不能滿足我們企業所需要的勞動力底百分之八十，因此我們不得不很快的，真正是飛快的訓練完全沒有技能的人們，從他們中間養成熟練的工人，這樣去滿足我們企業中最低限度的要求。試一試解釋這種莫明其妙的情形。無論如何，有一點是很明顯的，這些失業者，並不是後備軍，更不是我們產業中的經常失業軍，這是什麼呢？甚至按照人民勞動委員部的統計，近來失業工人的數目，比去年也要減少了七十二萬人以上。這就是說，到今年五月一日止，失業工人數目減少了百分之四十二。

我們國民經濟中社會主義部門的發展，還有一個成績。

(乙) 倘若站在按階級分配國民收入的觀點上來考察情形，結果還要動人。站在工農物質條件和文化條件的觀點上來說，按階級分配國民收入的問題，是一切根本的問題。德、英、美等國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爲着資產級的利益，盡量想模糊這個問題，爲着這個，他們才公佈關於這個問題的什麼“完全客觀的”，研究。

照全德統計局的統計，工資在德國國民收入內所佔的份數，在一九二九年等於百分之七十，而資產階級的收入佔百分之三十。照“聯合商務委員會，和“全國經濟調查部，的統計，工人在美國國民收入內所佔的部份，在一九二三年等於百分之五十四，而資本家的份數佔百分之四十五以上。最後，照經濟學家波立和斯頓勃的統計，英國工人階級在國民收入中所佔的份數，在一九二四年，差不多要等於百分之五十，而資本家的份數，佔百分之五十（多一些）。

很明顯的，這些調查的結果，是不足信的。他們不足信，是因爲除純粹經

濟上的差錯外，在這些調查中，還有另一種錯誤，他們的目的是局部的隱瞞資本家的收入，少說一些；同時，又局部的誇大工人階級的收入，把薪水很大的官僚，都算做工人，此外，在這些調查中，往往不計算農戶的收入，不計算一般的鄉村資本家的收入。這一點我已經不去講他了。

法爾格同志用批評的態度，分析了這些統計。他得到下列的結果。工人和城市中不剝削他人勞動的其他勞動者底收入，在德國是佔國民收入的百分之五十五，美國是佔百分之五十四，英國是佔百分之四十五；資本家的份數，德國是佔百分之四十五，美國是佔百分之四十六，英國是佔百分之五十五。

最大資本主義國家中的情形，就是這樣。

蘇聯內的情形是怎樣呢？

你們看國家計劃局的統計。請看：

(1) 工人和不剝削人家勞動的勞動者底收入份數，在一九二七至二八年，佔全部國民收入的百分之七十五點二（其中城鄉工人佔百分之三十三點三），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年為百分之七十六點五（其中城鄉工人佔百分之三十三點二），一九二九至三〇年為百分之七十七點一（其中城鄉工人佔百分之三十三點五）。

(2) 富農和城市資本家在一九二七年至二八年，佔百分之八點一；一九二八至二九年佔百分之六點五；一九二九至三〇年佔百分之一點八。

(3) 手藝人（大部份是勞動分子）的份數，在一九二七至二八年，佔百分之六點五；一九二八至二九年佔百分之五點四，一九二九至三〇年佔百分之四點四。

(4) 國家部份的份數（也是工人階級和一般勞動羣衆的收入），在一九二七至二八年，佔百分之八點四；一九二八至二九年佔百分之十；一九二九至三〇年佔百分之十五點二

(5) 最後，所謂其他各項（指一切的卹金）的份數，在一九二七至二八年，佔百分之一點八；一九二八至二九年，佔百分之一點六；一九二九年至

三〇年，佔百分之一點五。

因此，在資本主義先進國家中，剝削階級在國民收入中所佔的份數，大約要佔百分之五十，而在我們國家中，剝削階級的份數，佔不到國民收入的百分之二。

這也就可以說明一件驚人的事實：照美國資產階級作者鄧尼的話，一九二二年美國“百分之一的私有者，在自己的掌握中，集中了全國財富的百分之五十九，；照鄧尼的話，英國在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一年，“不到百分之二的私有者，佔全國財富的百分之六十四，，（見鄧尼著的：“美國戰勝英國，）。

在蘇聯，在蘇維埃的國家裏，能不能夠發生同樣的事實呢？當然是不能够的。蘇聯已經好久沒有這樣的“私有者，了，並且是不會有這樣的私有者。

但是，倘若在一九二九至三〇年，蘇聯總共大約只有百分之二的國民收入落到剝削階級方面去，那末餘下來的國民收入，到那裏去了呢？

很明顯的，這是留在工農掌握中的。

這就是蘇維埃政權在幾千萬工人階級羣衆和農民中間所有的力量和威權的根源。

這就是蘇聯工農物質幸福繼續改良的根源。

（丙） 既有了這些重要的事實，就非常容易了解工人的實際工資不斷的增加，工人社會保險預算案的增加，對貧農中農經濟幫助的加緊，建築工人住所的款子的增加，改良工人生活的用款的增加，保護產母和嬰兒的費用的增加，同時，也更容易了解蘇聯人口很快的增加，死亡率減少，尤其是嬰兒死亡率的減少等等的事實了。

大家都知道，譬如工人的實際工資，連社會保險費和利潤上扣下來作為改良工人生活的基金在內，已經增加到戰前百分之一百六十七了。最近三年來，

★實際工資，就是根據工資所能夠買得到的生活品的數目來計算。假定實際工資增加，那末，工人的生活就好了。（譯者）

僅僅工人社會保險金的預算，在一九二七至二八年是九萬萬八千盧布，到一九二九年至三〇年裏便增加到十四萬萬盧布。最近三年來（一九二七至二八年度到一九二九至三〇年度），為保護產母和嬰兒，化了四萬萬九千四百萬盧布。在同一時期內，化在兒童入學年齡前的教育上的（幼稚院，兒童遊戲場等等），計有二萬萬零四百萬盧布。化在建築工人住所上的，計有十八萬萬八千萬盧布。

這當然不是說，凡是努力的增加實際工資所應做的事情，都已經做到了，再也不能把實際工資提得更高些了。但倘若真有沒做到的地方，那末，這就是我們一般供給機關中官僚主義的過錯，首先特別是消費合作社的官僚主義。照國家計劃局的統計，在一九二九年至三〇年裏，國內貿易的社會化部分，經理着百分之九十九的批發和百分之八十九以上的零售。這就是說，消費合作社有系統的排擠私人部份，在貿易方面，佔了壟斷的地位。這當然是很好的。但所不好的，是有的時候，這種壟斷是有害於消費者的。原來商業上雖然差不多是佔了壟斷的地位，可是消費合作社總願意把‘收入’，較多的，利潤較多的商品（時髦貨等等），去供給工人，不去把‘收入’，較少，而為工人所更需要的商品供給工人（農產品等等）。因此，佔工人所消費的百分之二十五的鄉村經濟產品，工人就不得不出高價向私人的市場去購買。這我還可以說到，消費合作社機關，總是多注意於收支的差額，因此，中心的領導機關雖然下了嚴厲的指令，可是零售價格的減低，還是很慢。結果，消費合作社的活動，在現在的時候，不像一個社會主義的部門，而像傳染了相當新舊本家習氣的特別部門。試問，倘若消費合作社不執行嚴格的改良工人實際工資的任務，誰要這種消費合作社呢。他對於工人有什麼好處呢？

倘若雖然有上述的情形，可是實際工資還是年年不斷的增加，那末，這就是說，我們的制度，國民收入的分配機關，工資方面的整個立憲，都能削弱和抵償合作社方面各式各樣的缺點。

假使除此以外，再加上許多其他的條件，譬如像公共飯廳作用的提高，工

人住所的減價，給工人和工人子女的大量津貼，文化設備的改良等等，那末，可以很勇敢的說，工人工資的增加，比我們有些機關的統計所指出的，要多得多。

所有這些事實，合在一起，加上八十三萬以上產業工人（百分之三十三點五）的七小時工作制，加上一百五十萬以上產業工人（百分之六十三點四）的轉為五天工作週，加上廣大的工人休養所，養病所，避暑處的制度（最近三年來曾派去了一百七十多萬工人），所有這些設備，為工人階級的工作和生活造成了很好的條件，使我們能夠養成下一代健康的、活潑的工人，能夠把蘇維埃國家的能力，提高到應有的高度。用自己的胸膛來擁護他，使他不受敵人的進攻。（鼓掌聲）

至於說到給個人農民和集體農民的幫助，連幫助貧農在內，那末，最近三年來（一九二七至二八年度到一九二九至三〇年度），他的數目是等於四十萬盧布，都是由信用借貸和國家預算中支出的。大家都知道，僅僅這三年來，就幫助了農民一萬萬五千四百萬盧布以上的收穫。

所以一點沒有什麼奇怪的，工農一般的生活並不壞，人口死亡率比戰前減少了百分之三十六，兒童死亡率比戰前減少百分之四十二點五，而每年人口的增加，有三百萬人以上。（鼓掌聲）

至於說到工農的文化條件，那末，這方面我們也得到了相當的成績，可是絕對不能使我們滿意，因為成績並不大。倘若拋開各種各樣的俱樂部、閱書室、圖書館、識字處等等在今年所吸引的一千零五十萬人不算外，那末文化教育情形，就是如下。初級學校今年有一千一百六十三萬學生；中學校有一百九十四萬五千人；工業技術學校、交通學校、農業學校、羣衆生產技能養成所共有三十三萬三千一百人；各種技術專門學校和同等的職工學校共有二十三萬八千七百人；大學校和技術大學共有十九萬零四百人。因為有這些設備，所以戰前識字者只佔百分之三十，而現在便增到了百分之六十二點六。

現在主要的事情，就是採用義務的初級教育。我說這是“主要的”，因為

這樣的轉變，是文化革命的緊要步驟。而轉變到這種制度，很早就該幹的，因為現在我們在蘇聯大多數的區裏，有了實行普及初級教育所必須的一切條件。一向我們必須‘到處節省，甚至於節省學校，以‘拯救和恢復重工業，（列甯）。可是近來，我們已經恢復了重工業，並且繼續前進。因此，已經到了時候，我們已經應該着手組織普及的初級義務教育了。

我想，如果大會關於這點能夠通過一定的極堅決的決議，這是很正確的。
（鼓掌聲）

七 發展中的困難，階級鬥爭和社會主義 在整個戰線上的進攻

我已經講過我們國民經濟中發展的成績了。我已經講過工業方面，農業方面，根據社會主義原則改造全部國民經濟方面的成績。我還講過改良工農物質條件方面的成績。

倘若有人以為，我們是‘很容易很平安，的得到這些成績的，是所謂自流的，毫無特別努力和意志緊張，毫無鬥爭和震動，就得了這些成績，那就錯了。這樣的成績不會自己跑來的。實際上，我們是堅決的向困難作鬥爭，是在嚴重的，長期的征服困難的鬥爭中，才得到了這些成績。

這裏誰都講到我們的困難。但是不是誰都顧計到了這些困難的性質。可是困難的問題，對於我們有很大的意義。

這裏就發生問題：我們困難的特點是什麼，這些困難後面藏着那些敵人的力量並怎樣的來克服他們呢？

（甲）在說明我們困難的時候，應該至少注意到下列情形。

第一，應該估計到，現在我們的困難，是改造時期的困難。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這些困難根本和我們經濟的恢復時代中的困難不同。倘若在恢復時期中，問題是在使舊工廠工作，和在舊基礎上幫助鄉村經濟，那末，現在的問題，是根本重造，改造工業農業，更換他們的技術基礎，供給他們現代的

技術。這就是說，我們面前擺着改造國民經濟全部技術基礎的任務。這種任務，又需要新的，大批的投資到國民經濟中去，需要新的更有經驗的人材，能够指揮技術，推動他前進。

第二，應該注意，改造國民經濟不限於改良他的技術基礎，恰好相反，同時還須要改造社會經濟底關係。我這裏所講的，主要的是講鄉村經濟。已經聯合起來了的社會化了的工業中，技術的改造大體上算已經有了現成的社會經濟基礎。改造的任務，就是加緊在工業中排擠資本主義分子的過程。鄉村經濟中的情形，却不是這樣簡單。改造鄉村經濟的技術基礎，當然也是爲着同樣的目的。但是我們鄉村經濟的特點，在於那裏還多半是小農經濟，小農經濟不能够佔有新技術，因此，改造農村經濟技術基礎，而不同時改造舊社會經濟制度，不聯合小經濟爲大集體經濟，不掘除鄉村經濟中資本主義的根源，那就是不可能的。很明顯的，這些情形不會不使我們的困難，更加複雜，不會不使我們戰勝這些困難的工作，更加複雜。

第三，應該注意到，我們社會主義改造國民經濟的工作，已破壞了資本主義的經濟聯系，顛覆了舊世界的一切力量，就必然引起這些力量拚命的反抗。大家都知道，實在就是這樣。上層資產階級智識分子在我們工業各部門中的陰險的危害行爲，富農像野豬般地反對鄉村中集體式的經濟，各機關中官僚分子（是階級敵人的奸細）對蘇維埃政權各種命令的怠工，——這就是現在我們國內的臨死階級底反抗的主要形式。很明顯的，這些環境不能使我們改造國民經濟的工作輕易地進行。

第四，應該注意到，我們國內底臨死階級的反抗，不是和外界隔絕的，他是受周圍資本主義世界所援助的。周圍資本主義世界，並不是簡單地理論上的觀念。周圍資本主義世界——這就是說，在蘇聯的周圍，有仇視的階級敵人，準備着在精神上，在物質上，用財政封鎖的方法，有的時候甚至於用武裝干涉的方法來援助我們蘇聯內部的階級敵人。現在已經證實，我們底專門家的危害行爲，富農的反蘇維埃行動，焚燒和炸毀我們的企業和設備，都是得到國外津

貼的，都是由外國所指定的。帝國主義的世界，不願意蘇聯站定脚跟，能够趕上和趕過資本主義先進的國家。這樣，他們就幫助蘇聯國內的舊勢力。很明顯的，這當然也是不會促進我國的改造工作的。

但倘若不注意另一件事情，那末，我們困難的特點，是不會完全明瞭的。問題是在說到我們困難的特性。問題是在說，我們底困難不是衰落中的困難，或者停滯中的困難，而是發展中的困難，高漲中的困難，前進中的困難。這就是說，我們的困難是根本和資本主義中的困難不同。當我們講到美國的困難時是講的衰落中的困難，因為美國現在遇到恐慌，即經濟的衰落。當我們講到英國的困難時，講的是停滯中的困難，因為英國現在已經有幾年的停滯，即停止前進。當我們講到我們的困難時，我們講的不是衰落，不是發展的停滯，而是我們力量的增長，我們力量的高漲，我們經濟的往前進展。到某時期能够前進幾多，能够多製造出百分之幾的產品，能够多耕種幾百萬海克脫土地，能够多幾星期造成工廠，製造廠，鐵路等等，——這就是我們講到困難的時候的問題。因此，我們的困難，和美國或英國的困難不同，是發展中的困難，是前進時的困難。

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我們這種困難，是本身包含着戰勝困難的可能性的困難。這就是說，我們困難的特點，就在於他們本身帶着戰勝困難的基礎。

由此可以得到些什麼結論呢？

第一，我們的困難不是細小的和偶然的“麻煩”，而是階級鬥爭的困難。

第二，在我們困難後面，隱蔽着我們的階級敵人，這些困難，又因為我們國內的臨死階級的拚命反抗，國外對這些階級的援助，我們自己機關中存在着官僚主義分子，我們黨內有些分子的不信任和懷疑而更複雜起來。

第三，為要克服困難，首先就必須打退資本主義分子的進攻，壓服他們的反抗，這樣去肅清道路，飛步的前進。

最後就是，我們發展上的困難的性質，給了我們壓服階級敵人所必須的一

一切可能。

但是爲要利用這些可能，把他們變成行動，來壓服階級敵人的反抗，克服困難，那祇有一種方法：組織由各面向資本主義分子進攻，隔絕自己隊伍中的機會主義分子，因爲他們妨害進攻，手忙腳亂的東奔西竄，將不相信勝利的思想引到黨裏來。（鼓掌聲）

沒有其他的方法。

祇有丟了腦袋的人們，才會從布哈林同志的資本主義分子能和平底生長入社會主義的幼稚的公式中，去找出路。我們的發展，却不是照布哈林的公式前進的。我們的發展，是照列寧的「誰勝誰」的公式前進的。我們戰勝他們剝削者，壓服他們，還是他們戰勝我們蘇聯的工農，壓迫我們，——同志們，問題就是這樣。

所以，社會主義向各方面組織進攻——這就是在發展改造全部國民經濟的工作的時候，在我們面前擺着的任務。

黨正好是這樣的瞭解自己的任務，實行進攻我們國內的資本主義分子。

（乙）但是，一般說來，在存在着新經濟政策的條件下，是不是准許進攻，尤其是可否向各方面進攻呢？

有些人以爲，進攻和新經濟政策是不能並立的，新經濟政策實際上是退守，不久退守已終結了，新經濟政策當然應該撤消。這當然是傻話。這種傻話或者是從託洛茨基主義者方面說出來的，他們什麼列寧主義都沒有懂得，以爲「一下子」就可以「取消」新經濟政策；或者是右傾機會主義者的話，他們也是一點列寧主義不懂，胡嚷「取消新經濟政策的危險」，想爲自己放棄進攻來講一講價。倘若新經濟政策祇是退守，那末，列寧在第十次黨大會上在徹底進行新經濟政策的時候，就不會說「退守完結了」。列寧說退守完結的時候，難道他同時沒有說過我們將「嚴格的長期的」進行新經濟政策嗎？祇要提出這個問題，就可以懂得胡嚷新經濟政策和進攻不能並存的話怎樣的無聊了。實際上，新經濟政策不僅要退守，要允許私人貿易復興，在國家的調節作用的保

證之下，允許資本主義復興起來（新經濟政策的開始階段）。實際上，新經濟政策在發展的某一個階段上，同時便促進社會主義進攻資本主義分子，要縮小私人貿易的活動範圍，相對的和絕對的減少資本主義分子，社會化部份的繼續超過非社會化部份，社會主義戰勝資本主義（新經濟政策的現在階段）。新經濟政策是為社會主義戰勝資本主義分子而採用的。我們轉向各方面進攻，還沒有取消新經濟政策，因為私人貿易和資本主義分子還存在，商品流轉和貨幣經濟還存在，但是我們一定要取消新經濟政策的初期，發展他的下一個階段，現在的階段，也就是新經濟政策最後的階段。

列寧在採用新經濟政策後一年，在一九二二年曾經說過下面一段話：

“我們現在後退，但是我們這樣幹法，為的是開始是後退以後再奔跑起來，和更有勁的向前跳躍。只有在這個條件之下，我們才在實行新經濟政策中，向後退了。我們現在應該在什麼地方並且怎樣改排隊伍，適應，改組，以便退守以後，開始更勇猛的向前進攻——這我們還不知道。要順次序的實行所有這些動作，就應該不只幾十次的，而是幾百次的測量，然後再決定，，（“列甫全集，，第十八卷，下冊，一〇三頁）

大概清楚了吧。

現在有一個問題：轉入進攻的時候，是不是已經到了，進攻的時期是否成熟了呢？

列寧一九二二年，就在另一個地方說：

“聯合農民羣衆，聯合尋常的勞動農民，開始不可思議的、無邊的、比較我們夢想還要慢些的前進，但是要全體羣衆真正的和我們一起前進，……“那時候，這種運動的加速，到了一定時候就發生，他的速度，也將是我們現在所夢想不到的，，（“列甫全集，，第十八卷，下冊，第二十九到三十頁）。

現在還是這個問題：這種加速運動，這種加緊我們發展的速度時候，是不是已經到了，我們選擇時期，在一九二九年下半年開始向各方面作堅決的進

效，這是不是正確呢？

對於這個問題，黨已經給了明確的答覆。

是的，這樣的時期已經到了。

是的，黨所選擇的開始向各方面進攻的時期是正確的。

證明這一點，有工人階級積極性的繼續提高，在幾千百萬勞動羣衆中間，黨的威信空前的增加。

證明這一點的，有貧農中農羣衆積極性的提高，這些羣衆的根本轉向集體農場建設。

證明這點的，就是我們現在不僅能夠用蘇維埃農場與集體農場來代替富農生產，而且能夠超過他幾倍。

證明這點的，就是我們已經能夠大體上解決了五穀問題，積聚了一定糧食儲蓄，把穀類商品生產的重心，從個人生產方面，轉到了蘇維埃農場和集體農場方面。

這些證據，證明黨正確的選定了向各方面進攻和提出消滅富農階級的口號的時機。

倘若我們聽信了布哈林右傾機會主義的話，倘若放棄了進攻，顛覆了工業發展的速度，阻礙了集體農場和蘇維埃農場的發展，依靠個人的鄉村經濟，那末結果怎樣呢？

我們就一定破壞了我們的工業，葬送了社會主義改造鄉村經濟的事業，落得沒有糧食，並替富農肅清了道路。我們大概就已經坐在破鍋的旁邊了。

倘若我們聽信了托洛茨基季諾維埃夫派“左傾，機會主義者的話，在一九二六和一九二七年開始了進攻的火線，那時候，我們還沒有一點兒的可能，去用集體農場和蘇維埃農場來代替富農生產，那末，結果是怎樣呢？

我們大概已經在這方面破了產，表示了我們自己的軟弱，加強了富農和一般資本主義份子的地盤，把中農推入了富農的懷抱中，打翻了我們社會主義的建設，落得沒有糧食。我們大概就已經坐在破鍋的旁邊了。

結果是一樣。

怪不得我們工人說：“向‘左’去，就走到右邊來，。（鼓掌聲）

有些同志們以為，社會主義進攻中最主要的東西，就是壓力，倘若壓力不加緊，那就是沒有進攻。

這對不對呢？這當然不對。

壓力是進攻的必要份子，但這是輔助的份子，而不是主要的份子。在現在的條件之下，社會主義進攻中最主要的，就是加緊我們工業發展的速度，加緊集體農場和蘇維埃農場發展的速度，加緊在經濟上排擠城鄉資本主義份子的速度，發動羣衆建設社會主義，發動羣衆反對資本主義。你們可以拘捕和流放幾萬或幾十萬的富農，但是，倘若你們同時不用盡一切的方法，去加緊建設新式的經濟，去用新的經濟形式代替舊的、資本主義的形式，去剷除和消滅他們生產的根源，使鄉村資本主義份子^①在經濟上不能生存和發展，那末，富農還是要重新產生出來，長大起來的。

另一些人以為社會主義進攻是一種無顧忌的前進，用不着相當的準備，用不着在進攻過程中重新配置各種力量，用不着鞏固奪到的地盤，用不着利用積蓄來擴張勝利，而且如果有部份的農民退出集體農場的現象，那末，這就是說，我們已遇到‘革命的退潮’，運動的低落，進攻的停止。

這是對不對的呢？這當然是不對的。

第一，沒有一種進攻，無論他是怎樣的順利，會沒有某條戰線上的破陣和陷陣的。根據這點而說進攻停止或進攻失陷，這就是不懂得進攻的實質。

第二，在進攻過程中不重新配置力量，不鞏固奪到的地盤，不利用積蓄來擴張勝利，不徹底進攻，那末，這種進攻是從來不會，而且也不會勝利的。毫無顧忌的進攻，這就是說，不遵守這些條件，進攻必然要化為烏有和失敗。我們國內戰爭的豐富經驗，都證明了這點。

第三，“革命的退潮，往往因為運動的低落而發生；但現在是在運動繼續高漲的時候，是在我們全部社會主義建設，工業和集體農場繼續興旺的時候，

是在我們革命繼續發展的時候，而有一部份農民退出集體農場；在這兩件事情之間，怎樣能有什麼相像的地方呢？在這兩個完全不同的表徵之間，怎樣能有共同之點？

（丙）在我們現在的條件之下，布爾塞維克進攻的本質是什麼呢？

布爾塞維克的進攻的本質，首先就是發動羣衆的注意力和革命的積極性去反對我國的資本主義份子；發動羣衆的創造性和獨立性去反對我們機關和企業中的官僚主義，因為他們埋沒許多的後備軍，把他們隱藏在我們制度的中心裏，不讓他出來應用；組織社會主義競賽和羣衆的勞動熱潮，去提高勞動生產率，擴張社會主義建設。

布爾塞維克的進攻的本質，第二，就是着手改造職工會，合作社，蘇維埃和一切其他羣衆組織的全部實際工作，使他適合改造時代的需要；在那裏造成最積極最革命的工作人員的中堅份子，排擠和隔絕機會主義分子，職工主義份子，官僚主義份子；劃出其中異己和蜕化份子，自下提拔新的工作人員。

布爾塞維克的進攻的本質，還有就是盡量的收集款子，去接濟我們工業，接濟我們蘇維埃農場和集體農場，派送我們黨的最好的人們，去擴張這種事業。

最後，布爾塞維克的進攻的本質，就是發動黨的本身，去組織全部進攻事業；鞏固和整頓黨的組織，趕走那裏的官僚主義分子和蜕化的現象；隔絕和排擠脫離列寧黨路線的“左，右派的說客，提拔真正的堅定的列寧主義者到上面去做工。

這就是現在布爾塞維克的進攻的基礎。

黨怎樣的實行這種計劃。

你們知道，黨是最堅決的實現這種計劃的。

開始是黨推展廣大的自我批評，集中羣衆的注意力去注意我們建設的缺點，注意我們組織和企業的缺點。第十五次大會上就已經提出了加緊自我批評的必要。一方面，煤礦事件和各部門工業中的危害行爲，發覺了各級黨都沒有革

命感覺，另一方面，與富農的鬥爭，揭穿了我們鄉村組織的缺點，——這兩種現象，繼續的推動了自我批評。中央在一九二八年六月二日的通告裏，澈底的形成了自我批評的運動，號召全黨和工人階級底一切力量，來發展自我批評，“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不顧什麼面子，，。黨撲斥了那些站在巷戰防禦對面的，企圖破壞和削弱蘇維埃政權的託洛茨基派的“批評，，，並宣告無情的揭破我們工作中的缺點，以改造我們底建設，以鞏固蘇維埃政權，作為自我批評的任務。大家都知道，黨的號召引起了工人階級和農民羣衆非常活潑的回音。

此外，黨組織廣大的運動，去反對官僚主義，提出實行清洗黨、工會、合作社和蘇維埃底組織，去除異己份子和官僚化的份子。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一九三〇年三月十六日的決議，決定提拔工人階級到國家機關內做工。決定大批工人監督蘇維埃機關（工廠的輔助），就是這種運動的繼續。大家都知道，這種運動引起了工人羣衆偉大的興奮和積極性。這種運動的結果，就是黨在勞動羣衆中間的威信偉大的提高，工人階級對黨信仰的增加，成千成萬的工人加入共產黨，整間和整廠的工人決然願意加入黨。最後，這種運動的結果，就是肅清了我們組織內一切暮氣沉沉的分子和官僚分子，解除了蘇聯黨工中央委員會中舊的機會主義領導。

黨又組織了廣大的社會主義競賽，工廠中羣衆勞動的熱潮。黨的第十六次代表會議關於競賽的宣言，把工作推上了正軌。模範隊更推着他繼續前進。列寧共產青年團和所領導的青年工人，在競賽上和模範隊運動上得到很多的勝利。我們應該承認，我們革命的青年，在這方面起了特別重大的作用。現在已經沒有什麼可以懷疑，各工廠的社會主義競賽，幾十萬工人關於社會主義競賽所得到的成績的互相報告，互相號召，模範隊運動廣大的發展，如果不是最重要的事實，那至少也是最重要的事實之一。只有瞎子，才看不到羣衆心理上 and 對勞動的態度上，已經起了一種根本的根本的改變了我們工廠的面目。在不久以前，還有人喊出競賽和變化，模範隊運動的“杜撰，，和“不中用，，。現在這些“聰明人，，，甚至於引不起人家的一顧了，大家都當他們是上世紀的“聰明人

了。現在競賽和模範隊運動的事業，是奪到了的和鞏固了的事業。社會主義競賽吸收了二百萬以上的工人，加入模範隊的有一百萬以上的工人，這是事實。競賽的好處，就是競賽在人們對待勞動的觀點上，造成一種根本的轉變，因為他使勞動從以前認為是卑鄙的煩重的重擔，變為榮耀、光榮、英勇和勇敢的事業。在資本家那裏，人們所最希望的，最受社會讚揚的，就是有地租，依靠利息過生活，不作被輕視的勞動。在我們蘇聯，正好相反，最希望的，最受社會的所讚揚的事情，就是能夠成為勞動的英雄，能夠成為模範隊運動的英雄，能够在幾千百萬勞動羣衆中被崇敬的最高榮譽。

在競賽中還有一件事情可以算是一樣可以注意的，就是競賽開始在鄉村中散佈起來，已經蔓延到蘇維埃農場和集體農場。大家都知道在幾百萬蘇維埃農場農民和集體農民羣衆中間真正的勞動熱情的事實。

說能够在二年前夢想競賽和模範隊運動有這樣的勝利呢？

黨又收集了全國的財源去發展蘇維埃農場和集體農場的事業，供給蘇維埃農場最好的組織者，幫助集體農場二萬五千工人，提拔集體農民中最好的去領導集體農場，設立集體農民補習學校，因此，安置下了基礎，好去養成堅定的，老練的集體農場運動的人材。

最後，黨改造了自己的隊伍，改編成同行軍一樣的嚴整，改編了報紙，進行兩條戰線的鬥爭，搗毀托洛茨基派的餘孽，當頭打碎了右傾分子，隔絕了調和派，因此就保證了順利進攻所必須的條件，即黨的隊伍在列寧路線的基礎上的一致，和對進攻工作的實際正確的領導，拿住了並且設法處理了集體農民運動方面右派營壘中的漸進派人們和‘左’，傾份子。

這就是黨的基本辦法，用來實行向各方面進攻的。

大家都知道，這種進攻，在我們工作中各方面都得到了勝利。

我們能够克服我們國民經濟改造時代中許多困難的原因，也就是在這裏。

我們能够勝利的戰勝我們建設中的最大困難，基本農民羣衆轉向社會主義方面的困難，其原因也在這裏。

外國人有的時候問到蘇聯國內的情形。蘇聯國內情形是堅固的，不動搖的，這難道還可以懷疑嗎？你們看一看資本主義國家，看一看這些國家恐慌和失業的增加，看一看罷工和歇業，看一看反政府示威，——在這些國家內的情形和蘇聯的國內情形，有什麼地方可以比較呢？

我們應該承認，蘇維埃政權，是現在世界上一切存在着的政權中最堅固的政權。（鼓掌聲）

八 資本主義制度還是社會主義制度？

因此，我們已經看到了蘇聯國內情形的全景。

同時我們也看到了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國內情形。

無意中就發生一個問題：倘若把兩種國家相互對比起來，把這兩種景象比較起來，結果是怎麼樣呢？

這個問題之所以特別有趣，就是因為各國的資產階級行動家，各式各樣的資產階級報紙，從公開的資產階級報紙，一直到孟塞維克託洛茨基派為止，都異口同聲的呼喊資本主義的“興旺，，蘇聯的“滅亡，，蘇聯“財政上和經濟上的破產，，等等的話。

這樣，分析我們蘇聯的情形和資本主義國家的情形，結果是怎樣呢？

我們現在指出主要的，大家都知道的幾件事實。

在他們資本家那裏，工業和農業中都有經濟恐慌和生產衰落。

在我們蘇聯，國民經濟的各種部門中，都是經濟的高漲和生產的發展。

在他們資本家那裏，勞動者物質條件惡化，工人工資減低，失業工人增加，

在我們蘇聯，勞動者物質條件提高，工人工資增加，失業工人減少。

在他們資本家那裏，罷工和示威的數目增加，因此就喪失幾千百萬的工作日。

在我們蘇聯，沒有罷工，工農勞動熱情高漲，給我們的建設以數千百萬額

外的工作日。

在他們資本家那裏，國內形勢緊張，工人階級反對資本主義制度的革命運動繼續高漲。

在我們蘇聯，國內地位鞏固，千百萬工人階級羣衆，團結在蘇維埃政權周圍。

在他們資本家那裏，民族問題緊張起來，印度、安南、東印度羣島，菲律賓羣島等地的民族解放運動一天天的上漲，變成民族戰爭。

在我們蘇聯，民族親善的基礎鞏固起來，保證民族的和平，團結蘇聯各民族幾千百萬羣衆在蘇維埃政權周圍。

在他們資本家那裏，驚惶失措，並且情形還有繼續惡化的前途。

在我們蘇聯，相信自己的力量，情形有繼續改良的前途。

人們胡喊蘇聯的‘滅亡’，，資本主義國家的‘興旺’，等等。那些‘意料不到的’，，忽然落在經濟恐慌的漩渦裏，而還不能夠脫離一落千丈的危險的那些國家，就必然的要滅亡，——這樣說法，不是更正確些嗎？

他們資本家那裏嚴重的失敗和我們蘇聯嚴重的勝利，這些原因究竟在那裏呢？

人們說，國民經濟的局面與資本的多少很有關係。這當然是對的，資本缺乏是不是能夠說明資本主義國家的恐慌，資本多餘是不是能夠說明我們蘇聯的興旺呢？不，當然不能。誰都知道，蘇聯的資本比資本主義國家要少得多。假使這問題是靠積累的情形來決定，那末，我們應該是恐慌，而資本主義國家應該是興旺了。

人們說，經濟情形要看經濟人材在技術上和組織上的準備來決定。這當然是對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恐慌是不是可以由技術人材的缺乏來說明，蘇聯的興旺是不是可以用技術人材的多餘來解釋呢？不，當然不能。誰都知道，資本主義國家裏的熟練的技術人材，比我們蘇聯要多得多了。我們從來沒有隱瞞過，而且也不預備隱瞞，在技術方面，我們是德國人、英國人、法國人、意大利人

、首先最主要的就是美國人的學生。不，雖然人材問題對於國民經濟的發展，是有很多的意義，但這個問題不是靠技術人材的多餘或缺乏來決定的。

也許問題的解答，是在我們文化程度比資本主義國家高吧？又不是。大家都知道，我們羣衆的一般文化程度，比美國、英國和德國等等要低。不，雖然文化程度對於國民經濟的發展有很嚴重的影響，但問題不在乎羣衆的文化程度。

也許原因是在乎資本主義國家領導人的個人能力吧？又不對，恐慌是和資本主義統治的進攻同時產生的。資本主義定期的經濟恐慌，已經發生了一世紀多，每過十二年，十年，或八年重複一次。資本主義的一切政黨，資本主義的一切多少有名的行動家，從最有“天才的，起，一直到最普通的爲止，試用過全部的精力，去“預防，或“消滅，恐慌。但是他們都失敗了。胡佛★和他的黨徒也失敗了，這有什麼奇怪呢？不，雖然資本主義的領導者和政黨在這裏有很大的意義，但問題不在於資本主義的領導者和政黨。

那末，究竟是怎樣一回事呢？

蘇聯雖然文化落後，資本缺乏，技術上銀鏽過的經濟人材的缺少，可是經濟還是處在繼續發展的狀態，在經濟建設方面有重大的勝利；而資本主義先進的國家，雖然資本多餘，技術人材多餘，文化程度比較要高，可是還是處在繼續加緊的經濟恐慌情形之下，在經濟發展方面敗了一陣又一陣——這究竟是什麼原因呢？

原因是在乎我們和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不同。

原因在乎資本主義經濟的制度不中用。

原因是在乎蘇維埃經濟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比較起來，有他的優點。

什麼叫做蘇維埃經濟制度呢？

蘇維埃經濟制度就是：

(1) 資產階級的政權，已經被推翻，由工人階級的政權來替代；

★胡佛是美國的前任總統。

(2) 生產工具、土地、工廠、製造廠等等，從資本家那裏奪下來，轉交給工人階級和勞動羣衆佔有；

(3) 生產的發展不受競爭的原則和保證資本主義利潤的原則所支配，而受有計劃的指導和有系統的提高勞動者物質條件和文化程度的原則所支配；

(4) 國民收入的分配，不是要使剝削階級和他們許多的寄生蟲發財，而是爲有系統的提高工農的物質地位和擴大城市和鄉村中社會主義的生產；

(5) 有系統的改良勞動者的物質條件，他們需要（尤其是購買力）的增加（是擴大生產的經常增加的根源）担保工人階級不遭受生產過剩的恐慌和失業者增加等等的苦痛。

(6) 工人階級是國家的主人，他們不是爲資本家而做工，而是爲本階級做工。

什麼叫做資本主義制度呢？

(1) 國家的政權是屬於資本家的；

(2) 生產工具是集中在剝削者手中；

(3) 生產不是受改良勞動羣衆的物質條件的原則所支配，而是受担保資本主義高度利潤的原則所支配；

(4) 國民收入的分配，不是爲改良勞動者的物質地位，而是保證剝削者的高度利潤；

(5) 資本主義合理化和生產很快的發展，目的爲的是担保資本家高度的利潤，這樣就遇到障礙，遇到千百萬勞動羣衆窮苦的境地和物質保證的減少，他們往往不能滿足自己的需要，甚至最低限度的需要都不能滿足，這樣就必然立刻的產生生產過剩的恐慌，失業者的增加等等；

(6) 工人階級是被剝削的階級，他們不是爲自己而做工，是爲另一個階級，即剝削階級，來做工。

蘇維埃經濟制度和資本主義組織比較起來，就有這些優點。

我們蘇聯羣衆消費（購買力）的增加，總是超過生產的擴張，推動生產前

進；在資本家那裏，情形恰恰相反，羣衆消費（購買力）的增加，總是趕不上生產的擴張，總是落在後面，這樣就使生產轉入恐慌。原因就在這裏。

在資本家那裏，在恐慌時候，消滅商品的“剩餘”，，燒毀農產品的“多餘”，，以維持高價和保證高度利潤；而在蘇聯，犯這樣罪的人，就送到瘋人院裏去了（鼓掌聲）。原因就在這裏。

在資本家那裏，工人罷工，示威，組織革命鬥爭，反對現存的資本主義政權；而在我們蘇聯，我們見到幾千萬工農偉大的勞動競賽，預備用自己的胸膛去保護蘇維埃政權。

蘇維埃國內情形的穩固堅定，資本主義國內情形的不穩固和動搖，牠的原因，就在這裏。

我們應該承認，不知道那裏去安放生產的“多餘”，，而不得不在羣衆窮困和失業的時候去燒毀“多餘”，的那種經濟制度，應當自己替自己定死罪。

最近幾年是實際試驗的時期，是蘇維埃和資本主義兩種經濟制度考試的時期。在這幾年來，蘇維埃制度“滅亡”，和“破產”，的預言，已經是說得太充分了。資本主義“興旺”，的論調和讚美，還要多些。怎麼呢？這幾年却更重複的證明了，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是不中用的制度，蘇維埃經濟制度則有許多的優點，這些優點，無論是那一個資產階級的國家，不論是最“民主的”，也好，最“全民的”，也好，以及其他的好，都不敢夢想的。

列寧在一九二一年五月聯共代表會議上的演說中說：

“現在我們用自己的經濟政策，作為促進世界革命的主要工具。大家都注意蘇維埃俄羅斯共和國，世界上各國的勞動者，毫無例外的，毫無誇大的，都注意蘇俄。這一點已經達到了。資本家既不能不作聲，又不能掩蓋，因此他們就最注意我們的經濟錯誤和我們的弱點。在這方面，鬥爭轉移到全世界上去。我們解決了這種任務，那末我們大概就澈底的在全世界上得到了勝利，（“列寧全集”，第十八卷，上冊，第二百八十二頁）。

我們應該承認，列寧所提出的任務，我們黨已經很順利地完成了。

九 目前的任務！

(甲) 一般的

(1) 首先就是在蘇聯正確地分佈工業的問題。無論我們怎樣的發展國民經濟，但要正確的分佈國民經濟中各主要部門的工業是不行的。現在的問題，就在於我們的工業和我們的國民經濟，主要的是依靠烏克蘭的煤礦和五金工業的基礎。很明顯的，沒有這種基礎，是不能使國家工業化的。我們烏克蘭的燃料和五金基礎，就是這樣的基礎。可是只這一個基礎，將來是不是能夠滿足蘇聯南部、中部、北部、東北部、遠東、土耳其斯坦的需要呢？所有的材料都告訴我們，這是不能夠的。我們經濟發展中的新現象之一，就是這個基礎，對於我們已經是夠了。新的工作就是盡量的發展這個基礎，同時，即刻開始創造第二個石煤五金的基礎。烏拉爾。普慈聶茨的“康平納脫，(大聯合)，就是這種基礎，他把普慈聶茨的焦煤和烏拉爾的鐵礦聯合起來(鼓掌聲)。尼日聶建造汽車廠，却亮平斯克建造拖拉機廠，斯維得洛夫斯克在設立機器製造廠，沙拉託夫和新西伯利亞設立“康拜因，廠；西伯利亞和哥薩克斯坦有色金屬業的發展，需要在東方設立修理機器的工場和主要的五金工廠；最後，決定在新西比司克和土耳其斯坦建造紡織工廠，——因為這些情形，所以急切需要立刻着手進行在烏拉爾組織第二個石煤五金基礎。

你們都知道，我們黨的中央，對於烏拉爾五金工廠的問題，就是根據這種精神在決議裏決定的。

(2) 再，就是在蘇聯正確的分佈鄉村經濟基本部門的問題，照農作物的種類和部門而使我們各州專門化的問題。很明顯的，在小農經濟之下，嚴格的實行專門化是不可能的。這是不可能的，因為小經濟是不穩固的經濟，沒有必需的積蓄，不得不在自己田上分種各種各樣的植物，為的是如果在一種植物上受了損傷，還可以從別的植物上得着補償。大家也都很明白，在國家掌握中，倘若沒有相當穀類的積蓄，那就不能做專門化的工作。現在，當我們轉到大

經濟和在國家掌握中有了穀類的積蓄的時候，我們可以而且應該提出正確的按照植物和部門實行專門化的任務來。而徹底的解決五穀問題，却是這種工作的起點。我說這是“起點”，因為不解決五穀問題和在畜牧區、棉花區、油區、麻區和烟草區設立棧棧，那就不能夠把牧畜業和原料植物的耕種向前推進，就不能保證在我們各州裏，按植物種類和部門來實行專門化。

這裏的任務是要利用一切已經開闢的可能性，推動這件工作前進。

(3) 還有工農業中的幹部人材問題。大家都知道，我們的經濟幹部人材、我們的專門家、技術家、經濟工作人員等底技術準備的薄弱。又因為一部份專門家和從前的主人發生關係，受國外的慫恿，領導賊害事業，因此問題就複雜了。問題又因為另外一個原因，就弄得尤其複雜了。這個原因，就是我們許多作經濟工作的共產黨員，在這方面不表示他底革命警惕心，時常成為賊害分子精神上的俘虜。可是在我們面前，擺着偉大的改造全部國民經濟的任務，需要大批新的人材來指揮新的技術。因此，我們的人材問題，就變成真正最可注意的問題了。

解決這個問題，我們是用的下列的辦法：(一) 堅決地與賊害分子奮鬥；(二) 極端注意和機警的去對一切與賊害分子無關的最大多數的專門家、技術家（我們說的不是烏斯特略洛夫一類的的花言巧語、賊頭狗腦的東西，我說的是真正科學人材，和工人階級一心一意做工，不賣弄“鬼聰明”的人們。）；(三) 組織國外來的技術幫助；(四) 派送我們的經濟工作人員到外國去學習和學到技術經驗；(五) 把技術學校轉交給相當的經濟機關，為的是從工人階級中間，最快的養成足量的技術家和專門家。

這裏的任務，就是推廣這種工作，實現這些辦法。

(4) 反對官僚主義的問題。官僚主義的危險，首先就是，官僚主義埋沒了隱藏在我們系統中的無數可能，不利用他們，企圖把羣衆的創造性化為烏有，關在事務房裏，使黨的每種新的發端，都變成細小無聊的貪慾。第二，官僚主義的危險，就是官僚主義經不起關於執行情形的審查，他企圖把領導機關的

主要指示，變成紙上的，和實際生活完全脫離關係的空話。不僅那些鑽在我們機關中的舊官僚是有危險的，而新的官僚分子，蘇維埃的官僚分子，也是危險的，並且比舊官僚更危險。至於在蘇維埃官僚中間，“共產黨員，的官僚份子，還起很大作用。我說的是有些“共產黨員，，他們用辦公處的命令，“吩咐，，（他們相信這些東西的力量，好像相信偶像一樣）的方法，去代替幾千萬工農羣衆的創造性和自動性。

這裏的任務，就是打倒我們機關中和組織中的官僚主義，消滅官僚主義的“道德，和“習慣，，肅清道路，好去利用我們系統中的可能，發展羣衆的創造性和獨立性。

這種任務，並不容易，不是“一下子，就可以解決的。倘若我們想根據社會主義的原則來真正改造我們國家，那末，我們無論如何需要把牠解決。

在反對官僚主義的鬥爭中，黨的工作，向四方面進行：發展自我批評，審查各種工作執行的程度，清洗機關，從工人階級中自下提拔忠實的工作人員到機關中去。

這裏的任務，就是要努力實行這些辦法。

（5）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問題。倘若不在工業中有系統的提高勞動生產率，那末，我們就不能解決改造的任務，我們不但是不能夠趕上和超過資本主義先進的國家，而且甚至於不能保持自己的獨立存在。因此，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問題，對於我們有頭等意義。

黨在這個問題解決方面的辦法，是向三方面進行的：有系統的改良勞動的物質條件，在工業和鄉村經濟企業中確定同志式的勞動紀律，組織社會主義競賽和模範隊運動。所有這些辦法，都要依靠技術的改良和合理的組織勞動。

這裏的任務，就是繼續擴張羣衆運動，去實行這些辦法。

（6）供給問題這是關於充分的供給城市和鄉村的勞動者必須商品的問題，合作社機關適應工農需要的問題，有系統的增加工人實際工資的問題，降低工業品和農產品價格的問題。關於合作社的缺點，我已經講過了。必須消滅

這些缺點，實行降低價格的政策。至於說到商品的缺乏（商品饑荒），那末，我們現在可以擴充很堅固的輕工業的基礎，推進羣衆消費品的生產。糧食的供給，可以算是已經有了保障。肉類、牛奶製造品，和茶蔬的供給比較困難些。可惜這種困難不能在幾個月之內消滅它。爲要戰勝這種困難，至少必須一年。一年以後，因爲有了特別組織的蘇維埃農場和集體農場，我們就能夠完全保證肉、牛奶製造品和茶蔬的供給。當我們在自己的掌握中，已經有了糧食的積蓄、紡織品，加緊工人住屋的建築，廉價的市政設備的時候，再去解決其他的貨品供給問題，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去調理決定工人預算和工人實際工資的一切基本原素。這就是要澈底的保證工人實際工資迅速的增加。

這裏的任務，就是在這方面發展我們一切組織底工作。

（七）信用借貸和貨幣流通問題。合理的組織信用借貸事業，正確的處置貨幣積蓄，這對於國民經濟的發展有很嚴重的意義。黨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是按兩方面進行的；在國家銀行中集中一切短期借款，在社會部分中組織不用現款的支付。因此，第一，國家銀行變成計算生產和生產品分配的全國機關；第二，從流通中即閑出許多錢。毫無疑義的，這些辦法會促進（現在已經促進了）全部信用借貸事業的就緒，鞏固我們的「切爾達涅赤」。（註）

（八）積蓄問題。我們已經講過好幾次，現在用不着再來重複了，一般的國家，尤其是我們的國家，不能夠沒有積蓄的。我們在糧食、商品、現金方面都有相當的積蓄。我們的同志們現在可以感覺到這些積蓄的好作用了。但是，「相當的」積蓄，對於我們是不足用的。我們在各方面都需要更結實的積蓄。

（乙）工業方面

（1）主要的問題，就是加緊發展鋼鐵業。你們要注意，祇到今年，一九二九至三〇年，我們才達到了戰前產鐵的程度和超過它。對於全部國民經濟，這是一種很大的危險。爲要消滅這種危險，應該着手加緊的發展鋼鐵業。到五年

（註）「切爾達涅赤」等於十個盧布，蘇維埃新金本位的單位。

計劃底，我們不是應該像這個五年計劃所規定的那樣，只有一千萬噸鐵，而是應該有一千七百萬噸。倘若我們願想認真的發展我們國家工業化的事業，那末我們無論如何應該完成這種任務。

布爾塞維克應該表示他們是能夠應付這種任務的。

這當然不是說，我們應該拋棄輕工業。不，不是這樣說。至今我們到處節省，其中也節省了輕工業，為的是要恢復重工業。但是，我們現在已經恢復了重工業。現在只要繼續向前發展就好了。現在我們可以注意輕工業，加速度的推動地前進。我們工業發展中的新現象之一，就是，我們現在能夠加速的同時發展重工業和輕工業。今年超過了耕種棉花、蔗和糖蘿蔔底計劃，順利的解決了“根頭兒”，★和人造絲的問題，——這都是證明我們能夠真正的推進輕工業。

(2) 合理化、減低成本費、改良生產品質的問題。在合理化方面的破綻，降低成本費方面的虧空，許多企業中生產品質的惡劣，是再不能忍耐了。這些虧空和缺點，到處箝制我們的國民經濟，不讓她前進。早已到了結束這些可恥的污點的時候了。

布爾塞維克應該表示他們是能夠應付這種任務的。

(3) 專責制的問題。在各企業中，破壞實行專責制的情形，也是受不了的。工人呢，却在發怨言說：“工廠裏沒有做主的，”，“工作中沒有秩序的，”。再也不能忍耐使我們的企業從生產機關變為國會了。最後，我們黨和工會機關，應該懂得，沒有專責制，不嚴格地規定誰對工作負責，我們就不能夠解決改造工業的任務。

(丙) 農村經濟方面

(1) 牧畜和原料植物問題。現在，當我們已經能夠根本解決五穀問題的時候，我們可以開始解決畜牧問題（這在現在真正迫切的問題），同時也可以

★“根頭兒”，是蕪的一種，產在中亞細亞。

開始解決原料植物的問題了。在解決這些問題的時候，我們應該照着解決五穀問題的方向做去。這就是說，用組織蘇維埃農場的方法（這是我們政策的基本點），逐漸改造現在小農牧畜和小農原料植物的技術基礎和經濟基礎。“牧牛業，，，“牧羊業，，，“養豬業，，，“牛油牛奶托拉斯，，。加上牧畜業集體農場原料植物方面的蘇維埃農場和集體農場，——這就是解決當前問題的出發點。

（2）繼續發展集體農場和蘇維埃農場建設的問題。用不着申說，這個問題是我們全部鄉村建設中的頭等問題。現在就是瞎子也看到，農民根本的從舊制度轉向了新制度，從富農的奴役轉向了自由的集體農場底生活。再也不會回復到舊制度去了。富農的命運是必然消滅。留下來只有一條路，集體農場的進路。集體農場的進路，已經不是腐爛糊塗的東西。牠們已經由農民羣衆自己千百次地試驗過和審查過。試驗過和審查過，當牠是新的東西，牠能夠解放農民脫離富農的奴役，不至於貧乏，及能脫離黑暗。我們的政策，就在這裏。

鄉村中的新運動將怎樣的繼續發展下去呢？蘇維埃農場繼續的前進，牠是改造農村中舊制度的主要骨幹。許多的集體農場，就好像農村中新運動的根據地，跟在蘇維埃農場後面前進。這兩種系統底統一的工作，造成了蘇聯各州完全集體化的條件。

集體農場運動中最可注意的成績之一，就是牠能夠從農民自身中間，順利的提出成千的集體農場的組織者和成萬的集體農場的鼓動者。現在已經不只是我們黨內的布爾塞維克，而是集體農場中的農民自己，集體農場專業的成千萬的農民組織者和鼓動者，來掌管集體化的旗幟前進。而農民的鼓動者是集體農場運動中最好的鼓動者，因為他們找得到特別的說法，使其他農民羣衆容易懂得，容易接受。這是我們黨內的布爾塞維克所夢想不到的。

有些地方喊出必須放棄統盤集體化的聲音來。這裏有材料，證明甚至於我們黨內也有這種“思想，，的同情者。但是，只有不自覺地或自覺地和共產主義底敵人打成一氣的人們，才能說這樣的話。統盤集體化的方法，是必要的方法，沒有這種方法，就不能夠完成全蘇聯各州集體化的五年計劃。若想不到究竟共

產主義以及工人階級和農民的利益，怎樣可以放棄這種方法呢？

這當然不是說，在集體農場運動方面，什麼都是“平安的，和“舒適的”，集體農場內部，還要動搖。加入和退出還要發生。但是，這不能也不應該激怒集體農場運動的建設者。這更不能够算是集體農場運動強大發展上的嚴重阻礙。像集體農場運動那樣健全的運動，當然是無論如何，不願任何的和各別阻礙困難，總是要達到自己的目的的。

這裏的任務就是，準備力量，安排事業，使集體農場運動繼續發展。

(3) 使各機關盡量地接近各區和各鄉的問題。毫無疑義的，倘若我們不實行分區，我們是不能夠舉行改造鄉村經濟和發展集體農場運動底偉大工作的。擴大各鎮，把牠改變為區，消滅省，把牠變為比較小的單位（府），最後，成立州，作為中央直接的根據地。這是分區的總形勢。分區的目的，就是使黨、蘇維埃、經濟機關和合作社機關，接近區和鄉，使牠們能夠按時的解決鄉村經濟中、牠的發展中、牠的改造中的緊急問題。再說一遍，在這方面，分區對於我們全部建設，有很大的幫助。

要使各機關真正的接近，認真的接近各區和各鄉，在這方面是不是已經什麼都做到了呢？不，還沒有都做到。現在集體農場建設的重心轉到區的組織去了。從這裏發出集體農場和鄉村中一切其他經濟工作的線索，無論是合作社方面，蘇維埃方面，信用借貸機關方面，收買方面，都是這樣。

我們是否充分供給了必須的必要的工作人員給各區的組織來舉行所有這些各種各樣的工作呢？毫無疑義的，供給牠們的工作人員，是太不充分了。但有些什麼辦法呢？為要改正這些缺點，保證各區組織內我們各部門工作中得有足量的必要工作人員，應該做些什麼呢？現在應該做兩件事情：（一）取消府（鼓掌聲），牠變了州和區之間沒有用處的中間物，從府裏解放出來的工作人員，用去加緊各區的工作；（二）各區組織直接和州（和邊疆委員會，民族共和國的中央委員會）發生關係。這就是澈底實行分區，澈底實行使各機關接近各區和各鄉。

在我說到取消府的前途的時候，大家鼓了掌。府當然應該取消。但是以爲因此我們便可以嘲笑府，好像有位同志在“真理報”，上所幹的那樣，那就錯了。不應該忘掉，省區曾經負過很偉大的工作，起過很大的作用（鼓掌聲）。我們以爲過份着急地取消府，也是錯的。中央委員會通過決議取消府。但中央委員會並不是以爲這件事情，應該立刻舉行。很明白的，在取消府之前，應該進行必須的準備工作。

（丁） 運 輸 方 面

最後就是運輸的問題。用不着詳細來說運輸對於全部國民經濟有如何重大的意義。並且不僅對於國民經濟。大家都知道，運輸對於國防上，也有很大的意義。運輸的意義雖然重大，可是運輸業以及運輸業的改造，還是落在一般發展速度的後面。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有一種危險，就是會把運輸變成國民經濟中的“窄路”，能夠妨礙我們的前進，——這還需要證明嗎？還沒有到結束這種現象的時候嗎？

河上運輸的情形特別壞。事實是：瓦爾卡河輪船的運行，差不多不能達到戰前的百分之六十，得聶迫爾河上達到百分之四十。達到戰前百分之六十和四十，這就是河上運輸所能寫入牠的“成績”，表上的東西。不必說，這是很大的“成績”，不是到了消滅這種可恥情形的時候嗎？（呼聲：“到了，！”）

最後，這裏的任務就是用布爾塞維克的精神來進行運輸業，推動牠前進。這就是黨的當前任務。

實行這些任務，需要些什麼呢？

首先，主要的，需要繼續在整個戰線上發展向資本主義分子的進攻，徹底進攻到底。

我們政策的中心點和基礎，就在這裏。（鼓掌聲）

三

黨 的 問 題

現在就來講黨的問題。

我在上面已經說過蘇維埃經濟制度比資本主義制度多有的許多優點。已經說過在為社會主義完滿勝利而鬥爭的事業中，蘇維埃制度給我們以莫大的可能。已經說過，如果沒有這些可能，或不去利用這些可能，那我們是不能在過去時期中得到上述的各種成功的。

現在就發生一個問題：蘇維埃制度所給我們的一些可能，黨會正確的利用了嗎？黨沒有把這些可能隱藏起來，以至妨礙了工人階級把自己全部的革命力量來發展到底嗎？黨會由這些可能中，拿出一切力量來，以擴大各方面的社會主義建設嗎？

蘇維埃制度給我們以莫大的可能，使社會主義能完全勝利。但可能還不是實際。要把可能變成實際，必須許多條件，這些條件中，黨的路線和正確的執行這個路線的作用是不小的。

舉幾個例子來說。

右傾機會主義者肯定的說，新經濟政策是保證我們社會主義勝利的，——所以，可以不顧慮工業化的步驟，可以不顧慮蘇維埃農場和集體農場等等發展的步驟，因為勝利的到來，反正是有了保證的，即是有了所謂“自流”的保證。這當然是不正確的，而且是蠢笨的。假使這樣說法，那就是否認黨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作用，否認黨對於這種建設所負的責任。列甯從來沒有說過新經濟政策保證我們社會主義的勝利。列甯只說過，“在經濟上和政治上，新經濟政策保證我們有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可能”，但是可能還不是實際。要使可能變成實際，必須首先拋棄“自流”的理論，必須改造國民經濟，並向城市和鄉村的資本主義份子作堅決的進攻。

右傾機會主義者肯定的說，在我們的制度中，沒有使工人階級與農民分裂的基礎，——所以，可以不顧慮對鄉村各社會部分規定正確的政策，因為反致富農自己會生長到社會主義，而工人與農民的聯合，將“自流”，的有保證。這也是不正確而蠢笨的。只有不談解黨的政策（掌握政權的黨的政策）是決定工農聯合命運主要關鍵的人，才能這樣說；但列寧從來沒有認為工人階級與農民分裂的危險，是完全沒有的。列寧曾經說，“在我們的社會制度中，沒有認識着這種分裂的必然的基礎，，但是“如果在這些階級的相互之間，發生着嚴重的階級上的剝削時，那末分裂將成為不可避免的，，因此，列寧曾認為：

“我們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以及全黨的主要任務，是在於留心考察各種能夠產生分裂的情況，並提防這些情況，因為我們共和國的命運，畢竟是要看農民羣衆是否和工人階級一同走，保持與工人階級忠實的聯合，或者還是讓新興資產階級去把自己和工人們分離，和工人們分裂，，

所以，工人階級和農民兩者間的分裂不是完全不會有的，但是這種分裂不是一定要發生的，因為在我們的制度中，埋伏着預防這個分裂，且鞏固工人階級與農民的聯合的可能。要使這種可能變成實際，需要些什麼呢？為要使預防分裂的可能變成實際，必需首先埋葬“自流”的理論，必須消滅資本主義的根源，組織集體農場和蘇維埃農場，且由限制富農剝削傾向的政策，轉變到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

這樣看起來，必須把我們制度中所有的可能，以及對於這些可能的利用，把這些可能變成實際，——這兩件事嚴格的分開。

這樣看來，很可以發生這樣的情形，就是勝利的可能是有的，但是黨看不見這些可能。或者是不會正確的利用這些可能，結果不能勝利而至於失敗。

還是那個問題：黨曾經正確的利用了蘇維埃制度所給我們的可能和優點嗎？黨曾經作了一切的工作，使這些可能變成實際，去保證我們建設事業的最大程度的成功嗎。

換句話說，黨和他的中央委員會，在過去時期中，是否正確的領導了社會主義的建設呢？

在我們現時的條件下，黨的領導怎樣才是正確的領導呢？

要使黨的領導是正確的領導，除其他一切外，必須黨的路線是正確的，必須黨瞭解黨的路線的正確性，而且他們積極的擁護這條路線，必須黨不僅只規定正確的總路線，而要他天天去領導這條路線的實行，必須黨堅決的與脫離黨路線的各種傾向和調和派的鬥爭，黨在這個反傾向的鬥爭中，必須能使自己的隊伍一致，並造成鐵的紀律。

黨和他的中央委員會，爲了要實現這些條件，做了些什麼呢？

一 領導社會主義建設的問題

(甲)黨在現在時期的根本立場，就是由經濟建設陣地上的各單個區域的進攻，轉變到整個戰線上的總進攻，無論在工業方面，或農村經濟方面，都是如此。第十四次大會，主要是工業化的大會，第十五次大會，主要是農業集體化的大會。這都是整個戰線上總進攻的準備。第十六次大會的前一時期，與過去的各階段底不同，是在於這個時期，是社會主義建設的時期，是在工業方面與農業方面加緊社會主義建設的時期。第十六次大會，是社會主義在整個戰線上擴大進攻的大會，是消滅富農階級並實行統盤集體化的大會。

簡略說來，本黨總路線的實質就是這樣的。

這條路線正確不正確呢？

正確的。事實告訴我們，我們黨的總路線，是唯一正確的路線。(鼓掌聲)

我們在社會主義建設上的成功與成績，就能證明這一點。不能說黨在過去的時期中，在城市和鄉村中社會主義建設上所得的堅決的勝利，是一種不正確的政策的结果；這是從來沒有過，且是不能有的事。只有正確的總路線，才能給我們這樣大的勝利。

近來我們的階級敵人，資本家和他的出版物，各式各樣的教師及神父，社

會民主黨及「俄國」的孟塞維克阿布拉莫維赤及丹恩一流的人物，對於我黨政策的狂吠，也是證明這一點。資本家和他們的走狗既謾謗我們的黨，那就是說我們黨的總路線是正確的。（鼓掌聲）

現在大家所知道的託洛茨基主義的命運，也是證明這一點。託洛茨基黨營中的老爺們，曾經大叫蘇維埃政權的「墮落」，大叫「齊米崗爾」，大叫託洛茨基主義「必然勝利」等等。而事實上怎樣呢？事實上是託洛茨基主義破產了，完結了。你們都知道，一部分託洛茨基派已經在自己的許多申明書中宣佈了與託洛茨基主義脫離關係，宣佈了託洛茨基主義的反革命性。而另外一部分託洛茨基派，真正墮落成了標本式的小資產階級的反革命者，成了資產階級言論界上關於蘇聯共產黨各種問題的鬧事處。至於蘇維埃政權呢？按託洛茨基派的「預言」，本來應當「墮落的」（或者是已經「墮落了」），但是事實上，它却繼續的鞏固，建設社會主義，且順利的打破國內的資本主義分子和他的小資產階級式的捧台腳的人。

現在大家所知道的右派的命運，也是證明這一點的。這班人曾經大叫黨的路線底「倒台」，大叫蘇聯的「要破產」，大叫必須把國家從黨和它的領導底手裏「救出來」等等的話。而事實上怎樣呢？事實上是黨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各方面，都得到了莫大的成功，而右派這部分人，本來是想要「救」國的，後來却承認了自己的觀點錯誤，現在正坐在淺水灘上不能動作。

工人階級和農民中日益高漲的革命積極性，千百萬勞動羣衆積極的擁護黨的政策，以及工人和集體農場那種空前的、使蘇聯敵人和朋友都驚嘆不已的建設社會主義的勞動精神，也都是證明本黨的路線的正確。我且不說到工人羣衆對於黨的信仰之增高的事實，比方整個「一間」、一工廠的工人請求入黨，自第十五次大會到第十六次大會的期間內，黨員的數目增加了六十多萬人，就僅本年第一季中來說，入黨的就有二十萬人。這些事實，告訴我們一些什麼呢？這些事實是說：數百萬的羣衆都覺悟到了我們黨的政策是正確的。

必須承認，假使我們黨的總路線不是唯一的、正確的路線，那就不會有這

些事實了。

(乙)但是黨不能僅只去規定正確的總路線，他還應當每天去檢查這條總路線在事實上的實行。他應當領導總路線的實行，在工作的行程中，去改良而且完成已經決定的經濟建設計劃，改正並提防錯誤。

我們黨的中央委員會對於這件工作是怎樣做法呢？

中央在這方面的工作，主要的是使步驟加速，時期縮短，去改正並確定五年經濟計劃，檢查各經濟機關對於已經規定的計劃實行的情形。

現在拿中央委員會關於改正五年經濟計劃，使得建設加緊和執行時期縮短的幾個主要決議案來看看。

在黑色金屬方面：五年計劃只預定在五年計劃的最後一年中，鐵的生產額為一千萬噸；中央委員會的決議上認為這個數量是不夠的，且決定在五年計劃最後的一年中，鐵的生產應該達到一千七百萬噸。

在拖拉機的製造方面：五年計劃，只預定在五年計劃的最後一年中使拖拉機的生產件數達到五萬五千；而中央委員會的決議，却認為這個計劃是不夠的，且決定拖拉機在五年計劃最後一年中的生產件數，應當達到十七萬。

在汽車製造一方面也是這樣，原定五年計劃的最後一年中，只生產十萬架汽車（運貨車和輕便汽車合計），而中央委員會決定在這一年內要生產二十萬架。

在有色金屬方面，也有過同樣的現象，在這裏會把五年計劃的原定增大了百分之百。農村機器製造方面，也同樣的把五年計劃的原定，增大了百分之一百以上。

至於康拜因（割打機）的生產，是五年計劃中所完全未計算到的，這種機器，在五年計劃的最後一年中，至少要生產四萬架。

在蘇維埃農場的建設方面：五年計劃預定在五年計劃的末了時候，耕種面積擴大到五百萬海克脫；而中央委員會的決議却認為這個數量是不夠的，且決定蘇維埃農場的耕種面積，到五年計劃末了的時候，要擴大到一千八百萬海克。

脫。

在集體農場的建設方面；五年計劃預備在五年計劃末了的時候，把耕種面積擴大到二千萬海克脫；而中央委員會的決議，却認為這個數量太不夠了（只就今年說，就已經超過了這個數量），並決定在五年計劃的末了的時候，蘇聯的農業集體化大體上應該結束，而集體農場的耕種面積，到這時候應該達到蘇聯全部耕種土地十分之九，而這些土地現在是由個人農民耕種的。（鼓掌聲）

諸如此類的問題，還可舉出很多。

這就是中央委員會領導實行黨的總路線，領導社會主義建設計劃事業的一般情形。

或許有人說，中央委員會把原定的五年計劃，變更得這麼大，這就是破壞計劃上的原則削弱計劃機關的威信。但是只有毫無希望的官僚，纔能這樣說。對於我們布爾塞維克呢，五年計劃，不是什麼一成不變和永不更改的東西；五年計劃對於我們，是像各種計劃一樣的，大體上規定了，但是根據地方上的經驗，根據實行計劃的經驗，必須使他精確，必須變更，必須完成。任何五年計劃，也不能預先計算到我們制度中所包含的各種可能性，不能預先計劃到工作過程中，在工廠、集體農場和蘇維埃農場，以及各區域中實行計劃過程中的各種可能性。只有官僚主義者才能這樣來想計劃上的事情，以為只要計劃一經製定，工作便完結了。不知製定計劃只是計劃事業的開始。真正對計劃的領導，僅是在計劃製定後，在各地方上把計劃實際審查後，在計劃實行和更正後纔擴展的。

所以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會同計劃機關，曾經認為必須根據經驗，在提高建設步驟和縮短執行時期一點上，更正並改良五年計劃。

列寧在蘇維埃第八次代表大會上，在討論國家電氣化的十年計劃時，關於計劃原則和計劃事業的領導，曾經這樣說：

“我們黨的政綱，不能祇是黨的一種政綱。這個政綱，應該成為我們在經濟建設上的政綱，如若不然，他就不能成為黨的政綱了。這個政綱，

應該拿黨的第二政綱來補充，應該拿再造整個國民經濟工作和使這種經濟達到現代技術程度的計劃來補充……結果，我們應該採取一種相當的計劃

•這種計劃，在通過的時候，當然只是大體上的一種規定。我們黨的這個政綱，不能和我們黨的真正政綱一樣，只有在黨的大會上才可以變更。不是的，這個政綱，將在每一天，每一個工廠，每一縣去加以改良，加以審定，完成而且變更……應當留心地面上的科學與實際的經驗，要使計劃比原定時期更快的實行，以便羣衆能夠看見工業完全恢復的時期是可由經驗來縮短的。這件事要依靠我們。我們大家來在每個工廠，每個火車修理場，每一部門，把經濟改良起來，——那時候，我們就可以把時間縮短。而且我們已經在這裏縮短時間了。》，（“列寧全集，第十七卷，四二三到四二七頁）

這樣，你們就知道中央委員會更改並改良五年計劃，縮短時期，提高建設的速度，是按着列寧指示的道路作去的。

中央委員會提高建設速度縮短五年計劃執行時期的時候，是依據什麼可能呢？他是依據我們制度中所包含的力量，而這些力量是在工作過程中才顯露出來的；他是依據改造時期所給我們的可能。中央委員會認為工業和農業技術基礎的改造，在生產的社會主義組織之下，給我們以很多的可能，使建設速度的提高，成為任何資本主義國家所夢想不到的。

只有用這些條件，纔能解釋我們社會主義的工業的生產量，在最近三年來增大了兩倍以上的這件事實，而在一九三〇到三一年中，我們社會主義工業的生產量與今年相比較，將增加百分之四十七，且同時，僅只這個增加數量，就將等於戰前全部大工業的生產量。

只有用這些條件，纔能有釋蘇維埃農場的建設，在三年內要超過五年計劃，而集體農場的建設，已經在兩年內超過了五年計劃等等的事實。

有一種理論，說迅速的發展，只有在經濟的恢復時期內是可以的，而一經轉變改造時期，建設的步驟，便應當一年一年的大加減低。這種理論是叫作‘

發展線日益下降』的理論。這種理論，是一種以我們的落後來辯護的理論。他與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沒有絲毫共同之點，它是一種資產階級的理論，是要鞏固我們國家的落後性的。在過去與現在和我們黨有關係的人們的中間，祇有託洛斯基派、說不定還有右派是主張並且宣傳這種理論的。

有一種意見，把託洛斯基派看成是一種超工業化派。但這種意見祇有一部分是正確的。祇是在恢復時期終結時候的問題上是正確的。因為那時候的託洛斯基派，的確會主張過一種超工業化的空想。至於改造時期呢？在建設的速度上，託洛斯基派是一種極端的最小限度派和極偷懶的投降派。（全場大笑、鼓掌聲）託洛斯基派在自己的政見上和宣言上，沒有拿出關於發展的速度和數目字的計劃來，他們祇唱了一些關於速度的空調。但是在一個文件中，託洛斯基派曾經拿數目計劃來敘述他們對於國家工業發展步驟的瞭解。我所指的是國家工業「恢復固定資本特別會議」上根據託洛斯基主義原則所寫成的一個報告。我們現在對於這個一九二五至二六年的文件，不妨說幾句話，因為它完全可以表示出託洛斯基派的「發展線日益下降」的理論。

根據這個文件，預定在一九二六至二七年，投資於國家工業十五萬萬四千三百萬盧布；一九二七至二八年，為十四萬萬九千萬盧布；一九二八至二九年，為十三萬萬二千萬盧布；一九二九至三〇年。為十萬萬零六千萬盧布（按一九二六至二七年的價格）。

這就是託洛斯基派的「發展線日益下降」的情形。

而事實上，我們投了多少資本呢？事實上，我們投於國家工業的資本，在一九二六至二七年為十萬萬六千五百萬盧布；一九二七至二八年為十三萬萬四百萬盧布；一九二八至二九年為十八萬萬一千九百萬盧布；一九二九至三〇年為四十七萬萬七千五百萬盧布（按一九二六至二七年的價格）。

這就是布爾塞維克的發展線日益上升的情形。

根據這個文件，國家工業的生產量，在一九二六至二七年裏，應該增加百分之三一·點六；在一九二七至二八年裏應該增加百分之二二·點九；在一九二八

至二九年要應該增加百分之十五點五；在一九二九至三〇年要應該增加百分之十五。

這就是託洛斯基派的「發展線日益下降」的情形。

而事實上是怎樣的呢？事實上，工業生產量在一九二六至二七年裏增加了百分之一九點七；在一九二七至二八年裏，增加了百分之二六點三；在一九二八至二九年裏，增加了百分之二四點三；在一九二九至三〇年裏，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二；而在一九三〇至三一年裏，將增加百分之四十七。

這就是布爾塞維克的發展線日益上升的情形。

大家都知道，託洛斯基曾在他的「向社會主義走還是向資本主義走」一書中，專門擁護那種發展線日益下降的投降理論。他在這本書中，曾直接了當的說，因為「戰前工業的發展，大體上是在於建築新的工廠」，而「在我們這時候，工業的發展，在於比以前更多利用舊的工廠，使舊有的機器開滿工」，所以「自然，在恢復時期的過程完結的時候，發展的百分數要大大的減低」，同時，他主張「在最近的幾年中，把工業發展的係數，提高得比戰前的百分之六不僅只大二倍，而且要大三倍，甚或大三倍以上」。

這樣，每年的工業發展，便是三乘百分之六。每年一共要發展多大呢？每年一共是增加百分之十八。因此，按託洛斯基派的意見，國家工業生產量每年增加百分之十八，是改造時期中發展步驟加速的最高限度，應該把這個最高限度看成一種理想事業，力求達到其實現。試把託洛斯基派的這個「高明理想」拿出和我們最近三年中生產量實際上的增加（一九二七至二八年增加了百分之二六點三；一九二八至二九年增加了百分之二四點三；一九二九至三〇年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二）相比較，試把託洛斯基派的這種投降哲學，拿來和國家計劃局對於一九三〇年至三一年所預定的工業生產量增加的數目——百分之四十七（這種增加，大過於恢復時期中生產量增高的最大速度）相比較，那我們便能充分的看出託洛斯基派「發展線日益下降」論的全部反動性了，便能看出託洛斯基派對於改造時期的可能性之相信是如何的深刻了。

這就是託洛茨基派現在和我們的右派沒有分別的地方。

毫無疑義的，我們假使不把託洛茨基和右派的“發展線日益下降，，搗打得粉碎，那我們便不能擴大真正的計劃工作，便不能提高速度和縮短建設時期。爲要領導實行黨的總路線，爲要更正並改良五年計劃的建設計劃，爲要提高速度並預防建設上的錯誤，必須首先打毀而且肅清“發展線日益下降，，的反動學說。

中央委員會就是按我以上所說的進行的。

二 領導黨內生活的問題

或許有人想，領導社會主義建設的工作和實行黨總的路線的工作，在黨內是平安無事，無須鬥爭和無須有緊張的意志的。這樣的想法是不對的。事實上，我們的工作，是在與黨內的各種困難作鬥爭，是在於與一般政策方面和民族問題方面各種離開列寧主義的傾向作鬥爭的。我們的黨，不是在一種沒有空氣的空間生存着和行動着的。他是在極複雜的生活中生存行動的，因此就受着周圍環境的影響。而我們的环境，大家知道是由各種階級和社會集團所形成的。我們已經向資本主義份子作廣大的進攻，我們已經使我們社會主義的工業大步前進，我們已經擴大蘇維埃農場和集體農場的建設。但是這些現象，對於剝削者的階級不能一點影響沒有。這些現象，通常引起苟延殘喘的資產階級破產，引起鄉村富農破產，引起城市各小資產階層的行動地盤縮小。凡此一切，都毫無疑義的不能不使階級鬥爭緊張，不能不使正在過着最後生活的階級加緊反抗蘇維埃政權的政策。假使認爲這些階級的反抗，不能在我們黨的隊伍中得着某種反應，那就是笑話。事實上，這種反抗確實是在我們黨的隊伍中取得了自己的反應。我們黨的隊伍中的各種離開列寧主義路線的傾向，就是剝削階級反抗我們所生出來的反應。

要和階級敵人作勝利鬥爭，是否可以同時不反對我們黨裏的各種傾向，不打破這些傾向呢？不可以的。因爲假使在黨內有階級敵人的反應，假使在後

方有不相信我們的事件、並且千方百計要阻礙我們前進的人們，那我們便不能和階級敵人作真正的鬥爭。

因此，和離開列寧主義路線的傾向作鬥爭，是黨的目前任務之一。

為什麼右傾是現在黨內主要的危險呢？因為右傾反映着富農的危險，而富農的危險在現在這時候，在擴大進攻和肅清資本主義根源的時候，是國內的根本危險。

爲了要打毀右傾，消滅“左傾”，肅清道路，使黨能盡可能的團結在列寧主義路線的周圍，中央委員會應該怎樣辦呢？

（甲） 首先就應該結束黨內的託洛茨基主義殘餘，肅清託洛茨基主義理論的遺毒。我們把託洛茨基派已經是好久就打得落花流水了，逐驅了，他已經不成爲我們黨的反對派了。現在的託洛茨基派，是反無產階級的和反蘇維埃的反革命派。他們拚命的把我們黨的事情告訴資產階級。但是託洛茨基理論的殘餘，託洛茨基主義的遺毒，却是還沒有完全從黨裏消滅。所以首先就要消滅這種遺毒。

託洛茨基主義的實質在什麼地方呢？

託洛茨基主義的實質，首先就在於他否認我們蘇維埃國內工人階級和農民用自己底力量建設社會主義的可能。就是怎麼說法？這就是說，假使在最近的將來，沒有勝利的世界革命幫助，那我們就應該對資產階級投降，爲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國讓開道路。這是一種資產階級否認我們國內建設社會主義可能的理論，不過有世界革命勝利等“革命的”，詞句來掩蓋罷了。在這樣一種見解之下，能不能夠動員數百萬工人階級羣衆起來作社會主義競賽，起來用模範隊的方法生產，起來作擴大的進攻，以反對資本主義的份子呢？很明顯地，是不能夠的。假若以爲我們工人階級，幹過了三次革命，還會爲着資本主義打基礎而去作社會主義競賽和用模範隊的方法生產，那是最蠢笨了。我們工人階級的勞動情緒所以這樣高漲，不是爲的資本主義，而是爲的要在蘇聯完全埋葬資本主義，而建設社會主義。假使把我們工人階級對於建設社會主義可能的信仰力除

掉，那就是消滅競賽、勞動情緒的高漲、以及模範隊等等的基礎。

由此的結論，就是：爲要提高工人階級的勞動情緒而發展社會主義競賽，並組織廣大的進攻，便首先就要埋葬託洛茨基派就在我們國內建設社會主義不可能的那種資產階級的理論。

託洛茨基主義的實際，其次就在於他否認吸引農民中的根本羣衆參加鄉村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可能。這是怎麼說法？這就是說，工人階級沒有能力領導農民，去使農民的個人經濟，走上集體化的道路；就是說，假使在最近將來沒有勝利的世界革命來幫助工人階級，農民便要恢復資產階級的制度。這是一種資產階級否認無產階級專政有力量和能夠領導農民走向社會主義的理論，不過有世界革命勝利等“革命的”，詞句來掩蓋罷了。在這種見解之下，能不能夠動員農民羣衆起來作農業集體化的運動，組織羣衆起來進行集體化的運動，消滅富農階級呢？很明顯的是不能夠的。

由此的結論，就是：爲了要組織羣衆起來進行農民的集體農場運動而消滅富農階級，首先就要埋葬託洛茨基主義說連結農民勞動羣衆走上社會主義不可能的那種資產階級的理論。

託洛茨基主義的實質，最後就在於否認黨內鐵的紀律的必要，在於承認黨內有小組織存在的自由，在於承認組織託洛茨基主義黨的必要。就託洛茨基主義看來，蘇聯共產黨應該不是一個統一的、團結很緊地戰鬥的政黨，而是一種許多小組織和小團體，各有自己的中央和自己的出版物等等的混合物。這是怎麼說？這就是宣佈黨內有小團體存在的自由。這就是說，黨內既有政治的小團體存在的自由，那在蘇聯國內就應該有各種政黨存在的自由，換句話說，就是應該有資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這是一種資產階級承認黨內有小團體的自由，直至承認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內可有各種政黨存在的理論，不過有“黨內德謨克拉西”，有“改良黨內統治，等等的詞句作掩蓋罷了。那種智識階級各小團體的派別鬥爭自由，這不是黨內德謨克拉西，而黨所進行的廣大地自我批評和黨員羣衆的偉大積極化，才是真正的黨內德謨克拉西的表現，——這都是託

洛茨基主義所不瞭解的。在這種對於黨的見解之下，能不能夠保證黨內鐵的紀律，保證黨的一般的一致，以便和階級敵人作勝利的鬥爭呢？很明顯的是不能夠的。

由此的結論，就是：為了保證黨的鐵一般的一致，並保證黨內無產階級的紀律，首先便當埋葬託洛茨基主義在組織上的理論。

總之，託洛茨基主義的實質，就是他的實際內容是投降，他的形式是掩蓋和宣傳投降內容的“左的”的詞句和“革命”式的冒險空談。

託洛茨基主義的這種兩重性，是反映着小資產階級破產地位的兩重性：破產的小資產階級，不能忍受無產階級專政的“壓制”，拚命企圖或者“一下”，就跳到社會主義，以免得破產（由此就產生政策上的冒險主義和急性病），或者假使這個不可能，那就是對資本主義隨便作什麼讓步都來（由此就產生政策上的投降）。

託洛茨基主義的這種兩重性，就能說明為什麼託洛茨基主義“激烈”，攻擊右派，但結果總是同右派聯合，並和沒有假面具的投降派聯合。

黨內過去在集體農場運動方面的“左的”，過火，又是什麼東西呢？這是在實際上復活託洛茨基主義的慣例，復活託洛茨基主義對於中農關係的某種企圖，固然這種企圖是不覺悟的企圖。這種“左的”，過火，是列甯所謂“太用行政手段，一個錯誤政策的結果。這就是說，我們的少數同志，為集體農場運動的成功所眩目，對於集體農場建設的問題，不拿建設者的眼光去看，而主要的是拿行政者的眼光去看，結果就做出許多大錯誤來。

我們黨裏有種人，以為不應該打擊“左的”，冒失鬼。不當苛待我們工作的同志，不當妨礙他們的熱心，甚至因為這個熱心，以至發生錯誤，都不要去反對他們。同志們，這是笑話。祇有那些祇願意順水推舟的人們才能這樣說。這種人是永遠不能領會列甯主義路線的，因為他們不知道當環境需要逆流而行的時候，當黨的利益需要逆流的時候，那時候是需要“逆流而行”的。黨所以能夠把許多同志領回到正確的道路，黨所以能糾正錯誤，且達到許多成功，就是

因為他爲了實行黨的總路線，曾經堅決的起來反對當時的潮流。這就是實際上的列甯主義，是領導工作中的列甯主義。

所以我以爲如果我們沒有打破“左的，過火，那我們在集體農場運動中，便不會有如現在所得到的成功。

這就是和託洛茨基主義的殘餘，並及其實際上的遺毒作鬥爭的情形。

以布哈林，賴可夫與湯姆斯基爲首領的右派機會主義的問題，却稍許有些不同。

在說到右派的時候、不能說他們不承認蘇聯有建設社會主義的可能。他們是承認這種可能的，這就是他們與託洛茨基派不同的地方。但是右派的不幸，就在於當他們形式上承認一個國家內有建設社會主義可能的時候，他們却不願承認建設社會主義所必須的鬥爭途徑和方法。他們却不願承認各方去發展工業，是根據社會主義原則以改造全部國民經濟的中心任務。他們不願承認與資本主義份子作不調和的鬥爭，不願承認向資本主義擴大社會主義的進攻。他們不明白這些途徑和方法是整個系統的辦法，若沒有這些辦法，便不能在我們國家內維持無產階級專政和建設社會主義。他們以爲建設社會主義的事情，可以是偷偷地，自流地，沒有階級鬥爭，不向資本主義的份子進攻。他們以爲資本主義的份子，或者是不令人注目地自己死亡，或者將生長到社會主義。但是歷史上沒有這樣破天荒的事實，所以，右派實際上是走上否認我們國家內有建設社會主義底可能的觀點。

在說到右派的時候，也不能說他們否認吸引根本農民羣衆參加鄉村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可能性。他們不否認，而是承認這種可能的，這也是他們與託洛茨基派的不同點。但是他們形式上承認這種可能，同時却否認吸引農民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所必須的一些途徑和方法。他們不願承認蘇維埃農場和集體農場是吸引根本農民羣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主要方法和“大道”，。他們不願承認假使不實行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便不能根據社會主義的原則來改造鄉村。他們以爲可以偷偷的，自流的，沒有階級鬥爭的，僅只用一個供給和消費

的合作社，就能把鄉村領導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因為他們相信富農自己會生長到社會主義。他們以為現在的主要問題，不在於工業發展的高的速度，也不是在於蘇維埃農場和集體農場，而在於“開放，市場上的無政府狀態，並“去掉，對於鄉村個人經濟，直至資本主義份子的“壓迫，，但因富農不能生長到社會主義，而“解放，市場，就是武裝富農和解除工人階級的武裝，所以，結果右派事實上是走上否認吸收根本農民羣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觀點。

所以右派與託洛茨基派的公鷄式的鬥爭，結果常是右派與託洛茨基派在後台彼此間開聯合的談判。

右派機會主義的根本不幸，就在於他與列甫主義階級鬥爭的瞭解分裂了，而滾上了小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觀點。

假若右傾在我們黨內得勝，那無疑的就將完全解除工人階級的武裝，而使鄉村的資本主義份子武裝起來，且蘇聯國內資本主義恢復的可能就要增大了。

右派不同意組織另一政黨的觀點，這亦是他們與託洛茨基派不同的地方。右派的首領們，曾經公開的承認自己的錯誤，且已在黨的面前屈服了。但是假使因此就以爲右派主義已經埋葬了，那是不對的。右派機會主義的力量，不是由這種情形來決定的。右派機會主義的力量，是在於一般資本主義份子方面對於黨的影響的力量，特別是富農方面對於黨的影響的力量。正因為右傾是反映着垂死的階級各根本份子的反抗，所以右傾是我們黨裏現在的主要危險。

所以黨曾經認爲必須與右傾作堅決的不調和的鬥爭。

毫無疑義的，假使不與右傾作堅決的鬥爭，假使不使右傾底領導份子孤立，那我們就能動員黨與工人階級的力量，動員貧農與中農羣衆的力量，以舉行社會主義的廣大進攻，以組織蘇維埃農場和集體農場，以恢復我們的重工業，並消滅富農階級。

這就是黨內“左傾，，和右傾的各種問題。

現在的任務，就在於以後還要締結兩條戰線上不調和的鬥爭，反對代表小資產階級過激主義的“左，，派，同時還要反對代表小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右

派。

現在的任務，是在於以後還要繼續與黨內的調和份子作不調和的鬥爭，因為這些份子不明白，或假裝着不明白在兩條戰線上堅決鬥爭的必要。

(乙)在講到反對黨內各種傾向的時候，如果不說一說黨內在民族問題方面所有的各種傾向，那麼這幅圖畫是不完滿的。我所指的，第一就是大俄羅斯的愛國主義傾向，第二就是地方民族主義傾向。這些傾向是沒有“左，傾和右傾那麼現形和厲害的。可以把他們叫作是一種跛腳的傾向。但是，這還不是說這些傾向不存在。不是，這些傾向是存在的，而且主要的是這些傾向正在增長起來。這是毫無疑義的。因為階級鬥爭一般的緊張局面，不能不使民族上的衝突也相當的緊張起來，而這種衝突在我們黨裏是有反映的。所以值得揭露這些傾向的面目。

在我們現在的條件之下，大俄羅斯的愛國主義傾向的實質在什麼地方呢？

大俄羅斯愛國主義傾向的實質在於企圖不理會民族間語言文字和文化風俗的不同點；在於企圖準備消滅各民族共和國和區域；在於企圖破壞民族平等的原則，並輕視黨在機關、出版物、學校、以及其他國家和社會組織上民族化的政策。

有這種傾向的人，在這個問題上的出發點是：因為在社會主義勝利之下，各民族應該聯合成爲一個，而他們的各種語言文字，應當變成大家統一的語言文字，所以現在到了可以消滅民族間的各種不同點的時候，應該放棄幫助從前被壓迫的各民族發展自己的文化的政策了。他們這樣主張，好像是根據列甯所說的話，但是他們把列甯的話引用得不正確，並且，有時候簡直是曲解列甯和侮辱列甯。列甯說過，在社會主義之下，各民族的利益是聯合成一個的，是不是可以由這一點就得出結論說，爲了國際主義的利益，消滅各民族共和國和區域的時候到了呢？列甯在一九一三年同猶太工會派辯論的時候，曾經說民族文化口號，是一種資產階級的口號，——是不是可由這一點，就得出結論說，爲了國際主義的利益，消滅蘇聯各種民族文化的時候到了呢？列甯曾經說過，

民族的壓迫和民族界限，在社會主義之下是要消滅的，——是不是可以由這一點，就得出結論說，爲了國際主義的利益，放棄估計蘇聯各民族特點的政策，而採取民族同化政策的時候到了呢？由此類推下去，還可設許多問題。

毫無疑義的，因民族問題中的這個傾向有國際主義和列寧的名字作假面具以掩蓋自身的面目（這是大俄羅斯民族主義最精巧處），所以他是最危險的一種形式。

第一，列寧從來沒有說過在一個國家範圍之內，社會主義還未在全世界勝利以前，各民族間的不同點應當消滅，而各民族的语言文字應該合而爲一個大家共同的語言文字，恰恰相反，列寧曾經說：“各民族間和國家間民族和國家的不同點，就是在全世界範圍內無產階級專政實現以後，還要很久很久的存在，，（“列寧全集，第十七卷第一七八頁）。假使忘記了列寧這個根本的指示，那麼，怎能引證列寧的話呢？

不錯，有一個過去是馬克思主義者，而現在是叛徒，是改良派的考茨基先生，他有一種說法，是和列寧告訴我們的完全相反。考茨基肯定的說，如果上世紀中葉在奧大利和德意志統一的國家內無產階級革命勝利，那麼，結果就要形成一個共同的德國話，並使捷克人和德國化，因爲“僅僅從束縛下解放出來的交換的力量，僅僅德國人種所帶來的現代文化的力量，就足夠使捷克人的小資產者、農民和無產者變成德國人，而這些小資產者農民和無產者自己的民族是什麼東西也不能給他們的，，（見“革命與反革命，，一書德文版的序言）。這種“主張，，很明顯是與考茨基的社會愛國主義完全相符合的。我於一九二五年在東方民族大學的講演裏，就會反對考茨基這種觀點的。難道德國社會愛國派考茨基那種反馬克思主義的胡說，對於我們馬克思主義者，願意始終爲國際派的馬克思主義者的人還能引起某種同情不成嗎？誰是對的，考茨基，還是列寧？如果考茨基是對的，那麼怎樣解釋這一件事實，就是比落後的民族，如白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他們對大俄羅斯人比捷克人對德國人還要接近，爲什麼他們不因蘇聯無產階級革命勝利的結果而俄國化，反而復興且發展成了獨立的

民族呢？又如土爾克敏、基爾基茲、烏茲別克、塔齊克等等民族（且不說格魯精、阿爾緬、阿席羅尙及其他），雖然是落後的，但不僅沒有因蘇聯社會主義勝利而俄國化，反而復興且發展成了一些獨立的民族，——這件事實，又怎樣解釋呢？傾向於大俄羅斯民族主義的人，爲着要達到“十足的”，國際主義，却是落到了考茨基的社會愛國主義，這還要證明嗎？這些有傾向的人，歡喜在一個國家的範圍內，在蘇聯的範圍內，有一個共同的語言，他們實際上就是企圖恢復以前佔過統治地位的特權，就是大俄羅斯文化的特權，這還不明白嗎？這與國際主義又有什麼關係？

第二，列甯從來沒有說過民族壓迫的消滅和各民族利益合而爲一就等於消滅民族間的各種不同點。我們已經消滅了民族的壓迫。我們已經消滅了民族的特權，並建立了民族的平等。我們已經消滅了舊時代的國界，消滅了蘇聯內部各民族間的國界線和關稅等障礙物。我們已經建立起蘇聯各民族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利益的一致。但這是不是說，我們因此就消滅了各民族間的不同點，即民族語言、文化風俗等等的事情呢？很明顯的，沒有消滅。但是各民族間的不同點（語言、文化、風俗等等）既還存在，那麼在現在的歷史時期，要求消滅民族共和國和區域，就是一種反動的要求，是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利益的要求，——這難道還不明白嗎？這些有傾向的人，明白不明白現在消滅民族共和國和區域就是使蘇聯內部千百萬民衆，不能用自己的語言文字受得教育，不能有自己語言的學校、法庭、辦事機關、社會的和其他的組織，以及不能接近社會主義的建設呢？這些有傾向的人，爲了要達到“十足的”，國際主義，却落到了反動的大俄羅斯的愛國主義者手裏，忘記了並完全忘記無產階級專政時期中文化革命的口號，即對於蘇聯內所有的民族，無論是大俄羅斯人，或非大俄羅斯人，具有同樣意義的口號，——這還不明白嗎？

第三，列甯從來沒有說過發展民族文化的口號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之下是反動的口號。恰恰相反，列甯常說，要幫助蘇聯各民族發展他們自己的文化。在列甯指導之下，在黨的第十次大會上，曾經草就並通過關於民族問題的決

議案，這個決議案中說：

“黨的任務，是在於幫助非大俄羅斯民族的勞動羣衆，趕上已經往前發展的俄國中心地點，幫助他們：（一）發展並鞏固他們的蘇維埃政權，他的形式要符合於這些民衆的風俗等條件；（二）發展並鞏固他們自己語言文字所有的法庭、辦事機關、經濟機關、政治機關，這些機關應由本地明白地方民衆心理和風俗的人員組成之；（三）發展他們用自己的語言文字創辦的刊物、學校、戲院、娛樂事業，以及其他一切的文化教育機關；（四）用他們的語言文字開辦並發展一般科學的教育，並帶着職業和技術性質的教育。”

這樣，列寧是完全主張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來發展民族文化這個口號的，——這難道不是明顯的事實嗎？

否認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發展民族文化的口號，就是否認提高蘇聯內部各種非大俄羅斯民族文化程度的必要，就是否認對於這些民衆實行一般的強迫教育之必要，就是把這些民衆交給反動的地方民族主義者在精神上去奴役他們，——這難道還待證明嗎？

列寧確實曾經把資產階級統治下的民族文化的口號，看作是反動的口號。但這難道不是正確的嗎？試問在民族資產階級統治之下的民族文化是什麼東西？內容是資產階級的，而按形式是民族的文化，他的目的是拿民族主義的毒藥去蒙蔽羣衆，去鞏固資產階級的統治。試問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的民族文化是什麼？內容是社會主義的，而按形式是民族的文化，他的目的是拿國際主義來教育羣衆，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假使不與馬克思主義分裂，怎能把這兩種原則上不同的現象混爲一談呢？列寧反對資產階級制度下民族文化的口號，這是打擊民族文化的資產階級內容，而不是打擊他的形式，——這難道不是明顯的事實嗎？假使以爲列寧曾經把社會主義文化，看作是一種不帶民族色彩，沒有任何民族形式的文化，那是錯誤的。猶太工會派確實曾經有個時候給列寧戴上了這隻一頂大帽子。但是從列寧的“全集”中，可以看出列寧曾經堅決的反

對這種污蔑，並且痛斥這種說法的不正確性。難道我們中間那些有傾向的人，也想學一學猶太工會派的樣子不成？

把上面一切講過之後，那些有大俄羅斯民族主義傾向的人，還有什麼理由可說。

除了裝模作樣的大搖國策主義的旗幟和污蔑列寧以外，沒有別的。

傾向於大俄羅斯愛國主義的人是很錯誤的，因為他們以為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時期，是民族文化崩潰和消滅的時期。事實上，却是相反。事實上，蘇聯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的建設時期，正是民族文化發揚的時期，這種文化的內容是社會主義的，而形式上是民族的。他們大概是不懂得民族文化的發展因為用本地文字規定并實行初等普遍強迫教育的關係將更有力量地伸張起來。他們不明白，只有在民族文化發展的條件之下纔能真正使落後的民族一同參加建設社會主義的事業。他們不明白，這就是幫助并擁護蘇聯各民族文化發展的列寧政策的根本所在。

或許有人以為很奇怪，我們是主張來把各種民族文化聯合成爲一個文化（既是照形式，又是照內容），並是用一種語言文字的，而爲什麼同時，在現在無產階級專政時期，却又主張發揚各種民族的文化。但這是沒有什麼奇怪的。要給各民族文化發展和伸張起來，顯出他所含的一切可能。以便造成他們聯合成爲一個總文化，用一個總語言文字的條件。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在一個國家內，發展那照形式是民族的，而照內容是社會主義的各種文化，以便當無產階級在全世界勝利時，而社會主義成爲風俗習慣的時候，把他們聯合成爲一個總的社會主義的（照形式而又照內容）文化，用一個總的語言文字，——這就是民族文化問題上，列寧主義觀點的辯證方法的所在。

或許有人以為這種觀點是“自相矛盾”的。但是難道在國家的問題上，我們沒有同樣的“矛盾”，嗎？我們是主張國家死亡的。但是我們同時又主張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這種專政是直到如今，許多國家政權中之最堅有力的一個政權。國家政權的高度發展，爲的是要準備條件，以便使國家政權死亡，——這就

是馬克思主義的公式。這是“自相矛盾，嗎？是的，這是“自相矛盾，的。但這種矛盾，是生活的矛盾，這正完全反映着馬克思的辯證法。

再，譬如在民族有自決權（一直到分立權）的問題上列寧的觀點。列寧有時候把民族自決的問題，寫成這麼一個簡單的公式：“爲了聯合而分開，。你們試想一想——爲了聯合而分開。這簡直像一種怪話。但是這個“矛盾，式的公式，却反映着馬克思辯證法的日常真理，布爾塞維克由這個辯證法而得到了攻破民族問題方面許多最堅固的砲台的可能。

關於民族文化問題的公式，也是這樣：在一個國家內無產階級專政的時期中，發展民族文化和語言文字，爲的是要準備條件，以便社會主義在全世界勝利的時期，消滅各種文化，而使他們聯合成爲一個總的社會主義的文化和一個總的語言文字。

誰不瞭解我們過渡時候的這個特性和“矛盾性，，誰不瞭解這種歷史過程的辯證規則，那照馬克思主義看來，他就是一個死了的人。他們那些有傾向的人們的不幸，就是在於他們不瞭解，而且不願瞭解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

這就是關於大俄羅斯愛國主義的傾向底事情。

不難明白，這種傾向，是反映以前有過統治地位的大俄羅斯民族中正在過着最後殘喘的階級要恢復自己已經失掉底特權的企圖。

由此，便可以知道大俄羅斯愛國主義是黨內民族問題方面的主要危險。

地方民族主義傾向的實質在什麼地方呢？

地方民族主義傾向的實質，在於他們企圖閉關在自己民族的家裏，在於企圖抹殺自己民族中所有的階級矛盾，在於企圖用離開社會主義一般建設事業的方法保護自己，以反對大俄羅斯的愛國主義，在於企圖不看見使各民族勞動羣衆接近并聯合的蘇聯，而只看見能够使各民族彼此隔離的現象。

地方民族主義的傾向，是反映着從前被壓迫民族中正在死亡的各階級對於無產階級專政制度的不滿意，反映着這些階級要起來成自己民族的國家，并在這個國家裏設立自己階級底統治的企圖。

這個傾向的危險，在於使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復活起來，削弱蘇聯各民族勞動羣衆的一致，並幫助國外武裝干涉的冒險家。

這就是地方民族主義傾向的實質。

黨的任務，是在與這種傾向堅決的鬥爭，以保證在蘇聯各民族勞動羣衆中實行國際教育所必須的條件。

這就是我們黨內一切政策方面“左傾，與右傾的情形，以及民族問題方面各種傾向的情形。

這就是我們黨內的狀況。

現在當黨爲總路線而鬥爭得了勝利的時候，當我們黨的列甯主義路線在各方面得勝的時候，許多人大概都忘記了那些有各種傾向的人給我們的工作所造成的困難。不僅是這樣，還有少數帶有市儈情緒的同志，一直到現在，都還想可以與那些有傾向的人不作鬥爭。這些同志，不用說，是處在復業的迷途中。只要回憶一下托洛茨基派和右派的藝術，只要回憶一下在過去時期中與各種傾向作鬥爭的歷史，便不難明白這種黨內市儈情緒的無聊。毫無疑義的，假使我們不鎮壓那些有傾向的人並在公開的戰鬥中把他們擊破，那我們便不能得到今天我們黨所以可以自豪的一些勝利。

我們的黨，是在與離開列甯主義路線的各種傾向作鬥爭的過程中長大的。在這個反對傾向的鬥爭中，黨把自己的行列，鑄成了列甯主義的一致。現在誰也不能否認一件不容爭論的事實，就是我們的黨，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鞏固的團結在自己的中央週圍。大家都不能不承認，現在的黨比任何時候都要一致和團結得鞏固。第十六次大會是我們黨少有的一次大會，因爲在這次大會上，沒有形成了而團結一致的、能够把自己的路線拿來與黨的總路線對立的反對派。

爲什麼黨能够得到這樣大的成功呢？

黨所以能得到這樣偉大的成功，是因爲他在反傾向的鬥爭中，時時執行着原則上的政策，什麼時候也沒有做過台後勾黨和外交把戲的事情。

列甯說過，原則上的政策，是唯一正確的政策。我們所以在反傾向的鬥爭

中能取得勝利，就是因為我們很忠實而澈底的執行了列甯底這個選囑。（鼓掌聲）

★

★

同志們，我現在要講完了。

一般的結論是怎樣呢？

我們在過去時期中，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各方面，都得到了許多偉大的成功。我們所以能夠得到這些成功，是因為我們會高舉着列甯的偉大的旗幟。我們果想要勝利，以後還是應該高舉着列甯的旗幟，保持他的純潔。（鼓掌聲）

這就是一般的結論。

我們打着列甯的旗幟，在十月革命戰鬥中得到了勝利。

我們打着列甯的旗幟，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鬥爭中，得了偉大的成功。

我們打着列甯的旗幟，也定能在全世界無產階級的革命中得到勝利。

列甯主義萬歲！（繼續很久的鼓掌聲。全場歡呼。）

結 論

同志們！在討論了中央廣告之後，在大會對右傾反對派過去的首領們底發言表示了態度之後，我在自己的結論裏就沒有多的話可說了。

我在自己的報告中已經說過，黨的第十六次大會是我們黨史上少有的一次大會，在這次大會上，沒有多少已經形成的反對派能夠提出自己的路線來，並用他與黨的路線對抗。你們看見了，實際上果然是這樣。在我們這次大會上，在黨的第十六次大會上，不但沒有已經形成的反對派，甚至就沒有一小部份人，或幾個單個的同志，認為自己應該站到這個台上來說黨的路線是不正確的。很明顯的，我們黨的路線是唯一地正確的路線，而且他的正確性，竟這樣的明顯和無可爭論，就是，連右傾反對派過去的首領們，也認為在自己的發言中，應該毫不動搖地指出黨一切政策底正確性來。

既然這樣，很明顯地，就用不着再講我在報告中所說的那些事情底正確性。沒有這樣的必要，因為黨的路線顯然正確，現在用不着在這次大會上再進一步的去擁護他了。但雖是這樣，我却沒有拒絕作結論，這就是因為同志們寫到主席團來一些紙條子，我想，簡單的回答一下並不是多餘的，然後再關於右傾反對派過去的首領們底發言說幾句話。

大部份的條子，都是關於一些次要的問題。譬如：為什麼在報告中沒有講到瓷馬問題，——可不可在結論中講幾句話（笑聲）；為什麼在報告中沒講到建築房屋的問題，——可不可在結論中講幾句話；為什麼在報告中完全沒講到農村電氣化的問題，——不能在結論中關於這個問題講一點嗎，諸如此類的問題。

我應該對這些同志說，我在自己的報告中沒能把國民經濟的一切問題都包括在內。不僅是不能，並且我也沒有這個權利，因為我沒有權去侵犯古培錫夫

同志和亞可夫烈夫同志報告的範圍，他們應該向你們報告工業和農村經濟的各種具體的問題，實際上，假如在中央委員會的報告中，把所有的問題都講到了，那麼在關於工業和農村經濟報告裏，報告人應該講些什麼呢？（台下喊：對呀！）

特別是關於農村經濟電氣化的條子，我應該指出來，寫這條子的人自己有些不正確的地方。他認為我們已經“完全走到了，農村經濟電氣化的時期，認為人民農業委員部是不讓這個事業發展，認為列甯對這個問題會有另一種想法等等。同志們！這完全不對，不能說我們“完全走到了，農村經濟電氣化的時期。假使我們真已經完全走到了農村經濟電氣化的時期，那末，我們現在就必已經有了十個或十五個有電氣化的農村經濟生產的區域。可是你們都很知道，我們的情形還完全不是這樣。現在關於農村經濟電氣化的問題，只能說我們的電氣化還在實際研究的階段上。列甯也是這樣看這件事情，他獎勵農村經濟電氣化的試驗。有些同志以為拖拉機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現在已經是由拖拉機過渡到農村經濟電氣化的時代了。這當然是空談和妄想。還應當把這樣同志教育一下。人民農業委員部正是這樣對付這些同志。因為，寫這個紙條的同志，對人民農業委員部的不滿意，不能認為是有根據的。

第二種條子是關於民族問題的。其中有一個問題我認為是最有趣味的。一個同志把我在第十六次大會上關於民族語言問題的言論，拿來和我一九二五年在東方勞動大學的報告中的言論對比，並找出這裏有些不清楚的地方。須要解釋。紙條上寫着說：你當時曾反對過在社會主義時代（在一國裏）消滅各民族的語言，和創造一個共同的語言底理論（考茨基的理論），但現在，在第十六次大會上，在自己的報告裏卻說，共產主義者贊成把各民族的文化和語言鑄成一個共同的文化語言（當社會主義在全世界勝利的時代），——這裏不是有些不清楚的地方嗎？

我想這裏沒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沒有任何的矛盾。在一九二五年的時候，我在自己報告中，曾反對過考茨基底民族愛國主義的理論。根據他這個理論

，上世紀中葉奧大利德意志聯邦中無產階級革命勝利後，必定要使各民族歸化一個德意志民族，共同用一個德意志語言，並使捷克民族德意志化。我曾根據蘇聯社會主義勝利後國內生活中的事實，——推翻這種理論的事實，反對了這種馬克思主義和反列寧主義的理論。並且我現在還是反對這種理論，這從我在這次第十六次大會上的報告裏，便看得很明顯。我反對這種理論，因為這種各民族歸化起來，例如把蘇聯歸化一個統一的大俄羅斯民族，用一種統一的大俄羅斯語言的理論，是民族愛國主義的理論，是反列寧主義的，是和列寧主義的基本原則矛盾的理論。列寧主義的原則，認為民族的區別，在最近時期中不能消滅，甚至在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成功以後，還要存在很久。至於講到各民族文化和各民族的語言更遠的前景，我從來都堅持並現在還繼續地堅持着列寧的意見，認為社會主義在全世界的範圍內勝利的時期，當社會主義鞏固起來並深入於生活中的時候，各民族的語言不可避免地要歸化成一種統一的語言，這種語言當然不會是大俄羅斯的，亦不會是德意志的，將是某種新的語言。關於這點，我在第十六次大會上在自己的報告中，已經很確定地講過了。

這還有什麼不清楚的地方，還有什麼需要解釋呢？

●很明顯地，寫這個紙條子的人們，至少自己并未十分了解兩件事情。

首先，他們自己沒弄清楚一件事實，就是我們蘇聯已經走入了社會主義時期，但是，雖然我們走入了這個時期，各民族却不但不衰亡，而且反到發展和興旺起來。實際上，我們是否已走入了社會主義時期呢？我們這個時期通常都叫做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在一九一八年的時候，他就被叫做過渡時期。當時列寧在他的有的名文章‘左派幼稚病’裏，首先分析了這個時期和他的經濟生活底五種結構。現在，一九三〇年，這些經濟結構中有幾個已衰老而走向滅亡了，而其中有一種，就是工業和農村經濟間的新結構，正以空前未有其速度發展着，這個時期還叫做過渡時期。能不能說，這兩個過渡時期是一樣的，根本上彼此沒有差別呢？很明顯地是不能。在一九一八年裏，我們國民經濟的狀況怎樣呢？當時所有的是被毀壞了的工業，焚毀了的東西，沒有大

批的蘇維埃集體農場，城市“新興”，資產階級和鄉村富農的生長。但現在的情形怎樣呢？現在，我們有恢復起來的和改造了的社會主義工業，我們有極多的集體農場和蘇維埃農場，他們所耕種的地面，只按春耕面積佔全蘇聯底播種面積的百分之四十，城市裏有垂死的“新興”，資產階級，鄉間有垂死的富農。那時是過渡時期。現在也是過渡時期。可是他們中間有天淵之別。誰也不能否認，我們正在開始消滅最後一個厲害的資產階級，即富農階級。很明顯地，我們已經走出了從前所說的那種過渡時期，走進了直接的在整個戰線上發展着的社會主義建設的時期。很明顯地，雖然還建不成社會主義社會和消滅階級區別的時期還遠，但因為現在社會主義部份已經握住了整個國民經濟的一切經濟命脈，所以我們是已經走進社會主義的時期了。雖是這樣，但各民族的語言不但不衰亡和不鑄化成一個統一的語言，而恰恰相反，各民族的文化 and 語言却發展和興盛起來。因此，在一個國家的範圍內，在擴大地建設社會主義的時期，在一個國家裏建設社會主義的時期，各民族語言的衰亡和鑄化各民族語言成爲一個統一的語言底理論是不正確的是反馬克思主義、反列寧主義的。難道這還不明白嗎？

第二，寫這條子的人們不了解，各民族語言的衰亡以及將他們鑄化成一個統一的語言底問題，並不是一國內部底問題，也不是社會主義在一國之內勝利的問題，而是國際的問題，是社會主義在國際範圍內勝利的問題。寫這條子的人們不了解，不能把社會主義在一國裏勝利和社會主義在國際範圍內的勝利混爲一談。列寧說過，民族的區別，當無產階級專政在國際的範圍內得着勝利以後，還要存在很久，這話是很有意思的。此外，還要注意與蘇聯許多民族有關係的一種情形。蘇維埃聯邦裏有個烏克蘭，但別個國家裏又有一個烏克蘭。蘇聯有個白俄羅斯，但別個國家裏也有個白俄羅斯。他們是否想不到這些特殊條件，便能解決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的語言問題呢？再來看看沿蘇聯南方邊界居住着的民族，從阿席爾罷特尙到哥薩克斯坦和布拉特蒙古。他們都和烏克蘭、白俄羅斯的情形一樣。很明顯地，這裏也要注意這些民族發展的特殊條件。

還不明白呀，這些類似的，與各民族文化和各民族語言的問題有關係的問題，在一個國家的範圍內，在蘇聯的範圍內，是不能解決的？

同志們，這就是一般的民族問題，特別是對於上面所講的紙條上所問的民族問題。

現在讓我來對於右派過去的首領們的發言講幾句話。

大會向右派過去的首領所要求的是什麼？是要他們自己挺胸領足地自己悔恨自己嗎？當然不是！我們黨和我們黨的大會任何時候也不會要求黨員們怎樣地降低自己的身分。大會向右傾反對派過去的首領要求三件事：第一，他們自己應當深刻了解，黨的路線和他們所擁護的路線中間有一條鴻溝，他們所持的路線，客觀上不是走向社會主義底勝利，而是走向資本主義底勝利（台下喊：對呀！）；第二，要他們指出來這個路線是反列寧主義的路線，並要他們公開地和誠懇地脫離他（台下喊：對呵！）第三，要他們起來踴躍地同我們共同的反對一切的和各種的右傾份子。（台下喊：對呀！熱烈地鼓掌）

這就是大會向右傾反對派過去的首領們所要求的。

在這些要求裏，有沒有什麼會使那些還想成爲一個布爾塞維克的人們感覺得是降低身分的地方呢？

很明顯地，這裏沒有，並且也絕不會有什麼降低身分。每個布爾塞維克，每個革命家，每個自愛的黨員，都可懂得，只有他公開地誠懇地承認那些明顯的、無容爭辯的事實，他在黨的面前才得被人器重，才得進步。

因此我想起湯姆斯基同志所說的話，他說別人想把他送到戈薩波波去，強迫他吃蝗蟲和野蜜，這簡直是鄉下要把戲的人信口開河所說的笑話，根本一點革命者的價值都談不上（笑，鼓掌）。

有人會問，爲什麼大會又從新向右傾反對派提出這些要求來？這些要求，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上會對他們提出過一次了，難道這不是事實吧？當時右傾反對派過去的首領們曾接受了這些要求，放棄了自己的路線，承認了自己的錯誤，承認了黨路線的正確，應許與黨一起和右派奮鬥，難道

這不是事實嗎？是的，真有這些事實。那麼，到底是怎回事呢？事情就在他們沒有履行自己允許，他們沒有完成，並現在也沒有完成七個月以前自己所約定的義務。（台下喊：對呀！）烏格蘭諾夫同志在自己的發言中會說，他們沒有完成自己向十一月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所允許執行的義務，這話是完全對的。

這就是他們在這次大會上不受人信任的原因。

因此大會才重新向他們提出自己的要求。

賴可夫、湯姆斯基和烏克蘭諾夫三位同志這裏訴冤，說大會對他們不信任。但這是誰的罪過？這是他們自己的罪過。誰不盡自己的義務，誰就不要想被人相信。

他們，右傾反對派過去的領袖，有沒有過可能和機會來履行自己的允許和把過去的一切完全停止呢？當然有過。但他們在這七個月裏，利用這些可能和機會作了些什麼呢？什麼都沒有作。

不久以前，賴可夫同志曾參加了烏拉爾的大會。這自然是他糾正自己的錯誤最好的機會。可是怎樣？他不去公開地和堅決地拋棄自己的動搖，却在那裏詭辯和耍手腕。當然，烏拉爾的大會不能不給他一個打擊。現在試把賴可夫同志在烏拉爾大會上的演說詞和他在第十六次大會上的演說詞拿來比較一下。兩者之間有一條鴻溝。他在那裏詭辯和耍手腕，與烏拉爾的大會宣戰。在此地他却想公開地，大聲地承認自己的錯誤，企圖與右傾反對派決裂，允許幫助黨來和各種傾向鬥爭。這樣的變化是那裏來的，並怎樣解釋呢？很明顯地，這就是因為在黨內為右傾反對派過去的首領們造成了一種可怕的局面。因此，一點也不奇怪，就使大會得了這樣一個確定的感想：若不逼迫這些人一下，從他們那裏就什麼都得不到。（哄堂大笑，繼續不斷的鼓掌。）

烏格蘭諾夫同志有沒有過可能來完成他對中央委員會十一月全體會議的允許呢？是的，有過。我要說的就是不久以前，他在莫斯科電氣工廠的一個非黨大會上的演講。可是怎樣呢，他不像一個布爾塞維克在那裏發言，而對黨的路線長吁短嘆起來。當然，他因為這個緣故，從工廠支部那裏得到了應受的打擊

•現在試把他那次的演講，和他在今天“真理報”，上所發表的聲明書來比較一下，就看兩個當中有一條深淵相隔。這種變化是什麼緣故呢？這同樣是因為在右傾反對派過去的領袖們的周圍，已經形成了一種威嚇他們的環境。如果大會從此得出一個教訓：是因為沒有逼迫這些人，所以從他們那裏就什麼都得不到。這又有什麼奇怪的呢？（全場大笑。鼓掌）

或者，譬如湯姆斯基同志吧。不久以前，他曾在吉夫利斯參加了高加索的大會。當然在那時候他有機會來贖自己的罪過。可是怎樣呢？他在自己的講話中，講到了蘇維埃農場，集體農場，協作社，文化革命等等，諸如此類的東西，可是最主要的一點，就是關於他自己在蘇聯職工中央蘇維埃中的機會主義工作，他却一字不提。這就叫做執行他對黨所應盡的義務！他會欺騙黨，但不知道有幾百萬隻眼睛在監視我們當中的每一個人，誰也欺騙不過的。現在請把他在吉夫利斯的報告，和他在這次大會上直接地、公開地、承認他指導蘇聯職工中央蘇維埃的機會主義錯誤的演說詞比較一下，就看見，他們中間也有一條鴻溝。這種區別將怎樣解釋呢？這同樣是因為在右傾反對派過去的首領們周圍，形成了一種威嚇他們的環境。因此，如果大會設法好好地強迫他們一下，使他們能完成自己的義務，這又有什麼奇怪呢？（鼓掌。哄堂大笑。）

這就是大會對這些同志還不相信的原因。

為什麼右傾反對派過去的首領們，有這種比奇怪還奇怪的行動呢？

為什麼在過去這個時期中，他們從來不會想，不要用外面的壓力而自願地來完成自己的義務呢？

這至少有兩個原因。

第一，他們還不完全相信黨的路線是正確的，於是便輕巧地幹一點小組的工作，暫且等待差，候着一個適當的機會，好重新出來公開地反對黨。他們在召集小組的會議，討論黨的問題的時候，總是推延：等到春天，或者黨的播種運動要失敗，——那時我們再好好地打擊他一下。可是，春天並沒給他們一點好處，因為播種運動進行得很順利。於是他們又從新推延：且等到秋天

，黨的收買糧食的工作或者失敗，那時我們再好好地打擊中央委員會一下。可是到了秋天，他們又大失所望。但因為每年都有一個春天和一個秋天，於是右傾反對派過去的領袖們便繼續的等候着，不是希望春天，就是希望秋天。（全場哈哈大笑）

這樣坐着等候一季又一季，企圖等到一個適合的機會打擊黨，自然他們就不能盡自己的義務。

最後，第二個原因，就是右傾反對派過去的首領們不瞭解布爾塞維克的態度，不相信這種態度，並簡直是一點都不承認有什麼東西可以超出漸漸發展底範圍和自流以外。再，我們布爾塞維克的態度，改造時期要發展底新道路，階級鬥爭底劇烈化和這個劇烈化底結果等，使他們陷於恐慌、失措、畏懼、驚駭。因此很明顯地，他們見到一切與我們黨底最激烈的口號有關係的事物便退却了。他們和有名的柴霍夫小說『喪中人』的英雄，希臘文教員比里可夫所害的病相同。你們記不記得柴霍夫的小說『喪中人』？你們都知道，這位英雄不管天氣冷熱，總是不離套鞋、棉大衣和雨傘。有人問他：『請教，為什麼在七月這樣熱的天氣裏，你還是穿着套鞋和棉大衣？』他回答說：『以防萬一。恐怕有什麼意外的事情發生呢！假如忽然寒冷起來怎麼辦？』（全場大笑。鼓掌）他怕一切新的和出乎常人底灰色庸凡生活的常規以外的東西，如同怕瘟疫一般。人家新開了一個飯堂，比里可夫立刻就驚慌起來：『有個飯堂固然不錯，可是看罷，恐怕發生什麼意外。』組織了戲劇研究組，設立了讀書室，比里可夫又驚慌起來：『為什麼要這些戲劇社和新讀書室呢？看罷，要有什麼意外發生，怎麼辦！』（全場大笑）

右傾反對派過去的領袖們就是這樣。大家還記得把高等技術大學轉交給人民經濟委員會的一段歷史嗎？我們曾經把兩個高等技術大學轉交給國民經濟最高委員會。照說，這是一回小事。可是我們卻遇到了右傾分子方面拚死命的反抗。『把兩個高等技術大學轉給國民經濟最高委員會嗎？為什麼這樣幹？等一等不好嗎？看罷，從這個花樣裏生出什麼意外來怎樣辦。』現在我們所有的高

等技術大學都交給各經濟的人民委員會了。可是並沒有什麼意外，我們還是活着。再舉個例子，譬如，關於用非常手段來對付富農的問題。大家還記得，右傾反對派底首領們爲這件事會如何的向我們發神經病呵？‘用非常的手段來對付富農麼？爲什麼要這樣幹呢？對富農採用自由的政策不更好嗎？看罷，從這個花樣裏生出意外來怎麼辦。’，可是現在我們進行着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假如把反對富農的非常手段，同這個政策比起來，那簡直是件小事。可是並沒有什麼意外，我們還是活着。再譬如關於蘇維埃農場和集體農場的的問題。‘蘇維埃農場，集體農場嗎？要他作什麼？我們忙什麼？看罷，要因爲這些蘇維埃農場和集體農場生出什麼意外來，怎麼辦。’，諸如此類的很多很多。

這就是怕新的，不會用新的方式對付新的問題，這樣的驚慌——‘發生意外怎麼辦，——正是癡中人的特點。這種特點阻礙右傾反對派過去的首領們真正地與黨一致。

特別是困難當前，天空中現出一小朵烏雲來的時候，癡中人的這些特點，便更由許多滑稽的樣子表現出來。只要我們那裏發現一些困難和障礙，他們便馬上慌張起來：發生意外怎麼辦。只要聽見了一個章螂叫，並且章螂還未能全身爬出洞來的時候，他們就已經嚇得向後逃走了，驚心碎胆地哭喊起大禍臨頭和蘇維埃政權滅亡來。（全場哈哈大笑）我們安慰他們，並盡力地向他們解釋，說這一點危險也沒有，這只不過是一個章螂用不着害怕。但是，這不中用！他們還是繼續的哭着說：‘這怎是章螂呢？這不是章螂，這是成千成萬的猛獸呵！這不是章螂，這是深淵，這是蘇維埃政權的末路。’於是就我隣人來評判……布哈林關於這個問題寫了一個提綱，並且把他送給中央委員會。他肯定地說，中央的政策使國家走到了滅亡的地步，蘇維埃政權一定滅亡，如果現在不滅亡，那麼至多不過一個月就要滅亡。賴可夫同意布哈林這個提綱，可是他與布哈林却有極大的分歧，這種分歧就在於據他的意見，不是經過一個月，而是經過一個月零兩天，蘇維埃政權才會滅亡。（全場大笑）湯姆斯基同意布哈林和賴可夫的意見，但他又反對他們，說他們沒有能够不用提綱和不用文件，

以後還要為這些提綱和文件負責：“我向你們說過許多次，你們願意怎樣幹就怎樣幹，可是不要留下文件，不要留痕跡，，（全場哈哈大笑。不斷地鼓掌。）是的，經過一年以後，到傻子都明白了章螂的危險連一個空蛋殼都不值的時候，右傾分子才開始蘇醒過來，鼓起勇氣，甚至還吹起牛來說，他們從來沒有怕過任何的章螂，章螂不過是一個一點力氣沒有的甲蟲。（笑聲。鼓掌）但還要經過一年，可是在這一年中却要和這些不果決的人打麻煩。

同志們，就是這些情形阻礙了右傾反對派過去的首領們與黨的領導底核心接近並和他們團結到底。

這樣，究竟怎樣辦才好？

只有一個方法：把過去的一切澈底的拋棄，按照新的方式把自己從新武裝起來，並與我們黨的中央委員會結成一團為布爾塞維克的發展速度而奮鬥，與右傾奮鬥，其他的方法沒有。

右傾反對派過去的首領們能夠作到這一點那就很好。假如不能的話，那他們就只有抱怨自己了。（全場不斷地鼓掌，歡呼，全體起立，唱“國際歌”，。）

論經濟工作人員的任務

在全蘇聯社會主義工業中工作人員

第一次代表會議上的真誠詞

同志們！你們大會的工作快要完了。現在你們將要通過決議案，我相信這些決議案必會一致通過。你們在這些決議案裏（這些決議案我知道一些）讚同一九三一年的標準數字，並說要負起完成牠們的責任。

布爾塞維克的話是慎重的。布爾塞維克已養成了有言即行的習慣。但到底什麼叫做負起完成一九三一年的標準數字的責任呢？這乃是說，保證工業生產品總共增加百分之四十五。這實在是個很大的任務。但這還不够，負起這個責任，就是說你們不僅應許在四年中完成我們的五年計劃，——這件事已經決定了，再用不着任何的決議案了，——這乃是說你們應許在主要的、基本的工業部門中三年完成牠。

大會應許完成一九三一年的計劃，應許三年中完成五年計劃，這很好。可是我們已經受過“苦經驗”的教訓了。我們知道，應許並不是永遠都能履行的。一九三〇年初，也曾應許過完成全年的計劃。那時應該將我們工業的生產量提高百分之三十一至三十二。可是這個應許未曾完全執行。實際上一九三〇年工業生產量只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我們應當問：今年不能重覆這種現象嗎？我們工業中的指導者，工作人員們，現在應許在一九三一年裏將工業生產量提

高百分之四十五。但什麼可以保證這個應許能夠完成呢？

需要有什麼條件，才能完成標準數字，使生產量增加百分之四十五，不在四年中完成五年計劃，而在基本的、主要的部門中三年便完成呢？

這需要兩個根本的條件：

第一，這需要有實在的，或像我們常說的，「客觀的」可能性。

第二，需要有願望和才幹來指導我們的企業，使這些可能化為實際。

去年我們有沒有完全完成計劃的「客觀」可能性呢？是的，有。許多不可爭辯的事實能證明這一點。這些事實便是，去年三月和四月裏工業生產量比上年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一。但要問，為什麼我們未曾完成全年的計劃呢？受了什麼阻礙？什麼東西不夠呢？利用已有的可能性的能力不夠。正確的指導工廠、製造廠、礦井等的能力不夠。

我們當時有第一個條件：完成計劃的「客觀」可能性。但我們的第二個條件——指導生產的能力——却不十分充足。就是因為指導生產的能力不夠，結果計劃才未完成。生產未能增加百分之三十一至三十二，而只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

自然，增加百分之二十五這已經很多了。在一九三〇年裏沒有一個資本主義國家有過生產的增加，並且現在也沒有。在一切資本主義國家裏，毫無例外，生產都會猛烈的低落。在這種條件之下生產增加百分之二十五已經是很大的進步了。但我們當時可以增加得更多。那時我們有一切必需的「客觀」條件。

那麼，有什麼保障可以保證不重新發生意外，保證計劃完全完成，保證我們能適當的利用已有的可能，保證你們的應許很大一部分不祇留在紙上呢？

在各國的歷史中，在軍隊的歷史中，曾有過這樣的情形，即成功和勝利的一切可能性都有，但這些可能性却空費了，因為指揮的人未看見這些可能性，未能利用牠們，而軍隊失敗了。

我們有沒有完成一九三一年標準數字所必需的一切可能性呢？

是的，我們有這些可能性。

首先便需要國內有充足的天然財富：鐵礦，煤，石油，糧食，棉花。我們有沒有這些東西？有。我們所有的比任何國家都多。譬如拿烏拉爾講吧，沒有任何國家裏可以找到這樣財富齊全的地方。礦產，煤，石油，糧食——烏拉爾是應有盡有。我們那裏什麼東西都有，或者說，除了樹膠。但過一二年，樹膠我們自己也有了。從這方面，從天然財富這方面講，我們有充分的保障。實在有的比較我們需要的還多。

還需要什麼呢？

還需要有一個政權，這個政權要有願望和有力量來設法使這些廣大的天然財富為人民所利用。我們有沒有這樣的政權呢？有。不錯，我們利用天然財富的工作，並不是永遠遇不到我們工作人員的抵抗的。譬如去年關於創立第二個煤炭五金根據地（沒有這個根據地，我們就不能再向前發展）的問題，蘇維埃政權不得不進行一點鬥爭，但我們已經克服了這些阻礙，並很快地我們便有這個根據地了。

還需要這個政權能得到千百萬工農羣衆的援助。我們的政權有沒有這種援助呢？有。在全世界你們再也找不到另一個政權，像我們蘇維埃政權一樣，能得到工農的那樣援助。我不要講社會主義比賽的發展，模範隊運動的升漲，迎接工業財政計劃運動等等事實。在這些事實裏可以很明顯的看出千百萬羣衆對蘇維埃政權的援助，這些事實是誰都知道的。

還需要什麼才能完成和超過一九三一年的標準數字呢？

還需要有一種沒有資本主義那些不可救藥的病症，而比資本主義制度有許多優點的社會制度。危機，失業，浪費，廣大羣衆的貧困——這就是資本主義不可救藥的病症。我們的制度沒有這些病症，因為政權在我們手裏，在工人階級手裏；因為我們有計劃地經營經濟，有計劃地積累財富和正確地按國民經濟部門來分配他們。我們沒有資本主義那些無救的病症。這便是我們與資本主義的分別，這便是我們超過資本主義的可決定一切的優點。你們看一看資本家想怎樣走出危機。他們盡量地減低工人的工資。他們盡量地減低原料和食品的價

格。但他們却不願怎樣鄭重地來減低工業製造品的價格。這就是說，資本家企圖在商品的主要消費者農工的身上打算盤，企圖在生產原料及食品的那些國家的勞動者身上打算盤來救濟危機。資本家勢將砍樹。不但不能走出危機而反將使之加深，積累起新的條件來促成新的，更劇烈的危機。我們的優點便在於我們沒有生產過剩的危機，我們沒有，並不會有幾百萬失業者，我們的生產中沒有無政府狀態，因為我們是按着計劃來經營經濟。但這還不够。我們是工業最集中的國家。這便是說，我們能够在最新的技術基礎上來建立我們的工業，並因此而保證有空前的勞動生產率，空前的積累速度。從前我們的弱點在於這個工業是建築在放蕩的和小的農民經濟上。但這是從前的事。現在已經不是這樣了。明天，或者一年以後，我們便將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農村經濟的國家。蘇維埃農場和集體農場——他們都是經濟的形式——今年便已經供給了我們商品類額的二分之一。這便是說，我們的制度，蘇維埃的制度，使我們有迅速前進的可能，而這種可能性沒有一個資產階級國家能够幻想得到。

還需要有什麼，才能一日千里的前進呢？

需要有一個十分團結和十分一致的政黨，來把工人階級最優秀份子的一切力量向一個目標集中，又要有充分的經驗，以便不致遇困難而倉惶失措，並有系統地來執行正確的、革命的、布爾塞維克的政策。我們有沒有這樣的黨呢？有。他的政策正確不正確呢？正確，因為他收了極大的成效。這現在不僅工人階級的朋友，就連他的敵人知道了。請看天下聞名的“可愛的，先生們——美國之驚喜，英國之柴爾吉利，法國之普恩凱賽等怎樣的發瘋反對我們的黨。為什麼他們發瘋反對呢？因為我們黨的政策正確，因為這個政策屢屢收效。

同志們，這就是使我們容易完成一九三一年標準數字的那些可能性，他使我們有四年中完成五年計劃的可能，而在最主要的部門中並可三年完成。

因此，完成計劃的第一個條件——“客觀的，可能性，我們是有的。

我們有沒有第二個條件——利用這些可能性的能力呢？

說，即是我們的工廠、製造廠、礦井等等有沒有正確的領導呢？這

些事是否都很妥當呢？

可惜，在這方面並不是都很妥當。我們既是布爾塞維克，說話就該爽快，公開。

什麼叫做指導生產？我們這裏不是什麼時候都用布爾塞維克的觀點來觀察指導企業的問題。我們這裏時常有人想，指導——這就是在紙上簽字。這很可痛心，但這是事實。有時使你不知不覺地便回憶起舒欠得林所描寫的頑固人來。你們記得，老頑固教訓小頑固說：不要研究科學累壞腦袋，不要研究事情，讓旁人去幹這些事吧，這不是你的事，——你的就是指導，在紙上簽字。很可恥的，我們也當承認，在我們布爾塞維克中間，還有不少人是用紙上簽字的方法做指導工作的。至於講到深入事務，學會技術，成為事業的主人，——在這一點上却絲毫沒有。

怎樣能夠發生這種事情呢？我們布爾塞維克已經作了三次革命，在國內的血戰中得到了勝利，解決了建立工業這個最偉大的任務，領導農民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而指導生產時却祇玩弄紙條呢？

原因是在紙上簽字比指導生產更輕便。因之就有許多經濟工作人員走了這條阻礙最少的道路。這裏我們中心也有罪過。十年前曾提出這樣的口號：‘因為共產黨員還未能好好的懂得生產的技術，因為他們還需要學習管理經濟，所以就讓老技師、老工程師、專家們進行生產吧，而你們共產黨員，不要干與技術方面的事情，可是，雖然不干與，但要學習技術，要不住手地學習管理生產的科學，以便後來與忠實的專門家共同成為生產的真正指導者，成為真正管事的主人翁。’這就是那時的口號。但結果怎樣呢？結果把這個公式底第二部分棄去了，因為學習比紙上簽字更困難，而這個公式的第一部分却成庸俗化了，把不干涉解釋成爲不學習生產技術。結果落得莫明其妙。這種情形非常有害和非常危險的，越能趕快消滅牠越好。

生活本身會屢次報信給我們，說在這件事上有些不妙。煤礦案件便是第一次信號。煤礦案件告訴我們，黨的組織及職工會沒有充分的革命警備心。牠證

明，我們的經濟工作人員在技術方面落後得太不成體統了，證明有些舊工程師和技師，做工作毫無監督，很容易走上賊害行動的道路，況且國外敵人不斷的用“提議”，來鼓勵他們。第二個信號便是工業黨的案件。

自然，賊害行動的基礎是階級鬥爭。階級敵人當然要極力地反抗社會主義的進攻。但祇拿這一點來解釋賊害行動的如此發展，這是不夠的。

賊害行動為什麼能擴張到這樣大的範圍。這是誰的罪過呢？這是我們的罪過。如果我們曾把指導經濟的工作變更一下，如果我們能夠更早的開始學習技術，學會技術，如果我們更能勤快、更靈敏的干涉經濟指導的工作，——賊害分子或者不能賊害得這樣多。

應該自己成為專門家，成為事業的主人，應該注意技術智識，——實際生活已把我們推到這裏來了。可是無論第一次信號，或甚至第二次信號，都還未能保證我們得到必需的轉變。已到時候了，早已到注意技術的時候了。已經到了丟棄不干與技術這個過時的老口號的時候，而應該自己成為專門家，成為懂事的人，成為事業的全權主人翁了。

常有人問，為什麼我們沒有專責制？我們什麼時候不學會技術，甚麼時候便沒有專責制，並且也不會有。我們布爾塞維克中間沒有足量的人很熟習技術、經濟和財政等等問題，我們便不能有真正的專責制。你們儘可盡量地為決議案，隨便作甚麼應許，可是若不懂得工廠、製造廠和礦井上的技術、經濟和財政，——便沒有意義，便沒有專責制。

因此，任務便在於自己學會技術，自己管事。祇有這樣才能保證我們的計劃能夠完成，而專責制能完全實行。

這當然不是容易的事，但這完全是可以辦到的。科學，技術，知識，——這都是可以求得的。今天沒有，明天就可以有。最要緊的就是要有布爾塞維克的熱烈的願望來學會技術，學會生產的科學。祇要有熱烈的願望，便能夠達到一切，能夠克服一切。

有時有人問，不可以減低速度，阻止一下運動嗎？不行，同志們！不要減

低速度！正相反，按着已有的力量和可能性，還應該提高速度。我們對蘇聯工農所負的責任要我們這樣做。我們在全世界工人階級面前所負的責任要我們這樣做。

減低速度就要落後。落後就要挨打。但我們不願意挨打。我們絕不願意！然而俄國在古代的歷史中，却正是因為他落後而挨了人家的打。蒙古的“可汗”，曾打過他。土耳其的“拜”，（地主——譯者）曾打過他。瑞典的的封建諸侯曾打過他。波蘭和立陶瓦的“潘”，（貴族——譯者）曾打過他。英法資本家曾打過他。日本的爵士曾打過他。差不多人人都因為他落後而打過他。這是因為他軍事上落後，文化上落後，國家落後，工業落後，農業落後。他們打他是因為他們既有利，而又無罪。你們還記得革命前一個詩人的話：‘母國俄羅斯啊！你既貧困，你又富裕，你既強大，你又無力’。這些先生們把這位老詩人的話學得很好。他們一面打一面申斥道：“你富裕，——就可以靠你生活了。他們一面打一面申斥道：“你貧弱，——這就可以欺侮你，掠奪你，而不受罰了。打落後的和軟弱的，——這已經是剝削者的法則了。資本主義狼子的法則。你落後，你軟弱——那麼你就不對，就可以打你，壓制你。你強大，——那麼你就對，就應該對你小心。

這就是我們不可再落後的的原因。

從前我們沒有過祖國，且也不能有祖國。現在我們既然打倒了資本主義，我們的政權是工人的，——我們便有了祖國，我們要保持牠的獨立。你們願意我們的社會主義祖國被征服，並使之失去獨立嗎？如果不願意，你們就應該在最短的期間，消滅牠的落後，並在牠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上，發展真正布爾塞維克的速度。別的辦法沒有。所以列甯在十月革命時就說：“或者死，或者趕上和趕過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

我們比先進的國家落後了五十年——一百年。我們應該在十年之內趕上這個路程。我們不能這樣，便將被人蹂躪。

這就是我們在蘇聯工農面前應盡的責任。

但我們還有許多更嚴重和緊要的責任。這便是在世界無產階級面前應盡的責任。這些責任是與第一種責任相符合的。可是我們把牠看得更高。蘇聯的工人階級是世界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我們不僅是靠着蘇聯工人階級的努力而得了勝利，並且還有賴世界工人階級的援助。沒有這種援助我們早被毀滅了。人家說我們的國家是世界各國無產階級的突擊隊，這話講得很好，但這給我們加上了許多極嚴重的責任。國際無產階級爲甚麼來援助我們，我們爲什麼值得這樣援助？就是因爲我們最先與資本主義作戰，最先建立了工人的政權，我們最先開始建設社會主義。並因爲我們所作的事，如果成功了就可翻轉全世界，和解放整個工人階級。但怎樣才能成功？就要消滅我們的落後，發展建設工作中很高的布爾塞維克的速度。我們應該前進，使全世界工人階級看着我們，能夠說：他真是我的先進隊伍，他真是我的突擊隊，他真是我的工人政權，他真是我的祖國，——他們做自己的事業，就是做我們的事業，很好，——我們來幫助他們反對資本家，來鼓動世界革命事業。我們應否滿足世界工人的期望呢，應否在他們面前盡我們的責任呢？是的，如果我們不願意有奇恥大辱，我們就應該這樣做。

這就是我們的國內和國際的任務。

你們看見，他們一定要我們用布爾塞維克的速度來發展。

我並不是說，我們在指導經濟方面任何成績都沒有的。有成績，並且還很多。我們將工業的出產量增到了戰前的兩倍。我們創立了世界上最大的農村經濟生產。但如果我們在這個期間真正地學會了生產，學會生產的技術，學會生產的財政和經濟方面，那麼我們還能夠得到更多的成績。至多在十年中我們必要趕上我們落在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後面的路程。我們一切‘客觀的，可能性都有。只是真正的來利用這些可能性的能力不夠。而這却要靠着我們。只有靠着我們。到了我們學習利用這些可能性的時候了。到了拋棄不干涉生產的腐敗意見的時候了。你若是工廠的經理，——就什麼事都干涉，甚麼都究研。一點也不放鬆，學習了再學習。已經是布爾塞維克自己成爲專門家的時候了。在

改造時期，技術決定一切。而經濟工作人員若不願意學習技術，若不願意學會技術，這就是蠢才，而不是經濟工作人員。

有人說技術很難學會。這話不對。沒有布爾塞維克攻不下的城寨。我們解決了許多極困難的任務。我們打倒了資本主義。我們奪到了政權。我們建立了極大的社會主義工業。我們推動中農走上社會主義道路。從建設的觀點看來，最重要的事我們都作了。所剩的不多了：學習技術，學會科學。等到我們辦到這一層的時候，那時我們前進的速度將是我們現在所不敢設想的。如果我們真想到這點，那我們就能作到！



翁 懋 胤 翰

一 各： 祺 太 林 翰

巴 以 塞 二 大 不 可 計 之 一

翁 一

界 世 濠 岡 一 香 人 岡

[不 勤 吳 一 本 香 ， 而 吳 一 副 圖 畫 ， 一 蘇 友 器 ！]

濠 味 畫 亂 出 類

釋 濠 濠 而 罕 見。

辭 代 ， 既 論 辭 窮 ， 付

界 。 全 齊 主 處 而 先 漸

視 不 會 登 奏 的 辭 辭 與

與 門 陛 數 人 勝 的 墨 墨

門 法 法 法 的 畫 畫 ， 動

呈 似 舊 的 畫 史 ， 與 史

福 實 土 ， 比 學 與 門 辭

的 專 業 的 人 的 一 坐 的

一 脚 好 良 飲 一 淋 大 翻

香 的 本 意 ， 只 是 要 翁

界 的 知 是 的 史 籍 。 許

知 世 對 ， 濠 濠 濠 濠 世

的 辭 大

丁 濠 濠

香 目 翠

香 景 許

本

大 一 永 二 翁 尚

列寧主義問題

下卷·新版

· 每冊實價二元三角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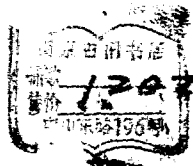
著 者 斯 大 林

出 版 者 中 國 出 版 社

經 售 者 全 國 各 大 書 店

||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
|| 民國二十九年三月版 ||

上,下冊共 120卷



22751

